

## 目 录

前 言	康 昭 (1)
阿卜杜·卡德尔及其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	(3)
麦萨利·哈吉：阿尔及利亚革命不幸的先行者	(12)
摩洛哥独立的先驱：阿拉尔·法西	(28)
摩洛哥国王哈桑一世	(35)
阿布希里和坦桑反抗德国统治的斗争	(43)
拉明·盖耶的一生——从旧非洲到新生的塞内加尔	(57)
马巴：武装反抗法国对塞内冈比亚征服的领导者	(71)
塞缪尔·柯林斯·布鲁：加纳商人与合法贸易的发展	(85)
克瓦库·克索努：阿布隆王国的末日	(100)
阿波美抵抗法国殖民入侵的英雄贝汉津	(128)
抗法战争中的娘子军	(135)
马丁-保罗·桑巴：从服役到起义	(144)
恩儒瓦亚：一位巴蒙素丹的改革与反殖斗争	(165)
中非独立的预言家——卡尔努	(182)
巴泰勒米·博冈达：中非的民权保卫者和幻想家	(197)
翁戈：一位反抗苛捐杂税和强制劳动的加蓬酋长	(215)
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安德烈·马佐阿	(227)
芒杜姆和奥万博族反抗安哥拉的葡萄牙 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235)
根根亚纳和莫桑比克十分艰难的谈判	(249)
马拉维民族主义的先驱者约翰·奇伦布韦	(262)
莫索索一世与莱索托王国的诞生和发展	(274)

## 前 言

非洲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大陆。勤劳智慧的非洲人民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15世纪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先后对非洲发动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侵略和掠夺达到了高潮。至20世纪初叶，整个非洲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和掠夺，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侵略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非洲人民从殖民主义入侵之初，就通过各种方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19世纪70年代以后，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侵略、征服和掠夺的斗争，更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五个世纪以来，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激烈变幻的政治风云，在非洲政治舞台上造就了一批批叱咤一时、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名字，至今仍在非洲人民中广为传诵。

法国“青年非洲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了一套系列丛书：《非洲人物志》，共12册巨型本，约150万字。这套丛书介绍了从公元前几千年的埃及法老，一直到60年代初在非洲有影响的民族主义领袖人物，达121人之多。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夏尔-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André Julien）、马加利·莫尔西（Magali Morsy）、卡特琳·科克里-维德罗维奇（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伊夫·佩尔松（Yves Person）。法、英、美三国等西方国家的著名非洲学家以及非洲各国众多的专家、学者都参加了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为了真实地介绍非洲领袖人物，他们不仅参阅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大量官方档案资料，还亲自到非洲当地搜集了丰富的口头历史传说。因此，这套丛书是一部全面介

绍非洲主要历史人物的大型学术著作。

为了推动我国对非洲历史、特别是对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历史的研究,我们决定从上述丛书中挑选部分人物传记,采取摘译和编译的形式,奉献给我国的非洲学术界。本书介绍的21位非洲风云人物,主要是19世纪前后,殖民主义国家大规模全面入侵非洲之际,领导非洲各族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重要人物。当然,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舞台上涌现的风云人物,远不止本书中介绍的这些人。有些比较著名的人物,如:几内亚抗法斗争的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安哥拉巾帼英雄恩津加,津巴布韦反抗英国入侵的领袖洛本古拉,南非反抗白人殖民统治的国王恰卡·祖鲁,等等,在国内介绍较多,已为我国广大人民所熟悉,故不再介绍。这里介绍的21位风云人物,都是在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舞台上起过较大作用,在非洲人民中有一定影响,而又因介绍不多,我国人民对他们不很熟悉的人物。我们相信,通过本书所作的虽然是很不全面的介绍,也可以使我们看出早期非洲人民为反抗殖民侵略、维护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一些概貌。

由于水平限制,本书在选编和翻译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切地希望国内学者批评指正。

康 昭

1988年9月21日

## 阿卜杜·卡德尔及其领导的 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

大多数经历过征服阿尔及利亚时期的人认为，阿卜杜·卡德尔 (Abd-al Qadir) 是阿尔及利亚人民15年反抗事业的化身。在为民族和自由而战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自由党人为“阿拉伯人民在一位民族领袖的领导下觉醒”而欢呼，并且热情地推崇阿卜杜·卡德尔为“阿拉伯民族的中兴者”或捍卫者。1843年，法国战争部长苏尔 (Soult) 将军把他和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高加索司令官沙米尔 (Chamyl) 一同列为“可以够得上授予伟人称号”的三位当代人物。拿破仑三世皇帝也曾经认真考虑使这位“阿拉伯民族英雄”成为东方阿拉伯王国的君主。

在帝国主义时代，阿卜杜·卡德尔倍受责贬。

自从非殖民化时期以来，他又一次被尊奉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英雄。他证明了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在经受三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之后仍然可能复兴，从而燃起了一种希望。他的同胞们怀着这种希望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

1930年7月5日阿尔及尔被攻占之后，居住在今日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居民的反应是极不相同的，但是没有普遍发生反对基督教入侵者的运动。在奥兰，各部落得知土耳其的奥加 (Odjaq) 被推翻之后，自发地奋起反抗它们的压迫者。库鲁格鲁部落 (Kû-lûghlû) 则情愿与法国人接近，以便对抗它所鄙视的阿尔及利亚人；而宣称前来打击土耳其统治、从而使居民们成为“他们故乡土地的独立的主人”的法国人则时常与这些半土耳其人或者他们的马赫曾 (makhzen) 部落相互勾结。在君士坦丁，艾哈迈德

(Ah'med) 贝伊依靠当地封建势力维持着土耳其政府。在提特里 (Tittri) 部落联盟之间战事纷纷。

根据穆斯林们回忆，这是一个弱肉强食、对外扩张野心昭然若揭的“天下大乱时期”。摩洛哥素丹阿布德拉赫曼 (Abderrh'mân) 企图在特莱姆森 (Tlemcen) 建立统治，突尼斯城的贝伊试图在法国人卵翼下在奥兰设立一个突尼斯贝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失败了。

在梅斯加拉 (Mescara) 及其周围地区，各部落决定把权力赋予一位当地人，让他领导反抗法国的运动。这些部落选择了西迪·穆依·阿丁 (Sidi Muh'yî ad-Din)。他是著名的伊斯兰教隐士、谢里夫出身的贵族、卡第里亚 (Qâdirîya) 宗教社团的穆卡迪 (moqadîm) 和距梅斯加拉10公里以外阿尔哈玛 (Al-Hammân) 河边盖特那 (Guetna) 的扎维亚首领 (Chef d'une zâwiya)。不久，这位虔诚的隐士在几次攻打奥兰不克之后，于1832年11月21日指派他的儿子为作战首领。

他的儿子哈吉·阿卜杜·卡德尔 (El H'ajj Abd-al-Qadir) 出生于1808年并且一直在盖特那生活到1822年。此后，他到奥兰的一所学校就读。在这个贝伊属地 (beylik) 的都城里，他认清了土耳其的统治。他的性格慷慨豁达，但是容不得土耳其人的褻渎和傲慢。从此，他便同土耳其人结为仇敌。他始终不渝地同压迫人民的库鲁格鲁部落和土耳其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升任各部落的统帅之后，并不自称帕夏，而是以信徒的埃米尔和阿拉伯人的素丹自居。为了象征性地表明实施新权力的合法性，他住进了梅斯加拉的贝伊们从前居住的宫殿。在那里，他宣布要结束混乱局面、对奥兰的基督徒作战并且全面实施《古兰经》的法律。1833年，谢里夫部落也承认他为素丹。但是由于对法国作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阿卜杜·卡德尔明智地同意与法国将军德米歇尔 (Desmichels) 谈判。

由于德米歇尔急于缔结和约并且幻想把阿卜杜·卡德尔变成

法国人的附庸，他向阿卜杜·卡德尔提出了一份措辞含混的正式和平条约和一份与巴黎政府意图相左的秘密条约。阿卜杜·卡德尔获得了一个用以输出粮食的港口和购置军需品的自由，此外，法国占领下的奥兰市和摩斯塔加奈姆(Mostaganem)市居民可以自由离开这些城市。这个条约正合阿卜杜·卡德尔之意。他岂能拒绝一个对他有利、把他奉为信徒们的埃米尔的条约？德米歇尔将军如约行事，向阿卜杜·卡德尔供应武器和军需品。但是受到基督徒承认和援助的埃米尔却违背了穆斯林君主不得与异教徒打交道的义务。他众叛亲离、四面受敌。他的亲兄弟率领达尔卡维亚(Darqâwiya)宗教社团反对他，他还不得不同梅德亚(Médéa)的头人哈吉·穆萨·达尔卡维(Haj Hûcâ al-Darqâwi)作战。但时隔不久，他战胜了一些有名望的部落首领，尤其是战胜了穆斯塔法·本·伊斯梅尔(Mûçtafa ben Isma'il)，恢复了声望。他得到了米利亚纳(Miliana)以及阿尔及尔和底特里的部落的拥护。这些部落在1834~1835年打败法国人之后归顺了阿卜杜·卡德尔。

事实上，法国人在对待阿卜杜·卡德尔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德米歇尔离去之后，他的继任者特雷泽尔(Trézel)对埃米尔持反对态度，而且在玛克塔(Macta)战斗中(1835年6月28日)受到毁灭性打击。蒙受耻辱的法国人向埃米尔的都城梅斯加拉发动了征讨。城市被攻陷之后，阿卜杜·卡德尔的贝伊领地分崩离析。他又一次被许多部属抛弃。但是他并没有气馁。他恢复了政权并且在塔格代(Tagdemt)建设起新的都城。然而他懂得，要想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必须要有几年的和平时间。他巧妙地利用法国舆论的和平愿望和多雷蒙(Daurémond)总督与布热(Bugeaud)将军之间的不和，同后者订立了一份十分优惠的条约，即塔夫那(Tafna)条约(1837年5月30日)。法国人撤回沿海地带，实际上把国家交给了阿卜杜·卡德尔。布热在秘密条款中甚至保证向他提供武器并且疏远马赫曾部落的首领。在取得

这一外交胜利之后，阿卜杜·卡德尔于1837~1839年期间致力于使南部和东部桀骜不驯的部落承认他的权威。在战胜撒哈拉的部落并且争取了大量部落首领之后，他收服了阿尔及利亚2/3的地区。他的权势达到了顶点。

法国在征服君士坦丁并且统治了君士坦丁市之后，打算背弃塔夫那条约。与基督徒和解的政策在穆斯林中也不得人心。1839年7月3日，塔扎（Taza）大会决定恢复战争状态。11月20日，圣战开始。这次圣战一直持续了八年，直至1847年的12月。

1840年12月，已经担任总督的布热推行从经济上摧毁阿卜杜·卡德尔国家的总体战计划。他要摧毁阿卜杜·卡德尔国家的城市及其设防要地，要“控制阿拉伯人的农业，不经我们批准，不许阿拉伯人播种、收割和放牧”。布热和他的校尉们在占领梅斯加拉之后，又捣毁了塔夫拉乌（Tafraout）、萨依达（Saïda）、塔扎（Taza）、博加（Boghar）、塞卜杜（Sebdou）诸城。法国人的“行动纵队”袭击部落、抢掠存粮并且伏击阿卜杜·卡德尔的部队。面对这种形势，阿卜杜·卡德尔只能回之以突然袭击并且对降敌部落给予报复性打击。1842年底，布热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他写道：“阿卜杜·卡德尔失去了他的国家的5/6、所有的据点和储备以及他的常备军队，更为惨重的是，失去了1840年以前的威望”。埃米尔被打退到南方，逐渐失去他的王国的国土和经济根据地，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战斗。他重新成为贝都因战士，率领着他的部下和畜群、他的忠诚的部落和正规军战士一直退却到高平原的最南部地区。1843年，在向伊贝尔阿木尔（Jbel Amour）转移途中，几万人的行营遭到路易·菲利浦之子达玛尔（d'Amale）公爵的突然袭击和劫掠。这次失败对阿卜杜·卡德尔的威望是个沉重打击。阿尔及尔省的部落抛弃了他，他的军官只能指挥撒哈拉人和下卡比利（Basse-Kabylie）的几个部落。从那以后，法国将军试图生擒他本人及其家庭剩余成员。经过七个月的追击，他损失了最后一批正规部队。他的最

优秀的军官本·阿拉尔(Ben Allâl)在梅腊(Melah)河战斗中丧生。1843年,阿卜杜·卡德尔不得不到摩洛哥避难。

1844年9月10日,法国和摩洛哥在丹吉尔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素丹宣布阿卜杜·卡德尔在他的帝国各地不受法律保护。阿卜杜·卡德尔受到直接的威胁,并受到法国和摩洛哥部队的夹击,处于绝望境地。他试图带着他的家族返回阿尔及利亚。当他率领着3000名残部穿过摩洛哥人的炮火、成功地渡过穆鲁耶河以后,发现阿尔及利亚南方的道路已经有法国人把守。毫无疑问,他可以带领一些骑兵冲过去,但是为了拯救伤员、妇女和儿童,他宁可向法国人请降。法国临时政府决定把阿卜杜·卡德尔及其部属囚禁于德班(De pan)城堡,后来转移到昂勃瓦兹(Amboise)城堡。

1852年10月16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自来向阿卜杜·卡德尔宣布恢复他的自由。阿卜杜·卡德尔满怀感激之情,到巴黎向路易·拿破仑致谢。后者赐给他每年10万金法郎的丰厚生活费。随后,他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布尔萨,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后来他被获准到大马士革定居。在那里,他同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特别是一些流亡在外的老战士重新相逢。当1860年德鲁兹人大肆屠杀马龙派时,他同老战士们驰援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并且搭救出几千人。阿卜杜·卡德尔受到一致感激,被授予庇护九世勋章。拿破仑三世授予他荣誉军团大绶带。梅及第(Médjidie)素丹授予他一级勋章。

当法国决定远征叙利亚时,在法国掀起了一场支持奥斯曼人压迫下的“阿拉伯民族”的大宣传。建立一个以阿卜杜·卡德尔埃米尔为君主的阿拉伯国家被说成是“东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阿卜杜·卡德尔为伊斯兰教的毁灭而痛心,不愿被法国的政策所利用。尽管当时巴黎的报界已经把他捧为“阿拉伯皇帝”、大马士革的亲王或者叙利亚的总督,但是他对于法国军官的封官许愿却避而不受,并且表示“反对法国部队进驻大马士革的想



法”。1865年8月，拿破仑三世再次劝说他出任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君主，他又一次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1883年5月26日，75岁的阿卜杜·卡德尔死于大马士革。

研究阿卜杜·卡德尔的欧洲人往往首先把他描写成一位宗教人物。同样，穆斯林们提起他这个人物，也说他具有十全十美的信徒形象和品格。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用当时的思想去解释人物。

对于19世纪的穆斯林来说，老战士并不是“反抗者”或者革命的“拥护者”的同义词，而首先是指手持武器传播和捍卫其对真主的信仰的信徒。

阿卜杜·卡德尔作为伊斯兰教的学者，从来没有以先知传教自比，而仅仅以一名真主的信徒自居。他号召“兄弟们”为真主而战，因为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除了安拉之外没有其他的权威。

由于最初的成功和他的公正，他赢得了民众。因为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公正的品德和真主的恩宠是合法行使权力的基础。他对自己的哈里发严格监督，甚至让人在集市上宣布，凡有申冤者，无论何人，皆可直接向他禀告。因而，他赢得了巨大的威信。

对于“他打着宗教旗号对阿拉伯人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影响”，布热深有感触。他在1846年3月3日写给基佐(Guizot)的信中写道：“阿卜杜·卡德尔对民众的巨大影响比他的军事行动更可怕得多。任何部落都无法抗拒他。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战士便拿起武器跟他走”。他吃的是粗茶淡饭，他总是衣着俭朴。他在深夜起床，祈求真主保佑他的灵魂和他的部属的灵魂。他对人以礼相待，不愿对真主的奴仆妄自尊大，不愿表现出高人一等。他廉洁正直，从不愿为私事动用公款。他为穆斯林黎民百姓秉公断案，执法冷静而严格。

阿卜杜·卡德尔正是从信仰和虔诚之中获得了抗拒敌寇和承受失败的力量。

这位埃米尔主张对穆斯林居民实行移民政策，目的是使居民到他的素丹国居住，或者是使他们撤退到残存的领土。他在对部落发布的告示中一再提起这种人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根据埃米尔的信仰，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外交。他笃信伊斯兰国家的君主会援助遭受不幸的兄弟。他曾经谦卑地命令以当时在整个阿尔及利亚西部具有深刻宗教影响的摩洛哥素丹的名义作祷告。他谦称是摩洛哥素丹的哈里发，并且把他在1837年从路易·菲利浦那里接受的礼品奉送给摩洛哥素丹。作为交换，他理直气壮地要求摩洛哥素丹提供武器。后来，在获得谢里夫君主的庇护之后，他又毫不迟疑地在摩洛哥的部落中鼓励圣战并且招兵买马。尽管他从不承认奥斯曼素丹是他的君主，但是1840年和1841年他曾经毫不犹豫地求助于奥斯曼素丹，请求帮助反对“异教压迫者”。另一方面，他从不讳言曾经与基督徒谈判，但仅仅是为了迷惑对方而已。

令19世纪的法国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位没有强大的正规军、几乎没有火炮和财产的阿拉伯首领，如何竟能在1841~1847年期间抗击统帅一支大军（1841年7万人，1845年8.3万人，1846年10.1万人）、拥有大量军火和一个大国的资金的布热呢？在欧洲，人们惊讶的是，轻而易举地战胜过谢里夫帝国大军的布热竟然无法一举打垮一个年轻而脆弱的国家的军队。阿卜杜·卡德尔的敌手认为，他是伏击战和小型接触战的大师。他运用的是突然袭击、打了就撤，以及向高平原运动之后掉头猛攻泰尔（Tell）交替进行的战术。他在给布热的信中写道：“当你的军队前进时，我们就撤；当你的军队被迫撤退时，我们再返回，……我们要使你的军队疲于奔走，我们要伏击你的军队，我们要一点一点地把它摧毁，而让气候去做剩下的事”。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埃米尔最突出的形象莫过于一位独具一格的政治家和国家缔造者。具体而言，他的功绩在于要在阿尔及利亚创建一个靠伊斯兰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从政治上密切部落

或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有组织国家才能够对付一个强大的外国的挑战。

他同马格里布的所有改革者一样，打算把他的国家建立在严格的《古兰经》教条基础之上。例如，他取消了对被征服者收取的传统税收“卡拉依”（Kharaj），并且代之以按收成和牲畜头数收取的《古兰经》什一税“阿古尔”（Aghour）和“扎卡”（Zakat）。他下令铸造一种新的银币，象征性地称之为穆罕默迪亚，并且在各种银质、铜质或青铜质的硬币上只印刻《古兰经》经文。

他的政府体现了一种神权政治。在政府中，权力被赋予宗教头人、神职人员、隐士和先知的后裔。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共同记忆中，他的时代曾经长期被称为“阿拉伯先知后裔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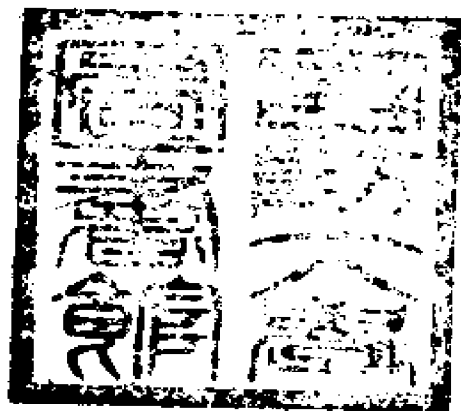
阿卜杜·卡德尔的素丹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招降纳叛仓促建立的，没有时间完全统一起来。人们把它描写成围绕梅斯加拉省建立的一个邦联。阿卜杜·卡德尔政权所收服的领地被划分为哈里发领地（Khalifalik）。最初是两个，即奥兰的加尔部（Gharb）和米利亚纳的夏尔克（Charq），1839年达到8个。每个哈里发领地下设阿甲领地（aghalik），由阿甲掌管。每两年任命一次阿甲。阿甲领地下设卡伊德领地（Caidat），卡伊德（Qaid）每年任命一次，但是可以连任。每个卡伊德领地下分若干谢赫领地（cheikhat）。埃米尔后来曾经说明：“我的命令下达给哈里发，并且逐级下达到谢赫。奏报也通过同样的系统上达到我的手中。”所有这些被授予权力的首领们都食俸禄，每个人的收入因其管辖权之大小而异。这些首领既是作战首领，也是行政官吏。此外，他们还在维持公共秩序和惩治犯罪方面行使司法权。凡属有关《古兰经》法律的大小事宜，尽归卡迪（Cadi）掌管。卡迪也领取一种固定报酬，但是不得收取受裁判者的传统礼品。

这个国家的主要实力以及中央政府对付部落封建势力的手段是正规军。1840年，可能有正规军1万人，其中有8000名步兵。

这些士兵分布在各个哈里发领地之中。埃米尔可以依靠这支军队逼税，而税收又使他得以供养军队和贴补公共开支。他当时曾设想建立一种征兵制度。他说过：“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要使用类似于法国人招兵的办法。”阿卜杜·卡德尔也能够从部落中招募非正规军。据估计，1839年非正规军的数量是5300人；另据估计，1840年达2万人。这支军队从来不缺少火药和枪支。或者从国外购买，或者在米利亚那制造。但是，它所拥有的大炮却寥寥无几。这支军队部分依靠国家供养，特别是从装满税粮和国家土地出产的粮食的官仓获得供给。但是，正如本·阿拉尔（Ben Allâl）哈里发所说的那样，“素丹的真正的实力在于大多数穆斯林对他的同情”。埃米尔总是能够找到志愿兵和非正规军。

一份由布热身边的人士起草的正式调查结论是这样写的：“要论埃米尔真正的实力，那就是他激起了人民对他的热爱。他打着他所捍卫的宗教的旗号，对阿拉伯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巨大影响。他具有非凡的、不可抗拒的威望。他的军队非常机动灵活”。

（杨光 编译）



## 麦萨利·哈吉：阿尔及利亚 革命不幸的先行者

1974年6月3日，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了。死亡终于使他结束了流亡，返回故乡城市特累姆森，该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阿尔及利亚的当代历史人物中，象麦萨利·哈吉这样争议很大的人物并不多见。这位先行者在余生之年不得不奋力抗争，以便洗清叛徒的罪名。回顾麦萨利的一生，就是要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并且实事求是地再现这位曾经领导过“北非之星”（1926～193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党（1937～1946年）和“民主自由胜利运动”（1946～1954年）这些阿尔及利亚革命筹备组织的人物的形象。

麦萨利·哈吉是明确提出以独立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理论的第一个阿尔及利亚战士。他不愿沉醉于同化的幻想之中。他对于部分解决不抱丝毫幻想。他信仰解放和人民起义的力量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他的声望远远超出了阿尔及利亚的国界。1959年1月28日，哈比卜·布尔吉巴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我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自由是你一生的目标……历史必将说明，你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之父。尽管受到种种镇压，但是你以行动培养了千千万万久经考验的战士。”然而，把他赶下政治舞台的正是他所培养的战士。民族解放阵线以统一政治生活和必须实行一党制为理由，对他逐渐疏而远之，然后，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通过禁止他的政党活动，以行政手段排挤了他。

麦萨利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诞生中起过何种作用？他的

个性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败落？麦萨利主义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正是要围绕这三个问题从麦萨利一生的事件、思想和他的政治生涯中寻找答案。

### 一个普通的阿尔及利亚人(1898~1923年)

艾哈迈德·乌尔德·哈吉·乌尔德·布贾尼于1898年出生于特累姆森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祖父在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后移居摩洛哥的乌季达，他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父亲在距特累姆森6公里的撒夫撒夫经营4公顷的一小块土地。土地收入微薄，难以养活自家以及与他家合伙的一家亲戚。冬天，他还到蒙大涅克的一个驿站去做工，寻求一份补充收入。特累姆森的居民看他持重、虔诚、干活卖力，就委托他看护西迪·布迈丁的陵墓。后来，他的一家因缴不起房租而不得不离开撒夫撒夫。

如果说麦萨利从他父亲那里懂得了对土地的热爱，那么，卡迪出身的母亲则使他受到宗教的熏陶。他母亲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她教他区分忍耐和屈从，并且谆谆教导他以礼待人，以至后来奥兰军团的战友们都把他看成是“小大人”。

在这个每日为生活而奔忙，7个人合住一间房的家庭里，麦萨利不能正常上学。他很早就退了学，步入了生活的课堂。教育对他来说是一种深深的向往。成年之后，他成为一名刻苦的夜校生。“我象水上飘荡的瓶塞一样生活。”麦萨利在他的回忆录中用这句简洁的话概括了他一生中的头20个春秋。9岁时，他学习理发，后来又学修鞋。10岁时，他离别家人，到距特累姆森10公里的埃尔·古第家中去作杂货店伙计。从此以后，他不得不只身在店铺后间生活。这些早期的经历给他留下痛苦的记忆，培养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乘一次宗教节日的机会，他返回了特累姆森，并且在他母亲的庇护下住了下来。他失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一家卷烟厂招去做贴标签的工作，后来因禁止儿童做

工的法律而被解雇。麦萨利与工会的头一次接触并不成功。解雇引起他的强烈不安。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在他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能够给予他这种解释。他暗想，“谁要是能给我解开这个秘密的钥匙，他就是我的真主”。“我想，只有法国人的学校才能使我摆脱这个时刻萦绕在脑海中的念头。”三个月以后，本区的一位小学教师默哈迈德·克卢什让他复了学，他同时还在德加瓦教团的哈吉·默哈迈德·本·耶累学校上学。1916年，他未能取得初等教育毕业文凭，离开了学校，踏上了通向舅舅的杂货店的道路。他在那里当了一名职员。

义务兵役制扩大到阿尔及利亚人头上之后，改变了他的生活环境，使他走上了个人冒险的道路。

1918年，麦萨利参加了法国军队。他离开特累姆森来到奥兰，被分配到奥兰第20军团军需处。1918年4月第二周，他乘西迪·布拉欣号船前往法国。他驻扎在波尔多，举目无亲，必须自己开辟道路。

麦萨利在青年时期受过多重影响。所有影响都来自被剥削阶层，有时也来自一些与其观点一致的法国人。他是一个主张漠视人间荣华富贵和疏远当权人物的教会门徒，认为在下层社会阶级中才有有德之人。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深信，法国人的优越地位只不过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未来是属于伊斯兰的。作为默哈迈德·布瓦耶的学生，他所学到的是：阿尔及利亚苦难的根源不仅在于殖民化。古老的土地经营方式和人的因素也妨碍着国家的发展。幼年时，他认识了一个法国人科杜夫人，他视她为第二个母亲。他在巴黎与她重逢，而且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埃米丽·比斯干，一位工人积极分子，巴黎公社社员的孙女。通过科杜夫人和她那位在特累姆森穷人区免费为人治病的丈夫，麦萨利认识到法国人的另一种形象。

他在这些方面的个人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当时，他还没有任何确定的思想，而且远未想到有朝一日会投身于政治行动，并

且去同独占阿尔及利亚舞台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斗争。

在波尔多，麦萨利应邀去法国人家中做客，逛剧院，旁听波尔多大学课程，提高阿拉伯语素养。

1919年8月，麦萨利获下士军衔，并于9月休假一个月。他返回特累姆森，看到了一个发生过社会变革的城市。商业活动已使资产阶级致富，并且使许多工匠摆脱了贫困。他并不敌视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进步可能预示着阿尔及利亚人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对殖民地行政当局的顺从却使他不安。他暗想，他们是否会为了自身的地位而置人民于不管呢？当他接触到一些只关心自己晋升而置周围老百姓的困苦于不顾的官员们之后，这种担心增强了。他从前那种对精英的仰慕和尊敬因此而淡漠下去。他发现，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集团既没有这种精英的文化，也没有他们那种见识，而是期待着一种彻底的变革。此外，以1919年2月4日关于穆斯林土著居民诉讼法的法令为开端的改革没有涉及移民的权利，也没有涉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大多数。尽管选举团扩大了，但是纳税人选举制度和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人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1920年初，麦萨利被任命为上士。他的待遇提高了。但是他却发现，他的军饷是1.5法郎，而与他同时晋升的一位法国战友却领到7法郎。他感到待遇不公，并且向军队领导部门提出书面抗议，但后者却答复他说，根据《土著居民法》，他不能享有法国人的权利。一批支持1919年2月4日法令的军官在波尔多大学的雅典娜教室举行了一次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报告会，公开敌视移民，他便把战友们召集在一起，并提议掀起反对《土著居民法》的运动。他的提议没有得到丝毫反响，但却反映出一种行动起来的愿望，这种愿望与日俱增。1920年4月，麦萨利第一次买来了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阅读《人道报》使他的思想掀起一场“小小的革命”。法国铁路工人的总罢工告诉他，存在着一种工人的团结和一种新的斗争方法。后来，他长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新



的道路在他的眼前展开了。

1921年退伍之后，他回到特累姆森。他不愿恢复过去那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不美好也无尊严”的生活。怎么办？父亲建议他去撒夫撒夫经营土地，母亲希望他再去舅舅的杂货店当伙计，政府为他在警察局安排了工作，他都拒绝了。麦萨利感到不能象以前那样生活下去。几个事件使他决定出走。

1921年，他由于站在提扎维咖啡馆的桌子上，当着一群法国军官高喊“穆斯塔法·卡迈尔帕夏万岁”而受到警方的传讯。这件事向他证明，在阿尔及利亚，一个象他这样处境的愿意行动起来的人，即便在必要时也不可能拥有言论自由。

1922年，他的母亲死了。他在特累姆森的最大牵挂已不复存在。

他深为政治活动所吸引，但这种活动仍然控制在显贵们的手中。哈立德埃米尔在途经特累姆森的时候，只去拜访大家族，而渴望见到他并与之会谈的麦萨利和他的朋友却不能接近他。在他们眼里，哈立德埃米尔的作风同正在特累姆森访问并首先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和愿望的共产党议员保罗·瓦扬·库蒂利耶截然不同。

在阿尔及利亚，劳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当时在特累姆森所做的工作对我来说既不满意也不适合。与劳动法和劳工权利相反，我认为这种工作使人精疲力尽……我自从自立之后，至少在5个老板那里干过活。他们没有一个在招募我的时候说定我的工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和休息日……劳工被当作一批无足轻重的人。这使我愤怒和失望，甚至诅咒这种劳动，诅咒我国的社会。更使我愤怒的是，这些老板竟然整天对伊斯兰教条、大清真寺的祈祷和麦加朝见津津乐道。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实。而我呢，我吃惊，我不能对此沉默不言。”劳动和接触当地老板的经历，促使麦萨利接受了社会问题的革命式解决办法。生活往往是最好的课堂。

## 走上革命道路（1923～1937年）

1923年，25岁的麦萨利离开阿尔及利亚来到法国。他到了巴黎，科杜夫人和他未来的伴侣埃米丽·比斯干帮助他迈出了第一步。在巴黎，他重新见到了被贫困赶出家门的阿尔及利亚农民的子弟和少数为寻求自由，或不如说是为寻求不同于他们在国内所享受的那种自由而来的中产阶级分子。

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同法国的工人阶级结为一体。团结的障碍不仅是种族主义，如果相信了这种论点，那就忽视了更为深刻的障碍。农村出身的移民无产阶级进入了一个与自身的价值和目的都不相同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世界想要改造移民无产阶级，以便与之结为一体，但却拒不接受它的个性。作为无产者，移民们应当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作为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则不得不同排斥其文明的外国文明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遭遇到不准备接受异己的整个法国社会的阻碍。后来，民族主义就是从这场斗争中汲取了力量。风俗和礼仪成为一种区别的标志。移民在劳动者中处于特殊的境遇。他们所从事的是最艰苦和收入最少的职业。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生活在同一些街区、同一些旅馆，在同一些食堂吃饭。他们再现着阿尔及利亚。移民群众在脱离了旧的组织、丢掉旧的动机之后，形成了一种新式的团结：他们具有了民族的思想。麦萨利·哈吉后来成为这种思想的代言人之一和最热诚的捍卫者。

一到巴黎，麦萨利就寻求同政治组织建立联系。1923年，他在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作旁听生时，同“东方阿拉伯人”成立的小团体建立了联系。这个团体与其说是一个战斗性组织，倒不如说更象一个上流社会的沙龙。它每星期五聚会一次，讨论穆斯林世界的形势，并为其复兴而祈祷。麦萨利很快就脱离了这个团体，因为他的行动起来的欲望无法在这里得到表现。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够

尽情释放他身上蕴藏的造反力的环境。他不久就找到了这样的环境。

1924年5月立法选举竞选之际，麦萨利参加了一次法国共产党的集会。加香、多里奥和迪克劳向巴黎的选民们介绍了该党的候选人——来自于勒利加尼的小人物、阿尔及利亚五金工人哈吉·阿里·阿布德卡代尔。集会结束后，麦萨利走上讲台向哈吉·阿里·阿布德卡代尔祝贺。他们约好见面时间，以便讨论阿尔及利亚人的境遇问题。8月，在参加完哈立德酋长的演讲会之后，麦萨利同哈吉·阿里进行了第一次会见。麦萨利很快就同他结成朋友，并且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变成了法共的拥护者。1924~1926年，他同谢比拉、哈吉·阿里和迪拉尼一起探讨建立“北非之星”组织。他是该组织的缔造者之一，后来又担任了该组织的第一任秘书长，并继突尼斯的沙德利·凯拉腊之后于1928年担任了该组织主席。

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证明材料、警方的报告、麦萨利回忆录）表明，“北非之星”的创立是“三种各有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别相结合的产物，即新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力图控制移民并且利用移民劳苦群众的法国共产党和试图削弱包括法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促进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三国际，而且后两个派别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大致如下：共产主义派（哈吉·阿里、谢比拉、马阿卢夫、瑟提、尚迪和图德尔）的成员主要来自殖民地化程度很高的地区。非共产主义派由巴努尼、阿克利、卡杜尔·法尔·撒阿顿、门格卢什、伊伏尔·穆罕默德·奈特·伊拉登组成。在这两派之间不偏不倚的是麦萨利和迪拉尼。他们两人都是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步入政治生活的，麦萨利是通过法共，而迪拉尼则是通过统一总工会。他们都认为法共的殖民地委员会成员对黑人和北非人的组织干涉过多，并且在拉斐特街120号举行的有莫里斯·多列士参加的一次会议上申述了这

种看法。他们都承认，阿尔及利亚问题与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没有任何差别。在他们看来，法国领导人所采取的有背于三国利益的方式、态度和专制行为反映出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在他们的倡导下，“北非之星”于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27年便开始同法共分道扬镳。从那时起，它的政治方针不再象法共那样服从于法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也不服从于苏联官僚主义的利益。

1927年1月30日，新的纲领在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独立的要求被摆在首位。1927年2月14日，麦萨利在沙德利·凯拉腊陪同下，代表“北非之星”在布鲁塞尔的埃格蒙宫参加了反帝大会。在此之际，他遇见了印度的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默哈迈德·哈达，叙利亚的贝克利，日本的片山潜和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北非之星”的民族主义主张与大会提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纲领是一致的。法共不同意这个纲领，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的机关刊物《社会斗争》只转载了麦萨利的演讲，而没有提到这一纲领。法共并未满足于不赞同“北非之星”的路线，而是通过对其领导一再施加压力，试图把另一种路线强加于它。1927年春天，哈吉·阿里·阿布德卡代尔通知麦萨利，法共中止了对“北非之星”的物质援助。法共控制的组织活动场所禁止“北非之星”集会。以麦萨利为首的常务工作人员再也领不到工资。他们不得不去寻找工作。共产主义派积极分子拒不出席会议，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则留下来阻挠非共产主义派的组织活动。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也降临到“北非之星”成员的头上。阿尔及利亚咖啡馆老板不许他们入座。1927年还拥有3500名成员的“北非之星”，到1928年人数已少得可怜。只剩下一些麦萨利的“使徒”。政府在1929年解散了“北非之星”。麦萨利和他的朋友们很快又以“光荣的北非之星”为名重建了这个组织。他们同工人运动中反殖最坚决的派别一刀两断，拒不接受其家长式的控制和殖民地改革的主张，而是从为1930年创刊的《民族报》撰稿的摩洛哥人柯第和韦扎尼以及突尼斯大学生海迪·努伊拉本·苏莱曼那

里得到政治支持。1933年，与法共的决裂彻底完成，双重隶属关系已不可能维持。阿尔及利亚工人对法共和拒不支持他们的阿尔及利亚大学生积怨甚深。1927~1933年是关键性的年头。正是在这一时期，在麦萨利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各个组织的特点开始显示出来。

1. 支持其他组织提出的民主要求，但条件是，这些要求不阻挡国家独立的道路。本着这一精神，麦萨利以“北非之星”的名义，一边毫不犹豫地同当选者联盟的本杰卢尔和神学者协会的费尔哈特阿巴斯建立必要的接触，支持“穆斯林大会”，一边于1936年8月在阿尔及尔体育场召开的万人大会的演讲中拒绝把阿尔及利亚并入法国和参加议会。他也同意暂时不提独立的要求，以便不使“人民阵线”的任务复杂化。

2.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中强调“北非民族革命运动”的团结，不赞成任何只顾本国的战略。

3. 不让激进的本国目标服从于欧洲少数人的意识。

4. 阿尔及利亚问题国际化和摒弃任何主张阿尔及利亚人同法国单独谈判的方针。

5. 把民族的要素简化为宗教（伊斯兰教）和语言（阿拉伯语）。

6. 运用和平斗争方式，但不排除诉诸暴力。

7. 欲称强于整个民族运动。

在制定这些原则的过程中，麦萨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反对共产主义派别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第一代“北非之星”中他的所有战友都承认他是他们的领袖，1933年，“北非之星”把总部设在达盖尔街19号，那是列宁在搞地下斗争时居住过的地方；

“北非之星”修改了它的纲领，设想对关键经济部门实行国家化，并且制作了一面旗帜，它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象征。在麦萨利的倡导下，它的民族主义包含了泛阿拉伯和泛伊斯兰的内容。这并不是同先前的方针决裂，而是强调了那些早已存在、

但因同共产主义者结盟而退居次要地位的特点。因此，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北非之星”试图通过达尼埃尔·盖兰和后来成为其律师的让·罗贝尔·龙格的关系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人权联盟”建立接触。在1934年2月事件发生之后，“北非之星”站在工人组织一边反对法西斯集团。它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所有的工人示威游行。他们的战斗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的法共殖民地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烈·费拉与麦萨利重修旧好，并请他参加人民大会，麦萨利同意了。

摆脱了孤立的“北非之星”使法国政府忧虑不安。不许神学者在清真寺中进行宣教的禁令给麦萨利提供了扩大“北非之星”影响的时机，他把这种影响扩大到商贩之中。捍卫伊斯兰教就是他的口号。5月26日，他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号召“穆斯林在必要的时候拿起武器保卫清真寺”。

民族主义牢固地扎根在移民群众之中，也传播到阿尔及利亚。1934年的一份警方报告表明，“北非之星”出现在37个中心。《民族报》对传播民族主义思想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国政府作出了反应。麦萨利于1934年11月1日被捕。他得到法国左派全体一致的支持，于1935年5月获释。麦萨利多次召集会议，并且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率领“北非之星”支持意大利法西斯的受害者埃塞俄比亚。1935年9月12日，他率领“北非之星”代表团参加了由谢吉·阿斯朗埃米尔主持的欧洲伊斯兰大会。在同一时期，他还曾参加“人民阵线”的一个代表团，该团在国联提出了埃塞俄比亚问题，并发言捍卫被压迫人民，并且主张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由于“北非之星”又一次受到镇压，麦萨利流亡到瑞士。后来，他在“人民阵线”获胜之后回到法国。他的积极活动使“北非之星”有了新的大发展。1936年6月20日，他所参加的代表团向负责内政的副国务秘书递交了两份要求，一份同阿尔及利亚有关，另一份同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劳工有关。“北非之星”要求广泛实行大赦、取消土著居民法、给予民主自由和通过普选

产生议会。在这一时期，它是移民中的第一个阿尔及利亚政党和在阿尔及尔最有影响的政党之一。但是，对1933年纲领立场的后退导致了“北非之星”内部的分裂。麦萨利在确定新目标的时候有两点考虑：不要与人民阵线决裂，不要过分超越伊斯兰教学者、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和议员们，在后者于1936年6月召开的大会上，主张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同化的思想占了上风。在麦萨利成功地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后，1936年12月27日在巴黎召开的有500名积极分子参加的全体大会上，争论爆发了。阿马尔·伊马什领导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派反对同法国政党结盟，决心只依靠马格里布人的力量一直斗争到北非独立。他们在会上遭到失败，并且被排挤出先前由麦萨利支持者组成的领导机构。在新执行局中，麦萨利靠的是“北非之星”第二代积极分子的支持。各派之间的斗争在支部中继续进行。伊马什在支部中指责麦萨利缺乏谦虚。

“北非之星”遭到“人民阵线”政府的解散和穆斯林大会支持者的围攻，这迫使积极分子们加紧团结在麦萨利周围。1937年3月1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在南特诞生。1937年6月18日，该党主席麦萨利把总部迁往阿尔及尔。从此以后，对法国工人运动寄予的希望就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史前史，而麦萨利无疑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之父。

谈论麦萨利主义并非易事。因为这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整套的信念和一种行动方式。它们之所以具有一致性，主要是因为麦萨利强烈的个性以及他与法共交往的政治经历，而不是由于理论的作用。诸如人民主权、必须以被压迫人民的阵线来反对帝国主义、号召群众直接参加斗争这样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当时却是革命思想；它们同一些独特的社会构想有关，这些构想预示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所要实行的是国家支配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麦萨利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不可能考虑建

立一种根本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

### 败落（1937～1962年）

1937年的6～8月，麦萨利走遍阿尔及利亚，到处解释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纲领，并且掀起宣传活动，反对布吕姆·维奥列塔授予2.1万名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公民权的计划。他的党是这项计划的唯一反对者，结果是“精英与大众相脱离”。因此，他不得不同时对付改良派和在穆斯林大会中重新改组的、得到法国工人组织全体支持的共产主义者。1937年8月27日，他被逮捕，11月，根据反法西斯团体法，以重建被解散团体罪被判处两年监禁。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遭到镇压。但是，阿尔及尔市通过了他的纲领，并于1937年10月选举被监禁的麦萨利为总参议。在监狱中，麦萨利继续领导着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并且反对同希特勒德国合作的派别。这一派的领导人起初是《阿尔及利亚议会报》的经理艾哈迈德·布达，后来是默哈迈德·拉米尼·德巴欣尼。

战争爆发后，维希当局请麦萨利与贝当政府合作。据芒沙维先生说，梅松加烈监狱军事指挥官于1940年6月17日，穆夫提·扎卡利亚于1940年11月，A·布门杰尔于同年12月先后向他转交了建议书，后两次都同北非联络处的舍恩上尉有关。麦萨利坚定地捍卫了民族主义立场。1941年3月17日，阿尔及尔军事法庭以反对法国主权行为和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判处他16年强制劳动、20年禁止居留和剥夺公民权的刑罚。极为荒唐的是，竟没有一个左派政府对这一判决提出异议，它竟成为以后对麦萨利加以迫害的法律依据。麦萨利在被移送朗拜兹苦役犯监狱之后，到1943年4月才同被监禁在克萨尔埃尔布哈里的法国抵抗者们一同获得释放。他住在费尔哈特·阿巴斯的家里。在一次招待会上，阿巴斯对麦萨利说：“麦萨利，昨天，我反对过你。我当时是同化的热诚拥护者，而且，我把你打倒了。事实说明，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今天，我信任你，我跟你走”。1944年3月14日，“宣言与自由之友”党成立，麦萨利、阿巴斯和谢克·布拉希米是该党主要领导人。但是，联盟未能持久。改良派提出通过普选成立阿尔及利亚议会和阿尔及利亚在新型关系基础上同法国联合，而麦萨利则强调独立口号并且支持泛阿拉伯和泛伊斯兰派别。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当然是通过直接行动。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领导机构决定举行起义和成立阿尔及利亚政府，并且设法使麦萨利逃脱。1945年4月18日，麦萨利突然被转移到阿尔及利亚南方的埃尔高烈阿，然后从那里被转移到赤道非洲的利伯维尔。5月1日，阿尔及尔和奥兰发生了暴力示威，5月8日，北君士坦丁发生流血事件。殖民地政府进行了残酷镇压。死者成千上万。阿巴斯、布拉希米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把责任归罪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民族主义集团破裂了。1945年5月8日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1954年7月，在奥尔努，麦萨利在“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党大会期间就这一问题写道：“直到那一天为止，我个人并不知道这些事件及其进展的真正来龙去脉和目的”。

1946年，麦萨利被送回法国，然后被送回阿尔及利亚。10月30日，法国司法部长赦免了他的主要刑罚强制劳动，但是维持禁止居留的附加刑罚。

返回阿尔及利亚之后，麦萨利率领他的党参加了议会竞选，并且为此成立了“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党。他的决定引起那些自1945年5月以来就只想把该运动组织改造成准军事组织的人们的反对。在1947年2月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并不是该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在大会期间，拉米尼·德巴欣尼的支持者十分活跃，形势倒向他们一边。麦萨利并不反对创立一个准军事组织，但他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并且是一种“愚蠢的左倾主义”。1949年12月，拉米尼·德巴欣尼被赶下台。对其支持者的斗争尚未结束，麦萨利赋予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一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党的方针又受到挑战。1950年3月，由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的

弗朗西斯、布门杰尔和谢克·拉尔比·特贝希组成的代表团向麦萨利建议，在6月的立法选举时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联合起来。代表团提出了一些条件：

——解散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党的地下组织；

——与阿拉伯联盟和各反帝组织断绝关系；

——正式谴责过去的和将来的恐怖主义；

——分别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与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

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党领导成员莫斯特法伊在中央委员会上宣布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并且以此作为他当候选人的条件。麦萨利与他发生了争吵。莫斯特法伊遭到中央委员会否决后，脱离了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党，并且带走了三位党的领导成员。1952年5月14日，麦萨利被软禁在法国的尼约尔。他在不顾其政党领导机构反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访问之后被流放。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从1952年起，他失去了耐心。他对于使领导机构赞同他的观点已不抱希望，他把争论公诸于党员，揭露党的“随和和妥协”政策、“对突尼斯和摩洛哥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抛弃革命原则和拒不从与其他阿尔及利亚政党联合的尝试中吸取教训。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党员都站到了麦萨利一边。从准军事组织中死里逃生的积极分子重新组织起来，试图使各派言归于好，以便实现麦萨利首先主张的行动。他们未能成功，于是决定准备起义。11月1日，他们行动起来，创建了民族解放阵线党。

在11月1日起义前的几个月里，麦萨利的处境已经恶化了。政府在得知民主自由胜利党分裂的原因之后，便采取措施把他孤立起来。1954年9月20日，政府指定他住进萨布尔道劳尼昂旺代的新寓所。11月5日，他的运动党被解散。他被禁止进行一切访问和会见。1955年4月6日，麦萨利被转移到昂古莱姆。1956年5月23日，居伊·摩勒政府把他流放到贝尔伊尔昂梅尔。他在那

里受到近50名共和国安全队警察的看守。他的运动党改名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

从战略角度来看，民族解放阵线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它的部队拥有较好的武器。由于首先发动武装斗争，它的缔造者博得了厌恶选举行动的革命者的拥护。在全国1000万人口中，原有政党加在一起也超不过5万党员，他们被淹没在数万名新涌现出来的战士之中。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工人和资产阶级失去了其组织的独立性。组织起来的农民大多数参加了解放军。

1954~1956年，受到镇压的主要是麦萨利主义分子。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在制造了一些谋杀之后，于1955年12月在君士坦丁被全部摧垮。1955年1月，该党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局成员。1955年10月，46名行动队负责人被捕。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和西部，民族解放阵线同其突尼斯和摩洛哥支持者用武力阻止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落脚栖身。在中东，埃及支持民族解放阵线，而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代表投入监狱。因此，该党失去了阿拉伯国家的积极支援。

1958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被排挤出军事舞台；但在1962年之前，仍在移民和大城市中拥有一些基础。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麦萨利创建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并且创办了《人民呼声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拥有几百名忠实的拥护者。

麦萨利是个不屈不挠捍卫长远目标的人，但他只是在组织内部这样做。对于那些与其目标相距甚远的人物，只要他们准备在本国的某一领域采取行动，他并不反对同他们建立接触。“民族独立是至高无上的希望和最高崇的解放事业”，这个麦萨利自1927年领导“北非之星”时起就不断为之奋斗的纲领是他的理想的精髓。尽管受到种种考验，他仍然忠实于这一纲领，即便是在1936~1943年期间形势迫使他“缓和或者改变口号”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赞成策略性的妥协，但却从未让步。

在起义前夕，他的拥护者曾指责他搞个人崇拜，他受到阿尔及利亚有史以来空前的迫害。这种指责是改良派的手法。在1954～1956年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盟友，那些执迷不悟的改良派都认为这种指责恰如其分，从而掩盖了他们在1954年11月以前的错误作法，并且把民族主义政党分裂的责任推给麦萨利。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麦萨利只有一点不令人满意，那就是没有重视党内那些声称没有他参加也要进行武装斗争的分子。这是他的一个致命错误。这位民族主义之父的民族主义事业胜利了，而他自己却落入了失败者的行列。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麦萨利是他所无法克服的矛盾的牺牲品。在阿尔及利亚成为自由国家的问题上，利益之争是团结的障碍。他对资产阶级有所警惕，但却轻视了社会斗争。当他的基本力量和领导机构仅仅是工人的时候，这种态度并没有损害他的组织。但是，从1937年起，他的党转移到阿尔及利亚，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对立、相互结盟或者相互容忍的场所。这些社会力量团结的唯一基础是反对殖民主义。因此，斗争的道路和手段问题、内部和外部的联盟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长期争论的话题。因此可以说，麦萨利是他的战略选择的受害者。跟着他走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下层则是受害者阶级。但是，今天，又有多少阿尔及利亚人知道，他们的国旗是麦萨利在巴黎第20区安息街的一个亭子间里制作的呢？

（杨光摘译）

## 摩洛哥独立的先驱：阿拉尔·法西

阿拉尔·法西(Alla al-Fassi)的家族发源于安达卢西亚<sup>①</sup>，由于产生过一些科学家而赫赫有名。这个家族的好几名成员在“马赫曾”<sup>②</sup>中担任高级职务，并且承认法国保护国政权。然而，阿拉尔却坚定捍卫民族主义事业，并且拒绝以任何形式同法国人合作。

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之一是受到“萨拉菲亚”(Salafiya)<sup>③</sup>运动的影响。

“萨拉菲亚”运动以反对宗教社团而著称。它主张恢复真正宗教的本源，即先知及其伴侣的宗教的本源。这在当时是制止道德颓败的唯一办法，而最受反对的道德颓败现象是各式各样的对圣人的崇拜。

阿拉尔·法西的老师们都属于这一运动。在卡拉维因大学<sup>④</sup>，他的任课教师有阿布德赖萨拉姆·塞尔济尼(Abdeleslam Serghini)和穆莱·拉尔比·阿拉维(Moulay Larbi al-Alaoui)等人，其中后者以其对保护国的勇敢态度而出名。

阿拉尔·法西沿着他们的足迹，一度在民族解放运动创始人穆罕默德·加及(Mohammed Ghazi)于非斯创办的纳西里亚

---

① 位于西班牙南方。——译注

② 即摩洛哥的中央政府。——译注

③ 意思是“复古”。19世纪末的阿拉伯—穆斯林改革运动。——译注

④ 建于860年，是穆斯林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内设初级、中级和高级教育，培养伊斯兰法学家和语文教师。在本世纪初，估计学生数量为1000名，有50来名伊斯兰教学者和教师执教。——原注

学校 (Naciria) ① 任教，然后在卡拉维因大学授课。他一边教书，一边秘密投身于政治活动，以致于在1930年未能获得卡拉维因大学的结业证书。直到后来他在该大学讲授先知生平课时，由于当局的反对和大多数教授胆小怕事，他也未被承认是一位正式的学者。

在1925~1930年期间，政治活动主要是一种虔诚的文化行动，并且由各个城市中建立的若干小组以串联方式开展。阿拉尔所属的非斯小组同拉巴特小组联系，而拉巴特小组又同得土安和丹吉尔小组保持联系。大家争相到清真寺去听从东方带回种种“萨拉菲亚”理论的舒阿依·杜卡利 (Chouaïb Doukkali) 讲课，并且动手撰写新闻和文章。阿拉尔当时主编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名叫《乌姆·阿尔·巴宁》 (Oum Al Banin)。他还在本·巴第 (Ben Badis) 主编的、在君士坦丁发行的《阿克·希哈》 (Ach-Chihab) 上撰写文章。他通常撰写在“萨拉菲亚”范围内进行宗教改革的宗教题材的文章。1930年5月，他在著名的柏柏尔法令颁布之时，公开表示反对保护国的政策，被投入监狱达四个月，并被流放到非斯以北的塔扎。

柏柏尔法令规定柏柏尔人免受穆斯林法律管辖，同时规定为他们设立习惯法法庭和不教授阿拉伯语的学校。这一法令在广泛的民众阶层中激起轩然大波。它使年轻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阿拉尔得以初试锋芒。

惩罚并没有使阿拉尔畏缩。从1933年起，他在得土安生活，在那里发表了强烈控诉法国和西班牙殖民政策的演讲。演讲措词之激烈，使他随后不得不离开摩洛哥，经休达前往法国和西班牙。因此，第一个阶段以柏柏尔法令而告结束。

阿拉尔于1933年在法国居住期间参加了《马格里布》杂志的

---

① 摩洛哥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在动员摩洛哥青年反对保护国和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原注

编辑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日内瓦结识了阿拉伯复兴运动著名人物沙及·阿尔萨拉尼（Chakib Arsalane）。

六个月之后，阿拉尔·法西返回摩洛哥，并且受到国王的接见。当时正是组建“库特拉瓦塔尼亚”（Koutlah Watania）即最初形式的政党组织的时候。其实，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组合，纲领并不十分明确。它致力于拟定一份改革计划，其中包括一份涉及法律、公众自由、教育和建立民主制度的、题为《紧急改革》的纲要。这一计划于1934年呈交给蓬梭总督。但蓬梭却认为这个改革计划在摩洛哥不能付诸实施。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取消保护制，但是当时一直还没有提到独立这个字眼。

1936年，《摩洛哥人民致人民阵线政府的呼吁书》再次提出了改革计划，但是没有得到我们所期待的答复。然而，《人民行动》和《阿特拉斯》等刊物却被获准发行。从1937年起，我们已经明白，我们对人民阵线政府寄予希望将不会产生什么结果。新任总督诺盖将军组织了镇压。1936年11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被禁止之后，阿拉尔遭到逮捕。一个月之后获释。“库特拉”（Koutla）遭到严厉禁止。随后，好几次群众运动都受到镇压。诸如9月份梅克内斯居民反对该地区殖民者截取布菲克拉尼河水的起义和10月份在叙利亚举行泛阿拉伯大会时全国组织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群众游行。就在这个10月份，冲突达到了顶点：在科米塞（Khemisser）发生了反对圣·特雷斯天主教传教士试图把该地区部落基督教化的暴力示威。各个主要城市都发生了群众游行，这些游行常常转变为同军队之间的流血冲突。

“库特拉”遭到禁止之后改组的民族党召开大会，阿拉尔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揭露保护国和摩洛哥人民所遭受的压迫。

总督府的行动使民族党与素丹<sup>①</sup>发生分裂。素丹担心民族党

---

<sup>①</sup> 素丹即摩洛哥国王。——译注

对他取而代之。当时传闻总督府发现了一份所谓民族主义的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举阿拉尔为共和国总统。

阿拉尔被放逐到撒哈拉，几天之后被转移到加蓬。他在那里生活了九个寒暑。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把改革看成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以1937年的事件为标志，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了转变，它在不久之后便提出了完全独立第一的要求。正如阿拉尔后来所说：“这种‘分阶段’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浪费时间。然而，为了认清殖民主义的真实面目，它是必不可少的”。

从1944年起，独立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直接和正式目标。在这一时期，新的政党——独立党的代表团郑重地向素丹、总督府和列强代表递交了《独立宣言》。

我们秘密会见了国王，他发誓忠实于独立党的原则，鼓励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走下去。按照他的建议，我们争取了一些卡伊德<sup>①</sup>。据阿拉尔说，他已致函戴高乐，要求摩洛哥独立。

《独立宣言》运动招致一场血腥镇压。反对《宣言》的卡伊德们在总督府的挑唆下涌至王宫，试图改变素丹的态度。1944年1月28日，戴高乐的密使、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的马希格里（Massigli）也试图使国王翻口。1946年3月，新总督艾利克·拉波尼抱着使保护国制度自由化的愿望来到摩洛哥。同一年，阿拉尔结束流亡回国。他受到穆罕默德五世的接见。素丹对他毫无敌意。

拉波尼用封官许愿引诱我们，枉费了心机。他打算实行一套经济计划，号称他要成为“摩洛哥的经济利奥德”<sup>②</sup>。阿拉尔的功绩则在于，从那时起就认清了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的区别。他说：“拉波尼想建立一些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将使摩洛哥甚

① 摩洛哥地方官名。——译注

② 法国将军，曾任驻摩洛哥总督。——译注



至在政治和民族独立之后仍旧不折不扣地屈从于法国”。

因此，独立党组织了对总督府新经济措施的抵制。独立党最高委员会在拉巴特开会，向素丹发出一份呼吁书，要求他拒绝签署新的法令，并且号召人民在法国强制推行新计划时予以抵制。

然而，阿拉尔没有在摩洛哥久留，他只居住了不到一年。独立党决定派他率领常设代表团在外国捍卫摩洛哥的事业，先去法国，然后到开罗。九年之后，他才返回摩洛哥。当时摩洛哥已经独立。由于卡萨布兰卡发生民众暴动以及素丹发表了“丹吉尔演说”，第一次公开赞同独立并且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民族运动正经历着决定性的转折。在巴黎，阿拉尔处在一片激化的气氛之中。法国外交部长拒绝接见他，朝野上下都不愿听到摩洛哥独立。充其量，他们只准备考虑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实行内部自治。

在阿拉尔领导开罗办事处的全部时间里，他同摩洛哥独立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是独立党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驻阿拉伯马格里布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并且是后一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和领导者。1952年，他在访问斯堪地那维亚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首都之后，作为摩洛哥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联合国大会。1955年，他代表独立党参加了万隆会议。

1953年8月22日，穆罕默德五世被罢黜并且被流放。傀儡素丹本·阿拉法即位。就在同一天，阿拉尔·法西从开罗向摩洛哥人民发出呼吁：“我们确信，在摩洛哥独立之日和法国军队撤出之时，摩洛哥政府必将是我们同我国人民以及我们的国王西迪·穆罕默德共同选择的政权。我紧急呼吁摩洛哥人民继续斗争，以求实现我们唯一的重要目标——摩洛哥独立”。

起初还是星散、孤立的武装抵抗运动在1953~1955年期间全面开展起来。阿拉尔同他倾注多年心血组建的武装部队保持着联络。以阿布德·克里姆（Abdel Krim）为主席、以阿拉尔为秘书长的马格里布解放委员会宣布，三个国家不获得民族独立决不

停火。1954年11月1日，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武装起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与摩洛哥的抵抗运动协调一致。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之后，等待它的是在马格里布第二次失败。因此，法国政府中出现了解决摩洛哥问题的倾向。1955年，开始在爱克斯<sup>①</sup>举行法-摩会晤。

早在穆罕默德结束流亡回国之前，独立党的执行委员会在马德里举行了扩大会议，招集了抵抗运动、摩洛哥劳工联盟工会（1955年3月20日成立）和独立党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决定在首先承认摩洛哥完全独立的基础之上同法国谈判，并且摒弃了突尼斯式的解放办法，即内部自治。阿拉尔反对爱克斯的谈判，并且主张继续同阿尔及利亚兄弟一道进行武装斗争。这导致他同独立党的关系一度紧张。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阿拉尔提出由他来领导独立党、工会和抵抗运动。这个提议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拒绝。抵抗者们认为，阿拉尔·法西与其说是一位政治领导人，不如说是一位伊斯兰教学者和精神领袖。他们只愿意赋予他名誉上的领导地位。阿拉尔因此深受震动，大失所望。

他重返开罗。1955年10月，开罗成为抵制法-摩协定的中心。阿拉尔从开罗发出了在马格里布普遍开展武装斗争的号召。法国政府认真对待这一威胁，急忙决定让穆罕默德五世结束流亡回国，并且在圣日耳曼昂莱<sup>②</sup>开始同摩洛哥苏丹谈判。1956年初，阿拉尔在马德里出席了一次小范围的抵抗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达成了妥协，一方面决定按照穆罕默德的呼吁在解放区放下武器，另一方面决定在撒哈拉仍被占领的领土上继续战斗，并且援助阿尔及利亚的战士。因此，一部分解放军向南方转移，并且以军事行动成功地解放了整个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sup>③</sup>，西班牙

---

① 法国南方城市。——译注

② 位于巴黎郊区。——译注

③ 即西撒哈拉地区。——译注

军队仅占据大西洋沿岸的几个据点。因此，法国和西班牙联合采取了一次军事行动，或者称为“刷子”行动，于1958年2月对解放军两面夹攻并且把它打退到北方。此后不久，国王解散了解放军。

阿拉尔于1956年8月独立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夕返回摩洛哥。会议决定改组独立党并且向国王递交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清算殖民主义的利益并且组成一个负责任的和协调一致的政府，以便实现一项紧急计划。1958年春天，他出席了在其住地丹吉尔召开的马格里布三方会议，即新宪政党、全国解放阵线和独立党三方会议。会议奠定了马格里布积极团结的基础。

1960年1月，独立党代表大会在卡萨布兰卡召开，阿拉尔终于成为主席的唯一候选人。在以后的大会上，他连续当选。

1961年，阿拉尔作为伊斯兰事务国务大臣首次加入哈桑二世国王领导的政府。他参加了负责起草独立后第一部宪法的皇家委员会。不久之后，阿拉尔等独立党大臣辞去了政府职务。独立党作了17年的在野党。1963年1月，在庆祝《独立宣言》之际，阿拉尔提出了《平均主义宣言》，《宣言》重申了独立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主张。5月，阿拉尔在非斯当选为议员，但是1965年3月卡萨布兰卡发生民众暴乱之后，议会遭到解散。从此以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和仍然是殖民地的摩洛哥领土问题上，独立党不断与官方的抉择发生分歧。阿拉尔坚持主张土地改革和更加公正地分配财富。独立党党纲上载明的“耕者有其田”曾是他晚年一篇诗作的主题。

1974年春天，阿拉尔在中东和东欧之行期间，阐述和坚持了他倾注50年心血为之奋斗的两个问题，即巴勒斯坦和撒哈拉的解放。谁知，这竟是命运为他安排的最后使命。

（杨光 摘编）

## 摩洛哥国王哈桑一世

穆莱·哈桑 (Moulay Hassan) 在摩洛哥历代的谢里夫君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反抗欧洲帝国主义、捍卫国家的最后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扮演了“古老摩洛哥的最后一道城墙”的角色。在民族艺术中，他的形象也深受人民大众喜爱。

19世纪的最后1/4世纪，摩洛哥处在日益高涨的欧洲市场经济和殖民扩张浪潮的包围之中。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1885～1864年），摩洛哥不得不在英国的压力面前（1856年12月贸易协定）、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1860年得土安条约）以及在法国的苛求面前（1863年条约）让步。这三个在西地中海进行角逐的强国没用多少年便结束了摩洛哥的孤立政策。这个闭关自守达两代人已久的国家突然面临着新的形势。

摩洛哥素丹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德拉赫曼 (Sidi Mohammed ben Abderrahman 1859～1873年) 打算实行新政，提供更多的贸易优惠，招聘欧洲技术人员，尝试兴办工业，制定改革方案。穆莱·哈桑很早就参与了这一整套的改革计划，并且从中受到启迪。然而，由于遇到外部的困难，特别是遇到1867～1869年的经济和社会大危机，这一套计划未能实现。

因此，当1873年9月12日穆莱·哈桑登上王位的时候，一场深刻的较量已经开始。马赫曾 (Makhzen) ① 决定以有限开放和慎重改革的政策来对抗蓬勃发展的欧洲的威胁。对于谢里夫政权来说，形势比前朝统治时期更为有利。世界市场价格的上涨和连

① 即摩洛哥的中央政府。——译注

年的大丰收清除了1868年灾难的影响，并且重新充实了国库。1871年法国的失败缓解了摩洛哥东部边界所受到的重大威胁。西班牙的政治和财政危机解除了北方的危险。英国的维持现状愿望以及英国代表约翰·卢蒙德·海 (Sir John Drummond Hay) 乖巧的友谊为摩洛哥外交提供了一个牢固的支点。

赛义德·穆罕默德·本·阿卜德拉赫曼的宠儿阿卜·阿里·哈桑 (Abu Ali al-Hassan) 登基时年已37岁。他同他的兄弟们都在非斯大学受到过“精心而严格的”教育。哈桑一进入成年，西迪·穆罕默德素丹便指定他为继承人，并且长期对他进行多方面的培养。他在马拉喀什出任哈里发时，参加过兴办工业的尝试（棉花工厂、制糖厂、水力磨面厂），而且与摩加多尔和萨菲的欧洲领事和商人接触频繁。他不但懂得行政管理，也了解军队，并且几次挥师南征。他很快地确立了他的君主地位。他在得到哈哈 (Haha) 部落的首领承认之后，扑灭了阿兹木尔 (Azem-mour) 的一次短时间作乱，并且在沿途平定了贝尼阿散 (Beni Ahsen) 部落之乱。他轻而易举地平息了梅克内斯的叔父的篡位企图。然而，为了战胜非斯城的反抗，他却颇费周折。那里的居民受皮革商的煽动发起暴动，要求免除税收，而且得到伊斯兰教学者的支持。他们拒不降服，关闭了所有的城门。法斯阿尔巴里 (Fas-al-Bali) 区在受到围困之后才被攻克。1874年秋天，新素丹的权威已经充分确立，不可动摇。马赫曾贵族认为，这样轻而易举地继位实属罕见。

其实，不论有多少叔父或兄弟居心篡位，穆莱·哈桑自有可靠的有利条件。他不仅是西迪·穆罕默德钦定的继位者，参加过兴办实业并且同马赫曾中的人物关系密切，而且具有自己的个性。他身材魁梧，体格强健，面色黝黑，脸庞瘦削，眼神机敏，仪态庄重，雍容大方。他身着宽松的白袍，质朴无华，衬托出一付威严的仪表。他心地虔诚，有条不紊。他那仁慈、俭朴和睿智的声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对阿拉伯文造诣高深，经常为大臣修

改致外国代表的重要书信。但是他不懂外语。有关欧洲问题的信息由欧洲顾问向他提供，并且来自于阅读宫廷收到的报刊，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画报《埃尔马鲁马埃》(El-Mahloumaet)和意大利政府发行的《埃尔摩斯卡代尔》(El-Moskatel)报。从1883年起，他定期听取对丹吉尔各报的评论，并且授意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

这位素丹在艰难的政治和外交形势下过着疲于奔波的生活。为了寻找财源和树立他对部落的权威，他不得不象游牧民一样生活。年复一年，从春天直到秋末他都在作战。谢里夫的远征军一批又一批地跑遍全国各个地区，收缴拖欠的税物，迫使地方首领降服。冬季，谢里夫的宫廷通常设在非斯、梅克内斯、马拉喀什这三个都城中的一处，而素丹永远是中央政府的唯一领导者。一切事宜都由他钦定。他思考一切，管理一切。他会见众多的顾问，在有关宗教和传统的事情上则征询伊斯兰教学者的意见，对于摩洛哥人、欧洲人，甚至炼丹术士的建议也不厌其烦。各部门的奏章，他都要亲自批阅；一旦决定，他便御笔亲批“执行”的字样。1887年他因患病无法理朝时，整个政府和政治生活都陷于中止。他在处理内政和对外关系时，经常利用有势有财的民间重要人物，尤其是得土安的富贾阿卜德·克里姆(Si Abd el krim)和马拉喀什的贵族布·贝克尔·甘贾维(Si Bou Béker el-Ghanjaoui)。素丹的宠妃，1878年入宫的腊拉·克佳(Lalla Keqia)具有实际政治影响。1881年2月18日，她为素丹生得爱子阿卜德·阿齐兹。在穆莱·哈桑的戎马生活中，她一直伴随左右。在素丹所必须考虑的势力之中，伊斯兰教学者最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学识，而且是因为他们在政府中占有越来越多的高级职务。19世纪末，政府机构的扩大使伊斯兰教学者们从非斯、得土安和萨累等文化城市接踵而来。他们由于得到素丹的承认并且能够提供法律咨询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是保守的信仰的捍卫者、道德伦理和民族意识的代言人。这个既庞杂又严肃的集

团同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宁可求助于“旧的道德和习惯”，也不愿革新。他们意欲限制国家的开放，消除国家开放所造成的固有文明危机。

## 内 政

在内政方面，素丹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他要维护帝国的团结，并且在欧洲威胁边境的情况下确保谢里夫属地的完整和统一；另一方面他要着手于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最终改变全国经济和行政的条件。

他既使用马赫曾政治的久经考验的手法，也求助于新的力量。他把统治部落和处理同宗教势力关系的传统办法运用得特别巧妙。穆莱·哈桑力图遏制、围困并且打入柏柏尔人的大部落，挑动它们相互敌对。他几乎每年都派出骑兵部队，收服了桀骜不驯的宰穆尔（Zemmour）部落联盟。他时而使用威胁，时而诉诸武力，特别是运用出色的外交制造首领、派系和利益的对立，利用谢里夫的威望和对欧洲人的担心。他以此取得了南方各大首领的效忠。在他在位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暴乱。在平原地区，他力图分散权力，以大量的小型区划取代18个大型管辖区。原先由五位总督管理的杜卡腊省，其总督数量后来至少有18名。阿卜达（Abda）的总督数量由3个变为6个，希亚德玛（Chiadma）的总督数量从1个变成4个。他总是力求分散行政管理中的财政职务。对于宗教势力，穆莱·哈桑刚柔并用。他同中央政权所在地区的宗教社团取得和解，并且在拒不降服的地区运用这些宗教社团的影响。他对伊德里斯的后裔表示尊敬，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并且赢得非斯舆论的拥护。在旅途中，他凭吊圣地，修葺圣人的陵墓。他经常凭借他的虔诚和谢里夫威望裁决教派之间的纠纷。他既善于迎合上升势力，又善于同他认为危险的势力作斗争。他曾经隆重接待西撒哈拉的谢克·马埃宁

(Cheikh Ma el-Ainin), 并且帮助此人在摩洛哥南方安身立足。他同德卡瓦 (Derkaoua) 和塔伊比亚 (Taibia) 部落的危险势力进行过斗争。在对边境地区大举远征以便使这些地区从属摩洛哥君主、免遭外国染指和分裂的时候, 他显然采用了政治、军事和宗教三管齐下的行动。他在1882年和1886年远征苏斯地区、1887年远征里夫地区以及1893年远征塔菲拉勒地区的时候, 就采用了这样的行动。

与此同时, 穆莱·哈桑力图创造进行结构改革的财政、军事和行政手段。他大力开展征税工作, 精心理财。尽管1886年以前付给西班牙的战争赔款占去海关收入的一半, 尽管要不断付给欧洲人大笔赔款以赔偿摩洛哥人造成的损失, 尽管1878~1882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然而国库收入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库充盈使穆莱·哈桑的主要手段——军队有条不紊地得到加强。军队改革有四项措施, 即改革征兵, 整顿军事部落并且组建一支占军队编制2/3的欧洲式常备军; 聘请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教官, 并且向欧洲派送在役军人和军官生; 购置现代武器, 尤其是火炮零件, 从而在几年之内把军队中的服役火炮数量增加一倍; 在非斯试办军火工业, 并且试办海军。然而, 这场花费高昂的事业只获得了相对的成功。工厂实际上没有运转起来。从欧洲军事院校归来的摩洛哥青年没有受到妥善使用, 或者不被录用。港口设防难以奏效。可是, 中央政府却有了一个有效的安内手段。它对素丹的大型战役帮助很大, 特别是强大的炮兵常常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收服南方的部分原因即是这种扩大军事实力的结果。然而这只是一种手段, 是一种为素丹树立权威的手段和一种严格征税的手段, 也是一种迫使迟疑不决的舆论接受素丹的改革要求的手段。在经济方面, 随着准许出口谷物、改善港口服务和调整关税 (1890年条约), 贸易受到鼓励。这些措施使贸易额迅速增加。穆莱·哈桑在位期间, 尽管价格普遍下跌, 但是贸易额却增加了40% (1873~1876年的平均数是5600万法郎, 1890~1893年



的平均数达7800万法郎)。穆莱·哈桑在马赫曾的田庄里努力发展商品作物。他支持西迪·穆罕默德开办的工业企业（弹药厂、榨糖厂、军火工厂），还创办了一所邮局。改进中央政府工作的尝试虽然持之以恒，但是收效甚微。大臣们的分工更加明确，政府官吏的工作有所改观，可是体制却基本上原封未动。在农业部门中，缺少重要的服务机构，官吏得不到足够的报酬，职务重叠，行政工作繁文缛节。

### 对外政策

穆莱·哈桑的改革政策之所以半途而废，其基本原因之一在于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干涉摩洛哥事务，在于列强为了它们的利益和活动而不断施加压力。令穆莱·哈桑左右为难的是，他只有使国家现代化才能抗拒欧洲的压力，然而他只有求助于欧洲人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因此事关民族利益和外交斗争。

改革政策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不过分扩大欧洲人对摩洛哥人的保护，不使一部分民族财富落入外国人手中，不为直接干涉当地政府提供机会。因此，古老的保护权是现代化问题的核心。无论在同外国代表召开的丹吉尔会议（1877~1880年）上，还是在马德里国际会议（1880年5月19日至7月3日）上，穆莱·哈桑都没能使这种法权受到取消或受到严格限制。这一法权最终还是扩大到了成千上万的摩洛哥豪门大户，甚至连韦扎尼（Ouezzane）的谢里夫这样的国家要员也成为被法国保护的人。穆莱·哈桑的宿愿是维护帝国的独立与完整。他总是使用以下这些手法：支付欧洲人索要的所有赔偿；使列强相互对抗，进而相互削弱；寻求对其危险最小的欧洲政府的支持；不断重申谢里夫帝国对“大摩洛哥”的权利。穆莱·哈桑在位期间，付出了几百万金法郎的巨额赔款，这对改革是一种阻碍。马赫曾使列强的利益相对抗，对改革的损害也不算小。任何一项得到某位欧洲代表支持的现代化事

业都引起竞争者的要求，致使计划破灭。一味地保卫摩洛哥对边境地区的权利难以确保将来不发生变化，但却花费了开支，为改革大业造成困难。这种谨慎而不信任的政策还扩大到与土耳其的关系方面。原因是两位素丹之间的宗教之争。这种不信任使马赫曾担心欧洲，但却没有转向近东。

在欧洲经济势力的包围中，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野心威胁下，穆莱·哈桑在非洲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中日益孤立，而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处理同列强的关系。

### 穆莱·哈桑统治的总结和意义

1894年6月6日，穆莱·哈桑在大举远征塔菲拉勒班师之后谢世而去。他的去世在欧洲和摩洛哥都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位君主在20年的时间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重新充实了国库，组建了一批军队，并且使军队部分地实现了现代化。

穆莱·哈桑维护了国家，但是他却没能建成能够长期保持独立的新国家。因为不可能实行必要的改革。他在即位后的最初几年就非常清醒地看出了这一点。他在1875年时就对约翰·卢蒙德·海说过：“我担心我那些无知的臣民造反，因此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实施所有的改革。”他还说过担心“列强的要求”。因此，他强调了基本矛盾，即他只有使国家现代化才能抗拒欧洲，而这种现代化只能同欧洲共同进行，也就是说会引起公众舆论对改革的反对。他始终慎重地对待伊斯兰教学者的缄默。后者是传统习惯的卫道士。他们因改革计划而惊慌，担心这种变化可能动摇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为欧洲人的到来或者接受新习惯有损于伊斯兰教而不安。穆莱·哈桑知道，这种对改革的抵制在下层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拥护。他在这条“抵制带”前碰了壁。对传统的依恋、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对外国的不信任以及独立的愿望交织在一

起，在舆论中形成一股不利于变革的潮流。穆莱·哈桑不得不迁就各种抵制。

由于实行开放政策和在边疆省份树立权威，他助长了两支新兴社会政治势力，即城市经济势力，特别是依靠同欧洲贸易致富的商人资产阶级和南方巨大的封建势力。素丹去世后，这些阶级之间的对抗迅速暴露出他的事业的深刻弱点，并且有助于欧洲的经济入侵和法国的政治控制。

(杨 光 编译)

## 阿布希里和坦桑反抗 德国统治的斗争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阿布希里(Abushiri ben Salim al-Harthi) 是非洲反殖斗争中的重要领袖之一，强调他的非洲精神，强调他组织地方力量的能力，并称他为20世纪民族主义的先驱。如果他获得成功的话，坦桑早就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独立了。

### 东非背景

阿布希里一向以阿拉伯人自居，严格地说，他应该是斯瓦希里人，东非海岸的人。他代表殖民主义入侵前东非海岸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那股势力。

公元前后，印度洋的亚洲人就航海到东非海岸，购买象牙和其他动、植物产品，其中包括黄金和奴隶。到中世纪，这些外国商人就与肯尼亚和坦桑的班图土人完全融合了，并组成了许多贸易社团，过着类似中东的城市生活，讲的是阿拉伯化的班图语，即有名的斯瓦希里语。一直到19世纪，斯瓦希里文化的影响仍局限于一条狭窄的沿海地带。这个社会没有在东非腹地产生巨大影响，它的出口经济主要建立在采集和交换，而不是在生产上。

这种体制从18世纪起开始发生变化。阿曼(Oman)的阿拉伯人(阿布希里的父系家族)，第一次驱赶走了从莫桑比克北部来的葡萄牙侵犯者。随后，在桑给巴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贸易中心。这座岛屿靠近大陆海岸，可以作为沿海陆地的仓库。当地商

人利用莫桑比克国内葡萄牙政权与印度商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世界对东非产品需求的增长，大显身手。在桑给巴尔和依靠该岛的大陆海岸，阿拉伯人和印度商贾不仅扩大了对天然资源的开发和奴隶贸易，还在较大的范围内，发展经济作物，如丁香、甘蔗、树脂、椰子仁干以及其他农作物。

坦桑内地人民向沿海扩张，与沙漠商队向内地深入的行动同时发展起来。东非这两部分土地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约在19世纪中叶，沿海商人在坦桑西部的中心塔波拉（Tabora）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仓库。从那里又开辟了几条商道，穿过大湖，到达乌干达、扎伊尔和赞比亚。

这个商业帝国建立在十分松散的政治结构上。桑给巴尔的素丹（19世纪末，他已与阿曼兄弟国王断绝关系）对肯尼亚、坦桑和中部索马里的沿海地方提出主权要求，因为他向每个大的港口派驻正式代表；沿海的商人在东非内地的商号里，升起桑给巴尔的红旗，在西部的乌吉吉（Ujiji），或是坦喀尼噶湖区都是这样。

桑给巴尔素丹实际上只对控制沿海贸易的收入感兴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19世纪初曾交替使用军事力量和阴谋诡计，以防止沿海其他城市（主要是肯尼亚的蒙巴萨和坦桑南部的基尔瓦）通过竞争方式，威胁桑给巴尔的霸权地位。在一些社团的内部，以及由桑给巴尔直接监督的坦桑北部港口，素丹都派有官员和少量驻军，他们与当地城市的显贵、定居的商人和近郊部落的首长分掌政权。桑给巴尔规定，一切离开港口的货物都要交付海关税；外国的商船，主要是欧洲人的商船必须与桑给巴尔进行贸易，桑给巴尔接受各港出口的产品。

到19世纪，斯瓦希里社会中的统治阶层有新来的中东移民，或是当地出生的、没有黑人血统的阿拉伯人；还有一种二等公民，阿布希里本人就属此类，他们是阿拉伯人与混血儿结合的后代，生长在东非，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联系。此外，还有一种居

住在沿海的自由民。他们是阿拉伯人与沿海部落人民结合的后裔。他们主要指纯非洲血统的城市小市民，以及许多获得自由的奴隶及其子女。沿海的多数土著居民是从内地迁来的奴隶，主要在种植园内从事劳动。

研究阿布希里运动，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的宗教情况。信仰伊斯兰教有多种表现形式。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斯瓦希里文化。阿曼的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与北非的商业集团一样属于伊巴迪·卡拉基特（Ibadi Kharajite）异端教派，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卷入沿海地区穆斯林的宗教冲突中去，然而，他们倾向于内地的广大城市社团。印度裔的居民也有自己的倾向，他们放弃信奉印度教后，则分属于不同的什叶教派，这些教派促使他们分裂，连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也因受这些教派的影响而分裂了。多数斯瓦希里人和许多非阿曼裔的阿拉伯人都是正统的逊尼派，该派强调传统宗教的教义。逊尼派受历届索丹的推崇，因此在19世纪一直占有很高的荣誉地位。另外，在索马里扎根的一支教派，也开始在该地区传播，并在内地城市（直到塔波拉）的小市民中扎根。

### 起义前的阿布希里

1880年底，沿海地区反抗殖民主义的领导人当中，阿布希里是个知名人物。但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他的材料，几乎全部来源于德国人，既不准确又不可靠。

虽然没有关于阿布希里直系亲属的可靠材料，我们仍可从他的名字追溯其父系的家族。他的父亲叫瑟里姆，是一个自由的穆斯林，其祖先属于哈尔蒂氏族（Harti，阿法尔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是18世纪移居到桑给巴尔的，并且是阿曼的第一批阿拉伯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的政治和贸易，以致各索丹为了巩固自己地方的政权，尽力设法削弱他们的权限。1856年，哈尔蒂人被卷进

一场试图控制桑给巴尔素丹的流产阴谋活动中，从此以后，他们在首都政治方面的影响消失了，该氏族许多人都转移到大陆，成为流动的商人，或靠种植园生活。

阿布希里总说他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人，但是，从他的外表来看，显然有些非洲人血统。根据许多材料介绍，他的母亲属纯非洲血统，可能是加拉人（Gala，属班图系统的尼昂韦齐支系，该族人在斯瓦希里社会中的地位仅次于班图人）。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不大。

阿布希里能讲斯瓦希里语和阿拉伯语，但是他的阿拉伯语讲得并不好，这与他的出生环境有关。我们不知道阿布希里的出生地，只知道他大部分的青年时光是在哈尔迪·塔波拉和乌吉吉等地度过的，这些地方都是买卖象牙和奴隶的中心地。以后，他在海港附近开垦了一个中型的甘蔗种植园。1870年初，可能是在他建立种植园之后，阿布希里加入了一场军事行动，即桑给巴尔的素丹攻击尼昂韦齐人（Nyamwezi）的首领米兰博（Mirambo）的斗争。该族人居住在内地，威胁着从塔波拉到坦喀尼噶湖和维多利亚湖的商道。与阿布希里同一个氏族的素丹王指挥这次战役，该王过去也是在内地从事贸易的商人。阿布希里在这次行动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任何有关文件均未提及他的名字。然而，阿布希里以后的威胁行动使德国人认为与“米兰博一样握有铁一般的拳头”。阿布希里武装起事的借口是，素丹王派兵威胁他在潘加尼（Pangani）的种植园。从当时的情况分析，阿布希里过去曾拒绝素丹王的直接控制，素丹王曾表示只要阿布希里一到桑给巴尔，立即逮捕他。1888年，阿布希里作为当地有威望的独立人士，已是潘加尼的知名人物了。当时他年约40岁，是一个发胖的小个子。然而，他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和刚毅的。

## 欧洲贸易和德国保护

一直到18世纪末，斯瓦希里海岸的对外贸易主要由亚洲人控制。1500~1700年间，葡萄牙人想控制该地区的企图完全失败了。甚至在1770年间，当法国、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已开始与东非进行正规贸易时，葡萄牙人也不敢贸然与桑给巴尔素丹争夺主权。

印度洋是英国控制海外领地最有利的通道，具有特殊的战略利益，因此英国驻当地领事一直控制着桑给巴尔的内部事务；英国军官指挥当地的常规部队，英国海军则监督取消奴隶买卖协定的实施，这些协定都是强加给素丹的。然而，另外一些到桑给巴尔经商的欧洲列强的贸易额却超过英国（不包括印度的贸易额）。英国的影响全凭仗基督教组织在桑给巴尔和大陆的势力。

1885年，自从年轻的德意志帝国正式宣布对坦桑大陆实行保护之后，局势完全改观。德国统治坦桑的头几年，由于德国所建立的保护制度与当地的社会格格不入，给坦桑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an Bismark）正式宣布东非为德国的保护地，但并不愿意帝国政府直接插手海外领地。一旦国际（主要是英国）上有新的安排，即把领导东非地区的事务交给“个人”。正是这批“个人”过去把这块土地变成殖民地。这些想统治东非的人并没有丰富的经验，也没有真正的能力。这是一批互不协作的冒险家集团。他们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公司，以后德国政府承认其为东非政府的代理机构。

1888年，东非的德国公司与桑给巴尔素丹就新的保护统治最后达成协议。桑给巴尔对部分大陆保留名义上的主权，而行政领导，包括海关权都要交给德国人。同年8月，该公司从桑给巴尔派出代理人，到包括阿布希里种植园所在地的潘加尼在内的沿海



七个主要港口建立据点。

### 起义的爆发

德国人和坦桑人之间的真正敌对起源于1888年8月德国在坦桑建立一个欧洲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当然还应追溯到德国的东非公司和桑给巴尔素丹们过去策划的阴谋。自1884年彼德斯（Peters）的第一批据点建立后，其他许多德国的远征队又走遍了坦桑沿海地区和内地，并与许多地方酋长签订了“保护”条约。该公司在许多新的地方建立了永久性据点，表面上看不出这些简朴的据点是属于欧洲人还是非洲人的，一个影响最大的据点于1887年建在达累斯萨拉姆（该市当时属于桑给巴尔素丹个人领地，不过是一个新开辟的小村子），并通过各种方式引进欧洲移民，彼德斯和其他人都通过各据点来维护德国移民的利益。各据点的负责人都是从种植园中推选出来的。

这一切作法引起了大陆居民的极度不安，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与这些扩大了的企业、基督教传教士、流动的外国商业集团，或是直接掌握土地和政治权力的个人打交道。甚至连一些素丹都不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巴尔加什（Barghash）素丹一直到死都在设法加强他在大陆的地位，并寻求法国支持，反对大英帝国和德国的行动。

甚至加里发素丹，1888年一面同意接受德国在沿海的行政管理权，一面又写信和带口信给各个地方酋长，鼓励他们起来反抗。

阿拉伯-斯瓦希里人的疑虑是有充分理由的，德国人的行动并没有局限于正式签定的条约范围。德属东非公司的代表到达桑给巴尔和大陆沿海地区之后，对当地居民就表现出狂妄自大和粗暴的态度，并且尽力把德国统治强加给当地居民。素丹的地方代表“里瓦里”（liwali）是与德国人分掌政权的，但却听命于德

国人，成为最低层的下属人员；素丹的旗帜按德国人的命令，从“里瓦里”驻地降下，升在德属东非公司驻地内德国旗帜旁边。许多城市拒绝服从此命令，德国人则专横地锯断了旗杆。此行动被当地人认为是一种战争的挑衅行为。

德国人在进行这种严重的挑衅行动的同时，已准备攻击阿拉伯-斯瓦希里政权。德国人征收关税的协定大大损害了地方商业的收入。此外，德属东非公司还发布一系列征税命令，包括对土地的征税。这项土地征税法严重地威胁了土地拥有者。德国人强迫当地居民注册登记地产，房屋、种植园和其他不动产还不包括在内。德国人对待当地人反抗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派遣战舰炮轰包括潘加尼在内的北方各港口，炮轰过后，海军陆战队接着登陆上岸。

德国军队登陆后，沿海各地就爆发了起义。凡是海军陆战队攻打的城市，当地居民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1888年9月末，德国代理人只得困留在被摧毁成废墟的巴加莫约（Bagamoyo）城和被围困的达累斯萨拉姆城内。德属东非公司驻基尔瓦（Kilwa）的代表被起义军杀死，而驻在潘加尼、坦加（Tanga）、林迪（Lindi）和米金达尼（Mikindani）的德国代表则纷纷逃往桑给巴尔。

初期阶段，这次起义并没有由非洲人统一领导，只是大家一致反抗德国人。素丹并不能控制局势。起事的各地都有自己的领导，不存在统一计划，而各起事的军队又不了解总的形势。

南部的城市如基尔瓦、林迪和米金达尼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个地区的阿拉伯-斯瓦希里的精英分子中，没有出现任何杰出的领袖，似乎也没有试图与沿海其他起义军集团建立联系。1888年以前，大陆上唯一能够领导起义的人是伯瓦纳·赫里（Bwana Heri）。他是萨达尼（Sadani）小港一个斯瓦希里君主的继承人。1886年，伯瓦纳·赫里曾设法与萨达尼南部和东部的齐瓜（Zigua）人和阿拉伯-斯瓦希里人的酋长建立联盟。其目

的是要利用混乱局势，巩固自己的地盘，并不想在完全新的领域内创建一个政治组织。

阿布希里参加起义活动初期只是反抗德属东非公司，并没有什么野心。阿布希里在潘加尼骚乱中首次露面正是德国海军攻打城市的时候，许多显贵希望柔给巴尔素丹能干预这次行动。

实际上，在潘加尼的德国代理人被该城人抓起来之后，素丹才派出他的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军队，去救援该城。最后从德国领事那里取得的允诺，就是德属东非公司暂时通过他的印度代理人征收海关税。

在此期间，阿布希里已经成为运动的首领，并提出建议，要采取军事手段来替代新的谈判。他宣称，应该拒绝德国人的势力通过任何形式卷土重来。他对昔日敌对的素丹也是这个态度。另外，他对自己的军事作用估计甚高，以后一直以此向世人夸耀。

早在1888年阿布希里就对德国人抱有敌意。当德国东非公司“勒瓦”（Lewa）烟草种植园主以武力侵犯阿布希里邻近的妇女甘蔗种植园领地时，就指控他们私下贩卖奴隶。阿布希里虽然也羡慕德国人所采用的农业手段，并表示可以在自己的种植园里效法，但必须排除一切外部干扰。到1888年9月，阿布希里所联系的政治力量不仅有潘加尼和邻近种植园的人，还包括了更大范围的势力。

### **阿布希里的起义力量**

当阿布希里确知潘加尼的首长们撕毁了与德属东非公司签订的协定时，就向素丹的使者宣称，他要到“沿海各城发动一场反对德国人的斗争”。实际上沿海各地无需别人去发动，早已起义了。阿布希里的战略是，尽可能在大的范围内建立关系，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持。

然而，有一个消极因素与阿布希里的心愿相违，就是潘加尼

的酋长们不太愿意公开反对素丹，即便是素丹已经受德国人控制也不愿意。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一个素丹代表“里瓦里”留在潘加尼，一方面作为人质留下；另一方面，他作为中间人，为桑给巴尔政权和地方酋长之间安排新的谈判。阿布希里的力量在日益发展，坦加和巴加莫约两座城被德国海军摧毁殆尽，这两城的显贵集团迅速地向潘加尼运动靠拢。

潘加尼起事的初期，阿布希里的拥护者赋予运动一定的宗教内容。他们表示不再与外国的基督徒打交道。然而，运动后期这种感情已不复存在，因为阿布希里一直与某些欧洲教会社团保持着良好关系。与阿布希里最接近的一个伊斯兰教专家，是坦加的诗人，名叫赫默迪（Hemedi ben Abdallah al-Boahry）。但是，赫默迪自称是土著的魔法师，对伊斯兰教义知之甚少。事实上，赫默迪之所以愿意为阿布希里服务，是因为后者允诺付给他钱，因此很难说他是一个运动的政治思想领导人。阿布希里的主要军官是从城市里招募的，并不是阿拉伯-斯瓦希里统治阶层的人物。保留下来的资料中对一个名叫日阿齐（Jehazi）的人有详细记载。他是科摩罗人，过去曾在刚果为斯坦利服务。基于日阿齐的个人经验，他被视为炮兵和筑碉堡的专家。众多的科摩罗人是阿布希里的主要支持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是他们容易赞同起义的主要因素。

当阿布希里与德属非洲公司断绝关系的时候，他已指挥着一支由6000~8000人组成的军队，当时在沿海地区是一支可观的力量。属于统治阶级的商人和种植园主是军队中极少数的“阿拉伯人”，总共约100多人；其他多数人，正如阿布希里在多次宣言中说的，以奴隶的名义起义，他们是平民、流动商贩和种植园工人，社会地位都很卑微。人数最多的是邻近村民，不仅包括潘加尼河谷的村民，还有邻近高地的村民。起义运动发生在旱季，东非的农民有空闲离家做其他的事。各村酋长纷纷派出他们的村民参加运动，因为他们厌恶德国人，想通过斗争取消海关税，同时

还可以藉此反抗索丹。

初期，阿布希里就努力与潘加尼、坦加和巴加莫约等地酋长联盟，曾取得暂时的成功。1888年底以前，当起义势力还弱小时，贝瓦纳·赫利对联盟并不感兴趣。内地两个很重要的王国：乌卢古拉（ULugura）的金果（Kingo）和桑巴阿（Shambaa）的桑波加（Semboja）都不愿意陷得太深。然而他们却给起义军提供某些帮助，同时又通过传教士与欧洲势力保持良好关系。这些酋长怕被阿布希里吞并掉，但是如果不与他联合，又很难在德国人征服的沿海保持自己的独立。

阿布希里为了保持潘加尼的基地，不得不应付大量的必然出现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军需供应，大大地超过了地方负荷量。由于战争破坏了商业和农业，更加重了困难。阿布希里为了避免危机，派遣士兵到农村去抢劫村庄和商队，还抓捕许多欧洲籍传教士和探险家作为赎买的人质。当然这些措施不能持久。1888年秋末，已引起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反感，他们感到自己受到威胁。为了不使起义在本土夭折，1888年11月底，阿布希里决定向南挺进。

### 起义的成败

从巴加莫约出发往前走，是阿布希里起义年表上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1889年5月，他向德国军队发起了反攻。第三阶段在同年10月，德国装备了全新武器发起进攻。在最后阶段，阿布希里打算逃往其他起义军占领地，或是肯尼亚边境，但没有成功，最后被捕并被处死。

阿布希里于1888年11月向南推进的目标是想把德国人从巴加莫约和达累斯萨拉姆两个据点赶出去。关于对达累斯萨拉姆的行动，他与当地阿拉伯人约定由他们负责。当地阿拉伯人于1888年12月和翌年1月两次攻打德属东非公司本部以及德国教会在该

城附近创办的两个机构。教会的机构被摧毁了，四个欧洲人被捕。然而德属东非公司却一直坚守抵抗。达累斯萨拉姆有钱有势的阿拉伯人则带着他们的俘虏，到巴加莫约去与阿布希里汇合。

向德国公司发起的两次进攻(12月和翌年3月)都失败了。这都归咎于阿布希里本人指挥不当。他的部队约2000到3000人，拥有700枝枪和几门炮，按理这样一支力量是足以对付德国人的，然而，起义军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修建碉堡以阻止停泊在巴加莫约港的德国战舰的士兵登陆。

阿布希里还没有用他的主要力量去驱赶德国官员，因为他认为，向欧洲人施加的压力已足以迫使他们接受合理的和平条件。在阿布希里的军队包围德国公司期间，法国驻巴加莫约的圣灵天主教会作为中间力量，在起义军和德国人之间斡旋。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但双方都需要勾通，如交换俘虏、支付赎金等。1889年3月末负责当地军事行动的德国海军司令接受暂时停火，以便考虑一个永久性解决办法。

阿布希里本人为了在坦桑大陆建立起新秩序，向德国人提出一个总的建议，只允许德国人在桑给巴尔征收海关税，而素丹可以在大陆各港口征收海关税，但必须通过非欧洲籍的代理人（实际上，欧洲人并没有控制沿海，他们既无战船和重型武器，也没有设防的城池）。另外，还要承认阿布希里是从达累斯萨拉姆到潘加尼沿海地区、以及大陆内地的总督。

很显然，桑给巴尔素丹和德国军官们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建议。1889年4月，赫尔曼·冯·魏斯曼被任命为德国地区的军事和行政负责人，他轻蔑地否定了该建议，并向阿布希里提出反建议，要求赔偿1万卢布后撤出沿海地区，或是继续武装对峙。谈判给德国人赢得了时间，增援了反攻的部队。

德国人积极准备攻打起义军的行动从1888年12月就开始了。在海岸修筑工事，以便运送武器。德国首相俾斯麦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支付200万马克的特殊基金，筹建一支由魏斯曼指挥

的非洲雇佣军，去摧毁“奴隶掳客”的起义。魏斯曼在军队到达之前就开始修筑碉堡。

阿布希里感到即将临头的危险，他劝阻地方居民与魏斯曼合作。他砍掉一个参加修筑碉堡的工人双手。在军事方面，他采取防守，在巴加莫约以外的恩佐勒（Nzole）军营固守。魏斯曼于1889年5月8日接受上千名苏丹人和祖鲁人（实际上是沙加恩·恩果尼人）的致敬，被起义军释放的欧洲俘虏又参加到向恩佐勒进军的行列。德军的进攻计划经过周密的安排，阿布希里部队受到闪电式攻击，损失惨重。德军对达累斯萨拉姆的进攻也迅速地获胜。北部沿海大城市很快都被德国人占领。阿布希里领导的起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阿布希里和其他反对德国人的沿海知名首领并没有放弃最后取胜的希望。因为魏斯曼从海岸向内地进军时，曾被起义军俘虏过；阿布希里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主要阿拉伯酋长采取种种办法，与内地各酋长和居民建立联盟关系。1889年夏季，一次新的反德行动风声四起。这次起事日期原定于伊斯兰历新年（相当于当年公历8月18日），参加起事的人不仅有大陆各个不同人种，还包括桑给巴尔素丹的军队。

然而，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意外，那一天什么事也没发生，而内地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1889年9月，魏斯曼率领一部分军队到达莫诺果诺（Morogoro），迫使当地强大的卢古鲁酋长与起义军断绝关系，而与德国人联盟。阿布希里此时被迫马上行动。

10月，他率领一支主要由姆本加（Mbunga）人组成的配有火器的几千武士，从巴加莫约后面绕道走向沿海地区。姆本加人是坦桑东南部的一支好战民族，其中一部分人在1880年左右因受赫赫人（Hehe）的逼迫，往北迁徙并定居在莫罗果罗附近。初期，阿布希里招募他们加入运动，以偿付金钱为代价，但是，经过恩佐勒（Nzole）的一场战役后，已付不出钱了，因此，他应

允部下出去抢劫敌人以及沿海地区的其他盟友。

象这样一支组织很差，并带着这种目的而行动的武装力量是难以控制的。姆本加人并没有抢劫阿布希里指定的集团，而他们随心所欲的行动激起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愤懑。另外，德国人于10月18日发起了进攻，一支约300名苏丹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德国人的指挥下攻打驻扎在米约姆博（myombo）的姆本加人的主要管地。经过一场恶战，姆本加人被赶出该地区，从此，阿布希里无能力组织一支新的军队了。

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威信扫地的阿布希里与沿海的最大起义军领袖博瓦纳·赫利（Bwana Heri）汇合了。由于阿布希里患象皮病，不能与赫利一道进行机动的游击战，只得往北部逃遁，向桑巴阿人的国王桑博加（Semboja）求援，或是继续战斗，或是进入英属肯尼亚。桑博加国王拒绝阿布希里在他所辖范围内停留。这位起义军领袖只得带着一小队人穿过德国人巡逻的领地，走向边界。最后，当他的中队人马落入德国人陷阱时，他只身躲进村子。德国人以1万卢布作为赏金以悬赏他的头颅。一些怀有敌意的姆本加族人，促使村长逮捕了阿布希里，并把他交给了欧洲人。阿布希里被德国人带回潘加尼，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于1889年12月5日被绞死。

### 历史领袖阿布希里

阿布希里在被德国人关押的日子里，为了逃避被处以极刑，他把自己部队中姆本加人所犯下的暴行统统推给下属军官，同时还向德国人表示，自己可以为他们效劳。这个建议并不过分，因为过去就有两个德国探险家曾提出采纳阿布希里的建议。这两个人被阿布希里部队俘虏过。博瓦纳·赫利于1890年被俘后，就被德国人任命为萨达迪总督。虽然阿布希里被捕后，很想与德国人妥协，但最终未逃脱被处死的厄运，其主要原因是阿布希里比别



的起义军领袖威胁性更大。

阿布希里领导反德运动时，就计划把潘加尼发生的起义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全国性的早期民族主义运动。阿布希里自称是阿拉伯人，想从素丹那里要一个总督的职位。他相信，在坦桑部分土地扎根的斯瓦希里人会支持他；他还想把斯瓦希里文化扩展到内地、以及沿海非穆斯林的非洲领袖和居民中去。

阿布希里所领导的起义活动必然失败的原因是：首先，他的下属指挥官的能力超过他本人，其社会影响也远远超出他个人影响，虽然阿布希里吹嘘自己的军事才能，实际上他还不如博瓦纳·赫利。其次，城市首领与沿海各部落酋长之间互不信任，他们对阿布希里也采取怀疑态度，甚至在德国人的武力威胁下，也难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姆本加族的武士在沿海地区生长，他们一心只想保卫自己，他们认为，游手好闲抢掠农产品的土著人与欧洲殖民者一样，具有危险性。后来由于德国人干了一系列蠢事，威信扫地，沿海居民才转而认为德国人比阿布希里领导的军队更可怕。另外，德国人所组织的武装力量装备精良，组织严密，大大超过非洲人的武装部队，德国人还善于运用分化手段，利用当地的政治局势组建他们的同盟。

在阿布希里攻打巴加莫约时刻，完全有可能阻止德国政府组织一支讨伐东非的军队，迫使德国地方政权接受一种和平协议。如果政局是这样发展的话，阿布希里本可以控制沿海的部分地区，在斯瓦希里的精英分子中起主导作用，在坦桑沿海地区发展，并扩展到内地。

（康 昭 摘译）

## 拉明·盖耶的一生

### ——从旧非洲到新生的塞内加尔

—

1638年，法国殖民军在西非塞内加尔河的河口登陆，建立圣路易城。从此，圣路易成为法国殖民主义者征服西非的策源地。到本世纪初，虽然位于圣路易南面的海港达喀尔因花生出口贸易的兴旺而日益发展，并成为法属西非洲的新首府，圣路易却仍保持着塞内加尔第一大城的地位。由法国殖民者于1840年建立的法属西非议会，一直设立在圣路易。议会名义上是由塞内加尔人选举产生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圣路易、达喀尔等四个城市的居民有选举权，占人口大多数的塞内加尔农村居民还受着殖民地《土著法》的统治。即使拥有选举权的城市黑人居民，也只是名义上同法国人享有同等权利，实际上政治活动一直操纵在法国人和法非混血儿的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城市中黑人青年的出路一般地说无非只有两条：不是从政——当殖民政府机构中的办事员，便是从商——主要经营花生及其他农产品的出口贸易。1904年法属西非洲的教育机构进行改组，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些就业条件，于是颇有一些黑人青年试图在教育界谋职。这些人中，后来有的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虽然他们起初或许并没有明确的革命意识，但是历史的洪流把他们卷到了时代的浪尖。拉明·盖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 二

1891年9月20日，拉明·比拉欣姆·马马杜·盖耶出生在圣路易的一个望族家庭。他的祖父曾当过法属西非议会的议员。只因为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苏丹（今马里）担任包税官，所以他才出生于苏丹的麦地那。不过他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圣路易的家中。6岁时，他同当时上层黑人家庭的子弟一样，先入穆斯林学校接受宗教启蒙教育；他在那里学习了六年，课程有《古兰经》的经文、伊斯兰的文学及神学。12岁时，他又同圣路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一样，开始接受西方教育。早在1840年，圣路易就有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不过，在拉明·盖耶入学时，教会学校早就由于1901年法国颁布的宗教与教育分离的法令而世俗化了。当时塞内加尔的西方学堂还按照宗主国的教学大纲授课；到1908年，这些学堂的课程开始分成两等：黑人班级的授课大纲被大大地简化；只有母语是法语的孩子才能进入所谓的“欧洲班”，接受同宗主国的教学大纲一致的学校教育。但那时拉明·盖耶已经毕业。他是在1907年7月取得初级教育结业文凭的。当时取得这一文凭的学生一般都进圣路易师范学校进修，拉明·盖耶却于1908年开始他的教员生涯。他在教学中违背法国殖民当局有关分班制的规定，仍按宗主国学校的教学大纲给黑人孩子授课，以此表明他的政治主张：他认为黑人在受教育方面应与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争取权利上的平等后来成为他终身奋斗的目标。

1914年，塞内加尔出现了一个名叫“塞内加尔青年”的政党。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健全的政党，而只是一群青年的松散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交谈有关就业、工资、津贴等社会问题，并探讨解决办法。这个团体同当时许多亚洲或非洲殖民地的类似团体一样，首先强调民族性：他们维护传统服饰和宗教习俗，鼓吹非洲的特性。然而，1914年，

正巧赶上立法选举。原先代表塞内加尔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弗朗索瓦·迦波不得人心，“塞内加尔青年”便策划提出一名不代表官方观点的候选人。他们认为曾在圭亚那当过关税督察员的勃莱兹·迪亚涅是合适的人选，尤其是因为勃莱兹·迪亚涅作出许诺：愿把维护塞内加尔当地人的公民权放在首位。在为勃莱兹·迪亚涅竞选的活动中，“塞内加尔青年”表现出了真正的实力。勃莱兹·迪亚涅于1914年5月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拉明·盖耶曾为迪亚涅的竞选作出了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政府颁布战争动员令：凡法国公民都有应征入伍的义务，殖民地的居民也无例外。这一新的形势为塞内加尔的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的论据：义务上的平等应该带来权利上的平等。塞内加尔的黑人既然为保卫法国的利益应征入伍（拉明·盖耶的两位兄长也走上了前线，并为法国捐躯疆场），他们理应享有同法国人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拉明·盖耶在大战期间以及大战以后，不仅鼓吹上述主张，而且在学业上力求取得同白人一样的成就：1916年，他任小学校长期间，请假赴法进修，在里昂的安培中学读完业士第一阶段的课程。1918年，他又通过了理科业士的学位考试，取得在法属西非洲境内任何学校任教的资格。过去只有白人才能取得这种资格。1919年，法国政府颁布特别法令，允许在大战期间参军的大学生恢复学业并可缩短学业期限，参加毕业考试。拉明·盖耶在大战期间曾服过预备役，他以这条法令为依据，申请学士学位的考试。他以一年的时间，修完大学课程，于1920年7月取得法学学士学位的学位。从此他离开教育界；1921年2月，他被任命为法属西非洲上诉法院及法庭的辩护律师。同年，他又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他的论文《论全权城市中塞内加尔本地人的政治处境》获巴黎大学法学院的“优等”评分。他是第一位得到这种荣誉的非洲人。他利用居留欧洲的这一机会，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次泛非会议。来自非洲和美国的130名与会代表一致呼吁黑人应该

享受与白人平等的权利。拉明·盖耶这位30岁的黑人青年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以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智力价值和专业能力，表现出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已不能置身于政治现实之外，不能满足于律师事务所的“生意兴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对殖民制度应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 三

在法国人——例如法属西非的总督麦兰——看来，勃莱兹·迪亚涅已经具有民族主义者的气质，甚至简直在为非洲国家的自治鸣锣开道。其实，当时有一大批非洲青年学生的主张，远比勃莱兹·迪亚涅激烈，例如拉明·桑戈尔以及后来继拉明·桑戈尔之后担任“保卫黑色人种联盟”书记职位的田莫柯·迦朗·库亚德，他们对殖民制度抱拒绝合作的态度。拉明·盖耶则在《法属西非日报》上撰文同这些青年学生遥相呼应。但他同他们的政治路线并不一致，因为他并不反对殖民制度本身，他只是主张在保存非洲传统、尊重穆斯林宗教习俗的同时，尽可能在殖民体制下多为黑人争取到一点改善——多一点正义，多一点平等和多一点友爱。他始终坚持这一方针，直到独立运动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他才开始触及民族主义的命题。

1922年以后，勃莱兹·迪亚涅的保守倾向日益显著，反对派也开始形成。“塞内加尔青年”改名为“塞内加尔青年共和联盟”，已同勃莱兹·迪亚涅疏远的拉明·盖耶进一步密切了同青年联盟的关系。1923年，拉明·盖耶在法国加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社会党），除反对一切殖民化的共产党之外，这是法国唯一主张殖民制度应日趋消灭的政党，不过他们把民族独立作为非常遥远的目标。他们对海外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他们很快习惯于在代表大会上看到拉明·盖耶的高大的身影，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就是黑非洲的化身。然而社会主义思想那时还没

有在塞内加尔传播，塞内加尔境内的社会主义者还只是一些依附于宗主国社会党的个别人。拉明·盖耶为了建立舆论阵地，他从弗朗索瓦·迦波的手中赎回了《法属西非日报》的产权，后来这家日报直到1958年正式停刊前一直充当他的喉舌；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政论和有关法权的文章，《法属西非日报》使他的声音传播到塞内加尔境外。

1925年，拉明·盖耶宣布参加圣路易的市长竞选。他的对手是勃莱兹·迪亚涅的心腹杜盖-克雷多尔。拉明·盖耶在竞选中历数勃莱兹·迪亚涅的“背信弃义”，指责他取消西非议会（地方议会那时已变成殖民地议会），缩小殖民地的财政权。当年5月，拉明·盖耶当选为圣路易市市长。6月，他又成为殖民议会的议员。但是，缺少行政经验的拉明·盖耶，更由于兼职奔波于圣路易和达喀尔之间，无法保证市政日常事务的顺利进行，结果大权旁落，副市长盖代理市长职务。当拉明·盖耶想从盖的手中收回一些财政权时，盖便指责他蓄意恶化财政赤字。社会上更流传谣言说市长挪用公款为自己修房子。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其实还另有一个政治原因：国民会议员勃莱兹·迪亚涅想同以拉明·盖耶为代表的反对派达成一项协议，而圣路易市政官员和选民中有一部分人对此并不赞同。1927年4月，这项协议正式达成，条文中并没有恢复西非地方议会的项目，对于发展教育事业、保障公民权益，倒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这正是拉明·盖耶念念不忘的两个方面。有人谴责这次妥协，拉明·盖耶两次为自己申辩。他说：“这只是一个绝对没有私心的正直人的行为，目的只在于平息感情冲动，为共同的事业服务，为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塞内加尔人的真诚团结贡献力量。”然而他与勃莱兹·迪亚涅的休战却维持不了多久。在1928年的立法选举中，反对派与勃莱兹·迪亚涅的头号助手迦朗杜·迪乌夫结盟，来同勃莱兹·迪亚涅对抗。迪乌夫提出的政纲要求建立新的全权城市和扩大公民权益，其中部分条款是拉明·盖耶起草的。勃

莱兹·迪亚涅虽然再度当选，但失去了许多选票。迪乌夫虽未当选，但所得选票（4936票）仅比迪亚涅少139票。

1929年的市长选举和1930年的殖民议会选举，拉明·盖耶都没有当选，接着他在政治舞台上息影了几年。但他并没有灰心，他只是感到自己学识尚浅，有必要进修。在理论方面，他在巴黎大学法学院进修取得了两门学科的高等文凭：1929年，他取得私法结业文凭，1933年，他取得罗马法与法学史结业文凭。在实践方面，他既积累了将近10年的律师业务的经验，因而有资格要求晋升为法官。他同迪亚涅进行了讨论，迪亚涅建议他到留尼汪去谋法官职务，因为那里的司法程序同宗主国一样，他可以在那里得到完善的职业训练。他向迪亚涅求职的举动又受到别人的再次谴责，他在《法属西非日报》上为自己申辩说：“我之请求参加法官团，无非为了满足我的求知欲。”有人认为“我醉翁之意旨在谋取官员职位。其实目前我并无此意。倘若有朝一日我希望当选公职，到那时我的选民才有权就我当时和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讨论和作出评价。”1931年，他被任命为留尼汪的参事，并在法学院任专座讲师。1934年，迪亚涅去世，他在列奥波德·塞达·桑戈尔和比拉戈·迪奥普等大学师生的支持下，才决定参加国民议会议员的补缺竞选。

#### 四

但是，他落选了。从1928年起成为迪亚涅的反对派的迦朗杜·迪乌夫当选为补缺的国民议会议员。由于上次立法选举中迪乌夫曾参加过竞选，选民们对他比较熟悉；而且法国殖民当局对他也不反感。当时由于花生价格猛跌，农业歉收，塞内加尔经济很不景气，在这种虚弱的局势下，选民们但求和平、团结，希望塞内加尔及早从经济危机中重新恢复元气，使失去的自由重新回到选民的手中，所以迪乌夫只须声言塞内加尔境内存在着分裂的

幽灵，便足以使选民们拥戴他来主政了。

下一届的立法选举尚需等待两年。拉明·盖耶身为法官，不得不回到留尼汪去。在拉明·盖耶不在塞内加尔的日子里，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人想为下届立法选举寻找一位比迪乌夫更豁达的候选人，他们想到了拉明·盖耶。这些人创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塞内加尔社会党”。在这里，社会主义一词并无国际主义的含义，因为对于塞内加尔来说，国际主义简直是浮夸的奢言，所以塞内加尔社会党其实是“一切自食其力者的”政党，它愿意向一切倾向开放：以前的迪亚涅分子也罢，迪乌夫分子也罢，凡参加过宗主国政党的人，都可以参加。从理论上说，社会党捍卫的是它的思想而不是个人，然而这个政党的真正团结的支柱是拉明·盖耶。拉明·盖耶为塞内加尔社会党明确了方针，他说：社会主义意味着越来越公平的正义，意味着教育的发展。“过去一贯帮助受压迫人民的法国应该帮助名符其实的法国国民（按：这里指塞内加尔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在人人平等的法律的保护下，得到更多的正义和福利。”就此看来，他的社会主义首先只是争取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1936年，塞内加尔社会党号称拥有党员5300余人。那正是法国境内人民阵线赢得胜利的年代，然而在塞内加尔情况却不同。迪乌夫再次当选。代表塞内加尔社会党参加竞选的拉明·盖耶再次落选。有人说：“勃莱兹·迪亚涅根据选民团签署的借据稳坐国民议会的议席直到寿终正寝。迪乌夫因为是资格最老的反对派，才理所当然地当选。现在拉明·盖耶也只有等迪乌夫一命呜呼才有上台的希望。”然而局势不久就发生了变化。他在法国境内的社会党朋友所取得的胜利使拉明·盖耶在塞内加尔的政治分量大大超过国民议员迪乌夫的分量。人民阵线的胜利，使社会党人马留斯·穆泰出任殖民部部长。法国社会党本来就把殖民地人民自治作为解决殖民地问题的一个长远目标，这同拉明·盖耶的主张是一致的。身为塞内加尔社会党主席，拉明·盖耶当仁不让地把自己视作一切受过法国式学校教育的



黑人行政人员、职员、工匠、中小企业主、社会知名人士的代表。因此在达喀尔就出现了这样的话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的迪乌夫及其追随者代表了在法国境内落选的民族阵线，而落选的拉明·盖耶倒代表了在法国执政的人民阵线。

在那一段日子里，拉明·盖耶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身为法官，他受命负责调查法属赤道非洲的私法和习俗。殖民部长穆泰专门为此目的设立非洲法委员会，拉明·盖耶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总推事。身为塞内加尔社会党的主席，他力求促成自己的政党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合并为“法属西非洲社会主义联盟”。他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1937年，他被委任为马提尼克的法官，但因党内事务羁身，他不得不推迟数月赴任。在他的努力下，“法属西非洲社会主义联盟”在法国两院联席会议中所占的席位由1937年的9席很快就上升到1939年的81席。他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原先他只是国民议会殖民委员会的普通观察员，1938年他被选为候补委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惨败，那时拉明·盖耶正在巴黎任非洲法委员会的总推事。维希傀儡政府准他离任五年，他便携家离开法国，回到塞内加尔，重操律师旧业。在那几年中他的工作非常繁忙。1941年法国傀儡政府在塞内加尔设立军事法庭。法庭根据当年3月颁布的“特别法”（又称“非洲土著刑法”），不需任何凭据，仅靠捕风捉影，便可用妨害殖民地安全或戴高乐分子的罪名任意捕杀非洲居民。由维希傀儡政府派遣来的法属西非总督布瓦松将军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在食品供应、交通运输及公共场合等方面都作出种族歧视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拉明·盖耶在那些日子里为以各种罪名受审的塞内加尔人出庭辩护。

1942年12月，法属西非洲宣布投靠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但贝当分子并不立即下台，种族主义的魔影仍在塞内加尔游荡，因此，1943年末，拉明·盖耶以全体塞内加尔人的名义，上书戴高乐将军，要求结束种族歧视政策。

##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在法属西非洲出现了名符其实的“拉明·盖耶时期”。国际局势对非洲是有利的。联合国宪章预见到了传统制度即将告终。因此塞内加尔也要求宗主国实行最大限度的改良，拉明·盖耶就成了塞内加尔的化身。拉明·盖耶自1936年竞选失败后，不再参加公职竞选，而他的非官方身分，反倒使他在塞内加尔政治生活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与议员们交往，出入于政府各部，他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他同大多数的社会党部长关系密切。身为非洲政界元老，他不仅是塞内加尔的化身，甚至是非洲的化身。现在，他始终为之战斗的主张已经到了旗开得胜的时刻；平等、正义和友爱的呼吁，已经唤来了新的黎明。然而，妥善解决法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问题，还缺少平静的气氛。1944年11月蒂亚洛阿兵营的事件更使即将到来的黎明蒙上阴云。在离达喀尔仅几公里的蒂亚洛阿兵营中，从前线或德国战俘营归来的塞内加尔士兵由于拒绝在拿到拖欠的军饷之前离开兵营而遭到镇压，死伤无数。军事法庭决定按情节轻重给反抗者处以严刑，有人甚至将被判处10年徒刑。拉明·盖耶出庭为他们辩护。法属西非的各大城市慕名向他求教。他奔忙于巴黎和非洲之间，争取欧洲人士对他所捍卫的事业的支持。

他改组塞内加尔社会主义联盟，力求使这一组织同宗主国的类似组织具有同样的地位。法国政府要求他履行政党注册手续，1945年4月，他的政党正式公开自己的纲领：要求实现政治平等。拉明·盖耶说，这个要求只是一个公正的补偿，因为塞内加尔人帮助法国得到解放，法国应该让帮助过它重获自由的人享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1945年7月，在达喀尔市政选举中，他当选为市长（后来他在这个职位上，任期长达1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出现许多政治组织。为了争取参加1945年10月制

宪议会的召开，这些政治组织团结在社会主义联盟的周围，以非洲集团的名义实现了统一。拉明·盖耶当时著文说道：“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法国在为新宪法奠定基础。而这一切居然把我们置于局外，也就是说同我们作对。我们不能袖手接受这样的现实。”显然，拉明·盖耶的个人努力为促成法国各海外领地的代表出席制宪议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拉明·盖耶还为非洲妇女争取到了选举权。1945年9月，非洲集团领导委员会公布参加10月大选的候选人名单，塞内加尔第一次获得选派两名代表的权利。拉明·盖耶是当然代表，而第二位代表则是由拉明·盖耶向大会推荐的政坛新人——列奥波德·塞达·桑戈尔。他们提出的纲领是：“法国公民应属同一范畴，他们的权利应该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所尽的义务——包括为同一个祖国捐躯在内——是一样的。我们同样应该努力，为在宗主国，特别在非洲，开创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民主局面，以实现名符其实的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那么，当前如何实现这一纲领呢？那就是：取消土著歧视和强迫劳动，恢复地方议会，扩大选举权。这些都是拉明·盖耶一贯为之奔走呼吁的目标。

拉明·盖耶当选为国民议会的秘书，从而成了议会中黑非洲议员们的喉舌。非洲议员为了在表决有关海外领地的议案时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他们决定分散地参加不同的议员集团。拉明·盖耶和桑戈尔等人参加了社会党集团。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仍是解决塞内加尔问题的最理想的出路。1946年2月，塞内加尔地方议会终于恢复，同年5月，以拉明·盖耶的名字命名的法令颁布了：法属殖民地的一切非洲人都享有完全的法国公民权。拉明·盖耶在1921年就提出的纲领终于实现了。

在讨论新宪法草案的日子里，拉明·盖耶起到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他作为海外领地委员会的委员，加强了殖民地当选议员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他又促使议会中的社会主义派别同意海外领地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条文草案。要完成后面这个任务，

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从1944年起，一再被大多数选票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导委员会委员。他代表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党团组织，尤其是他代表了非洲。他在宪法委员会的发言中为非洲议员的提案作了如下的申辩：“有人说，我们只从黑非洲的角度看问题。就算这样，难道应该抛弃我们的提案么？黑非洲有2500万居民，制订一项对2500万居民都适宜的宪法条款，难道能持漠然态度么？”但，他同时又再三声明：“我们谁也不想脱离法国的统治，我们的提案决无丝毫这类的打算。”1946年末，莱翁·勃鲁姆出任法国总理，组成清一色的社会党政府。拉明·盖耶被任命为副国务委员。

然而，事态的发展开始使人怀疑殖民地在法国的统治下有无实现司法和政治演进的可能性。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暴动促使拉明·盖耶重申殖民地人民实现自治的权利，他谴责暴力。在国民议会中，他反对取消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豁免权，为他们的权利辩护。讨论中也有人指责塞内加尔士兵开枪，把镇压的罪责推到他们的头上。拉明·盖耶也为他们辩护，他说：“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到马达加斯加去的，只因为他们是军人，而军人得服从上级指挥，不能自作主张选择自己的去向……他们只是尽军人的职责，只是在痛苦的、艰难的情况下尽责而已。我想无顾忌说一句，照我看，不是只有他们，也不是总由他们采取某些行动的”。

非洲民主大会的成立更证明了非洲的政党可以独立行动，不必追随宗主国的政党亦步亦趋了。拉明·盖耶却忠于他的社会主义朋友们，拒绝出席大会。塞内加尔社会党不适应新的政治生活的条件，拉明·盖耶左右的助手们似乎也没有及早意识到形势的变化。他本人更是容不得一点批评。1947年，内部矛盾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明朗化了。桑戈尔及其拥护者们要求党内民主，反对集权，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成。然而情况并不因此得到改善。桑戈尔于是在1948年辞去职务，创建塞内加尔民主集团，并在议会中组织海外独立党派。这时，在拉明·盖耶周围，分裂的局面日益

明显。1951年的竞选运动是在戏剧性的气氛中进行的。社会党建立了一支类似民兵的组织，号称“红色贝雷帽”，塞内加尔民主集团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号称“绿色贝雷帽”，以示对抗。拉明·盖耶到比尼奥纳进行竞选演说时，城内房屋起火。但是由于政党领导人力求避免严重的对抗，局势才没有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选举结果：社会主义党得票仅占1/3，拉明·盖耶落选。

## 六

这次选举失败之后，拉明·盖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他离开塞内加尔，去法国治病，无法再积极参与塞内加尔的政治生活，而只能局限于给他的部下下达一些指示了。1952年，他出任法国驻联合国社经委员会的代表。1956年，塞内加尔进行市长选举。除达喀尔市长职位仍由社会党当选外，在其他城市社会党都落选了。在议会中，塞内加尔民主集团占有110个席位，社会党却只占59个席位。一次次选举都使社会党感到幻灭，以至连保尔·薄尼菲和奥倍·迪奥普这样的党内负责人都不能不向拉明·盖耶进忠言了。塞内加尔社会主义联盟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么与宗主国的社会党保持关系，甘冒失去塞内加尔群众的危险，要么同法国社会党脱离关系，在塞内加尔组建非洲社会主义集团。拉明·盖耶却下不了同宗主国决裂的决心，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还意味着要他放弃他一贯主张的与法国同化的理想。1956年5月，他是迫于无奈、不无痛苦地同塞内加尔民主集团靠拢，并与法国社会党疏远的。他认识到为了使非洲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就不能阻挡泛非运动的兴起。1957年，在科纳克里的代表大会上，塞内加尔社会党提出创建“非洲社会主义运动”，拉明·盖耶担任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在塞内加尔地区范围内，社会党政组为塞内加尔行动社会党，而且以行动社会党的名义参加当年3月举行的法国海外领地议会的竞选，得到10.1万张选票。但

是由塞内加尔民主集团和塞内加尔民主联盟联合而成的塞内加尔人民集团却得票45.9万，大大超过了拉明·盖耶派。拉明·盖耶一贯要求在宗主国统治下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事态的发展却深刻地证明了他的主张的局限与不足。经过这些年的失利和碰壁，拉明·盖耶似乎有所觉醒，开始适应新的政治局面。既然塞内加尔的政治舞台已由他当年举荐的列奥波德·桑戈尔主宰，那么他只有同桑戈尔结盟才能免使非洲分裂。

为了促成非洲政党的团结，他在1958年先在巴黎后在达喀尔同各政党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商，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于是他决定在地区范围内努力。塞内加尔人民集团和塞内加尔行动社会党联合发起创建非洲团结党。作为塞内加尔的地区组织，塞内加尔进步联盟宣布成立，由列·塞·桑戈尔任联盟总书记，拉明·盖耶任政治首领。

## 七

从此，拉明·盖耶的政治态度迅速发生变化。为了争取青年们的拥护，他不能落后于形势。作为制宪协商委员会的委员，他被选进参议院，并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参议院的副议长。1958年11月，他出任马里联邦议会议长。过去他一直下不了决心与法国割断政治联系，现在他同主张立即实现独立的青年一代站在一起。他赞成向戴高乐提出马里联邦独立的要求，他以非洲政治界元老的身分起草了致戴高乐的请愿书，在那封信上签名的有穆·凯塔，玛·迪亚和列·塞·桑戈尔等人。他参加了批准独立宣言的商谈。他主持了独立的马里议会。马里人民甚至请求他考虑担任马里联邦的主席。

1960年8月，在塞内加尔决定脱离马里联邦的时候，拉明·盖耶没有露面，也许这是他举棋不定、有意回避的表示。有些桑戈尔的忠实追随者对此很为不满。但是，拉明·盖耶毕竟在达喀

尔和在塞内加尔享有崇高的威信，而且日久见人心。1962年的政治危机说明拉明·盖耶的支持有多么可贵。他决定支持桑戈尔，他认为桑戈尔是塞内加尔团结的保证。当时议会大厦已由支持迪亚的士兵把守，他便把议员召集到自己的家中。经过十几次讨论，近百名议员中有47名议员投票赞成推翻迪亚政府的弹劾案。那是1962年12月17日。

此后，拉明·盖耶又继续当了五年议长。年岁并没有使他的睿智衰颓，也没有稍减他对塞内加尔生活的关怀。1968年6月11日，达喀尔爆发学生罢课运动，那时他虽然已经生命垂危，却仍对事件的发展十分担忧。罢课因国丧而暂息了数天，达喀尔人民万人空巷为这位半个多世纪以来震撼过非洲政治生活的杰出人物送葬。桑戈尔总统在葬礼中致悼词。他说：“拉明·盖耶始终身先士卒，50年来，不仅为法语非洲的人民、而且为整个法国势力范围内的各族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

作为塞内加尔的法国人，他当过教员、律师、法官，他在学历上的成就足使任何一个法国人感到光荣。他精通西方文化，他希望为非洲的精英们争取到同样的学习条件。他希望把殖民帝国改造成为一个法语非洲的共同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了他所展望的这一前景。但他不愿意在晚年重新对他的选择挑起争论，而是不惜忍受内心的痛苦来自行解决。局势不允许他有所犹豫，也许正是他的高龄使他更能体谅青年一代的追求。

作为塞内加尔人，他不否认他对法国的依恋，但他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变作他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比他的晚辈们更彻底。他没有直接领导民族斗争，但非洲怀着深深的敬意把他奉为长辈，奉为哲人。

（李恒基 摘译）

## 马巴：武装反抗法国 对塞内冈比亚征服的领导者

从1850年到1890年，有两股势力在塞内冈比亚的政治舞台上起作用：法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力量以及由穆斯林宗教领袖领导的一种社会革命。从一开始，这两股势力之间就有矛盾。穆斯林运动本来不反对法国人，而是反对从事贩卖黑奴的传统政治制度。因此，出现了一批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他们想改造各自的社会。然而，他们多数人都遇上了法国的扩张势力，而法国人却支持没落的社会秩序，因此，在改革塞内加尔社会的浪潮中，涌现了一批抵抗坚决的领袖。

在这些穆斯林革命者之中，最出名的首领是图库洛尔人 (toucouleur) 哈吉·乌马尔·塔尔 (Hajj Umar Tal)，他当时所统辖的地区在今马里的西部。法国总督费德尔伯 (Faidherbe) 和乌马尔故乡富塔·多罗 (Fouta Toro) 的显贵破坏了他进军的计划。在塞内冈比亚成功地对抗传统政治制度并在一段时期内遏制法兰西帝国扩张的伟大人物是乌马尔的弟子，名叫马巴 (Ma Ba) 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马巴从1861年到1867年间，控制了塞内加尔的政局。他在萨罗姆 (Saloum) 到冈比亚之间创建了一个政权，甚至在短时期内，统治势力达到塞内加尔河北岸。他的势力在所谓法国控制地区内得到发展，法国人虽然做了许多工作，终不能彻底摧毁他的势力，甚至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和合作者仍继续战斗，尽管互相之间有矛盾，但反对法国人却是他们的一致目标。

这位能够在短期内遏制法国扩张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没



有他本人的照片，只能简单描述。他全名叫阿马瑟·巴 (Amath Ba)，法国人称他穆罕马杜·巴 (Mohammadou Ba)，他最响亮的名字是马巴。他个子高高的，神情严肃，走路时稍瘸，脸上由于出天花而留下深刻的痕迹。他约50岁时才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前大部分时间是教授《古兰经》。他曾给英国、法国领导人，还有塞内加尔的领导人写过信，却没有留下有关自己斗争的记述，他的革命行动永远铭刻在人民记忆之中。

马巴的祖父叫帕泰·杜洛赫 (Paté Douloh)，是图库洛尔人，出生于塞内加尔河边的富塔·多罗，所属氏族是社会上的领导集团，1770年被一次教士叛乱所推翻，从此，他就皈依了正宗的伊斯兰领袖。马巴的父亲叫恩迪奥古·巴 (Ndiogu Ba)，受过《古兰经》教育，与许多其他同龄的图库洛尔人一样，离开本土到其他地方去教书，以后在冈比亚河北岸的一个王国落户，曼丁哥人叫这个地方为巴迪布 (Badibu)，少数民族沃洛夫人却叫这个地方为里普 (Rip)。当时塞内冈比亚的少数民族都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希望穆斯林领袖能够保护他们，以抗拒素以抢劫为生的领导社团。从17世纪以来，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大的家族都在巴迪布北部和萨鲁姆南部落户。马巴本人约在1809年生于巴迪布。

马巴虽然是图库洛尔人，却在沃洛夫人中成长。父亲给他讲授《古兰经》，后来送他到北方开约尔 (Cayor) 的沃洛夫人国家继续学习，因为那里对《古兰经》的研究比萨鲁姆和巴迪布更深。他的兄弟马穆尔·恩达里 (Mamur Ndari) 被送到毛里塔尼亚。马巴学习结束后，到他母亲出生地约洛夫 (Jolof) 讲《古兰经》，并在那里结了婚。他的父亲于1827年去世。约1840年，马巴应邀返回巴迪布，他对该地区家族有很大影响，因为该地区古老家族的子弟都是他教育出来的。他的成功一半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另一半是因为他具有渊博的伊斯兰教知识。许多黑人马拉布 (marabout) 来自领导层的家庭，马巴的部下大部分是他

的学生或弟子，他们每个人都能指挥村子里的一小股力量。这时塞内冈比亚酝酿着一场变革，买卖奴隶时代所形成的政治形势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秩序，近两个世纪以来，战争和掠夺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也是各国王和首领财富的重要来源。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叶，由于崇尚武士精神，增强了武士们（当地称“梯埃多”tyeddo）的地位。他们主要从奴隶中招收。这批尚武的奴隶没有独立的身分，他们个人的晋升要取决于他们伺候国王的能力；公共事务日益需要的大批人员也从这批奴隶中提拔。如果奴隶贸易在18世纪初叶不能成为有利于酋长和他们武士的社会基础，那么，塞内加尔当时所进行的皮革和种子贸易会迅速发展起来。

众多的国王起用穆斯林教士，马拉布在宫廷里成为联系国王的人物，他们制作护身符，并为他们的主子祈祷。这些穆斯林领袖得到土地后，努力发展正统的宗教社团。他们生活简朴，严守教规，勤奋而有手艺，多数人从事生产和贸易，并在村里开办学校。“梯埃多”的生活则完全不一样，穿着鲜艳，嗜好饮酒。穆斯林信徒很早就反对这些武士。布巴卡尔·巴里(Boubacar Barry)就反对围捕奴隶，反对卖奴隶给欧洲人，他在1670年所写的著作中描述了穆斯林改良派所作的努力。穆斯林革命者在被传统贵族和法国贩卖奴隶的掮客联合打败之前，曾是塞内加尔北部和毛里塔尼亚南部的主人。

19世纪，两种人的对立加剧。随着奴隶买卖在大西洋的衰落，传统酋长和武士们收入相应减少，塞内冈比亚社会出现了危机。靠战争和掠夺而生活的武士们轻视正规劳动，主要收入来源切断后，就加紧剥削农民和商人。19世纪初，外来的旅行者更促进了各敌对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

虽然伊斯兰教是宫廷首先带入塞内冈比亚社会的，可是在贪图享乐、酗酒的武士和穆斯林清教徒之间的差异却难以调和。这两种人以外还有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种人，就是农民和从事手工业的群众，他们既不是穆斯林，又非武士，却是围捕奴隶和“梯埃

多”抢劫行动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从马拉布那里购买护身符，却又不肯背离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

穆斯林社团的成员除马拉布外，都聚居在村子里，他们都是一些朴实的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一些大的马拉布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联姻和受同等教育的机会结成的，富塔·多罗的宗教革命领袖都曾在开约尔的皮尔（Pir）村的一所学校里学习过。因此，穆斯林社团存在着一种聚合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穆斯林多次发动反叛活动，1855年在乌阿洛（Oualo），1842年在乌里（Wuli），1855年在孔博（Kombo），1859年在开约尔等，他们与曼丁哥人和沃洛夫人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1840年间，当欧洲的贸易商行开始大量收购花生之后，花生生产迅速发展起来。穆斯林农民把贩卖花生积攒的钱用来购买武器，到1861年，多数农民都已拥有武器了。这时穆斯林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意识到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优越性，从而要求他们的首领按正统教规办事，停止传统的鬼神活动；反对种族歧视，不得抢劫和奴役穆斯林，允许广泛地宣传《古兰经》教义。马巴在致法国人的信函中已明确表示了上述内容。

马巴受哈吉·乌马尔·达尔的影响最深。乌马尔是19世纪初塞内冈比亚唯一去麦加朝觐的伟大人物，他的人格和智慧超群，在穆斯林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1846年和1847年，他在塞内冈比亚进行宗教宣传旅行时，与马巴相识。他们二人按照传统的宗教习惯，一起祈祷三天三夜；乌马尔指定马巴为他在当地的代表，以后马巴把自己居住的地名改为乌马尔居住地名，叫尼奥洛（Niolo）。这对马巴一生为伊斯兰奋斗起了决定性作用。1862年前，马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被推选为穆斯林首领集团的头；他的兄弟定期前往巴瑟斯特（Bathurst）进行贸易活动，并囤积武器和军需品。

巴迪布国王的儿子马阿特·贾克吉尔（Maat Jaxeer）抢走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妇女，要马巴为婚礼奉献一头牛，马巴回

报以辱骂，只送了一碗燕麦，他的使臣被当作人质扣押起来。穆斯林信徒为此发起了武装进攻，杀死了国王的儿子，从此爆发了战争。

冈比亚的英国殖民政府对爆发战争的起因说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穆斯林的武装行动是为了惩罚巴迪布王国，因为在巴瑟斯特经商的人经常受巴迪布王国的骚扰。穆斯林的进攻是配合法国驻果雷(Gorée)部队行动的，马巴登上了英国的船只，同意一起出征，条件是要保护他们的村庄。巴迪布王国被法军打败，马巴协助法国人建立了和平。巴迪布国王派遣儿子贾克吉尔去杀马巴，可是贾克吉尔头晚喝醉了酒，泄露了机密，被国王杀死，从此爆发了战争。

有一点可以肯定，伊斯兰社团感到受压，战争是从摧毁贾克吉尔居住的村子开始的。不管怎样解释，马巴是被迫行动的，由于他个人和战友的安全受到威胁。战争一开始，穆斯林群众中就涌现了一批能干的领袖，他们横扫巴迪布王国，焚烧了所有不愿接受新秩序的村子，把萨鲁姆的敌军统统赶到河对岸。马巴本人并不想向政权伸手，他在1862年就曾表示过要去教书，但是事情并不能按他的意愿发展。

当他率军反抗压迫取胜后，所有穆斯林都倾向于他，要他支持。对巴迪布的反叛开始后不久，冈比亚河对岸尼乌米(Niumi)国王去世，一个马拉布想篡夺王位，请求马巴支援，马巴派去一支由其兄弟指挥的军队。该国继位王子于1862年5月要求英国人庇护。马巴向英国人表示，凡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可以得到宽恕。后来由于一次战斗失利，马巴才被迫与英国人签订条约(1863年)，承认尼乌米的独立，但仍要它进贡。此后，马巴尽量避免与英国人发生直接冲突，因为巴瑟斯特是供应他所需大量武器和军需品的主要来源地。

马巴的武装力量真正受挫是支持萨鲁姆所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穆斯林一方大败，三位领袖中只幸存一位，因此他们再次

要求马巴支持。当时萨鲁姆的国王是一个年方19岁的青年人，名叫桑巴·劳维贝·弗尔 (Samba Lawbé Fall)，与前任一样好酒贪杯。萨鲁姆是塞内冈比亚最富庶的地方，有丰富的盐田，又是进行贸易必经之要地，然而，桑巴国王的统治力量却很薄弱。法军在费德尔伯指挥下，于1859年入侵萨鲁姆和邻近的西内 (Sine)。这位法国上校想取消向塞内加尔国王上贡的传统习惯；取消贸易中的障碍（主要是“梯埃多”的抢劫），以便最后建立法国哨所网。桑巴国王感到危机四伏，被迫接受了费德尔伯的条件，但是只要法国人离开，他又推翻了自己的许诺。1861年法国人再次入侵这个王国，这次法军的统帅是彼内-拉伯哈德 (Pinet-Laprade)。萨鲁姆国王被打败后，同意支付赔偿费用，允许法国在考拉克 (Kaolack) 设立哨所；新签订的条约规定贸易税收额只占出口贸易的3%。

法国费德尔伯到达西非之后，把魔掌伸向大陆腹地，建立了一系列哨所点。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法国驻果雷和圣路易商人的利益，法国人不仅不能超然于地方冲突，他们还从大量冲突中渔利。初期，他们认为萨鲁姆的穆斯林代表进步势力。彼内-拉伯哈德写道：“马拉布是《古兰经》的忠实执行者，他们厌恶强盗般的暴行。在开约尔·巴奥尔 (Baol)、西勒和萨鲁姆，有一批人靠抢劫为生，马拉布近年来决心征服这批有害的蠢货”。

由于法国人的干预，桑巴国王的实力大大减弱，1861年法国迫使萨鲁姆支付沉重的赔款，只留给桑巴国王少量的购买武器和马的费用，还规定出口税由考拉克的指挥官负责征收。可是一直到了1863年1月，法军指挥官并没有把规定的费用支付给桑巴国王。1862年雨季前，桑巴国王的“梯埃多”为了得到粮食，破坏了庄稼。

这个时期，又一次爆发了战争。1862年10月6日，马巴率领4000人向只有1000多名武士的桑巴国王据点发起攻势。由于马巴兵力占优势，他乘胜攻打了一个法国哨所，遭到失败。

这次战役之后，马巴撤至尼奥罗，但是并不意味着马巴失败了，他的主要兵力还留在萨鲁姆，因为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局限在哨所炮弹所及的地方。到1862年底，马巴的力量已发展到萨鲁姆东部、吉洛尔（Jilor）省和西部地区。萨鲁姆王国讲塞雷尔（Sérére）语的大部分居民都进行了抵抗，然而萨鲁姆三角洲群岛上的塞雷尔族的穆斯林却投奔了马巴，可能因为他们也很仇恨“梯埃多”的缘故。到1863年雨季，马巴已经能够主宰从萨鲁姆到冈比亚以及从沿海岛屿到约洛夫（Jolof）边界的大片土地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还用石头修筑了约5米高的碉堡，每个碉堡还有10米高的瞭望塔。

穆斯林武装力量之所以成功，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一）非洲的伊斯兰教一千多年前就在当地扎了根，对挽救非洲各社会危机起了主要作用。例如，伟大的柏柏尔人改革家奥斯曼·丹富迪奥（Osman Dan Fodio）在富塔·贾隆（Fouta Djallon）和富塔·多罗等地的行动；以后是穆罕默德·阿哈麦德在尼罗河畔的行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物，但是都不如马巴出名。（二）可能是主要原因，由于19世纪发生了社会变革，特别是花生贸易替代奴隶贸易对穆斯林社团十分有利。

穆斯林与传统酋长总是时分时合，因为只有穆斯林会读会写，能够控制内地贸易。因为穆斯林从事贸易活动，所以他们所种植的商品农作物比其他地方多。穆斯林居住的村子里，有大批在田间劳动和织布的奴隶，他们也剥削奴隶。到19世纪中叶，由于欧洲对油料作物需求的增长，才改变了手工劳动的市场。

1850年间，穆斯林势力之所以占上风是因为他们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以后的10年战争改变了局势，这些和平的人变成了武士。马巴建立了有相当规模的国家之后，并没有在建立统治机构方面做什么事情；他迫使对方皈依伊斯兰教，以穆斯林法规为准则。在接受宗教法规办事地方的大权落在与他初期合作者手中，他们都是马拉布家庭成员，实行家长制的酋长，许多投笔从戎的

人现在依靠战利品和大批奴隶生活。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怪，一场因为反对穆斯林使用奴隶而发起的运动，却扩大了奴隶制和剥削奴隶的劳动。

马巴是虔诚的教徒，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真主的使命，虽然战争行动的后果是很悲惨的。马巴的武士们横扫一切，他们破坏、抢劫和焚烧一切。战争初期，马巴军队很少抓到俘虏，凡是不愿皈依伊斯兰教的一律格杀毋论。马巴说：“真主是我们的父亲，他引导了这次战争，我们受他的指挥”。他以宗教的热忱来激发武士们的勇气。一个英国总督描述他的工作方法说：“当他快接近要攻打的城市时，先下马跪在地毡上祈祷，一群马拉布围绕着他，一起念诵真主的伟大，然后把祈祷文写在纸上分发给各武士，他们决心走向胜利，或是走进天堂。打仗取胜后，他们也举行祈祷会”。

马巴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本人却是很朴实的。他给约洛夫国王的信中写道：“你们比我伟大，比所有东部的国王都伟大”，但是紧接着他又命令道：“象穆斯林那样到我这里来，真主是你我之间的证人”。他愿意接受那些已经臣服的人继续统治下去，但他们必须信奉伊斯兰教，而不是服从马巴个人。在马巴和他支持者之间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他并不想控制他们，也没有创建什么可以驾驭他们的机构。他一心想恢复伊斯兰原有面貌，不达到此目的决不罢休。他有很强的洞察力，1867年以前，他从不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

即便在马巴攻打考拉克之后，许多法国人还认为马巴比“梯埃多”更好。因为穆斯林繁荣了市场，与法国人有交往的贸易社团成员都是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是倾向马巴的。费德尔伯和彼内-拉布哈德都一直想控制贸易，他们知道工作重点对象是统治阶级；然而穆斯林对这两位法国总督并不感兴趣，当 they 与传统酋长发生冲突时，决不听凭外来者的摆布。头几年，马巴的行动并没触犯法国人的根本利益，费德尔伯主要对塞内加尔河流域和素

丹有兴趣，因此，法国所引进的花生种植业和商业活动在开约尔、巴奥尔和西内迅速地发展起来。

当马巴于1864年接受了一个新支持者时，就与法国人的关系急剧恶化。法国人把开约尔的国王马柯杜赶走，强行安置了一个傀儡，以取代马柯杜的年轻儿子拉特迪奥尔（Lat Dyor）。但是武士们都支持拉特迪奥尔，1862年把那个傀儡打败了。1863年12月，拉特迪奥尔率兵攻打一支法国纵队，从此，他成为引人注目的军事领袖。1864年，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卷土重来，打败了拉特迪奥尔并把他逐出开约尔。他带领武士和侄子南下，首先抵达西内国王宫中，塞内冈比亚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接待那些在政治冲突中失意的人。但是当时西内国王处境困难，他统治的国家是塞内冈比亚中不信神的国家，他对南方穆斯林革命者持怀疑态度。另外又对法国人抱有幻想，尽管1859年前，西内王国曾三次受法军的打击。拉特迪奥尔被西内国王拒绝后，到达马巴宫中。法国人要求马巴赶走拉特迪奥尔，马巴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拉特迪奥尔已皈依真主，他要与我在一起……他与我一起念《古兰经》，我们就是朋友，因为我热爱真理”。

费德尔伯为了避免一场无把握的战争，想与马巴谈判，因此，马巴与法国人之间长期交换信件。马巴主要强调两个观点：传统酋长对穆斯林犯下错误，是《古兰经》指导他向不忠实的人开战。为了进行贸易的法国人可以得到安全保证，他表示坚决不中断与拉特迪奥尔的关系，他可以为后者偿付一切债务。

费德尔伯曾经有一段时间似乎不清楚马巴从事战争的原因，从前者给马巴的信中看，好象他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制裁酗酒的“梯埃多”的掠夺行为。费德尔伯还给马巴划出不能超越的界线，他把萨鲁姆和西内留给马巴，却不允许马巴触犯巴奥尔和开约尔两地，他说：“在征服其他地方之前，先把萨鲁姆整顿好……不要忽视与我们有友好关系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去触犯这些地方，如巴奥尔。如果触犯开约尔，就等于攻打圣路易



一样”（见1864年5月23日，费德尔伯给马巴的信）。法国人把萨鲁姆国王赶出考拉克，马巴却允许该国王在考拉克附近的土地上耕种。1864年10月，马巴、法国人与四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认马巴是巴迪布和萨鲁姆的“阿尔马米”（almamy，君主之意），确认法国人有权在萨鲁姆进行贸易和已存在的边界线。签字的各方有互相通商的自由，保证异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一律平等，不得歧视”。

马巴对这个条约并不满意，他一直在争取时间。1865年初，有人获悉他的人马正向巴奥尔和约洛夫移动，马巴很清楚法国人在雨季中不会有大规模行动。彼内-拉博哈德既不愿意白人军队在雨季行动，又不信任完全由土著步兵组成的纵队；在军事行动之前，他还需要在开约尔和约洛夫之间的边界上建立哨所网，运送武器等。这一切做法没有什么成效，有些哨所四周的人并不听从法军的指挥。

尼奥姆雷（Niomré）哨所的指挥官于1865年10月29日给总督的信中诉苦说，人们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存在。“我尽力要人们懂得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您。他们回答说，他们的领袖是卢加（louga）的马拉布，没有他的命令，什么也不能做”。

7月底，约洛夫国王被马巴打败，马巴成为这个王国的主人。马巴利用新的地位，与刚被法国人打败的特拉尔扎（Trarza）的首长建立联系，还与富塔·多罗的图库洛尔人也建立了联系。

从1865年起直到马巴死后两年，他的密使定期往返富塔·多罗。马巴在信中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价值不大的人”。他只是替真主行道（见1865年8月截获的马巴给富塔·多罗居民的信），他要求实现穆斯林的团结，要求各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马巴究竟接收了穆斯林多少钱，没有确切的数字，因为很早乌马尔就在富塔·多罗进行宣传，并吸收了许多信徒，一种支持性的捐款并不少见。支持穆斯林的人包括各种不同种族的人，有曼丁哥人、图库洛尔人、塞雷尔人以及占人口多数的沃洛夫人，但是萨

鲁姆南部的沃洛夫人却是反对派。正当马巴和拉特迪奥尔率军占领塞内加尔北部的时候，齐库·乌斯曼·迪奥卜（Cheikhou Ousman Diop）受许多老的穆斯林家族支持而起来造反，马巴不得不把他的主要兵力调回萨鲁姆与乌斯曼打仗。

当彼内-拉博哈德军队攻打马巴时，马巴的主力已于11月返回萨鲁姆南方。法军的明确目标就是摧毁马巴的武装。彼内-拉博哈德沿着陆路进军，借以吓唬马巴的盟友和搜罗一些非正规的战斗人员。在法军接近尼奥罗时，队伍已大大扩充，骑兵2000，步兵4000，其中3/4都是非洲人。按彼内-拉博哈德的报告，法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死伤仅100多人，彼内本人肩上受了伤。

然而，关于这次军事行动，非洲口头传说的内容却截然相反，各种来源都说是穆斯林取得胜利。冈比亚所保存的档案材料证实了口头传说的正确。一份材料详尽描述了非洲人俘获许多法国军官，是反法殖民战争中罕见之事。1866年8月24日，班珠尔官方公开记录上记载着：“他们为去年12月在土巴尔科隆（Tubarcolong）打败法国人而自豪。他们头戴法军军帽，乘坐法军货车前进”。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拉特迪奥尔是一个军事战略家，过去曾打败过法国人。他为了不让法国的步枪和轻机枪发挥作用，在森林里设下埋伏，另外派遣一个从未见过白人的武士，由于好奇而探头，招致法国人提前开枪，中了穆斯林的圈套，法军失利撤退时丢弃了许多武器和军用品。

马巴在1865年的战斗中曾有过撤退，当他撤出约洛夫时，带走了一批人，以后这些人就定居在萨鲁姆南部。1867年法军袭击并焚烧了萨鲁姆三角洲的穆斯林居住的村子，还向考拉克哨所增派了援军，其目的是为了阻止穆斯林向西内进军。该年4月，法军160人离开哨所进行侦察活动时遭伏击，返回据点时只剩下40名士兵。此时，乌云笼罩了整个欧洲，上级及时制止住了彼内-拉

博哈德想再次发动进攻的计划。

马巴最后不得不屈服的原因，不是因为法军武器的优势，而是非洲社会的原因，深受传统宗教影响的社会拒绝伊斯兰教，西内国王信奉传统宗教，马拉布在该王国宫廷中只负责通讯联络。这个时期的西内国王叫孔巴·恩多方·儒夫(Kumba Ndoffen Joof)，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应法国人的请求，拒绝接收拉特迪奥尔。孔巴统治一个异教徒的国家，夹在两个强大的有扩张野心的敌人中间。1859年，他曾抗拒过法国对西内的侵犯，当他的抵抗行动无效时，又想限制法国人的贸易活动。法国人对花生感兴趣，国王就禁止种植花生。彼内-拉博哈德对国王说：“如果你想要我们保护你反对国内、外敌人，你就应该听从我的忠告。你应努力提高你臣民的福利和增加国家财富，你如果种植贸易所需的各种产品，就可以得到一切”。（见1863年7月9日，彼内给西内国王的信）。因此，孔巴再次向法国人作了让步，然而他国家的南大门却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强大敌人——穆斯林军队。从1864年起，法国人定期接受孔巴国王所表达的忠诚并给予所需武器。

马巴本想避免与西内发生正面冲突，1867年他却改变了战略，在考拉克附近的一次战斗获胜后，他的部队就开始入侵西内，在一次袭击中焚烧了西内的首都。据口头传说讲，被弄得手足无措的孔巴国王，给马巴送去一信，指责他搞突然袭击，让其在战斗中与西内军队公开较量。马巴主力部队到达西内的那个晚上，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马巴军队的弹药被淋湿，为了晾干弹药，部队停止前进。西内国王获悉上述情况后，决定先发制人，逼迫马巴军队不得不后撤，撤退过程中被西内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拉特迪奥尔半途逃之夭夭，马巴只得求真主保佑，最后一场血腥战斗之后，人们发现了马巴的尸体，他的头被割下，作为战利品送给法国人。西内的口头传说家歌颂这次胜利时说：“迪阿乌·迪奥博(Diahou Diob)的公牛再也不能进攻国王了”。但是，真

正的胜利者是法国人，孔巴为法国的扩张扫除了主要障碍。孔巴于1871年被一个法国商人所杀害。

另一个怪现象是：马巴从不抱怨法国人。由于法国人的扩张才引起一场反对法帝国主义的穆斯林革命。从此，马巴不再听从法国人的指挥，但费德尔伯和彼内-拉博哈德却不能接受一个战斗的穆斯林国家。

马巴遗留下来的是革命反抗精神。马巴在巴迪布造反30年后，塞内冈比亚被战争撕裂成两半。代代相传的领导人大多倾向于穆斯林，他们都希望改变有压迫的社会，许多领导人来自马巴阵营，当时最重要的社会集团有二：一是传统的贵族阶级。当拉特迪奥尔返回开约尔时，他把曾教育过马巴儿子的莫马尔·安塔·萨里 (Momar Anta Sali) 带回，一起整顿开约尔的政治体制。拉特迪奥尔的侄子阿尔布里·恩贾伊 (Alburi Njay) 于1875年把约洛夫变成一座强大的穆斯林碉堡。二是马巴的人，受过传教士的训练。马穆尔·恩达里 (Mamur Ndari) 想把他的兄弟马巴的国家稳定在尼奥罗；马巴军队的高级将领福德·卡布拉 (Fodé Kabla) 是曼丁哥人，于1871年穿越冈比亚河；马巴的下级军官在冈比亚河两岸为高级的穆斯林领袖服务。1880年，冈比亚大部分地方被穆斯林所控制。在塞内加尔，只因法国人的干预才维持住了原有的旧秩序，当传统酋长的地位受穆斯林威胁时，他们就向法国人求援，或结盟。

法国人的干涉并不是挫败马巴继承人的唯一因素。马巴继承人想通过战争成为唯一的主宰。随着市场对花生需求的增加，一个奴隶市场发展起来，新的酋长与以前的“梯埃多”一样，觉得战争有利可图，他们依靠掠夺、贩卖俘虏和奴隶劳动而生存。这种向旧生活方式的倒退是导致马巴等人失败的主要原因。马巴想创建一个真正的国家，但他对真正国家的概念又是模糊的。一些改革家如奥斯曼·丹富迪奥在已征服的社会里仍利用原有的各种官僚机构。马巴只知道应该按《古兰经》原则建立国家，却又没有

一个可遵循的典范。他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既纯朴又简单，与东部非洲的穆斯林社团相比要浮浅得多。

当历史把马巴推上舞台后，他只从宗教角度行事，而不是从政治方面考虑，他本人和他的支持者都认为是在实现真主的意志。马巴在各地任命“卡迪”（法官），承认其作为酋长的权力，从而形成马拉布统治一切的局面，马巴却没有创建控制马拉布的机构，结果是新上任的领袖在自己小范围内迅速建立了权势。1880年，一批传统酋长与穆斯林社团之间发生了严酷的冲突。在反抗法国人的最后几年中，人们为了恢复丧失的统一，曾作过许多努力。

对农民来说变化较小。虽然某些村子的穆斯林拒绝参战，最后仍变成了尚武斗士。一些相互攻打的人在大量搜捕奴隶，该世纪末奴隶人数占塞内冈比亚西部人口的1/3或半数。那些未参战的农民生活在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一些老年农民谈到这个时期时说，到田野去劳动必须带枪。欧洲人的扩张，不同秩序的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花生价格的跌落等所造成的压迫关系，都是加剧袭击和抢劫行为的因素。

法国人最终把马巴的继承人各个击破。拉特迪奥尔为了封锁达喀尔-圣路易的铁路，整整战斗了四年，1886年终于倒在法国人的枪弹之下。1887年马巴的儿子萨埃尔·马弟（Saër Maty）被打败后，逃到冈比亚。1890年，一支法国军队进入约洛夫，阿尔布里逃到内地继续战斗。以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那些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马拉布。与拉特迪奥尔一起返回开约尔的莫马尔的儿子就是阿马杜·邦巴（Amadou Bamba），阿布杜拉耶·尼亚斯（Abdoulaye Niassé）也是一位学者，1865年还在他童年时代就迁居到约洛夫，他的儿子哈吉·伊布拉辛马·尼亚斯（Hajj Ibrahim Niassé）是20世纪西非伊斯兰教的伟大人物。

（康 昭 编译）

## 塞缪尔·柯林斯·布鲁：加纳 商人与合法贸易的发展

西非人和欧洲人于15世纪在沿海首次相遇。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基本以贸易为主。非洲人在交易中起主要作用。400多年中，西非商人和欧洲人共同对商业的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交易中处于重要地位。一直到19世纪即将结束，当经济形势开始发展时，他们和欧洲人平等地干，并获得了财产和权势，明显加强了他们在非洲社会中的地位。这些大商人的存在本身与时代的决定性发展有密切联系。然而，关于他们，我们只有很少资料。我们缺少关于他们事业的详细情况。对于19世纪加纳商人塞缪尔·柯林斯·布鲁（Samuel Collins Brew）的情况，我们也只能从现有资料出发，概述他的一生。

布鲁的一生延续了19世纪的近3/4。在19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决定废除奴隶贸易，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混乱，奴隶贸易是它们同西海岸关系的主要基础。1803年丹麦首先废除奴隶贸易；四年后，轮到了当时在西非最重要的贸易大国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对所有西非国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后果。随之而来的是对各种经济状况长期而困难的适应过程。在今日的加纳，这一过程和国内政治大动荡同时发生，国内政治大动荡与贸易形势密切相关。布鲁的贸易活动受到了事态发展的很大影响。他的一生反映出沿海商人在政治经济变革时代由奴隶贸易向合法贸易过渡时期的处境和经历。

## 芳蒂人 (Fante) 的历史及其与布鲁一生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布鲁的准确出生日。他可能生于1810年左右，即英国议会投票通过废除并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后不久。布鲁是当时有名的芳蒂国家中大西洋岸边海岸角的人。芳蒂是沿海岸延伸100来公里的一个国家联邦。布鲁是芳蒂商人萨姆·坎特·布鲁 (Sam Kanto Brew) 的儿子；他有两个姐妹和一个兄弟亨利 (Henry)。亨利似乎也选择了商人职业。

该地区的特点之一是居民们有一种古老的交易方法。直到19世纪初，芳蒂地区约300年来一直担当欧洲商人的中间商角色，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被严格限于沿海地区，而非洲人被限于内地。因此芳蒂人得到了谨慎而能干的批发商的名声。19世纪中，一位住在芳蒂的英国殖民者指出：“非洲人的商业观念十分进步。人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些商业民族”。所以这种从事商业的志向是布鲁出生的那个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塞缪尔·柯林斯是混合名。他的曾祖父理查德 (Richard) 是爱尔兰大贩奴商，18世纪下半叶，长期住在距海岸角14公里的芳蒂国家城市安诺马布 (Anomabu)。布鲁出生时，不同种族的通婚早已很广泛。这种通婚现象是由于人们进行交易的特殊方式形成的，自1482年葡萄牙人在埃尔米纳 (Elmina) 建筑了第一个欧洲堡垒以来，欧洲各国都在向当地酋长租用的土地上建筑堡垒和设施。从这时起这种交易就开始了。

渐渐地形成了一些从事贸易的外国人小集团；他们沿着海岸逐段安顿下来。由于这些外国人不仅主要食品和劳力而且发展同内地国家的贸易都要依赖非洲邻居，他们同当地居民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为了更加密切同当地居民的关系，外国人经常同当地妇女结婚。这种结合的后代会被当地社会吸收，而且他们也常常会选择

商人职业。布鲁家族就是这种情况。塞缪尔·柯林斯·布鲁的父亲追随其爱尔兰祖先，在19世纪初期就成了芳蒂的大商人；下一代塞缪尔·柯林斯继承了这个传统。但塞缪尔·柯林斯·布鲁不同于其父，显然代表了在西非出现合法贸易特征的新时代。

布鲁出生的社会受到欧洲设施的影响。渔村都变为在堡垒周围发展起来的都市。芳蒂国家的海岸角和安诺马布就是主要实例。在这些沿海城市里，挨着传统茅屋建起了许多石头大房子。里面住着非洲富人和欧洲商人。很快就需要合格的瓦工和木工，甚至抛锚海上的舰只与堡垒之间需要摆渡的水手。而居民们和从内地来要转运去新大陆的奴隶们也需要食品。供应舰上的需求是贩卖奴隶时期在西部海岸发展起来的贸易内容之一。建有堡垒的城市进行了频繁的贸易活动并成为一直延伸到内地农村的庞大商网的中心。开辟得很好的道路把内地阿散蒂（ashanti）王国和欧洲殖民地连接了起来。阿散蒂奴隶和用枪支、织物、酒类以极小规模交换的黄金与象牙都是通过这些道路运回的。奴隶贸易的废除打乱了这种传统经济的基础条件并迫使内地和沿岸国家找到其他出口产品。对象布鲁一家这样的商人来说，这需要认真地适应。

### 加纳南部的英国人

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一旦被表决通过，英国人在整个西非沿海开展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激烈，也更经常。强迫停止贩卖人口并以合法贸易取而代之，即以英国制成品交换西非产品，是经济上的原因和人道主义的动机。

在整个19世纪，英国在西非逐渐扩大控制，先控制贸易后控制政治。在加纳南部，由建立小商行转入行使真正的殖民权力。布鲁要经历这种转变，而英国的存在对商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9世纪初，当布鲁降临人世时，有三个国家在加纳海岸建立



了商行：英国、荷兰和丹麦，它们各自在海岸角、埃尔米纳和阿克拉还设有总部。英国人拥有他们在18世纪即奴隶贸易鼎盛时期海上竞争和商业竞争时代获得的主宰贸易的地位。英国的堡垒和设施分段建在沿海，有时也和其他国家的混建在一起。但是芳蒂国家与之有特殊利害关系。从16世纪中叶起，英国商人就开始同该地区建立联系。100多年后，他们建造了海岸角堡垒，它后来成为皇家非洲公司的所在地（1672~1750年）。其实这是英国人在1664年占领瑞典堡垒基础上的扩建。英国在芳蒂另一座重要城市安诺马布的第一座堡垒也建于1670年代，而当它倒塌后，另一座堡垒在18世纪中叶建成。布鲁出生的城市海岸角和他后来筹划一家企业并成为显要人物的安诺马布因此同英国人保持了悠久的历史。

奴隶贸易废除后，英国在加纳的殖民地还会有什么用，奴隶转运站的职能消失了它们还能起什么作用呢？一直到1821年，它们都由18世纪中叶接替皇家非洲公司的非洲公司（1750~1821年）管理。从1821年至1828年，它们属王国管辖，但数量减少到4座（其中包括海岸角堡垒和安诺马布堡垒）。1828年，由商人进行管理，1843年，它们再次属王国直接管辖。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曾考虑放弃这些城市作为英国贸易帝国的前哨。在海岸角堡垒的英国人卷入和阿散蒂的第一次战争（1824~1826年）后不久，鉴于当时合法贸易总额还很小而政局又不稳定，宗主国政府想放弃所有责任。1828年，甚至派来了一艘军舰要把商人及其财产接运回国，只是当事人提出了抗议才导致另外的解决办法。双方通过和解达成协议，规定王国对这些城市采取新的贸易管理形式。

在许多方面，不应从伦敦寻找决定英国对加纳沿海政策的因素，而应该在西非本身寻找。从1830年至1847年的这些年中，所有设施都接受以乔治·麦克莱恩（George Maclean）上尉为首的海岸角商人管理。就是在这—时期，麦克莱恩对于合法贸易可能

真正发展的条件采取了决定性措施；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布鲁奠定了后来在安诺马布兴隆的贸易的基础。麦克莱恩对于这种经济新秩序的主要贡献是，沿海芳蒂国家与阿散蒂帝国之间经过长期战争和紧张状态后稳定了双方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和内地达成协议，麦克莱恩根据协议成为在沿海地区遵守协议条款的半官方保证人。他很少有办法完成好这项任务。殖民地从伦敦政府只得到很少的维持和防御津贴；至于麦克莱恩的军事力量也同样受到限制。协议尤其得到司法当局进行干预的保证。司法当局迁到了沿海，那里的纠纷有可能危害和平与贸易的顺利进行；从英国法律与习惯规定结合在一起以后，纠纷开始得到解决。这样就能维持同阿散蒂的贸易自由发展，避免过去的经常中断贸易。这种公正处理的方式其结果极大地影响了英国贸易地域的扩大和贸易总量的增长。

19世纪中叶，一种英国保护制度在海岸角堡垒出现。从1860年至1870年，主要在芳蒂国家和阿散蒂，再次出现了连续的政治动荡，打破了双方的平衡状态并为1874年即将在加纳南部确立真正的殖民权力开辟了道路。

### 阿散蒂和海岸

英国在加纳南部的存在对布鲁的商业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对阿散蒂王国与沿海之间的关系作用更大。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1807年，阿散蒂王国曾侵入芳蒂国家并开始进行征服，一直延续到1816年。这次入侵沿海地区，欧洲殖民者在18世纪就预感到了；它可能标志着对森林王国南部扩张政策的顶点。当入侵结束时，布鲁刚出生不久，它根本改变了西非的权力结构并开始了长期的政治动乱。阿散蒂人入侵沿海地区对英芳关系和英国的存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出现了向合法贸易过渡所引起的经济发展。

阿散蒂与芳蒂之间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各自都起了不同的作用。阿散蒂森林王国自18世纪末以来提供了黄金、象牙和奴隶，它经过自首都库马西开始的、穿越北部由尼日尔城市延伸过来的大草原并通向南部的路线，将它们运往欧洲堡垒。芳蒂人根据国家形势，控制着堡垒通向阿散蒂市场的交通道路网。阿散蒂人1807年开始入侵沿海国土后，产生了政治经济影响：它预示着阿散蒂人与欧洲殖民地之间的直通贸易，直接威胁着芳蒂人的中间商作用。

早已走上合法贸易道路的英国人这时有什么反应呢？从某种观点看，阿散蒂存在于沿海并不使他们不高兴：它展现了和西非最大而最强的国家结成贸易同盟的前景。从18世纪阿散蒂王国扩张初期起，英国人和所有其他殖民团体就开始力图同产黄金和提供奴隶的内陆国家发展密切联系。但芳蒂人控制沿海阻碍着英阿直接往来。作为中间商的芳蒂人非常固执，所有同内地的贸易都必须通过他们。打破他们的垄断必将带来好处，尤其是在英国人为他们工业革命的结果制成品寻找出口市场的时候。在合法贸易时代，人们认为阿散蒂王国和伸向北部的国土有着巨大潜力；征服芳蒂国家结束后不久的1817年，第一位英国大使离开海岸角去库马西赴任。

然而，英阿关系发展很不顺利，直到1830年左右（当时布鲁还很年轻），政局依然很动荡，双方关系不能取得大的进展，也不能指望同内地建立经常贸易。对此有种种原因，其中英国人负部分责任。他们同阿散蒂进行的曲折外交谈判并未解决问题。但是政局持续动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芳蒂人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厌恶合并于阿散蒂帝国。另外，芳蒂人擅长于利用已有的贸易经验压住英国人并在反复的沿海外交中加强自己的地位。

英国人对阿散蒂人无论如何态度暧昧。如果他们从同阿散蒂王国的良好关系中得到好处，人们也会说他们可能冒失地得罪了芳蒂人。西非的政治仍十分多变，而且英国人紧紧依赖于其设施

周围最直接的邻居。他们最希望推行平衡政策，使他们有可能同内地进行贸易而又不失去沿海居民。但是这种政策对于事态来讲需要回旋余地，而归根结底又不可能实行。英国人面对向南部的扩张主义不能永远不表示这样或那样的态度。因此，在布鲁一生中，芳蒂人与英国人之间已有的联系只会更加密切。

加深同芳蒂人的关系并不因此意味着英国人针对阿散蒂的野心决定了明确的立场和行动准则。相反，他们的政策在整个19世纪几经变化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在外交与战争、良好关系与不和之间动摇不定。例如1820年代中——当时布鲁只是一位少年并生活在海岸角——英国一小股军队去援助沿海国家反对阿散蒂人。1830和1840年代中，由于海岸角堡垒的麦克莱恩和库马西的克瓦库·杜阿（Kwaku Dua）一世的影响，英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协调的不同时期。阿散蒂人根据1831年麦克莱恩协定放弃了统治南部国家的要求。但是内地商人可以自由往来并可不受约束地一直去沿海，向他们开放他们能从内地去沿海的通路。自英国人废除奴隶制以来，经济前景似乎第一次明显地有利于加纳；和平繁荣的时代开始了。布鲁是该时代的受益人之一。不幸的是，19世纪前半叶过后，这种政治稳定的局面并未持续多长时间。阿散蒂人与沿海的人之间发生了新的冲突。而英国人再次采取了使任何有关一方都不满意的、变化不定的立场。1863年，阿散蒂人入侵南部国土。因此同内地中断了贸易，包括布鲁在内的众多的商人财政问题严重。虽然是非正式的保护国，但十分失望的芳蒂人只得到英国人不果断也无效的支援。英芳关系不好的后果严重。只是在1873年，当阿散蒂进行比先前更广泛的入侵时，伦敦政府才决定对阿散蒂人进行强有力的远征，以劝阻他们进行其他的征服。在其后的战争中，阿散蒂人在自己国土上被加尼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的远征军打败，几个月后，1874年7月，黄金海岸而并非内地王国被正式宣布为殖民地。英国人最终认为，他们应在政治上正式在南部存在，而且应

更加关心和平与贸易发展。

布鲁的童年时代正是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和阿散蒂入侵后的大动荡时期。他的出生地、设有英国人总部的城市海岸角首当其冲。它处于芳蒂人、英国殖民地与阿散蒂人之间进行贸易交往的关键地位。

可惜我们很少有关于布鲁童年和他受教育的详细情况。我们知道他上过海岸角的公立学校；因此他是19世纪初接受西方教育的少数沿海非洲人之一。从奴隶贸易时代起，欧洲商人就开始让他们黑白混血的子女接受教育，或是把他们送回本国，或是送进堡垒的学校或各国堡垒里时断时续的学校。1760年代中，由一位十分热心的加纳传教士得到英国当局的同意，在海岸角堡垒建立的就是这类学校，它后来被布鲁念书的公立学校取代。我们一点也不能证明布鲁上学期间去过国外（西非商人非常重视教育）；但需要指出，布鲁曾派他的一个儿子去英国学习。

布鲁对1823年去世的父亲萨姆·坎特了解甚少。其父的去世结束了活跃但又十分动荡的贸易生涯。布鲁的父亲死在他可能从海岸角被流放到塞拉利昂去的英国舰上（官方说法断定是自杀）。英国人与阿散蒂王国之间出现紧张状态并且他们的外交谈判失败后，海岸角与阿散蒂人之间出现对抗事件时他是因他所采取的态度而判刑的。殖民当局断定，当认为他可以支持英国人反对阿散蒂人时，他却欺骗了英国人。总督认为，这是“一个极端危险分子”。几年来，英国人同芳蒂商人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这种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布鲁的父亲不顾英国的禁止一直关心着奴隶贸易。

无论伦敦会做出什么决定，西非国家几个世纪来建立的贸易传统不会很快消失。奴隶贸易及其全部后果曾受到欧洲人需求的鼓励，而19世纪初它突然被禁止，非洲的贩奴商和中间商难以接受。另外，也并不是全面禁止：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西舰只总是停在沿海，以便得到奴隶并无视法律一如既往地他们将他们押运走。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布鲁的父亲在他去世前的年代中，因进行了大量非法交易而获得了一定声望。

据常驻的英国人说，尽管绝不是萨姆·坎特一个人在加纳沿岸进行这种贸易，但他还是成了最著名的“大贩奴商”。自1817年起，人们就想捕获他并结束他的奴隶贸易，但海岸角堡垒当局没有成功。布鲁的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最有权势的是阿散蒂王，其父任他的中间代理商，以和西班牙海员用武器、火药交换内地奴隶。在继征服芳蒂国家之后的谈判初期阶段，英、阿关系肯定受到这种非法贸易的损害，它是海岸角堡垒与库马西之间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也是英国人更积极地参加沿海贸易的原因之一。为了从前的贸易在整个西非消失，将需要几十年时间，而在1860年代中，合法贸易仍将同先前贸易竞争。

### 布鲁与合法贸易

布鲁度过绝大部分的成年人生活，并不是在其父成名的、他家居住的城市海岸角，而是在邻近的安诺马布城。就是在那里，他准备经商并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生涯；他很强的个性使他成为商业团体中最主要的成员之一；他后来有许多妻子、儿女及佣人。人们不知道他迁移的原因，也完全不知道他学习商业的原因。不管怎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成功了。安诺马布是因奴隶贸易而繁荣起来的芳蒂地区（建有英国堡垒）的相当长时间的重要贸易中心，19世纪初衰落了。这是1807年废除奴隶制和阿散蒂人进攻堡垒对该城市共同影响的结果。

1830年左右，安诺马布城恢复了一些繁荣。布鲁很可能在1830年代或许和其兄弟亨利一起定居在那里。大约1840年，他成为该城市的显要人物。

因此，布鲁是在麦克莱恩时期对发展合法贸易有利的时候创办了企业。阿散蒂人与芳蒂人之间的关系稳定了，阿散蒂王国商

人可以随便进入沿岸。先前的动荡时期之后，这种和平环境为禁止奴隶贸易后非洲的积极性开辟了道路。当时沿海地带的发展完全表明了西非人特有的适应能力，尽管他们需要面对整个19世纪不稳定的市场。从前的贸易，如黄金贸易，重新重要起来，而且还发现了其他资源。

后来显得重要的第一种资源是棕榈油。生产足够的向欧洲出口的棕榈油制品是当地人的唯一工作；它适应工业革命所必需的油脂和润滑剂的需求。1830和1840年代为加纳南部建立贸易的第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棕榈油的生产规模太小。这种贸易主要是和农民生产者进行。出口棕榈油制品对西非国家内地经济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比起过去需要有庞大组织和只有少数人分享收益的奴隶贸易时期利润分配得更加广泛。进口商品的市场反而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同外国进行的贸易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向合法贸易的过渡中，人们已能看到“西非现代经济的初期历史”。一些新的中间商出现了。在加纳南方，依靠欧洲的进出口商人增加了。在他们当中，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许多非洲商人；布鲁的一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布鲁在安诺马布的生意于1840至1860年代，即非正式成为保护国的年代最为兴盛。他全部的出口贸易依赖于阿散蒂的产品，因而也依赖于沿海与阿散蒂王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布鲁特别关心老产品黄金和象牙的贸易，黄金起的作用最大。在19世纪的加纳，象牙似乎成为次要贸易的产品。布鲁本人不出口棕榈油，因为其主要产区在远离沿海的东部。他认为，和阿散蒂的关系相当重要。如果关系不好，他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如同南部所有其他非洲和欧洲商人一样，当海岸角堡垒当局想保持同内地国家的良好关系时，他也感到满意。当平衡状态被打破和1863年阿散蒂人再次入侵沿海国家时，布鲁属于随之而来的贸易减少而生意受到损害的那些人。至于进口，他的生意有一些改革。销售棕榈油增加了内地对欧洲产品的需求。家庭经济中的一些变化和财富

的更广泛分配刺激了进口，这一活动在19世纪中加强了。从1850年起，不断扩大的商人团体仍得到1852年启用的定期来往于欧洲与西非间的轮船的帮助。这意味着和外国做生意的可能性增加了。布鲁代表了这类当时发展起来的非洲独立商人，他自己经营业务并直接和英国公司谈生意。

他和伦敦的“赫顿 (Hutton) 和索恩斯 (Sons)”与“福斯特 (Forster) 和史密斯 (Smith)”两家英国公司做生意，尤其是第二家。“福斯特和史密斯”是和加纳南方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布鲁大约从1853~1854年一条轮船航线启用后不久开始和它谈生意。按照沿岸根深蒂固的做法，该公司先以赊欠的方式向他运送商品。布鲁进口的产品中有织物、朗姆酒、香烟；棉织品在工业革命时代显然是最畅销的商品之一。布鲁把这些商品陈列在他的安诺马布商店里以及加纳沿海各地由他许多妻子掌管的商店里。

关于他经营的规模、组织和财政基础，我们没有任何准确资料。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任何家庭字条、帐簿似乎都没有保存下来。然而，布鲁在约20来年中，很显然是沿海成功的批发商。1844年，一位曾去西非并住在安诺马布他家中的英国游客就这样描写他的主人：“一位完全可敬的和非常敢闯的商人”；布鲁属于一座“有大量贸易”的城市中英非混合的团体。几年后的1848年，人们知道布鲁的经营规模扩大了，当时他订购了大量货物。人们根据他获得的财产还可想象他兴旺的情况：在安诺马布有一座大房子，在他出生的城市海岸角还有另一座以“布鲁宫”著称的房子。他的孙子、本世纪初加纳有名的民族主义者写道，布鲁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交易大王”。

但是，他并非永远兴旺。1860年代，布鲁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以致在1867年破了产。1863年阿散蒂入侵后，同阿散蒂人中断贸易是破产的直接原因；此外，英国人没有能力采取果断行动维持沿海岸的局势。英国的政策不明朗如关闭通往内地的道路



造成了经济危机。布鲁尤其受到影响。他支付进口商品所用的黄金和象牙都依赖于阿散蒂人，而且他的进口产品由于他在内地建立了商业网可在正常情况下销售。同阿散蒂的交易突然停止对布鲁意味着他不可能履行诺言。向他提供主要商品的“福斯特和史密斯”公司是他的主要贷方之一。1867年，布鲁欠公司8000至9000英镑。该公司对他施加压力，他必须卖掉包括安诺马布的房子在内的财产来偿还债务。

布鲁的破产引起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非洲人当时在该地区进行的贸易活动。诚然，从1863年起，阿散蒂和芳蒂人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严重地损害了许多商人，但是非洲人为什么也显得很脆弱呢？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没有欧洲人应付危机期的对策多。说到底，这是社会结构的差异问题：他们难以使欧洲型的更为个人主义的贸易方法和坚持非洲社会固有的集体性责任取得一致。这种问题在今天加纳某些方面依然存在。

象布鲁这样的商人不仅应被看成是个人，而且还应被看成是社会大集体、非洲大家庭的成员。这个大家庭内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对于那些因往往受到新形式教育而能够发家致富的人来说，义务应该很重。非洲人按照传统把财产看作集体财产，而尽管私有制观念在同欧洲的关系中渐逐被重视，但这种社会表现依然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对于那些成功的人，人们希望分享他们巨大财富的成果，尤其负担处境最不利的人。从那时起，家庭“伟人”周围就有许许多多依赖于他的人。这可以说明，19世纪的非洲商人都倾向于把利润投入财产中，因而履行对他们家庭的义务，使它们获得可靠而长久的财产。但是这类财产在不景气时很难变为现款。

非洲商人采用的另一种直接产生于传统社会的投资形式是奴隶佣人的形式。这种内部极其复杂的奴隶制应区别于过去供出口的奴隶贸易。关于它在19世纪中的作用目前正在进行研究。我们应该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它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可追溯

到很久以前，而且在1874年加纳南方建立真正的殖民权力以前，英国人没有插手废除这种根深蒂固的习俗。其实，“奴隶制”一词在这里是一种语言简化现象，因为它代表着非洲集体内部多种依赖或隶属的形式和程度。有各种各样获得奴隶的方式。他们可以被买来，但这种“市场”完全是内部的：奴隶佣人不会被运到海外。1840年曾在沿岸经过的一位英国游客确认，他们的条件“比我们英国农民的条件优越得多”。这是一种商业或工业劳动力：例如他们在芳蒂与阿散蒂国家间运输商品。在布鲁家如在其他非洲商人家里一样有许多奴隶佣人，其中一些人被用在他的贸易上。就算是一个商人拥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佣人，但也不意味着他有了直接可变卖的财产。卖掉奴隶佣人或当全部生意减少时利用他们作为借款担保是非常困难的。

至于布鲁没有支付能力，因没有准确资料而不能明确说明。但它至少表明了贷款问题。随着19世纪下半叶贸易扩大，因缺少银行而突出的这一问题越来越普遍了。欧洲供货人似乎让非洲买主出更高的价钱并向他们强加比同欧洲商人交易时更苛刻的条件。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冒着更大的风险向非洲人贷款，非洲人在收回获得的商品价值前往往投资建房或投资买奴隶佣人，而在没有支付能力时，讨还非洲的财产是极其困难的。当贸易竞争更为激烈时，当地新的商人阶级在财政上的破产与困难促使他们失去许多贸易机会，而最有利于从另一种文化情况产生管理经验的欧洲公司。

### 布鲁与国家事务

布鲁生活在商人在国家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代。英国的影响在加纳南方的扩大使得商人在沿海城市起到双重作用。布鲁属于显贵——商人阶级。他在20年中，被殖民政府授与官方职务。由于他在1867年破了产，他成了官员，可以猜想在他一生的最后

一段时间他主要关心的不再是贸易。

布鲁的职务在英国和芳蒂关系长期不稳定的情况下应当受到好评。他的职务主要是司法性的。英国法律和司法制度从1830~1840年代的麦克莱恩时期起就开始在沿岸实行了。受过教育的非洲商人和英国商人在沿海城市代理治安法官的职务。他们是没有报酬的法官。从1857年起，甚至还可能在此之前，布鲁就是安诺马布的皇家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司法档案清楚地表明，布鲁本人因债务或其他关于对待奴隶佣人的案件而作为原告或被告也被牵连进许多争端。

他在1868年被任命为安诺马布的法官，到殖民权力建立六年以后他一直担任此职。1874年后，法官们都被任命为县特派员。他们的管辖权很广泛。然而，他们的目的仍是保证贸易自由往来。管辖权不但由非洲人掌握，而且由欧洲人掌握。布鲁任特派员直到1879年退休，由另一个非洲人接替。以后殖民政府对人选要求更加严格，而且在20世纪初只有唯一的一名非洲县特派员。民族主义领导人只能怀念布鲁时代；他们将从中受到启发，作为一种时代的启发，在这种时代非洲化的前景并不是不兑现的诺言。

事实上，布鲁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担任公职是处于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非洲和欧洲商人的利益在一些问题上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又不一致。所以，非洲人和欧洲人在1850年成立的海岸角堡垒立法委员会中都有代表：布鲁从1864年至1866年是该委员会成员。两个集团都在为阿散蒂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英国与芳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海国家的安全。1863年英国人的失败和随后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一些非洲商人和芳蒂酋长结盟，以参加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没有迹象表明布鲁参加了这些政治活动。但政局很复杂。对“保护国制度”的日益不满并不排除芳蒂人方面希望看到英国人保护他们的利益。当1873年至1874年进行决定性战争时，包括布鲁在内的沿

海商人都站到了英国人一边。

### 19世纪的非洲商人

布鲁的职业表明了非洲商人在奴隶贸易向合法贸易过渡时期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沿海具有非欧关系特点的经济交往在废除奴隶贸易后继续进行了一个时期。交往的鼎盛时期是在1850年与1863年间。一位加纳史学家把这一时期描述为“非洲商人的时代”。这些作用分别反映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布鲁及其同事们是非洲社会中一类现代型的杰出人物，在传统的部族社会和英国殖民地两个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应该强调指出，一些最初的民族主义者都出身于这些商人家庭。虽然在1863年后的年代中当地商人不得不正视贷款压缩，但也不应该从中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时代结束了。他们的适应能力使他们可以找到新的经济出路，例如租借业务，这是1874年后在内地发展采伐建筑用木材和开发黄金的结果。布鲁的儿子詹姆斯·赫顿·布鲁(James Hutton Brew)参加了这种业务。其他出路还有：从1880年代起当代商人开始出口橡胶（加纳橡胶曾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的抢手货）。然而不得不得出结论，19世纪末非洲商人的重要性下降了。他们的地位很不利；他们在同欧洲的关系中独立性更小了（以粗制品交换制成品）。这一变化有多种因素。不过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当欧洲各大公司在合法贸易中不占绝对优势时，非洲商人发了财，只是从1880年起偶然发生了贸易事件才开始对欧洲各大公司有利”。殖民权力加剧了这种变化。它协助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条件。在19世纪最后年代中欧洲人进入了国家内地，而且英国统治扩展到了整个加纳：它最终囊括了阿散蒂国家和北方领土。西非市场不断增加资本需求，不利于小规模商业，只有很少可能积累资本的非洲商人因而为最终控制绝大部分进出口贸易的欧洲大公司开辟了道路。

（吴增田 摘译）

## 克瓦库·克索努：阿布隆 王国的末日

1898年8月21日，在象牙海岸东北部邦杜库（Bondoukou）法国哨所的院子里，邦盖（Benguey）中尉让士兵处决了阿布隆王国的三名主要酋长：吉多姆（Kyidom）酋长克瓦库·克索努（Kuaku Kosonu），号帕普（Pape）；富马萨（fumasa）酋长克瓦西·阿南·阿吉埃（Kwasi Anin Agyei），号巴萨科（Basako）；苏马（Suma）酋长克瓦姆·法拉姆（Kwamu Fram）。随着他们的消失，阿布隆历史的一页过去了；一个国家的独立结束了，然而这个国家在生存的两个世纪中却幸免于最恶劣的风暴。对阿布隆人来说，殖民时代开始了。

三个被处决的人中最年长和最有威望的是帕普。近30年来，他果断地领导了王国事务。在国外，他参加了所有战争和全部谈判。他反抗任何外国统治，相继反对了在非洲这个地区进行干涉的所有强国：他首先反对了阿散蒂人（Asante），接着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最后是萨摩里（Samori）的索发人（sofa）。在国内，他参加了所有争端；坚决支持酋长的权力，全力反对了国王克瓦库·阿吉马恩（Kwaku Agyeman）独揽大权的努力。他的一生和悲惨结局是一种榜样，说明了至少一部分非洲传统贵族在欧洲征服面前的态度。这种态度分不清是拒绝还是带有盲目性；帕普如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非洲领导人一样，拒绝白人的干涉和他们控制国家的企图，但是他搞错了他们计划的真实性，而没有估计到他们为了达到其目的所拥有的各种手段。在他临死前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已意识到实际的严重危险，但为时太晚了，

帕普对其错误判断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天来责备他的错误是容易的，但无论如何，他依然保持了决不投降的荣誉。

## 拼凑的王国

吉亚马恩 (Gyaman) 的阿布隆王国领土位于现在象牙海岸的东北部和现在加纳的西北部，在科莫埃河 (Komoé) 与黑沃尔特河之间，周围是大草原和茂密森林。这个地区从 19 世纪初开始就以金矿财富而出名；另外，这里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商路，从尼日尔河经博博-迪乌拉索 (Bobo-Dioulasso)、贡戈 (Kong) 和库马西 (Koumasi) 通往几内亚湾。整个沿途从南到北运送可乐果、黄金、欧洲人贩运的产品、海盐，而从北到南运送奴隶、撒哈拉盐、牲畜、象牙。这种贸易促使在王国中心出现并发展起了一个大商业城市邦杜库。

从部族观点看，这个国家的人口由许多成分组成：吉亚马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方面的团体，聚集的成员在出身、语言、组织和文化上都迥然不同。除许多小部族外，主要部族有四个：库朗戈族 (Kulango)，分布在全国各地；阿戈尼族 (Agni)，集中在博纳 (Bona)、比尼 (Bini) 和阿西卡索 (Asikaso) 卫星王国内；迪尤拉族 (Dyula)，居住在邦杜库和巴拉博 (Barabo) 西部边境地区；最后是阿布隆族 (Abron)。阿布隆人是王国的缔造者和主宰，但只占全部居民的 20% 左右。在 19 世纪末叶全部居民达到大约 8 万人。

从社会观点看，王国居民主要分成四级：阿布隆尚武贵族，垄断着政权；迪尤拉商人和伊斯兰教隐士，享有王国内特权宾客地位；农民，大部分是库朗戈人，只给阿布隆首领象征性纳贡，但属于其司法权范围，并因此有可能受到沉重处罚；最后是奴隶，原是塞努弗人 (senufo) 或古隆西人 (gurunsi)，是被买来的或被抓来的，其大多数是阿布隆人和迪尤拉人的财产，为白人种

地、采金和运输。

· 阿布隆王国由吉亚马恩 (gyaman) 酋长塔恩·达特 (Tan Date) 在大约1690年建立。王国组织是在18世纪上半叶随着王国扩展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吉亚马恩本土分成五个省。最大的省是国王自己的领地，由他直接管理。君主是在王室母系家族内部按照家族中分别叫作亚卡赛 (yakase) 和赞赞 (zanzan) 的两部分人轮换的规定进行选择。其他各省委托给不同血统的酋长：西昂吉 (Siengi) 或昂科比亚 (Ankobia) 省由亚卡赛支系的各国王父系血统后代领导，阿吉多姆 (Akyidom) 省则由赞赞支系的科非·索诺 (Kofi Sono) 国王及其兄弟比尼·亚奥 (Bini yao) 的父系血统后代领导。昂科比亚酋长和吉多姆酋长分别被看作是国王的“儿子”。富马萨 (Fumasa) 省由在移居中归顺了阿布隆人的阿散蒂酋长的父系血统后代领导，佩南戈 (Penango) 省则由索诺国王的萨弗酋长 (Safo) (战争首领) 的父系血统后代领导。富马萨酋长和佩南戈 (Penango) 酋长分别被看作的是国王的萨弗酋长。因此，亚卡赛人和赞赞人之间的二元性在一些省里同时存在；每一个支系关系到两个省，一个省由一个“儿子”统治，另一个省则由一位国王的萨弗酋长统治。

在日常行政管理方面，各省有很广泛的自治。酋长们在其权限内拥有同国王在其领地内一样的宗教、司法和经济特权。当然，对于他们法庭的判决可以上诉国王，但是，国王几乎总是批准这种判决。关于对外政策，由国王和酋长们组成委员会，制定重大决策：发动战争，缔结盟约。在一般情况下，按道理至少官方应该意见一致。关于军事组织，人们知道在阿康 (akan) 国家里，通常把全国居民分成前卫、右翼、左翼和后卫，由国家的主要酋长担任指挥。在阿布隆王国，这种结构只明确了前卫和后卫，前卫由属于国王省的松戈雷 (songore) 酋长、吉昂代 (gyende) 酋长和德罗博 (drobo) 酋长指挥，后卫委托给吉多姆酋长指挥。最后，吉亚马恩在存在的头几十年里，对邻近的许多地区建

立了霸权，当时的各个国王把监督这些地区的任务授予各省酋长。

### 1818年阿散蒂人的胜利

帕普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制度范围内度过的。关于政治背景，需要追述几句王国的历史。这是一部以阿布隆人被迫进行连续的、而往往是不幸的反对阿散蒂帝国主义的战斗为主的历史。大约在1600年，王国的祖辈因为继位发生争吵，从阿克瓦姆 (Ak-wamu) 出发，首先在库马西地区定居，但17世纪末，他们被阿散蒂酋长奥赛·图图 (Osei Tutu) 和形成中的阿散蒂国家的战士赶走。于是他们在现在领土的东部定居，并逐渐征服了当地居民和与他们同时来的移民，例如博纳的阿戈尼人。然而，奥波库·瓦雷 (Opoku Ware) 的阿散蒂人被吉亚马恩的金矿财富所吸引，希望控制通往贡戈和杰内 (Djenné) 的商路，于1740年入侵了这个国家。国王阿博·米里 (Abo Miri) 被杀，王族幸存的人逃到贡戈。过了几年，他们同意向阿散蒂酋长纳贡后又从贡戈返回。国王科菲·索诺及其继承者科菲·阿吉马恩 (Kofi Agye-man) 建成了王国组织；另外，他们把王国边界推向西部和北部。沃洛比迪 (Wolobidi)、坦达 (Tanda)、萨皮亚 (Sapia) 的库朗戈管辖区，索洛博 (Sorobo) 的维拉 (Hwela) 管辖区被征服，阿布隆酋长们瓜分了他们的村庄；比尼的阿戈尼人和纳西昂的库朗戈人被沦为附庸。最后，根据国王科菲·索诺的提议，迪尤拉人定居巴拉博，并同贡戈的瓦塔拉人 (Watara) 建立了密切关系。阿布隆人希望在同阿散蒂可能再次对抗中得到瓦塔拉人的支持。19世纪初，吉亚马恩重整旗鼓，并试图摆脱库马西人的束缚；1818年的暴动以泰恩河 (Tain) 的灾害而告结束。国王克瓦德沃·阿丹戈拉 (Kwadwo Adingra) 自杀，而成千上万的阿布隆人被杀或被俘。



当时吉亚马恩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为了向阿散蒂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阿丹戈拉的继承者科菲·弗菲（Kofi Fofie）向邻居马恩戈（Mango）国王迪昂·瓦塔拉（Dian Watara）借了所需款项；然后，为避免偿还债务，他向债主发动了进攻。但阿布隆军队被迪昂·瓦塔拉打得惨败，而弗菲经过两年统治后在战斗中丧生。阿布隆人当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恢复独立的愿望，而且报复思想非常强烈，尤其是泰恩河战败者的异母兄弟达特。1850年，耶博阿（Yeboa）死后，达特的亲儿子克瓦库·阿吉马恩成为吉亚马恩首领：其父通过武力强迫他担任酋长，而且两人都明确表示，一有机会就希望继续斗争。然而局势并未成熟，其他酋长都主张谨慎行事。首领们的观点占了上风，不久达特去世。当帕普在大约1870年成为吉多姆酋长时，形势就是如此。

### 帕普与报复

克瓦库·克索努·帕普大约出生在1806年；他是第四个吉多姆酋长阿杜·亚奥·库马（Adu Yao Kuma）的儿子和国王科菲·索诺的孙子；因此他是阿吉多姆（Akyidom）亲王家族的成员。该家族包括四部分人，分别定居在潘达（Pinda）、西罗德（Siraude）、科科西亚（Kokosia）和古梅雷（Gumere），轮流担任省首领。帕普属于第四部分人。1818年阿散蒂人入侵时，他还是个孩子，不得不逃离着了火的邦杜库。六年后，他大约18岁时参加了阿萨曼科（Asamankow）战役。1824年1月21日，阿散蒂人在战役中打败了英国人及其盟友，杀死了英国黄金海岸的总督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ac Carthy）。毫无疑问，这两件事给他留下很深刻印象。在他看来，阿散蒂人依然是长期的特殊敌人，同时也是最可怕和最憎恨的敌人。

帕普加入吉多姆酋长的行列和定居阿吉多姆省首府克瓦辛达瓦（Kwasindawa）的准确日期不清楚，可能是1870年左右。然而，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完全改变了这个地区各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1873年初，阿散蒂人与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局是：1874年2月4日，英军进入库马西，烧毁城市，然后撤回海边。阿散蒂人的失败产生了巨大影响：德瓦本（Dwaben）盟国闹分裂，同时招致东部的布隆戈人（Brong）也步其后尘，贡贾（Gonja）和达贡巴（Dagomba）恢复独立；西南部的赛富维（Sefwi）脱离了阿散蒂帝国；总之，整个阿散蒂帝国瓦解了。

阿布隆人并未指望同阿散蒂结束对抗而从中得到好处。从1872年起，在阿散蒂酋长疯狂时他们就向海岸派了密使同英国人及其盟友取得联系。1873年末，当英国纵队开始进军首都时，阿散蒂酋长科菲·卡卡里（Kofi Kakari）请求吉亚马恩酋长提供军队，帮助他打退白人，但是他遭到拒绝，被拒绝的消息传遍了库马西和海岸。不过阿散蒂人在一年多中成功地向阿布隆人掩盖了其失败的程度，只是到了1875年春天阿布隆人才知道了实际情况。吉亚马恩酋长克瓦库·阿吉马恩很快就宣布拒绝长久地承认阿散蒂的君主地位；同阿萨弗·阿吉埃（Asafo Agyei）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整个吉亚马恩，过路的阿散蒂商人被粗暴对待，商品被掠夺。

于是动荡时期开始了。阿散蒂方面，新君主蒙萨·邦苏（Mensa Bonsu）努力巧妙地对付其王国头上的危险。从1875年11月起，他命令军队去夺回德瓦本。阿萨弗·阿吉埃战败，被迫逃到英国领地。然后，他利用外交手段和施展武力，努力使反抗的附庸归顺，为达此目的他还依靠了仍然忠实的盟友。这样他于1876年初向多尔马阿（Dormaa）国王科菲·昂苏（Kofi Ansu）发出最后通牒。多尔马阿位于吉亚马恩与阿散蒂之间，由同阿布隆王国结亲的王族统治；这就足以使多尔马阿酋长（Dormaaahene）受到蒙萨·邦苏的怀疑。为了强迫他屈服，邻国贝雷库姆（Berekum）的军队入侵了他的国家；科菲·昂苏被惊慌失措的酋长们所抛弃自杀身亡，而他的继承者蓬戈·亚奥（Pong Yao）逃到吉

亚马恩，要求报仇。同时，蒙萨·邦苏还对塔吉马恩 (Takyima<sup>n</sup>) 国王克瓦贝纳·弗菲 (Kwabena Fofie) 进行指责。克瓦贝纳·弗菲宣布了独立并要求收复阿散蒂人从前夺走的土地。阿散蒂酋长让恩科朗扎 (Nkoranza) 和旺希 (Wenchi) 的君主进行干预；克瓦贝纳·弗菲战败，也逃到吉亚马恩，并很快请求主人援助。

阿布隆人认为，这是期待已久的进行报复的良机。1877年初，蒙萨·邦苏向邦杜库派遣使团，对阿散蒂商人遭到的敲诈勒索提出抗议。使团团团长克瓦库·波库 (Kwaku Poku) 被逮捕，成员被痛打，财物被剥夺。在随后的数周内，一支阿布隆纵队和蓬戈·亚奥的多尔马阿人联合，严厉惩罚了贝雷库姆。1878年，恩科朗扎和旺希也遭到阿布隆人和克瓦贝纳·弗菲的人的联合攻击。阿散蒂人再次派出由丹麦人尼尔森 (Nielsen) 和混血人于伊德科佩 (Huydecoper) 率领的使团。该使团和上次一样也未成功，甚至未被接待。同时，吉亚马恩酋长根据其盟友阿萨弗·阿吉埃的建议，竭力保证得到英国的支持。1877年和1879年，他曾两次向海岸角 (Cape Coast) 急遣使者要求英政府让吉亚马恩得到女王保护。但英国人犹豫不决。由于他们正希望巩固同阿散蒂对手的战线，拒绝扩大其责任的范围；1877年，这一考虑占了上风，阿布隆的使团被回绝了。但1879年，里斯 (Lees) 总督却决定向吉亚马恩派去了一支由县代理人史密斯 (Smith) 率领的远征军。不过，史密斯在到达邦杜库后发现阿布隆领导人四分五裂，吉亚马恩首领克瓦库·阿吉马恩至少与三名省首领尖锐对立。在这些酋长中第一个就是帕普。

据英国史学家认为，斗争是针对阿布隆对阿散蒂政策的总方针。这种斗争使得支持同前宗主国融洽相处的大多数酋长反对吉亚马恩首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首先，在当时的吉亚马恩敌视阿散蒂人是一种虽不一致但至少十分普遍的意见。当同阿散蒂关系破裂时，主张谨慎小心的人表示克制，并强调指出所招致的风

险，但吉亚马恩酋长走得更远，而且不顾传统，帕普处在他们之中是不可能的。其他说法认为，他实际上是反对阿散蒂最激烈的人之一。根据其中一种说法，帕普逮捕了7名阿散蒂人，他们是其君主派来向阿布隆人征集贡品的；他杀死了4个阿散蒂人之后，让人挖去了第五个人的眼睛，对他说：“告诉你主子说你什么也看不见了”；让人割去了第六个人的耳朵，对他说：“告诉你主子说你什么也听不见了”；至于第七个人，则让人砍去了他的胳膊，最后说：“告诉你主子说，你什么东西也不能拿了。”不管怎样，当恩科朗扎入侵时，率领阿布隆军队的依然是帕普。几年后，英国中尉伦斯达勒（Lonsdale）描述他是“推动反对阿散蒂的主谋”。

事实上，包括帕普在内的酋长们指责吉亚马恩酋长的不是他政策的方针，而是他实施政策的方式。当史密斯1879年访问时，酋长们向其诉苦：克瓦库·阿吉马恩单独做决定；当他支持蓬戈·亚奥和克瓦贝纳·弗菲时，并没有同酋长们商量，而且也没有同他们分享他从两名逃跑君主那里以“联盟代价”得来的黄金。同样，向海岸角派使者也是他自己提出的。总之，克瓦库·阿吉马恩所被指责的是他违背王国传统，个人独揽大权。

1879年7月24日至8月24日，史密斯在邦杜库时，没有能使吉亚马恩酋长和三名持不同意见的酋长重新和好。他离开时确信，由于他们闹分裂，阿布隆人对阿散蒂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然而分裂双方终于和解，因为1880年10月，阿布隆使者告诉阿萨弗·阿吉埃，吉亚马恩正准备一接到他的信号就对阿散蒂开战。英国人逮捕了阿萨弗·阿吉埃，并把他押送到拉各斯，于是阻止了冲突爆发。但15个月后，1882年春天，阿布隆人同相邻的班达王国又爆发新的冲突。他们侵入班达王国，其对手遭到惨败。班达首都被攻占和烧毁，居民四处逃散。

1882年6月，阿布隆人取得全面胜利，帕普对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根据传说，他对班达人怀有旧恨，这仇恨同他年轻时

发生的一件事有关。当他住在班达时，其妻惨遭当地青年人的侮辱。不管怎样，作战中他在佩南戈酋长克索努的协助下指挥了阿布隆军队。但是吉亚马恩酋长的儿子阿皮亚·萨恩（Apia San）站在他们一边清楚地表明，阿布隆领导人之间至少同意暂时融洽相处。

当库马西得知阿布隆进攻班达的消息后，立即在那里激起强烈不安，许多酋长敦促阿散蒂酋长去援助他的盟友。但是蒙萨·邦苏在前年受到英国人侮辱后仍一蹶不振：由于发生了一件小事，英国人错误地指责他准备再次入侵英殖民地，强迫他赔礼道歉并支付巨额赔款。所以，蒙萨·邦苏担心动员阿散蒂军队会激怒英国人，并宁愿要求英国人裁决。洛维（Rowe）总督由于希望在该地区恢复贸易所必需的平静，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令伦斯达勒承担这一任务。伦斯达勒首先去库马西，然后去邦杜库。12天后，国王和酋长们隆重接见了他们；他要求他们停止战斗，在一个月內解散部队，向他们交出已被监禁五年的阿散蒂大使克瓦库·波库。尽管帕普强烈抗议，吉亚马恩酋长依然表示同意。伦斯达勒总结这次斗争时说“国王阿吉马恩认为班达人只是一帮捣乱分子，不值得注意，对他来说，他们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帕普酋长强烈反对这种意见，认为班达人造成了那么多困难并制造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必须首先严厉惩罚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出国家去。国王反对这种观点，坚持己见”。

帕普与克瓦库·阿吉马恩之间再次出现分歧，在以后几年中分歧越来越严重。自1875年克瓦库·阿吉马恩同阿散蒂关系破裂以来，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人。实际上可以说他非常向往白人的军事威力。1874年，白人能够征服强大的阿散蒂和攻占库马西，他似乎认为，只要得到白人支持，就可以使吉亚马恩对付世敌可能的卷土重来。因此他准备满足白人的一切要求。帕普则不一样，他相信阿布隆人足够强大，可以自己保证自身的防卫。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象克瓦库·阿吉马恩那样重视同海岸的欧洲人建立良好

关系。

尽管是表面现象，可帕普对自己的胜利并不失望。首先，阿布隆人仍保持着1882年征服的地盘；其次，阿散蒂的危险消失了。在这次事件中，君主们实际上都表示要和解，但阿散蒂酋长们比阿布隆酋长们更不同意这种态度。被指责软弱无能的阿散蒂酋长蒙萨·邦苏——再说其专制政府也越来越引起争议——1883年3月8日被废黜，于是阿散蒂进入了动荡时期，不久又演变成真正的内战。趁此机会，吉亚马恩巩固了成果：大约1883年，于1877年失败后逃到恩格旺塔（Nkwanta）的君主贝雷库姆向克瓦库·阿吉马恩派了一名使者讲和，他同多尔马阿言归于好，至少在实际上承认了吉亚马恩酋长的君主地位。同样，塔吉马恩酋长克瓦贝纳·弗菲在1883年死后不久，其继承者克瓦库·格亚科（Kwaku Gyako）也同老对手旺希国王阿布雷法·克瓦德沃（Abrefa Kwadwo）达成谅解，并在帕普主持下举行了谈判。从此以后，吉亚马恩成为该地区主要政治强国。

### 继位与政体危机

但是，随着阿散蒂威胁的消失，吉亚马恩内部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使王国在1875~1880年间四分五裂。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是昂科比亚的继位问题。这一问题曾是阿帕奥·西亚科万（Apao Siakwan）与吉亚马恩酋长的异母兄弟科菲·科科布之间第一次对抗的赌注。前者占优势，但一、二年后死了。科科布于是重提参加竞选，但克瓦库·阿吉马恩再次排斥了他，而支持他亲生儿子克瓦库·迪亚乌希（Diawusi）。然而这种指定在阿布隆政治制度内造成一种“政体”危机，导致王国濒于动荡的边缘。

迪亚乌希是吉亚马恩酋长的儿子，昂科比亚首领克瓦西·达特的亲孙子，完全有权利要求昂科比亚的位子。但他是哪个母系直系亲属呢？他母亲是阿马·卡莉亚（Ama kalia）公主，她是

1818年战败者吉亚马恩酋长克瓦德沃·阿丹戈拉的母系孙女。克瓦库·阿吉马恩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娶她为妻，而根据阿布隆人婚姻标准，这一结合无懈可击，因为夫妇既不属于同一个母系家族，也不属于同一个父系家族。可是，经过1818年的失败后，为了掩饰王室母系家族成员由于战死或被俘到库马西而几乎全部消失，阿布隆人决定，从此以后国王女儿的儿子可以合法即位。克瓦库·阿吉马恩本人是国王科菲·阿吉马恩的女儿所生。因此1880年，几个前任都一直是这样确定的，同时迪亚乌希也可以用他的母子关系为自己要求有朝一日登上王位进行辩护。根据他的出身，他有晋升的双重可能性：既可以成为昂科比亚酋长，也可以成为吉亚马恩酋长。但在阿布隆人看来，这种情况不能接受，也可以说是丑事；整个制度的平衡事实上基于双重排斥：昂科比亚和阿吉多姆的位子保留给国王或亲王的儿子，但不准他们占据王位；相反，同母异父的外甥，即王室母系家族成员，可以得到王位，但同时这些成员不能占据省级位子。然而，根据1818年后实际扩大的王室母系家族，迪亚乌希可以说既是儿子又是外甥。他一个人兼有这两种被看作不相容的资格，根据阿布隆人习俗，这使他成为一种“家谱中的怪物”。

当然，迪亚乌希家谱状况的反常特征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甚至也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选定迪亚乌希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政治方面的。克瓦库·阿吉马恩安排他20岁的亲儿子领导昂科比亚，是在权力集中的道路上跨越了一个新阶段。这种特殊家世的存在与阿布隆政治制度的思想背道而驰，该政治制度的基础是遵守轮换，所有轮到的国王或亲王家族的成员在理论上都有参加挑选的平等权利。阿布隆人对迪亚乌希登基提出争议，是想制止这样一个过程，即实际上最终剥夺大多数求职者任何取得政权的重要机会，而倾向于将所有关键职位只留给极少数人。另一方面，假如同一个人可以先后是昂科比亚首领和君主，在阿布隆人看来，这是把应该分开的使政治制度保持平衡的职位混同起来。权

利的集中或分散，这仍然是抉择的关系。阿布隆人在抉择问题上会互相分裂。

为什么首领不立即起来反对选定迪亚乌希呢？英国文献表明，选定迪亚乌希是在1879年4月与1881年10月之间。而当时同阿散蒂的对抗正接近白热化程度，首领们确实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冒险使已紧张的内部局势更加恶化。从1883年起，阿散蒂危险的结束改变了形势，使首领们恢复行动自由。另一方面，迪亚乌希不久也暴露出狂妄和粗暴的真正个性。他不仅屡次对居民们行为不端，进行侮辱和敲诈勒索，而且对“同事们”蛮横无礼，令人难以容忍。有一天，吉亚马恩酋长在他的阿芒维（Amanwi）住宅召开首领会议时，迪亚乌希纯属虚张声势，向华丽的大阳伞开枪，伞下坐着富马萨酋长克瓦德沃·布阿蒂尼（Kwadwo Buatini），国王对此只是竭力抑制发火。还有一次，他企图罢免国王的一位主要萨弗酋长，即阿克瓦穆（akwamu）酋长克瓦西·克拉（Kwasi Kra）；后者跑到阿芒维向克瓦库·阿吉马恩告状，但迪亚乌希带着一帮武装人员一直跟随他到国王的村庄。最后，他决不会让人忘记其地位的特殊性，夸耀他的出身和他的出身给他带来的希望。1888年，他对特雷克-拉普莱纳（Treich-Laplène）说：“我父亲是国王，母亲是国王的女儿。”

从那时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强大阴谋集团，集中了王国的大多数要人，以科科布和帕普为核心人物，周围有佩南戈酋长亚奥·克索努，克瓦库·阿吉马恩的推定继承人阿杜·克瓦德沃，还有富马萨酋长克瓦德沃·布阿蒂尼。唯独迪亚乌希的母亲阿马·卡莉亚王后始终不移地支持他。至于克瓦库·阿吉马恩，不可能让他儿子就范，他眼看着在迪亚乌希再犯“重罪”时于1887年爆发的混乱升级而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当迪亚乌希住在阿芒维时，同其兄弟克瓦库·尼亚卡（Niaka）发生争吵，两个人最终动起手来；他们的国王父亲试图把他们拉开，但迪亚乌希意外地将国王打伤。伤害国王，哪怕是无意的，不仅罪恶滔



天，而且是褻渎行为，而当这种罪行是国王亲儿子犯下的，这一举动就更加罪大恶极。当场见证人科科布立即告之帕普、布阿蒂尼和亚奥·克索努。这几个人集合了他们的兵士，向昂科比亚首府蒂埃迪奥(Tiedio)进发；而迪亚乌希则逃到帕姆巴索(Pambaso)，投向阿穆鲁菲(Amurufi)国王的红人。阿穆鲁菲力图为他说情，但枉费心机，他们占领了昂科比亚所在地，将其交给了科科布。对于国王的胆怯反对，他们予以鄙视，甚至不同意和他讨论。

这一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首先照传统看，一位省酋长被废黜在吉亚马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做法在阿散蒂人中司空见惯，但在阿布隆国家中直到当时从未有过。而尤其从未有过首领们在同国王较量中获胜；不过帕普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他战胜了班达，并领导了反对迪亚乌希的斗争。此后，他成为吉亚马恩的强有力人物。至于克瓦库·阿吉马恩，他在战斗中丧失了大部分威信，次年，第一批征服殖民地的侦察兵看到的是一位精疲力尽的人。

### 法国的保护国

当吉亚马恩被搞得四分五裂时，海岸局势事实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黄金海岸，英国政府对于阿散蒂王国在蒙萨·邦苏被废黜后出现的混乱长期无动于衷。1887年2月8日，曼彻斯特商会对政府的死气沉沉提出抗议。布兰德福特-格里菲思(Brandford-Griffith)总督为了防止这种控告，提前几周就派了伦斯达勒上尉去瓦萨乌(Wassaw)、当吉拉(Denkyira)和赛富维(Sefwi)，甚至在2月8日就同赛富维签署了保护条约。

这项条约的作用之一是切断库马西和克兰雅博(Krinjabo)之间的商路，而恢复吉亚马恩和海岸角之间的交通。这样对于法国批发商维迪尔(Verdier)的代理人绝对不合适。20年来，维

迪尔一直在阿西尼 (Assinie) 开设一家商栈。当时在埃利马 (Elima) 管理维迪尔种植园的特雷克-拉普莱纳曾提醒过长官布雷蒂涅尔 (Bretignère), 并通过他提醒塞内加尔中尉总督贝约尔 (Bayol)。1887年4月5日他写道: “一个时期以来, 大家都在谈论英国人的入侵, 他们收紧并推进内部的海岸线以便切断通向阿西尼地区的道路……再不能犹豫不决了: 或放弃殖民地, 或组织远征以便通过同盟条约争取阿布隆人和邦杜库人。”从4月16日起, 贝约尔路过阿西尼时同意了申请。因此, 特雷克5月2日离开克兰雅博; 12日到达贝蒂埃 (Bettié), 17日到达扎拉努 (Zaranu)。经过五天没结果的讨论后, 他到了阿本古鲁 (Abenguru), 在那里生病发烧, 一直住到6月2日。因担心他自己不能回吉亚马恩, 他派回了翻译卡蒂埃 (Quatié); 卡蒂埃在阿芒维会见了克瓦库·阿吉马恩, 至少在特雷克看来, 国王很快就对法国人表现出好感, 但特雷克继续前进; 6月13日到达阿莫阿克科鲁 (Amoakokru), 同恩德尼 (Ndenye) 的国王及酋长们签署条约, 让他们的国家接受法国保护。他已精疲力尽, 于是上路返回。

但是他的旅行并不是不被人注意; 当时在当吉拉的伦斯达勒得知他住在阿本古鲁立即做出反应: 6月19日, 他命令非洲下士范·迪凯 (Van Dyke) 去阿芒维将一面英国旗交给吉亚马恩首领。大约7月中, 范·迪凯到达阿芒维, 但只是在30日才能完成任务。大多数酋长们持保留意见, 他必须先说服他们。然后范·迪凯途经邦杜库去见他们的长官。

英国人认为, 范·迪凯的成功保证了他们对吉亚马恩的一种选择。但是法国采取的主动行动很快就证明这一选择是脆弱的。事实上, 特雷克-拉普莱纳及其主子维迪尔并不想停留在1887年的半失败状态, 希望通过和吉亚马恩签署保护条约来补全在贝蒂埃和恩德尼获得的胜利。但为了再次组织远征, 他们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的担保和财政支持。班热 (Binger) 的任务是向他们提供决定

性论据。1882年2月，说班热死了的假消息使这项计划暂停执行，但6月底得知班热还活着，并能到达贡戈。维迪尔立即告诉殖民地副国务秘书，并建议派特雷克去迎接班热。特雷克去贡戈的路上将经过吉亚马恩，因此可以和这个国家商谈。法国政府在8月2日表示同意。特雷克立刻启程去巴萨姆（Bassam），9月10日离开克兰雅博，10月16日到达阿芒维。从10月25日至11月7日，他住在邦杜库，酋长们都在那里为佩南戈酋长亚奥·克索努举行葬礼。然后他又回到阿芒维，11月13日签署了法国保护吉亚马恩的条约；在条约下面画十字花押的有吉亚马恩酋长，省酋长帕普、科科布和克瓦德沃·布阿蒂尼等。

三周后，一支强大的英国远征队到达吉亚马恩，在当时的阿布隆人看来，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事件。这支远征队的起因如何呢？当特雷克9月离开克兰雅博时，其出发的消息很快传遍黄金海岸，从10月13日起，《黄金海岸回声报》就宣布一个英国代表团将去吉亚马恩，以最终确定英国在这个国家的权利。但是这个由监察员莱恩布里奇（Lethbridge）、少校尤尔特（Ewart）和医生弗里曼（Freeman）率领的代表团12月8日才启程。代表团由一名叫科菲·达比（Kofi Dabi）的阿布隆青年人陪同，他是作为向总督派去的一名国王使者，负责再次请求向吉亚马恩派遣英国军官；后来证实，急遣科菲·达比的不是吉亚马恩酋长，而是迪亚乌希。迪亚乌希力图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以恢复他的地位。莱恩布里奇及其助手于1889年1月22日进入邦杜库。

来访者首先受到十分谨慎的欢迎。第一，他们由100名豪萨族士兵陪同，这种武力炫耀使阿布隆人感到不安；第二，科菲·达比的出现使酋长们认为莱恩布里奇是来恢复迪亚乌希的权力的，他们决定要用武力来反对这种可能性。然而莱恩布里奇最终消除了主人的猜疑。1月24日，克瓦库·阿吉马恩率领克瓦德沃·布阿蒂尼、科菲·科科布、帕普和新的佩南戈酋长克瓦德沃·克索努隆重地接见了他们。

· 接见中，莱思布里奇使他的对话者收回同特雷克签订的条约，而同他签署新的条约。可是他对自己活动的依据没有把握，1月30日又回到海岸以得到新的指示，尤尔特和弗里曼呆在原地，并开始带头勘察这个地区，于是发生了一件事端，表明了阿布隆人对欧洲人入侵的真实情感。两个英国人首先请求允许他们去贡戈，但白费劲；在受阻的情况下，他们打算不向任何人提出什么要求就去访问班达。就在他们刚上路时，国王和酋长们来访，禁止他们离开邦杜库。他们正准备服从，突然帕普介入。弗里曼叙述说：“他让我们明白，无论班达或是别的地方都不希望我们去，我们最好安静地呆在邦杜库，一直到我们回海岸的时候。”

尤尔特于是想抓住这次机会来显示威望，对帕普的蛮横无礼处以50英镑罚款。这一要求使阿布隆人群情激奋，对抗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国王召开会议商谈这一情况。弗里曼说：“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帕普、布瓦丹（Boitin）和科科布表示拒绝交罚款，并说如有可能，应该由我们强行收罚款。”但是国王得到其继承人阿杜·克瓦德沃的支持，决定罚款由他负担。尤尔特同意这样解决，事情就了结了。

我们认为这一插曲说明了三。第一，国王和酋长们刚刚签订了使吉亚马恩受英国女王保护的协议，但仍然禁止女王代表在这个地区进行任何旅行。很显然，他们认为他们所签署的条约并未导致丧失任何主权，条约主要涉及贸易方面。但第二，阿布隆领导人之间对于尤尔特吹牛的争论表明存在着分歧，伦斯达勒代表团来时分歧已有初步表现，后来逐渐加深。很明显，克瓦库·阿吉马恩准备做出重大让步以维护吉亚马恩和英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1889年，表明其态度的不再是阿散蒂的危险，而是想维护和发展同海岸的贸易。帕普对这种考虑并不敏感；事实上他省里的大部分村庄处在草原区，它们为进行贸易，去内地的迪尤拉地区，尤其是贡戈和博雷（Bole），而不去南方。总之，当克

瓦库·阿吉马恩认为吉亚马恩的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同白人的关系时，帕普依然忠实王国的传统方针，寻求同迪尤拉族融洽相处和合作。最后，再看看在争论中对抗的两个集团的构成。一方面，同赞赞支系有关的帕普与属于亚卡赛支系的昂科比亚酋长和富马萨酋长联合；另一方面，出身亚卡赛的克瓦库·阿吉马恩得到其推定继承人阿杜·克瓦德沃的支持。依照轮换的规定，阿杜·克瓦德沃属于赞赞族。实际上这是面对面的酋长阵营和国王阵营。一位关心其长远利益的继承者加入了国王阵营。

### 英、法瓜分

在随后几年中，白人显得更加谨慎；只有法国的梅纳尔（Me-nard）上尉在1891年春天到过这个国家；况且他在那里没有受到很好接待。吉亚马恩的生活一如既往。阿布隆人根本没有料到，在距邦杜库数千公里的地方，英法外交官坐在凯道赛绿色地毯上热烈讨论着他们的命运。经过几番周折，讨论于1891年6月26日结束，双方签署了一项议定书，规定两个强国瓜分吉亚马恩。这项决定当然没有同阿布隆人商量，而他们似乎至少有两年竟不知道这项决定。1892年，就地划定边界的混合委员会成员——法方有班热、布罗洛（Braulot）、克罗扎（Crozat）和莫尼埃（Monnier），英方有兰（Lang）、默里（Murry）、博伊斯拉根（Boisragon）和弗鲁姆（Vroom）。他们4月底和5月初事实上就住在吉亚马恩；但因对协议条文解释意见分歧，他们提前一个月停止了工作；因此，认为把协议内容告知克瓦库·阿吉马恩没有好处。此外，兰不同意英国政府让步，并力图让国王公开表示愿意归顺英国人；设想从此后不提瓜分问题。瓜分问题只有经过再次谈判才最终一致确认，1893年7月12日的协议记载了谈判结果。1893年11月17日，英国中尉总督霍奇森（Hodgson）这才把同法国的协议向克瓦库·克瓦布拉（Kwabila）阐述。克瓦布拉是吉

亚马恩酋长的使者，来诉说阿布隆商人被赛富维人敲诈勒索之苦。但很明显，在阿布隆人看来，这个时候霍奇森的阐述不会有任何意义：白人怎么会瓜分一个具有两个世纪的古老团结、他们没有占领而只是断断续续访问过的国家呢？

1889~1895年间，决定王国政治生活的并不是白人的主动行动。王国的政治生活仍以争夺霸权的各个不同部族间的平衡问题为主。1887年废黜迪亚乌希使得帕普及其朋友们占了优势。但不会被看成是最终一致承认的结果。首先，忠于国王的人仍对这种结果提出异议，他们中的强烈报复思想正在发展。克瓦库·阿吉马恩由于年高与遭到失败而身体虚弱，的确不可能恢复斗争；同样，迪亚乌希也彻底威信扫地，1892年在遗弃和遗忘中死去；但他的兄弟们，尤其是国王的二儿子、年轻的阿皮亚·萨恩只想为1887年的耻辱报仇。再说，帕普的胜利也在于他同其他省酋长建立的关系，特别是同他们当中那些属于或联合亚卡赛支系的、与克瓦库·阿吉马恩休戚相关的人建立的关系。万一他们死了，一切都会成为问题。然而，1892年底或1893年初正是这种情况发生了：昂科比亚酋长科菲·科科布和富马萨酋长克瓦德沃·布阿蒂尼相隔几天或几周先后死去。

关于昂科比亚的选定，帕普很难干预，而这一位子已归于他的死对头克瓦德沃·阿吉马恩，号坦贝 (Kwadwo Agyeman, dit Timbe)。因此，围绕选定新的富马萨酋长将展开一切活动。然而，占有富马萨位子的人是按轮换的规定在布苏姆布拉 (Busumbra) 缔造者后代的父系家族中分别居住在坎德纳 (Kandena) 和萨普里 (Sapli) 两部分人中进行选择。已故首领布阿蒂尼因是萨普里人，其继承人杜阿·亚奥，号多鲁瓦亚 (Dua yao, dit Doroya)，是坎德纳人。多鲁瓦亚似乎支持帕普，但因一年后于1894年初他也死了，几乎没有来得及表示他的意见。他的继位问题很快就引起了激烈冲突，一方面“坎德纳的人”表示这样短的统治时间并不构成真正的轮换，因而希望杜阿·亚奥由其“兄

弟”克瓦西·阿南·阿吉埃，号巴萨科 (Kwasi Anin Agyei, dit Basako) 来取代；但“萨普里的人”则要求这一位子应归于他们，并提出亚奥·阿吉埃为候选人；但同时，与通常的规定相反，亚奥·阿吉埃拒绝负担杜阿·亚奥所欠下的债务。争论很快激化了，不久，亚奥·阿吉埃被指控毒死了杜阿·亚奥以取而代之。于是帕普借口这一指控真正采用了武力；帕普及其盟友抢在新昂科比亚酋长克瓦德沃·阿吉马恩——一般地说他有权利也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支持亚奥·阿吉埃——干预之前，强迫任命了巴萨科。

亚奥·阿吉埃的支持者当然不屈服，两派终于打了起来；双方在离萨普里不远的地方打对阵战，战斗中不仅使用了短木棍和大砍刀，而且使用了步枪。克瓦德沃·阿吉马恩和国王的儿子阿皮亚·萨恩去援助亚奥·阿吉埃，但被击退，而阿皮亚·萨恩却落在对方手中。他们为了侮辱他，让他头顶一个鼓，由帕普的女儿来敲打……。

帕普因此成为再次冲突的胜利者，他的权力于是达到了顶点。1894年12月，他代表国王接受了班达摄政王希埃·亚奥 (Sie Yao) 的归顺。但是，阿布隆地区的每个人都认为，当发生意外事件迫使敌对双方至少商定休战，否则和解时，昂科比亚酋长和亚奥·阿吉埃的支持者会试图进行报复。

### 萨摩里登上舞台

1892年和1893年萨摩里因遭到法国纵队的打击，决定远离最初地盘，带领所有军队到东部去。1894年7月初，索发人 (Sofa) 入侵迪米尼 (Dyimini) 王国，并在三个月内占领了绝大部分国土。但很显然，对萨摩里来说，占领迪米尼王国只是一站；甚至在他占领之前，已决心走得更远。从1894年6月起，他就派了几名商人去黄金海岸的英国商栈，但他们被阿布隆人截住杀害，夺

走了所带的黄金。当年底，他请求吉亚马恩首领准许他带领士兵穿越国土“去拉麦凯”（La Mekke）；但遭到拒绝，于是决定用武力开辟通道。

形势发展很快。4月和5月双方集结兵力并打前哨战，似乎是阿布隆人前哨主动进攻。萨摩里主力军于5月底或6月初越过科莫埃河（Komoé）。阿布隆人同萨摩里先后在恩古尼亚（Ngunia）和马拉乌伊（Marahui）两次激烈交战，两次战斗都失败了。国王和酋长们于是逃到国家南部的达迪亚赛（Dadiase），萨摩里则于7月10日进入邦杜库。索发人在城里维持了两年，同时占领了王国的整个北部，但未试图进入森林。

在此期间帕普的作用如何呢？在这里我们想驳斥邦杜库管辖区第一批法国行政人员的大量诽谤，特别是朗布兰（Lamblin）。照他看来，帕普十分仇恨克瓦库·阿吉马恩和亚卡赛对手，只是形式上同萨摩里打仗；刚一失败，他就逃跑，丢下剩余的阿布隆军队任入侵者摆布。失败后，他把所有权力都交给占领者，作为交换，希望将吉亚马恩政府委托给他。

所有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帕普积极参加保卫国家；在马拉乌伊交战时主要是他指挥了阿布隆军队。关于富马萨的继位，一部分阿布隆酋长和另一部分酋长之间确实存在争议，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协调他们的力量，而分别迎战敌人。因此，克瓦德沃·阿吉马恩指挥昂科比亚的人在恩古尼亚迎击索发人；富马萨和阿吉多姆在后面离得较远，没有参战，但几天后他们在马拉乌伊受到打击。吉亚马恩在战斗中付出了分裂的代价。

阿布隆人失败后在关于应怎样行动问题上又出现新的分歧。克瓦库·阿吉马恩及其顾问似乎很久就希望白人再早几年承担义务来援助吉亚马恩。他们曾向海岸角派了好几位使者，但马克斯韦尔（Maxwell）总督答复说，吉亚马恩已属于法国势力范围，应由法国采取必要的措施。然而法国人很快表示，他们同非洲合作者打交道时并不重视自己的诺言。帕普似乎比克瓦库·阿吉马



恩更快地注意到这种事实，因而坚决支持同萨摩里签订临时协议。最后帕普让自己的观点占了上风，1895年9月或10月初，阿布隆人宣布归顺：他们向胜利者交出了迪米尼的逃亡者，支付了大量赔款和放回两名地位很高的人质：克瓦库·尼亚卡国王的三儿子，立即被释放；克瓦德沃·耶博阿成为1893年或1894年阿杜·克瓦德沃死后王国的指定继承人，并随萨莫里军队一直到了博雷(Bole)。

帕普于是返回在克瓦辛达瓦(Kwasindawa)的住宅，克瓦库·阿吉马恩则回到迪亚赛。这两个人之间仍然十分对立。1896年3月，由戴维森-豪斯顿(Davidson-Houston)率领的英国代表团临来时，国王、王后阿马·卡莉亚和昂科比亚酋长克瓦德沃·阿吉马恩再次要求英国军官援助，并让帕普对他们的不幸负责。但是，当3月24日克瓦库·阿吉马恩去索科(Soko)接见戴维森-豪斯顿时，帕普及其朋友也在场，他们和国王共同反对法国和英国瓜分吉亚马恩。戴维森-豪斯顿表示听说在他到达前帕普曾三番五次地竭力想把阿吉马恩交给萨摩里，但很明显，这种谣传属于对手诽谤帕普的活动：索发人决不会企图捉到老君主本人，而且如果克瓦库·阿吉马恩感到威胁，他肯定不会冒险去索科，索科离邦杜库只有三小时路程，那里有萨摩里的强大驻军。

1896年9月5日，克瓦库·阿吉马恩去世，在等待克瓦德沃·耶博阿登基时，帕普作为吉多姆酋长行使摄政职权。朗布兰以此为理由，指控帕普利用国家被占领而篡权，并为了保住权力，断然推迟选定克瓦德沃·耶博阿。实际上，帕普的摄政权完全符合阿布隆惯例。关于克瓦德沃·耶博阿即位，是索发人希望他登上王位——如果帕普反对，那就表明他敌视占领者——但只有克瓦库·阿吉马恩的葬礼结束后才能举行登基仪式；但葬礼应该由其亲属来安排；所以，对延期负责的不是帕普，而是他的亲属。

帕普在此期间的政策很明确。1896年10月，他还非常坦率地向法国批发商埃尔伯(Erbe)阐述了他的政策。埃尔伯为了维迪

尔的利益试图同萨莫里接触。在他看来，吉亚马恩只凭自己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对付强大的萨摩里。在很长时间内希望得到外部援助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努力生存下去，而不要徒劳地激怒占领者。但是帕普仍十分敌视占领者，一旦外部形势的发展提供机会，他就准备摆脱他们的控制。1897年7月这种机会来了，他没有错过。

1896年底，英国总督马克斯韦尔事实上委派亨德森（Henderson）和弗格森（Ferguson）去班达、博雷和布纳地区，重申英国在那里的权利。但亨德森被索发人逮捕，随从人员溃逃。虽然亨德森被很快释放，但马克斯韦尔仍决定把萨摩里的人从同英国人签署条约的地区驱除出去，并把他们赶向法国势力范围。监督员米切尔（Mitchell）根据这一计划于1897年6月14日率领一支强大纵队待在班达地区的拉乌拉（Lawra）。帕普十分秘密地向他派了密使，请求他进攻萨摩里在邦杜库的驻军。米切尔同意并约定了进攻日期。

7月7日，英国军队经过短暂战斗后进城，索发人都逃向纳西昂（Nasian）。在随后的几天内，在阿布隆村庄中孤立的索发人也被屠杀或驱逐，仅剩30来人仍维持在巴拉博。萨摩里在吉亚马恩的占领结束了。

### 抛弃与变节

帕普向米切尔进行的活动表明酋长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萨摩里占领两年后，他明白了他过去的理想——通过“出色的孤立”政策维护阿布隆的独立——成为泡影。邦杜库的解放并没有改变他的看法：索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但他们躲在纳西昂和巴拉博，离城只有三天路程；至于萨摩里军队的主力根本没有受损。只要威胁存在，吉亚马恩就需要有人保护。谁来保护呢？在米切尔进入前十来天，帕普看到法国人的使者、土著士兵下士阿马迪

· 特拉奥雷 (Amadi Traore) 到了邦杜库；法国行政人员博努尔 (Bonhoure) 和内布 (Nébout) 委托他交给索发人驻军首长巴卡里 (Bakari) 一封信。帕普因此确信法国人实际上是萨摩里的盟友，而许多阿布隆人也赞成这种意见。所以就谈不上请求法国人帮助了。在这种情况下，求助英国人是唯一出路，而由于英国人刚刚有力地显示了威力，帕普就更容易下定决心：1896年1月，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库马西，并逮捕了曾给吉亚马恩沉重打击的阿散蒂国王普兰佩 (Prempeh)；这一胜利肯定有助于加强英国人在阿布隆人心目中的威信。

所以，当米切尔来到邦杜库时，帕普就准备站在英国人一边。但是，从翌日起，米切尔就向帕普证实邦杜库属于法国人，而且女王的部队不能留在那里。为了证实他的说法，第三天他就撤离，就地留下了一连豪萨人，由土著军官邓卡菲 (Duncafy) 带领。但是这一连豪萨人根据英国驻库马西官员斯图尔特 (Stewart) 的命令也很快撤出邦杜库，斯图尔特担心同法国人发生事端。毫无疑问，这一撤退使帕普感到不安；但他很快又产生希望，因为马克斯韦尔总督决定结束萨摩里的危险并准备不顾法国可能提出抗议，命令重新占领邦杜库，1897年9月2日布拉姆韦尔 (Bramwell) 上尉完成了占领。9月27日，马克斯韦尔亲自到城里。28日和29日，他在一次会晤中见到了酋长们，参加会晤的有新伊玛姆俾南迪·蒂米泰 (Kunandi Timité)、帕普及其主要支持者。马克斯韦尔向他们重复英国坚决遵守1893年的瓜分。10月23日马克斯韦尔离城，几天后英国纵队开向北方。帕普及其朋友被抛弃，重新陷入孤单；他们对英国人所抱的希望破灭了。

由于变节行为已经使团结涣散，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尽管英国人在邦杜库的时间很短，但却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第一，城里的迪尤拉人把战俘交给英国纵队来准备食品，搬运行李等。不过当纵队出发时，一些战俘不愿意再回到主人那里去，而英国人又忠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将战俘带走。据朗布兰后来

调查，有45人因此被释放。知道在黄金海岸已废除奴隶制的迪尤拉人立刻明白，如果英国人待在邦杜库，那儿也同样会废除奴隶制；这对他们来说将是破产。相反，法国人在其控制的领地却避免破坏这种制度，而这种谨慎行为非常有助于阿西尼（Assinie）和巴萨姆（Bassam）的贸易成就。从此迪尤拉人完全站在法国人一边，同时和帕普断绝关系。第二，佩南戈酋长克瓦库·塔阿也失去12名奴隶，被英国人罚款46英镑；结果他也脱离了帕普阵营。

因此，英国人的撤离使帕普受到削弱和不知所措。但是起初，阿布隆人和迪尤拉人主要担心的是仍占据着纳西昂的萨摩里恢复进攻；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要跟随英国人走一段时间，以受他们保护。至于伊玛姆库南迪·蒂米泰，一直随他们到布纳；在那里他同法国上尉布朗（Bouland）接触。布朗向他肯定法国人即将从象牙海岸进入邦杜库；伊玛姆因而返回城里，以实际会见已住下来的法国人。帕普和他最后的支持者没有越过卡马拉（kamala）；他们到达那里后，朝偏西方向走，最后停在距邦杜库西北部有两天路程的洛迪（Laudi），以希望在那里有个结局。但是，克瓦库·塔阿，还有皇后卡莉亚和昂科比亚酋长克瓦德沃·阿吉马恩都没有行动；后两个人甚至没有走动就在邦杜库迎接马克斯韦尔；实际上，几个月来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地方，而在耐心伺机报仇。随着法国人的到来，他们终于认为他们是走远的。

事实上，法国人登场了；他们一知道英国人越过了1893年的边界，就三番五次地抗议，但是马克斯韦尔撤出邦杜库迫使法国人证明他们也是能够占领这座城市的。这一任务由克洛泽尔（Clozel）和朗布兰承担；11月26日他们带领25名卫兵从阿西卡索（Asikaso）出发，12月5日到达邦杜库，立即和皇后卡莉亚、克瓦德沃·阿吉马恩和克瓦库·塔阿合作；他们希望围绕这些人成立一个“法国党”，另外还向集中在洛迪的酋长们派去了使者，但这些酋长回答说，他们往后“属于英国”，并希望这样维持下

去。克洛泽尔由于掌握的人数少，不能采取强迫手段，而最好运用交际手段。不过有12月17日从布纳返回的伊玛姆库南迪·蒂米泰亲自作为理想的调停人。实际上，库南迪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可能强调指出了法国在苏丹力量的重要性，当他同布朗会晤时对此有所了解。不管怎样，帕普及其朋友终于让步了：1898年1月7日在邦杜库的一次会晤中，他们归顺了克洛泽尔。克洛泽尔只对他们处以100法郎的罚款。

1898年1月31日克洛泽尔离开邦杜库，朗布兰留下；出发前，他开始建造防御工事，为了把工事建好，他要求酋长们向他提供劳役，这立即引起酋长们的暗中指责。但是哨所的主体部分于4月1日完工。在此期间，3月8日，邦杜库地区被建成了由朗布兰领导的独立圈。表面上阿布隆人对新局面很容易将就；在法国人看来，吉亚马恩的殖民化往后会一帆风顺。

### 造反者和帕普的支持

1898年4月底爆发了阿西卡索起义。吉亚马恩南部的这块属地从1896年8月起就被法国人占领。法国人同国王亚奥·埃芬（Yao Efum）很快出现不和，使他受到种种欺压和罚款；另外，法国人还利用包括最残暴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来恫吓橡胶采集工，将他们的收获销售到海岸角。1898年初，阿西卡索的局势因而很紧张；3月14日的一项关于在象牙海岸与黄金海岸之间设立关税壁垒的法令引起了冲突。在两个多月中，亚奥·埃芬的战士和橡胶采集工包围了阿西卡索的驻军。7月2日该驻军才被拉伊尔勒（Lairle）少尉的土著士兵解救出去。

朗布兰刚一得知阿西卡索的起义后就竭力援助被包围的驻军；首先向他们派去了15名卫兵，然后召集阿布隆各首领，要求他们和他一起组成援救纵队。库南迪·蒂米泰、克瓦德沃·阿吉马恩等立即响应。但帕普、巴萨科和克瓦姆·法拉姆采取什么态度

呢？据朗布兰认为，他们首先试图既威胁又许诺地劝阻“法国党”的首领们同他一起向阿西卡索进军。另外，帕普的代表巴萨科、克瓦姆·法拉姆和吉亚马恩英国占领部分的一组橡胶采集工的首领达尔库（Darku）在邦杜库附近的桑帕（Sampa）举行会晤；值此机会，三人之间签署了一项条约，以在吉亚马恩扩大起义。对整个这件事怎么考虑呢？

首先，帕普、巴萨科和克瓦姆·法拉姆事实上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当朗布兰去阿西卡索时，并没有陪同他去；巴萨科因在瓦亚克鲁（Voyakru）遇见了朗布兰，就这个问题和他说了几句“话”。起义的最后，阿西卡索起义的橡胶采集工的酋长克瓦德沃·阿达布（Kwadwo Adabu）撤到黄金海岸，在那里被英国上尉阿米塔奇（Amitage）逮捕并审问。据阿达布叙述，帕普让他知道“他在为英国人服务并得知法国军官正在毁坏阿西卡索，他知道他们要来吉亚马恩采取同样行动；所以他要来处理这件事”；多疑的阿达布由于别的原因拒绝了这种建议。当阿达布说这些话时，他被英国人监禁着。

另一方面，传说是怎么讲的呢？昂科比亚的讲法是肯定帕普曾竭力阻止克瓦德沃·阿吉马恩去阿西卡索。其他说法首先强调帕普的敌人在当时情况下起的决定性作用；克瓦德沃·阿吉马恩和邦杜库的迪尤拉人串通一气向法国人揭露帕普及其两个伙伴的“亲英”态度和阴谋；他们强调说：“只要这三个人还活着，你们就不能控制这个国家。”

我们认为，从研究事实中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阿达布的证明确定帕普实际上同阿西卡索的“造反者”进行了接触，并给他们以道义上的支持；显然，他并不甘心于法国人呆在吉亚马恩，而且认为阿西卡索的混乱不管怎样可以促使法国人离开。另外，很明显，克瓦德沃·阿吉马恩及其支持者抓住对他们出现的机会算旧帐，并最终向废黜迪亚乌希、消灭亚奥·阿吉埃和侮辱国王克瓦库·阿吉马恩的人报仇。

## 强有力的方式

至于法国人，决定杀鸡给猴看，以避免重新爆发阿西卡索那样的起义；他们知道王国居民低估法国的军事能力：1895年博德在索发人面前逃跑和巴萨姆政府后来对萨摩里犹豫不决，人们都还记忆犹新；所以他们相信只有无情地显示力量才能改变这种逊色的“尊贵形象”和产生所寻求的恫吓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帕普、巴萨科和克瓦德沃·法拉姆完全肯定是受害者。事实上他们被怀疑忠于英国人，这在殖民军军官看来是特别严重的罪行。最后，殖民军军官们还认为，结束由班热及其追随者一直在象牙海岸实行的“和平征服”的政策和把在苏丹采用的恐怖方法用在这个国家的时候来到了。

所以很快就要决定帕普及其朋友的命运了。1898年7月11日，朗布兰回到邦杜库，23日，他出于仇恨向总督指控三名酋长。8月7日，邦盖上尉和拉伊尔勒少尉带领一队土著士兵也到达邦杜库。当时克瓦姆·法拉姆在维雷姆（Wereme）的住所，而帕普和巴萨科住在国王克瓦德沃·耶博阿附近的埃雷博（Herebo），他们并没有东躲西藏，而且可能根本就没有预感到等待他们的命运；8月15日，邦盖让人把他们逮捕并带到邦杜库。20日，他们被送到由邦盖、拉伊尔勒和朗布兰组成的军事法庭，在场的有国王、王国的要人和邦杜库的显贵。“诉讼”只是一场可悲的喜剧。当三个被告试图为自己辩护时，西塔法（Sitafa）答复他们说：“继续胡言乱语吧，白人是不会懂得你们的意思的。”事实上他收买了翻译塔诺·克瓦西（Tano Kwasi）。塔诺·克瓦西系统地歪曲了他们所说的话。经过这场法国人既当法官又是当事人的法庭滑稽表演之后，帕普、巴萨科和克瓦姆·法拉姆被判处死刑，并于翌日被枪决。帕普在被处决时年龄为92岁。

帕普的悲惨历史充分说明了保守地反抗殖民统治的伟大与悲

剧。帕普的理想，对外是恢复和维护吉亚马恩的独立，拒绝任何外国统治；对内是保护国王和首领们有均衡特权的旧秩序。但是他不懂得，至少从1888年起，吉亚马恩所对付的强国和过去在盟国中或在战场上遇到的强国性质是不同的。同时，帕普的政治计划可以说是矛盾的：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吉亚马恩的主权，但反对任何权利的集中，他使王国丧失了能更好地对付外国侵略的手段；在他身上看不出在象萨摩里或阿散蒂国王普兰佩那样的许多人物身上所看到的“现代化”意愿。当他临死前意识到对自己的努力是自吹自擂时，于是就企图挑动一些殖民者同另一些殖民者对立。即使英法代表在当地十分对立，但是面对非洲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根本利害是一致的，这使得帕普的新策略化为泡影；在这一点上米切尔和马克斯韦尔没让他有任何怀疑。然而，倔强的老人仍不屈服：阿西卡索事件时，他重抱希望，甚至可能考虑很快恢复战斗。对象他这样的人，当时历史是不给任何出路的；但除去他的弱点和错误外，他至少还有优点，毫不动摇地承受了自己选择的命运，而且直到最后的时刻仍昂首挺胸。

（吴增田 摘译）



## 阿波美抵抗法国殖民入侵的英雄贝汉津

贝汉津 (Béhamzin)，这个名字使人们想起非洲在19世纪末一位顽强抵抗欧洲殖民入侵的伟大爱国者。尽管他被视为阿波美王朝中最血腥、最残忍的君主，但他进行的抵抗战争却是有一口皆碑的。他勇猛超群，忠于祖国。他的军队英勇善战，使欧洲殖民者大为震惊。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波美王朝曾是几内亚湾最强大的王朝，今天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贝宁人民共和国把贝汉津看作是本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贝汉津1845年出生在今日的阿波美市，取名叫阿豪克波努 (Ahokponu)，后成为古昂多 (Koundo) 王储。他的母亲出身贫寒，他的祖父盖佐国王从1818年起在位。盖佐拥有一支因招募了女兵而更显得生气勃勃的军队，是他把自己的国家从约鲁巴人控制下解救了出来，他四处征战，贩卖黑奴，通过征服邻国来扩大王国的疆域。盖佐的功绩还在于他振兴了农业，使王国经济适应了欧洲发展油料工业的需要。

贝汉津从小喜好工艺制作，对商业饶有兴趣，喜欢在国内旅行。当时阿波美王国有三个社会阶层，即：奴隶、庶民和王子，王子是王国中惹事生非的一群人，他们的野心和对王位的贪婪已是路人皆知。

盖佐为了安抚他们，只得让他们参与国家的管理，他的儿子格雷雷1858年继位之后也如此效仿。在这个王国，没有一个王诸能够顺利地继承王位，对王位的争夺时时会动摇整个王朝。

法国人于1851年与达荷美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7年之

后，法国商人试图迫使王国出让科托努，这就促使两国之间关系开始恶化。阿波美人认为，土地归先人所有，是王国的共同财产，国王要保证土地不被任何人侵占。这就是“国王即土地、土地即国王”的思想，它决定了所有王室人员在殖民入侵面前都采取了抵抗的态度。

格雷雷在王室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指定了他的继承人。起先，他选择了他最宠爱的儿子阿汉汉佐为王储，但这位王储莫名其妙地在1872年突然死去，有人怀疑是贝汉津投的毒，国王心灵上遭到严重的创伤，过去对贝汉津就抱有怨恨之心的王后更是怀恨在心。尽管王后竭力反对和老百姓议论纷纷，国王还是于1875年立贝汉津为王储。

1878年，法国人要求阿波美当局出让科托努。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国王召回了违背君命私下向法国作出让步决定的阿波美代表，宣布这些人为叛国者并处以死刑。

柏林会议之后，欧洲列强加紧了对非洲的瓜分。法国人试图打通沿海地区到内陆的通道，他们征服了阿波美周围的一些小国，因此，格雷雷成为法国人的主要障碍。那时，70岁高龄的老国王已把大权交给了贝汉津。贝识破了法国人的意图，他和占据了多哥的德国人达成了秘密交易，阿波美卖给他们奴隶，以换回武器和军火。

格雷雷向法国人表示，决不把一寸土地赠送他人，并谴责他的邻国的君主向法国妥协，为法国进攻阿波美提供跳板。1887年底，法国向阿波美派去了主管西非殖民领地的总督巴乐尔(Bayol)，就科托努港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他空手而回，并对国王的冷落感到十分愤怒。他在给巴黎的报告中强调对他的冷落是对法兰西共和国的侮辱，必须惩罚这个被“人类所不耻的王国”。

老国王于1889年12月28日晏驾，1890年1月1日，王储继位，并正式取名贝汉津国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鲨鱼国王”，意思是他的暴怒足以使白人船队的舵失灵，因而不能在科托努靠

。新国王时年40有余，他头发苍白、态度高傲，举止间显示出不辱父命的神态。

贝汉津的实际统治（1890年1月至1892年）是这个王朝中最短暂也是最悲壮的时期。

当时一些法国人写到，这位黑人君主无限忠于祖国，他具有三个特点，即：嗜血、好战、爱祖国。

首先，借助传统的神灵，求得它的保护是王国一切活动的基础，死去的祖先都变成了神灵。对他们最好的祭祀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人血。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举行人祭的原因。

其次，王国是通过战争才建立和扩张起来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用于祭祖和贸易所需的奴隶。能征善战的将军是成为国王的重要条件。贝汉津在作王储时曾听到有人劝告他多用心农业，他说：“如果我不打仗，那我靠什么生活呢？我只能退位了”。

1890年3月，法国借口阿波美王国扣押12名欧洲人质一事派军队在科托努登陆，同阿波美的军队展开了激战。法国人领受了对方特别是女兵部队的战斗力。一位法国中士后来写道：“在激战中，我们不得不把一个女兵击毙，因为她死死地扼住我们一位同伙的脖子不松手”。贝汉津时常亲自督阵，以激发军队的士气。法国人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全凭他们手中现代化的武器。

战争使阿波美国内的反对者们纷纷现出了各自的本来面目。有的人建议国王举行谈判以争取和平，国王的兄弟们和大商人却担心国王会因获得了和平而变得更骄傲、更残忍，这些人希望国王战败，以满足他们报复的心理。有一位王子说，欧洲人不到来，王子们也会密谋结束贝汉津的统治。1890年发生了两起反对贝汉津的阴谋，一起是太后勾结一帮权贵企图闹事，她被抓了起来，处以笞刑，失去了作为太后所享有的所有特权。她的同谋死的死、逃的逃。另一起是几位大臣想谋刺国王，尽管他们宣过“血誓”，但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以失败告终。

在外部，阿波美王国和法国军队之间出现了“不战不和”的局面。贝汉津向法国人解释了他的对外政策，它以三项原则为基础：欧洲和王国都必须维护传统的友谊；欧洲人可以在王国管辖的地区从事贸易，但欧洲人必须尊重王国的主权；王国的土地可以租用，但决不割让。因为拱手割让土地必将遭到祖先和上苍的惩罚。贝汉津写道：“我们决不会放弃科托努，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将是大逆不道，雷霆将轰击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居民”。

国王一面向法国人阐述这些原则，一面在积极备战。他认为法国人迟早要向他进攻的。贝汉津在失去邻国支持之后，他主要的盟友是德国人。他以“劳动协定”的名义向德国人提供了3000名非洲战俘，向葡萄牙提供了600名战俘，以换取德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王国出售棕榈油和果仁的收入也基本上用于战争开支。

这时法国当局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尽管某些公众舆论对法国的殖民行动持保留和批评态度，但议会中各派都一致认为，法国的旗帜一旦插上一块土地就应该在那儿永远飘扬。

法国在采取最后行动之前，先后向贝汉津派去了三个代表团。代表团带去了给国王的礼物，这些礼物理所当然地由军人护送。当这支由不同军种的军人组成的护送队伍返回海边时，五位军官写出了一份详尽的技术报告，这份报告包括地形图、行程纪录以及其他有关情况。带队长官沃德乌少校提出了一份包括三项内容的报告：对王国军事装备的估价；对国内政局的估价；进攻计划。他建议法军沿维美河溯流而上，然后登陆攻打王国。他去阿波美肩负着的是间谍使命，受到了上级指挥官的称赞。

1892年初，贝汉津同法国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原因是1891年底，阿波美的军队讨伐了邻国的阿佳族人，捉了不少的俘虏。贝汉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曾祖父曾败在过阿佳族人的手中，他是为了复仇才这么干的。但现在阿佳族人的保护人是法国人了。1892年3月，阿波美王国又血洗了受到法国人保护的离科托努不

远的六个村庄，当时一位法国高级军官在停泊在沿海的军舰上也遭到了枪击。事后，贝汉津写信给法国人，试图把这些事解释清楚。他强调，他有权惩罚那些欺侮过阿波美王国的人，他并不想破坏1890年同法国签订的协定，以法国人为敌。但法国人抓住这个借口，决不松手。

军事讨伐的决定终于做出了，1892年4月11日，法国议会通过了这次军事行动的费用300万法郎。共有491名议员参加了投票，64%的人投了赞成票。法国确定投入的兵力为76名军官和2088名士兵。远征军总司令多德斯上校5月8日来到了贝宁湾。

贝汉津坚定地宣布迎战。他在给法国人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挑起战争，我们将奉陪到底。我的士兵如此之多，犹如出洞的蚂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哪怕战争持续一个世纪，我们损失两万人，我也要打到底。”他的部队比两年前强大多了，拥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而且更加训练有素。特别是那些女兵更是跃跃欲试，要在战场上用鲜血表达她们对国王的忠诚。

多德斯派一部分军队到莫诺地区进行佯攻，以吸引贝汉津的注意力，他自己则率主力沿着维美河溯流而上，完成对王国的包围。10月24日至27日，双方部队进行了激战，其中又以法军强渡祖河一战最为壮烈，法军遭到了惨败，只是他们使用大炮和密集的排射才击溃了阿波美军队。阿军表现了异常的勇敢和顽强，他们的纪律严明，面对枪口和刺刀毫不畏惧。女兵善战的本领超过了男士兵。

因阿军方面阵亡人员太多，它的处境变得困难起来。贝汉津提出要谈判，但他的倡议没有得到响应。远征军已开到了王城的大门口。国王为了避免法军进入王城，试图同法军讲和。但法军提出的条件危及了王国的自由，国王无法接受。11月17日，法军攻陷了王城，贝汉津在放火烧毁王宫之后逃出了王城。第二天，多德斯宣布，阿波美人民的利益从此掌握在法国的手中，另一份通告宣布贝汉津国王被废黜，他被永远开除出这个国家。

贝汉津继续领导着抵抗运动，几次从法军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逃了出来，化险为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位于阿波美北部的高原地带设立了指挥部，领导残存的部队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当地人民为他提供了一个个安全地带，向他提供了食品和情报。1893年4月，贝汉津乘法军松懈之机，率兵频频出击。但他知道，光靠武力是无法收复失地的，他向法国派去了谈判小组。法国人决不肯放弃到手的胜利战果，不愿做出任何让步。8月，多德斯决定尽快平息这一地区，他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1894年1月15日，他封了一个听命于法国人的人为国王，这个地区变成了法国人的保护区。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贝汉津决定走出丛林，在这之前，他为战死的阿波美将士举行了纪念仪式。在高高的祭台上，他向英灵们起誓，决不背叛祖国。他说：

硝烟蔽日，生灵涂炭。

为国捐躯，矢志不渝。

与其卑躬屈膝，

宁可含笑九泉。

1894年1月26日早上，贝汉津带着一位君主应有的尊严来会见法军司令。他拒绝了多德斯伸出的手，而让自己的军事长官同这位司令去处理所有问题，因为他只能同与他身分相当的人谈判。他提出要会晤法国总统，这却给法国人提供了一个使他落入陷阱的绝好机会。2月11日，他在科托努港登上了一艘法国护卫舰，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永远也不能踏上法国的土地。他和11个亲戚和陪同人员开始了永远流放的征途，经过长时间的漂泊，他们到了位于拉丁美洲的马提尼克岛。在那儿一住就是12年，他的一个儿子在当地学校上了学，他还增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这漫长的流放生活中，贝汉津心情沉重，思乡心切，身体也一天天坏下去。他给法国总统、殖民当局写信，要求允许他返回祖国。在阿波美，人民在深切地怀念着他，很多人身着丧服，以等待着

国王的归来。这不能不使殖民当局忧虑万分，当局把贝汉津看作是危险人物，因为他对人民依然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到了1906年，国王的身体越来越坏。3月，法国决定把国王转移到离阿波美不太远的阿尔及利亚。国王忍受着内心的折磨，他的左胸感到灼热，间隔性发热，肾功能出现障碍，最后引起肺炎，尽管进行了抢救，他还是在1906年12月10日病逝在阿尔及尔市的一家医院里，死时眼睛还圆睁着。阿波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结束了一生。

贝汉津生前不能返回祖国，死了，殖民当局也不允许他的骨灰运回国内安葬，当局担心当地的人民会借此机会掀起反对殖民统治的浪潮。在贝汉津死后22年也就是1928年，他的骨灰才得以在他儿子的护送下运回国内。贝汉津离开阿波美35年了，这丝毫没有冲淡人民对老国王的怀念。尽管殖民当局设下了种种障碍，但成千上万的阿波美人呼唤着他的名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大地。他的后代和人民细心地照料着他的坟墓。

**(凌忠贤 编译)**

## 抗法战争中的娘子军

在达荷美人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的斗争中，活跃着一支娘子军。口头传说把它的创建归功于盖佐国王。据从前访问过达荷美王国的旅行家提供的证据推断，女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当时，阿加雅国王的军队屡受挫折，便征召大批妇女（可能有2000名）入伍，把她们编入正规军，投入战斗。

盖佐的功绩在于，在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过程中组建了女兵部队。他开始有步骤地征召女兵，把她们分成专门的兵种，创建了一支不同于女战士部队的女猎手部队，并且提倡对所有女兵进行高强度训练。他的继承者格莱莱和贝汉津保留了这支部队，并且努力使其现代化。在沦为殖民地之前女兵已建立了好几十年，奠定了它在军队中以及在国家中的地位。

关于达荷美沦为殖民地时期以前的女兵数量及其变化，不同的资料来源提供的数字如下表所示：

时 期	女兵人数	军队总人数	资料提供者
1845	6000/8000	—	邓肯
1849/1850	5000	—	福布斯和比克劳福特
1851	6000	16000	汤森
1856	5000	25000/30000	瓦龙
1856	4000	9000/10000	雷宾
1862	10000	50000	恩斯科特
1863	5000	—	威尔莫特
1863	2500	10000	伯顿
1873	3000	—	拉菲特
1890	3000	10000/11000	肖达尔

女兵在组织和领导方面均效仿男兵部队的建制。女兵卫队与男兵军团同级，队长的标志是腰带上悬挂几缕马尾。女兵左路军



由被称为坤德美 (gundémé) 和凯屯冈 (kétungan) 的军官统领, 这些军官的级别分别与男兵中称为米冈 (migan) 和高 (gaw) 的军官相同; 右路军由耶维 (yèwé) 和阿克帕杜美 (akpadumé) 统领, 其级别相当于男兵中的梅乌 (méhu) 和克波苏 (kpossu)。这三个师的每个师分成由女军官统领的若干营或团。这些下级单位的名称含有纪念某些丰功伟绩的意义或者具有特殊的含义。例如, 盖佐创建阿利高希 (aligossi) 部队就是为了缅怀因忠于艾登多曾国王而在阿波美王宫的阿利高被屠杀牺牲的女兵。杰多克波部队 (djédokpo) 的名字意思是“下跪”。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其成员被严格地限制在王宫之内。当她们经过的时候, 平民百姓必须匍伏在地。

每个师都有一些不同兵种的代表人物, 区别的标志是她们的制服。这些制服的颜色因年代和场合而异。女兵中最勇敢的女猎手因时期不同而占10~20%不等。她们的任务是围捕各种野兽, 必要时围捕大象。从服装上可以区别她们。她们往往身着棕色衬衣和齐膝棕色短裤, 用铁环箍顶, 头发梳成两只羚羊角状。首领们佩戴着铁角或银角。武器是又长又沉的猎枪。每个女猎手都在左臂和脖子上各挂一只大壶, 里面装着火药和军需品。腰带上挂着一柄锋利的弯刀, 以便结果受伤的动物。这些妇女身材高大, 训练有素, 力气过人, 十分敏捷。据伯顿说, 她们之中有20人曾经在象群中一举打倒7头大象。

所有其他女兵都是战士, 被分成四个人数不等的主要兵种: 步兵 (gulonento)、炮兵 (agbarya)、大刀手 (nyekplo-hento) 和弓箭手 (go-hen-to)。

娜纳加同大多数女兵一样, 是个步兵。她身穿蓝色衬衣, 腰带紧束, 条纹短裤不过膝盖。她还有一条平时放松、战时收紧的缠腰布, 头戴一顶无边圆帽, 帽前绣着一只蓝色的鳄鱼。制服上系着腰带, 腰带上挂着子弹夹, 用于香蕉树叶制成的子弹中装着火药。脖子上吊着火柴。在征战的时候, 她象男兵一样, 用一只

褡裢携带必要的装备和食物。军官们的标志是头顶上佩戴的白布，跟随她们的奴隶小姑娘负责携带她们的武器和衣物用品。

随着时光的流逝，步兵的武器发生了变化。英国枪被短筒火枪所取代。1882年定型的这种法国小枪更为轻便，也更易于操纵。但是，所有这些枪支射击速度慢，缺乏准确性。正因为如此，白刃武器在战斗中起着重要作用，女兵们喜欢白刃战。她们每人有一柄短刀和一把没有护手的匕首。锄头、佩刀、砍刀在混战之中也有用武之地。

“炮兵”约占女兵的1/5。炮兵身着红色和蓝色服装。她们的旗帜上画着一个正在撕碎敌人的女兵。在长时期内，她们被认为是女战士中最伟大、最强悍的人。一些女兵被派去操纵老式的铁炮。这些炮的炮架不稳固，大部分是由男炮兵操作的。其他女炮兵则装备有喇叭口火枪或者喇叭口短铳，并配备有女弹药搬运手。她们在射击时用枪托支住地面。这些口径很大的喇叭口铜管短枪发出的声响与大炮一样大。这些枪的枪膛里装的是买来的火药和当地铁匠用铁矿制作的大小不一的弹丸，没有任何弹道可言。

女大刀手装备有长近1米重达10公斤的大刀。

弓箭手是一些身穿蓝色紧身服、头戴绣有蓝鳄鱼无边圆帽的青年兵。箭是有毒的。在她们的手腕上，还用皮套挂着一口小砍刀。在平时，她们主要是一支用以炫耀的部队，在战时，由于她们的武器低劣，不过被用作助手和搬运兵而已。此外，战死的女战士也由她们搬运。因为，按照风俗，所有阵亡士兵都必须运回达荷美，在其故乡安葬。

人们习惯地把她们叫作“国王的女人”（ahosi），并且用“我们的母亲”（mino）称呼她们，这是一种表示敬重的礼貌的称谓。邻国的居民把达荷美女兵看作是难以用武力战胜的、甚至是不可能用武力战胜的危险臣民。

当盖佐组建女兵部队的时候，要求女兵部队必须全部由自由

的芳族姑娘组成。后来，编制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战争奴隶参加了进来，她们通常都是些在远征中俘获的小姑娘，后来象达荷美姑娘一样接受了军事训练。但是，达荷美姑娘仍然占居多数。在达荷美姑娘中每三年招一次兵，由两名专职军官领导。他们在乡村中指定一些适合于作战的姑娘。这些姑娘被送到阿波美，一个委员会对她们进行审查，决定接受她们参军，并且把她们分配到各个部队。在此之前，国主要在她们的之中挑选一些新的妻子。免于招兵的只有从前为法国人和英国人服务的奴隶的女儿以及公主们。芳族女兵和外来女兵完全平等。奴隶并不显得地位卑贱。因为，在达荷美，国王的母亲之中往往就有被俘虏来的约鲁巴人。另外，她们甘苦与共，只有老兵和骁勇的女兵之分。

女兵们在入选参军之后，就不能任意离开军队。她们要当一辈子女兵，除非国王决定召去作妻子，或者把她赐配给一位优秀的男战士，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因此，在女兵部队里有一批在战火中两鬓添霜的老年妇女。她们保持着集体生活的习惯，教育年轻的新兵。

女兵们必须专一地从事军事职业，并且为此保持独身。事实上，女兵们过的是一种与异性隔离的生活。女兵的生活和理想使她们成了一些特殊的人。但是，男战士却可以结婚，过家庭生活。由于她们受到同胞们高度的尊敬，似乎成了一些神秘人物。当她们经过的时候，普通的男人如不下跪，就得避开。宗教因素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她们的职业赋予她们一种特殊的本质，她们受到超自然力的保佑。女战士和女猎手们相信自己刀枪不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特别是，她们在服用一种草药之后，便感到增添了非凡的力量。这种草药可以用来提高和保持好战的热情。每次作战之前，国王都把一只酒瓮中的酒赐给女战士一杯，而这只酒瓮却只由国王一人保管。女战士饮下此酒之后，“变得疯狂，只想杀人”。

女兵们的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她们驻扎在阿波美王宫，住在专门供她们使用的一间茅屋里，每两天值勤一次。对大多数女兵来说，值勤就是在宽大的宫庭内院中沿走廊建造的大棚下守夜。在那里，每个人坐在一块席子上，枪支放在面前一个分叉的架子上。在日出之前，武器必须擦拭好。英勇无畏和战斗热情出类拔萃的女兵被选入贝汉津的卫队，成为国君的心腹。她们被召到王宫的一个战略要地站岗，可以睡在距通往国王活动区最近的一道门旁，禁止那些未经许可之人擅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训练。唱歌和跳舞在日常生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歌舞传扬了过去的女战士的传统，增强了当今女战士们的勇气。

在休息的日子里，女战士们成了农民和工匠。因为，除了在传统节日发放食物和衣服之外，国王并不供养他的部队。部队必须能够自我维生。她们集体种植玉米和“达荷美土地所能出产的一切产品”。她们还制作陶罐和葫芦。

当女战士进行军事远征的时候，当女猎手出发寻找猎物的时候，这些女兵的日常生活更为紧张。国王对他的军队只提供火药和子弹。没有任何后勤部门，每个人必须带上在外期间所必备的食物，通常是烤玉米、辣味很浓的豆糕和熏鱼。

每年，达荷美国王都要组织一场对邻国的战役。此外，还可能对某个不驯服的首领加以惩罚。无论在盖佐统治时期还是在格雷雷统治时期，女军官们都同男性同行一样参与每年远征方略的磋商。

法国人同达荷美人之间的战争证明了女兵的战斗力，但是也把她们送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四年的时间里，阿波美失去了独立，并且随之失去了构成其实力的所有机构。从一开始，战争的性质就已经明确，不再是掳掠邻国的人口或者惩罚某个不驯服的首领，而是必须维护国家的完整。1889年12月27日，王诸昆斗在接见法国向格雷雷派遣的使团团团长让·贝约尔上校司令官的时候捍卫了这一原则，他坚定地说，“达荷美决不出让一片领土”，

并且抱怨法国对他的国家的大量干涉。几天之后，他以贝汉津的名字成为国王。无论在召见法国人质的时候，还是在1891年2～3月他同奥代乌的使团成员讨论中，他都不断提出独立问题。对于前者，他在1890年5月2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和平地通商。是谁首先挑起战争，居心何在呢？血债要由他来偿还。我和我的人民要抵抗到底，我们要把外国人赶出我们的土地”。他选择鲨鱼作为徽记，象征不让外国人在达荷美的土地登陆。

大批女兵参加过上述召见和接待外国人的活动。她们知道促使国王抵抗的原因，并且最早懂得这是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第一场法国—达荷美之战（1890年2月21日～10月3日）是法国人首先挑起的。当时在贝宁湾法属殖民地供职的官员亚历山大·达尔贝加承认这一点，他写道：“与官方的说法相反，不是达荷美人进攻了我们，而是我们首先开火”。拥有包括4000名女兵在内的1.5万～1.8万军队的贝汉津以达荷美传统的军事战略指挥了军事行动；在1890年2月21、23、27日和3月1日进行伏击战之后，3月4日向驻扎在科托努的法军发动了进攻。在这第一场全面的冲突中，女兵们表现特别突出。在600名被打死和1000名被打伤的达荷美人中有大量的女兵。达荷美的部队虽然攻势凌厉，但没能夺取科托努，不得不撤退。在随后的几天里，局部的战斗不断发生。1890年4月20日，一场新的全面冲突在波多诺伏地区爆发。6000～7000名男战士和2000名女兵发动了进攻。“她们冒着三门大炮的轰击和步兵的齐射猛冲，一直冲到刺刀跟前”。孤身作战者亦有之：“酣战之中，我们不得不刺破一个女兵的肚子，以便解救一名她准备割断脖子的受伤下士”。但是，达荷美部队因几百人死亡和大约1500人受伤而受到削弱，不得不撤回韦梅河的另一边，完全失去了夺取波多诺伏的希望。

1890年夏天，贝汉津改组了他的军队。他注意到，他的对手拥有超过自己的武器，他必须使装备现代化，才能更有效地作

战。于是，他向欧洲商人，特别是德国商人购买了武器装备。结束战争的1890年10月3日协定其实不过意味着暂时的休战，哪一方都不愿意让步：法国想征服达荷美，阿波美王国想保持独立。

1891年全年和1892年的头几个月，贝汉津继续加强他的军队，5000枝快枪、一批弹药和大炮到货了。1891年2~3月，奥代乌的使团估计士兵人数为3000名，女兵至多不超过1800名。一年以后，让·贝约尔估计达荷美总共可以动用2.2万名战士来对抗法国，其中有1万名正规军和1500名女兵。不过，这些大致的数字表明，女兵在整个军队中的相对比重减少了。

在两国对韦梅地区发生争议之后，法国于1892年4月挑起了第二次达荷美战争。人数多达2200人、拥有大量武器的法国远征军在多兹上校率领下开进了达荷美。他们沿着那时欧洲人尚不熟悉的韦梅河道路推进，目的是夺取阿波美。贝汉津的部队交替使用进攻和防卫，试图顶住敌人。随着战斗的发展，达荷美人不得不临时征召缺乏经验的战士，以补充兵员的损失，女兵部队无法得到补充。女战士和女猎手在战斗中混作一团，眼看着她们的部队土崩瓦解。

下面的大事记要记载了导致达荷美战败的一系列战斗，它描述了一支军队覆没的过程。这支军队的成员早已发誓，与其向侵略者让步，毋宁死。

1892年9月14日，除骑兵以外的法国人在多格巴集结。

9月19日，达荷美人采用突然袭击的战略，于拂晓发起进攻，达荷美人死130人，远征军死5人，伤17人。法国人缓慢向前推进，9月28~30日发生了一些局部战斗。10月2日，法军跨过韦梅河。

10月4日，达荷美人在波盖萨发动第二次总攻，有1万名男、女战士参加。据哈瓦斯通讯社10月7日讯，“达荷美人表现出高度的勇敢和不可思议的抵抗力。一些女兵在距方阵10米的地方被打死”。

敌对双方损失惨重：远征军死6人，伤32人，包括16名女兵在内的95名达荷美人被遗弃在战场，但大量死者已被战友们运走。

从此以后，法军的推进天天都遭到贝汉津的抵抗。女兵们屡建功勋，并且献出她们的生命。

10月12日，达荷美人试图在乌姆博美迪阻止法军前进。

10月13日，贝汉津的士兵首次使用爆破弹，从此以后，每次战斗都要使用。但他们未能阻止法国人夺取阿克帕。

10月15日，达荷美人发动新的总攻，遭到惨重失败。

此后几天，达荷美人以壕沟为掩体进行伏击。

10月26日，远征军打退女兵的冲锋，攻占科托克帕。法国人向卡纳推进。

11月2日，瓦空之战持续数小时。

11月3日，拂晓，达荷美人从四面同时围攻法军宿营地，“从顽强的防卫转入大胆的进攻”。邓格拉斯强调说：“贝汉津国王勇敢的士兵以及无所畏惧的女兵们所有的白刃武器只不过是过短的大刀和佩刀，难以对付刺刀冲锋。”经过四小时的战斗，达荷美人不得不撤退。

11月4日，在乔库韦，这是最后一次总攻。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女战士和女猎手专门负责打军官，受到更加惨重的损失。

法国人开进了卡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达荷美军队死亡4000人以上，伤8000人以上。女兵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

11月6~15日，贝汉津开始谈判，但没有取得结果。11月15日多兹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贝汉津离开他的首都。11月17日，一片火海的阿波美被法军攻占。正当躲避在阿切里格贝的贝汉津集合起身边的军队残部、几百名战士和最后一批女兵的时候，多兹将军于1892年12月3日发表声明，宣布废黜达荷美君主。远征军在此之前两天已经解散，它在征服中损失了15名军官和70名战

士，受伤者有29名军官和411名士兵。

然而，尽管贝汉津的处境不稳，他在国内的威望却没有下降。法国当局力求俘获他，并且为此成立了一支远征军，派多兹将军率领。从1893年10月14日起，法国部队日益逼近贝汉津的避难所。数十名女兵的力量不足以抵抗。他准许他的忠实者向法国人投降，自己同一群家人躲进灌木丛中。他躲在那里一直没有被发现，直到1894年1月25日才决定投降。

几天以前，正当他的兄弟在法国人保护之下当上国王的时候，他告别了他的亲属。在一次激动人心的讲话中，他解释说，他“至死”也不签署保护协定，“以便不背叛无数骁勇的战士、无数不屈不挠的女兵毫不犹豫地为之牺牲生命的理想”。

（杨光摘译）



## 马丁-保罗·桑巴：从服役到起义

1887年10月11日晚上的大巴唐加 (Batanga)。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周围村庄的三位酋长或“国王”聚集在他们之中最有声望的马多拉 (Madoia) 酋长家中，研究因当天的事件而出现的形势。

白种人，人们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他们带来的财富得到人们的好评，同他们伟大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已签署了一些条约 (1842年)。但是人们从不象丛林人那样把他们看成是半人半神，而只须他们保持好的习惯做法：沿海滩建立商店或代理商行。在那里巴唐加酋长和居民给他们带来或自己交换在茂密的大森林深处收获的产品；然后巴唐加人再将欧洲产品高价销往内地。这种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使他们获得了很大益处：所以问题不在于看到丛林人来到海岸，也不在于从海上出现的白人进入内地。那将成为祸根！

然而，这正是一位白人不久前长篇大论地向他们提出的，他同另外三名欧洲人和120名非洲人提前五天上了岸。他们不是声称在内地建立一座村庄吗？“给我们一些向导，他们要求说，我们将成为你们的朋友。”对于白人，人们从不敢说“不”字，但是后来国王们进行了多少讨论啊！

未来顽强的抵抗者马多拉断言：“不管怎样，我决不向他们提供向导。对于你，弗朗克·波巴拉 (Frank Poballa) 这就完全不同了：你已经是‘白人’了，你在韦尔曼 (Woermann) 代理商行里给他们工作。但你呢，托科 (Toko) 王！你的财产将都完了，不是吗？”

托科辩驳说：“难道你不相信我们有可能比这些外国人聪明，并能让他们上自己的圈套吗？这些外国人在道路很滑、满是树根和野藤的荆棘丛林中冒着这个季节的大雨，而且没有粮食，会坚持多长时间呢？只要使他们相当长时间地疲惫不堪就行了，而不要使他们离海边太远，他们一叫嚷饶恕就把他们带回海边。你让我干吧：你知道通往内地的真正道路有多么难找和难以行走。不过是我托科亲自作向导，可以相信我，我们将走十分艰难的道路”。

10月16日清晨托科王就这样做了，对于由他带领的、冒着接连不断的倾盆大雨和走在茂密丛林中长长的运输队来说令人疲乏不堪的考验开始了，跟随托科王的有孔德（Kund）中尉、塔彭贝克（Tappenbeck）少尉、动物学家韦森伯恩（Weissenborn）和植物学家布朗（Bran）。

但是托科没有白人测定路程距离和方位的魔法，多亏孔德不断从口袋里拿出护符（罗盘），他发现尽管绕道走弯路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大体上仍不是朝东走，而是同海岸平行朝正南走。于是他们发怒、争吵，徒劳地试着朝东北方向走，但遇到河流上涨的障碍，又返回了洛贝（Lobé）河口。

所有国王重新组成联盟，发誓决不给欧洲人提供向导或翻译，但是孔德通过英国哈顿（Hatten）和库克森（Cookson）代理商行，同洛贝河另一边的邻居埃韦埃·亚·埃科（Evéhé Ya Eko）酋长建立了联系，那次全体国王宣暂时忘记了请他。埃韦埃看到自己有可能取代马多拉·托科和波巴拉，将成为强大外国人可以信任的人。正好在他弟弟家里长大了一名大约14岁的聪明伶俐的男孩子，名叫梅本加·姆埃博诺（Mebenga m' Ebono），别名可能叫桑巴（Samba）；作为搞运输的人，他已经常常穿越荒凉的大森林，走七天直到洛肯杰河（Lokoundjé）旁的比潘迪（Bi-pindi），在那里又开始有人居住，而且巴唐加人在那里以商品换取恩根巴人（Ngumba）带来的象牙。将这个男孩推荐给白人毫无危险，因为他不属于家里人；他是耶梅耶马（yemeyema）

家族的布鲁人 (bulu) 年小的孤儿，按照风俗，他叔叔把他留在巴唐加人当中，既作为友谊的证明，又作为交换的抵押；他在巴唐加人当中长大，不但学习了海边的语言，而且学习了代理商行的用语，于是他给大家，甚至给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充当语言媒介。所以桑巴完全适合作向导和翻译。

据口头传说，桑巴出生在梅图图·昂贡 (Metutu Engong)，这是一个离比巴 (Biba) 非常近的了村庄。他母亲是阿姆巴姆 (Ambam) 附近埃萨姆比塔 (essambita) 家族的恩图姆人 (Ntumu)，名叫门盖·恩埃伊 (Mengue n' Eyi)。其父在他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且他母亲在产期中也死了，婴儿由另一名恩图姆妇女埃达·姆博 (Eda Mbo) 喂养和抚育，她是叔父粤巴姆 (Obam) 的妻子。据柏林人类学家肯定，桑巴的诞生可定在1873年。

耶梅耶马人力图出海；而且后来没有几年奥巴姆和他的亲人就定居在阿科克 (Akok) 附近的托姆 (Tom)，离海岸附近的埃博洛瓦 (Ebolowa) 西部110公里，这给人以巴鲁人突如其来扩展的印象。这种扩展的目的是以货换货，获得财富，并且从19岁起，男孩子们一旦通过主要宗教仪式，就可以参加旅行和搞运输；所以桑巴重新回到巴唐加人中最会做生意的巴诺霍人 (Banoho) 当中。

当埃韦埃要给白人提供向导的消息传开后，他受到酋长们组成的进出口贸易联合公司的死亡威胁。于是孔德同意采取断然措施：他叫来了炮艇，逮捕了马多拉王和托科王，作为人质将他们带到杜阿拉（当时对喀麦隆的称呼）。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两个国王被监禁在豪华住处，他们对政府的设施留下了深刻印象，认识到他们低估了力量的对比，而且认识到埃韦埃比他们深思熟虑。对他们来说，现在重要的是重新得到白人的信任；所以他们开始对埃韦埃的推荐竞相许诺。埃韦埃提供的不是一个孩子，只领到了比潘迪吗？他们呢？

将每个人提供一个向导，能够带领远征队走得更远，穿过“恩古姆巴”（ngumba）和“雅温得”居民区，甚至走得还更远些，穿过“大”尼翁河（Nyong）附近有带尾巴的漂亮红色妇女的神秘地区，尼翁河是一条传说的大河，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巴唐加人去过。孔德就是要把揭示这条河（萨姆加河（Sanaga）的奥妙作为其探险的目的。

1887年11月7日，一队人马在三名向导带领下重新从洛贝河右岸埃韦埃酋长的村庄出发了。埃韦埃亲自陪客人们走了半个小时，直到黑暗大森林的边缘，然后将客人托付给桑巴。森林中的路很快就变得非常艰难，路很滑而且障碍重重，孔德估计每小时最快只能走2公里——其实，要走完洛贝河口与比潘迪之间人迹罕至的75公里路程需要五天时间。孔德称赞几个向导，所以也称赞桑巴，他们非常熟悉道路，熟悉跨过的或沿着走的溪流的名称和各个树叶棚之间的距离，更确切地说是行走的时间，一些树叶棚是作为躲避一会儿没完没了的雨而单纯歇脚的地方，另一些是较为宽敞的可以过夜的临时宿营地。但是一定不能在那里耽搁！储备的大米吃光了，必须尽快往前走。但到达比潘迪又遇到了灾难：村庄正在闹饥荒，什么东西也没有卖的。这些忍饥挨饿的人勉强被邻近的巴科科人（Bakoko）搭救。

桑巴于是从比潘迪返回了海边。事实上，埃韦埃没有任何理由从比潘迪开始就叫回其对手托科和马多拉的向导。在这种情况下，远征队遇到了种种困难：通加（Tonga）酋长不友好的接待，同扬戈纳人（Yengone）发生战斗，被武泰人（Vouté）袭击，遭巴萨人（Bassa）的埋伏和骚扰，使10人死亡，30人受伤（受伤的包括孔德和塔彭贝克），远征队弹尽粮绝，由韦森伯恩带领受难返回，疲惫不堪，无法形容，直到抢救队来挽救处于绝境的远征队。然而这支抢救队是由一名迅速而保证不迷路的使者向导请求并带领来的：十分可能依然是桑巴，因为按当地习俗，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是雇用非常年轻的人，甚至孩子作当差

的人。

孔德最终雇用桑巴作为他信任的人和“小男仆”是在1888年3月3日返回海边后和1889年1月6日再次出发之间。当孔德作为先遣队比塔彭贝克的200人提前五天出发时，当2月两个伙伴都在梅托姆巴（Metomba）染上重病时，当他们最后只受到埃索诺·埃拉（Essono Ela）令人满意的接待，在那里决定建立雅温得哨所时，桑巴总是跟着他的主人。当1889年3月12日，因患风湿病而行动困难的孔德变成瘸腿而且几乎瞎了，决定将哨所交给塔彭贝克以被抬回海边时，很明显，桑巴要陪同他悲伤地撤退。

在此之后，3个发现了雅温得的人当中两个最年轻的韦森伯恩和塔彭贝克相隔几周因发烧和筋疲力尽而死；第三个人，被任命为上尉的孔德得了中风，身体瘫痪，不能说话了；他活到最后仍然残废。10月22日，他在克里比（Kribi）用手势把权利移交给刚从欧洲派来的继承者摩根中尉，摩根自然也继承了他的用人。在摩根支持下，一支120人的队伍在1889年11月5日再次上路去雅温得。大概至少有16岁的桑巴一上来就成为两面人物：一方面是“勇敢、勤奋和有效的”模范用人，总是充满恰如其分而有效的积极性，总是出现在摩根左右。摩根独自带领远征队走在狭窄的路上，只是和他忠实的助手交谈，这位助手有机会还作他的向导和翻译。桑巴是很守时的，每天早晨按时叫醒主人，给他热水，然后照顾他每天盆浴，帮他穿衣服并系好护腿套，接着把他托付给厨师照料吃早饭，监督拆卸帐篷，有时他过分勤奋，一个人忙拆两顶帐篷。

但是晚上在宿营地，当搭好帐篷，吃完晚饭，铺好床时，干完活后出现的又是另一个桑巴：不再是用人，甚至不再是白人唯一的密友，这更是个很老练的人，一位已走过这条路的人，他比还很缺乏经验的摩根更有能力，可以预料并预言后面的宿营地。

这次新的探索遇到了和上次相同的危险；到达恩根巴人（Ngumba）地区之前有饿死的危险；遭到埃翁多人（Ewondo）的枪

击，运输工人在雅温得的罢工，中埃通人（Eton）的埋伏，遭巴蒂人（Bati）的流血伏击，由萨纳加河右岸忍饥挨饿很悲惨地返回。1890年1月在马兰巴（Malimba）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对巴科科人进行了报复。但是桑巴也度过了光荣时刻，在雅温得田园诗般的哨所休息了10天，哨所上的法国人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吹着军乐和穿着军礼服排场很大地进入武泰人的首府恩日拉（Ngila），在行进队伍中桑巴和摩根一起走在前头；武泰国王的盛大欢迎以阅兵和外国部队的表演给人以深刻印象；最后，在马兰巴岛上长时间地休整了五个月。

1890年5月底，摩根将桑巴带到克里比，不过是为了马上准备再次远征。这次远征要第一次把法国公司的一位代表魏勒先生以及一支商队一直带到拥有大量便宜象牙的恩日拉。6月2日，桑巴同他们一起再次上路去比潘迪，以便走得更远和“打开产象牙的地区”。

这次远征难道不是殖民化的开始吗？内地的抵抗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当6月9日摩根及其人员到达通加酋长住所时，酋长不在家，他的代表很快拒绝提供任何粮食。这一事件导致双方流血冲突。摩根抓了17名人质。因此直到通加的敌人、姆洛勒（Mlolle）酋长那里一路都很平静，姆洛勒酋长总是热烈欢迎白人，而且一早就派他的一个儿子给摩根当向导去雅温得。

两小时后，摩根中尉在一个小村庄里看见有个“仪表堂堂”、体格强健的年轻人向他走来，此人通过桑巴自我介绍说是通加酋长本人。开始他求原谅他的人缺乏教养；他只希望同白人和平友好，对仅仅由于他不在家而造成的误会表示抱歉；他请求摩根接受他给的一只极好的公羊，以原谅他自己并释放被俘的人。摩根受到感动，尽管伙伴们提醒，他仍然同意了通加的请求。通加带着释放的人质走了，任凭远征队远离姆洛勒，进入他自己领土的内地。晚上摩根在森林中宿营。

第二天6月14日，道路开始进入狭谷。摩根发现了许多足迹，觉察到有埋伏，他命令登上岩壁：于是突然发出许多隐蔽的枪声，有几个人被击中，但是当远征队中最敏捷的人来到狭谷边上的时候，进攻的人不见了；不过还听得见胜利的叫喊声和远处通加的响亮声音。桑巴翻译道：“这仅仅是开头：现在你们会受到不断攻击，甚至在夜里，而且只要你们还没有都被杀死，就会一直攻到你们的宿营地，因为我不再愿意在我这里有任何一个白人！”

20分钟后，再次受到攻击：许多铁块（用作火石枪的弹丸）袭击了远征队。此后摩根让队伍跑进适合埋伏的狭窄通道。直到晚上连续受到袭击。

最后在黄昏时他们到了一条小溪，姆洛勒的儿子证实那里已是通加领土的边缘。队伍停下来休息并放松了半小时，然后尽管在茂密树林遮蔽下天越来越黑，姆洛勒的儿子仍继续给队伍带路。几分钟后，突然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了枪声，姆洛勒的儿子顿时被打死。摩根乱放枪进行回击；没有任何胜利的喊声回答他。

一旦包扎好伤口（摩根的腿上中了三个铁块，他的护腿套很好地保护了他），直到雅温得的路就只不过是娱乐的散步；6月24日，德国人在雅温得受到岑克尔（Zenker）的热烈欢迎。但是在那里殖民化也引起了反抗：7月13日，巴阿巴人（Baaba）进攻雅温得。桑巴将进攻的事情告诉摩根。必须再次以武器回击武器，以火烧其他村庄来回击哨所周围的大火。

7月底出发去恩日拉。在那里摩根和韦勒遇到了新的麻烦：恩日拉酋长的拖延，建立贸易关系的困难，等等。接着，摩根尽管不情愿，但仍被用作雇佣兵反对巴蒂人，而且在围攻恩加代尔（Ngader）时受了伤，然后逃离恩日拉。因为虽然他患慢性痢疾，使他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仍试图实现他的宏大志向，即成为使巴唐加海边和中部喀麦隆地区，尤其是和蒂巴蒂（Tibati）与巴尼奥（Banyo）相沟通的一个人。同他在恩日拉分手重返雅

温得的韦勒回到杜阿拉后宣布，不要再指望重见这支远征队了……因为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可能是发疯和垂死的白人仅仅和少数同样是外来的非洲人一起深入陌生的土地。

事实上，摩根和桑巴一起差一点儿被杀死在一个村庄里，而且到达约科（Yoko）后，摩根感到病得很厉害，认为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并在1890年11月1日写下了遗嘱。这一天是他32岁生日。他瘦得皮包骨，人们用吊床抬着他。大约12月中，他只把自己托付给尊贵的蒂巴蒂的拉米多。这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得救全寄托于非洲伙伴们的忠实与照料，在他们当中有忠实的桑巴，他对桑巴是非常感激的。

1891年1月1日，他终于到达巴尼奥，并认为他的任务完成了。远征队只要翻过山就会发现“尼日尔皇家公司”所属的领地。该公司用船将远征队一直送回到拉各斯。桑巴和摩根一起在拉各斯暂住三周，1891年3月11日再返回杜阿拉。在杜阿拉人们十分惊奇地欢迎他们，因为包括总督在内大家都以为他们死了。

至此人们领略了作为模范用人的桑巴的历程和优良品质并给予好评。同时还应指出，桑巴值此之际得到了进一步培养和广博的经验。这不仅是因为他服从了德国人的细心与严格，而且还因为他从18岁起，在他还非常灵活和接受力强的时候，就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同胞更广泛、更千变万化地观察到了社会。桑巴不仅在丛林路上自己遵守纪律并经受炮火的锻炼，不仅学会了同奸诈而狡猾的首长们交涉，而且学会了在陌生人和比他年长的人面前放心大胆地讲话。他曾仔细观察了这些神秘白人的古怪但总之行得通的并常常是有趣的风俗习惯，当时人们把这些白人当作国王或半人半神；然而，对桑巴来说没有一个人是伟人。

另外他还学习了非洲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风俗习惯；恩日拉是非常古怪的军事国家。人数众多的军队，有弓箭手和骑兵，专制的国王，圆形而不再是方形的茅屋，以黍为主的粮食和酒，这一切使离开森林的男孩在那里生活很不习惯。而在蒂巴蒂的拉米



多那里，也完全是另一块天地，有丰富多采的衣服和手工业，私人围起来的广阔土地，里面隐居着高贵妇女，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组织，使用的文字（阿拉伯文），过分考虑的举止……桑巴为了了解这些情况，他处在看得最清楚的地位，因为他陪伴着主人，当主人礼节性拜访年轻的拉米多哈曼·拉穆（Haman Lamou）时，他就坐在主人跟前，当用华丽词藻相互致意和交换技术情报时，由一位豪萨人翻译从富富尔代语（fufuldé）译成皮德然语（pidgin）（反之亦然）。所以桑巴连一次谈话都没有放过，因为他很好地掌握了简化英语，这是当时非洲的真正国际语言。由于懂得这种语言，他可以处处同所有人谈话，不但和港口内和船上的尼日尔公司的职员，而且和拉各斯的任何一个居民谈话。拉各斯这座城市对他和摩根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新发现，它有商店、碎石路、高尔夫球、跑马场、4座基督教堂、27座清真寺等。

据统计，事实上拉各斯在1891年已大约有9万居民：喀麦隆，换句话说杜阿拉还只不过是拉各斯旁边的一个村庄。英国人实行“间接统治”的原则，支持提拔当地的杰出人物。几乎所有的哨所长和尼日尔皇家公司的船长都是非洲人了。自1854年以来，拉各斯的英国国教主教就是一位一致受人尊敬的“当地人”，一位约鲁巴人。

至于摩根，拉各斯的经历只能帮助他仔细考虑一些时候以来的一个计划：对桑巴表示感谢，带他一起去柏林，让他学习受教育。

所以桑巴在自己人家里过了几周后同主人于1891年5月初，乘坐韦尔曼公司的大船，航行了四周，由喀麦隆（杜阿拉）到达了汉堡。到达德国后，被当作英雄受到热烈欢迎的摩根经常出席报告会并要很快结婚，桑巴首先被托付给韦塞尔（Wessel）先生的警卫。前年韦塞尔已经接收了一个11岁的男孩儿通戈（Tongo），他以前是武泰国王的小奴隶。桑巴在学校里跟老师上基础课，在沙恩（Schan）牧师那里学习基督教的教理课，并在小旅店主人

霍夫曼（Hoffmann）先生家里住宿。摩根答应桑巴，只要他会读和会写德语并给他取了教名后，就让他自由。通戈难道不是在15个月中赶上了中等课程并能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吗？

在四个月中，直到当时只讲皮德然语和非洲语言的桑巴能够十分令人满意地掌握了口语德语并学会了正确地书写德语。他只剩下接受洗礼了，每周他都要求在下一个星期日进行洗礼。那后来……后来，既然他已会写德语，就三番五次地给充当他养父的人写信，写感人的请求书：尽管有拉各斯的榜样，但他所希望的是跟着摩根在柏林这座大城市里过简朴生活；他的全部愿望似乎是仍作新婚夫妇的模范用人，仍作仆人。但后来则完全不一样了。

### 勇敢的士兵（1892~1899年）

1891年以来，给桑巴取了马丁-保罗（Martin Paul）的教名后，摩根不愿意再雇他从前的用人了。首先是他不再去陌生的土地冒险寻求意外的收获；在柏林，有一个很好的德国女厨师当然比一个勇敢的翻译更适合摩根夫妇，当时并不缺少用人；此外，新婚夫妇似乎长期居住在岳父家里，摩根可以请长假无忧无虑地写书。但主要的是把桑巴培养成一个杰出的“年轻男仆”对喀麦隆政府有什么用呢？摩根给这个聪明而忠实的男孩儿付出那么多费用当然有其他打算；他只希望桑巴“一步步地”高升并得到培养，以便他象先来德国的几个喀麦隆人中的多数那样不因虚浮的光荣而自高自大。摩根认为，在欧洲对待一个将来要回国的黑人唯一的好方法，是让他到木匠、或裁缝，或鞋匠那里进行严格学徒，以便他将来回国后可以发挥他的能力；一种职业总会保持永久价值……

但选择什么职业呢？摩根让这位经过体验而成熟的年轻人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方向。然而很明显，桑巴非常欣赏这位军官的勇

敢和真实才能，把他当成父亲，即当成榜样：他选择了军队职业。

到军队去！为了锻炼这个男孩儿已表现出的身体耐力，军队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

所以他更加顺从地接受德国训练，并且更加毫无抱怨地忍受严格的训练。他曾经是个理想的用人，他也是个理想的士兵。摩根让他加入了精锐部队：皇家卫队的射手队；他很快被任命为下士，然后被准许在士官培训队受训以成为士官。

从1894年初起，即在柏林军队两年后，因一次意外事件将他召回了喀麦隆。1894年1月4日，当时在法兰克福任部队指挥官的摩根收到首相卡普里维（Caprivi）的一封信，要在柏林召见他。殖民地喀麦隆受到崩溃的威胁，临时总督莱斯特（Leist）营私舞弊，十分令人憎恨，以致达荷美驻军在12月底发生暴动并试图杀死他以及杜阿拉的所有白人；只是由于冯·坎普茨（Von Kamptz）的干预他们才被释放；内地也在骚动；同在12月，冯·格拉文罗伊特（Von Gravenreuth）中尉在包围布埃亚时不久前被不屈服的阿博人（Abo）杀死。怎么办呢？

摩根答应重新控制局势。他曾经主张把当地警察（88人）变成保护部队。问题在于使这支小小的部队得到充实。摩根可以自由选择，招收一名助手，他选择了多米尼克（Dominik）中尉。他和多米尼克一起出发，在埃及招收了由英国人训练的95名杰出的苏丹士兵。他俩路经利比里亚时还招募了70名韦伊人（Vei）。当然，摩根决不会忘记他的老伙伴桑巴；尽快把他安置到从德国派遣的海员射手支队中去，以支持殖民政府和给新建的喀麦隆部队配备干部。

桑巴返回故乡当时对喀麦隆人来说可能并不很重要；当时杜阿拉人只会以蔑视的眼光看待一个声称在文化适应方面同他们竞争的小“布须曼人”。如果说桑巴抵达巴唐加海边带着礼物一直回到亲人家中，那么这位年轻的欧化孤儿不会留下很深刻印象，

而且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对德国力量的叙述。

在德国人那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认为，桑巴返回故乡是一个事件，因为同法国制度进行有意识地对比，他们也希望实行“间接统治”，并依靠当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他们期望喀麦隆形成自己的疆界，并在整个德国帝国内享有同其他国家一样的内部自治。桑巴的成功向他们证明了这一赌注是有道理的；所以一切关于当时的分析都构成了对于一个为其种族争光的人的一片赞扬，“人类最合适的用人”，“值得完全信赖的杰出的士兵和组织模范”，“严格得直至最小细节的军人”。这些称赞同沿海居民的失望形成了对比。因此从桑巴一返回将要成立的保护部队就被任命为军士，仅仅服役了两年半之后的这种任命在德国军队中很可能是晋级最快的记录。

于是人们懂得，被白人而可能只有被白人才认为是有特殊价值的桑巴，样样事情都干，而且肯定还不只如此，以报答他们的期望，并和他们一起共同表现出是现代的和“文明”的杰出人物。他是第一个开始在表面上采取合理态度的人，大部分将追随他的“文明人”都仿效这种态度；后来他也是第一个离开他们的人。

暂时他还表现出热情。他和军械师齐默尔曼(Zimmermann)是两名士官，多米尼克感谢他们俩非常快和非常认真地告诉他这个国家的特点。由于摩根去布埃亚为格拉文罗伊特报仇，年轻的多米尼克和两名特殊助手于1894年5月2日离开武里(Wouri)河边首次出战并了解阿博人火的洗礼。从5月4日起，勇敢的桑巴给他俘虏了一名负责议和的妇女，多米尼克信赖了她的意见。然后他们去“安抚”巴科西人(Bakossi)，桑巴带领30名士兵留下占领并监视该地区几个星期。

1894年7月13日，这三个人和180名“警察”出发去雅温得。奥卡拉·恩特萨马(Okala Ntsama)的接待是热烈而隆重的，许多埃翁多人认出了桑巴并向他致意。部队处处被耽搁，8月9

日才到达哨所。

从1895年5月起，桑巴和多米尼克同时被指派到雅温得，他是多米尼克的翻译和助手。多米尼克很关心给他的助手安排好食宿，而且安排了一个家庭：8月，武泰酋长丹杜古（Dandugu）提供了梅塔（Meta）和马西纳（Massina）两个姑娘以担保和平，她们俩的前途是非常美好的；梅塔嫁给了比姆比亚（Bimbibia）博士并在杜阿拉的非洲社会中起到了第一流的作用；马西纳作为报酬给了桑巴，成为他忠实的妻子和有时作为武泰语的翻译，桑巴从未学习过这种语言。

多米尼克在10月请假走了，只有桑巴同巴尔特希（Bartsch）和拉比顺格（Rabischung）一起来对付12月姆沃格贝特西人（mvogbetsi）的暴动，暴动的风火燃遍了雅温得周围整个地区并危及哨所。多米尼克被紧急叫回，但是冯·坎普茨的残酷镇压造成了后果，1896年4月10日多米尼克返回雅温得时，路过了被烧毁和成为废墟的地区。3月27日，暴动者无条件向冯·坎普茨投降。

5月18日，冯·坎普茨带上桑巴作为向导和翻译再去海边。唯独通加酋长拒绝参加修筑途经其洛洛多尔夫（Lolodorf）至比潘迪领土的雅温得一克里比公路。为此，通加酋长被洛洛多尔夫的哨所长逮捕。通加酋长和他的两个妻子以及3个仆从由以前被鄙视的桑巴带到海边，被关在政府所在地的监狱里，直到公路工程结束。事实上，杜阿拉的景象使他由仇视德国人变为尊敬德国人，他在士兵的监视下可以在杜阿拉随意散步。

桑巴和一队商人一起从海边返回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多米尼克的左膀右臂。1896年8月，是他在巡回中承担了指挥运输工人和分配重量的困难任务；是他以其雄辩的口才毫不费劲地就征服了萨纳加河畔的巴蒂人酋长和姆韦勒人（mvele）酋长；是他帮助主人打了第一头大象；最终还是他穿着当时豪萨式和白人式华丽的彩袍，走在主人前面，侦察草原的路，安排食宿，发现了被武泰国王砍去头的金字塔，带领远征队去恩日拉并在西部

恩古特 (Ngute) 国王陌生的土地上去更远的地方。10月返回后，多米尼克给他建了一所更大的多间房子，同时派他一个人去征服贝尼亚阿达人 (Benyaada)。14天后，贝尼亚阿达人请求和平。然后他参加了对贝内 (bēnē) 大酋长姆巴尔贝科诺 (Mbarbekono) 的征服。12月，他完全放心大胆地接受了新任务：陪同从喀麦隆北部来的要去克里比观看大海的第一批豪萨商人，并带回要观看雅温得的第一个德国总督。

桑巴23岁时几乎有将近10年只同欧洲人在一起，度过了青春的瑰丽多采和非常重要的时期；他想比欧洲人“更白”：当多米尼克问他恩古特的兄弟担任什么具体职务时，桑巴脱口说出柏林广场指挥官的专有名。他本人由于增加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难道不能保证出色地起到一个德国士官的全部作用吗？要赶上他的父亲与他的榜样多米尼克（摩根不在，出发去远处时），他缺少什么呢？皮肤；这仅仅是皮肤问题。

于是，桑巴向柏林的化妆品制造商定购了脂粉、香粉和发腊——他也是那里第一个使用化妆品的人。但是所有布鲁青年人在他们入教时，作为摆脱人境的神，不是从头到脚自己抹上发白的高岭土吗？从克里比带回这些白粉的桑巴没发现开始使用白粉比组织欢迎总督的检阅有什么更好的了……因此，他希望通过这种确实的同化迹象使他的上级非常高兴，并更进一步受到他们的器重。

多米尼克想利用总督的到来结束强大的恩日拉，尽管恩日拉多次许诺，但仍继续奴役南方居民并烧毁他们的村庄。1月21日，由总督、两名军官、齐默尔曼带着机枪、桑巴和76名优秀士兵组成的一支队伍开始行动。当普特卡默 (Puttkamer) 同16名随从和冯·卡纳普留下来在萨纳加河附近打猎时，其他人在25日到达武泰人城，一直进到中央广场。突然有1000多名兵士把他们包围起来屠杀。

有60名士兵在王宫大门口走投无路，他们破门而入宫内躲

避：宫内无人，国王在远处。多米尼克、齐默尔曼和桑巴拔出手枪，决定使敌人大受损失而后死。他们的12个人倒下了，桑巴也中了一支箭。三分钟后人们惊呆了！多米尼克发现桑巴站在他旁边，肚子上插着箭，淌着血，但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齐默尔曼已架好机枪准备扫射时，局面扭转了：武泰人逃跑了，其中有153人就地被杀死，全城一片火海，浓烟滚滚。桑巴答应放下武器，做外科手术并被捆在马上。三天后，28日，他再次陪同齐默尔曼和40名士兵一起去占领武泰人用于控制萨纳加河的两个工事。

就这样，勇敢的士官一直到当兵结束，大约有五年时间（1894～1899年）。1897年10月，他同冯·卡纳普中尉和一支远征队从雅温得出发去东部，行走82天后到达法国的卡尔诺（Carnot）哨所（在目前的中非帝国）。他们受到行政长官布洛梅（Blomé）极其热烈的欢迎。12月10日，桑巴再次作为前卫被派往雅温得；当法国20人的护送队在当时的贝尔图阿（Bertoua）边境哨所返回时，这一小队人很快被马卡人（Maka）包围，他们俘虏了一名迟到的士兵；桑巴单枪匹马杀死了一个进犯者并驱散了其他人。

1898年3月20日，多米尼克在雅温得又见到了忠实的齐默尔曼和桑巴。他们再次向快要渡过萨纳加河的恩日拉发动进攻。6月14日，桑巴第一个进攻瓦塔雷（Wataré）城，杀死了守卫城门的武装士兵。9月1日，他独自同15名士兵渡过萨纳加河，从后面袭击巴特尚加人（Batchenga）。此后，桑巴领来了150名新兵，就地在雅温得为武泰-阿达马瓦远征队进行训练。1899年1月12日，有650名士兵和13名欧洲干部的远征队离开了哨所。这支真正的军队要在2月和3月利用自动武器打败并最终征服武泰国王和蒂巴蒂的拉米多。但是桑巴军士放弃了这次作战：他留在哨所收拾东西准备动身，由于他得了关节炎，要离开军队了，多米尼克感到非常伤心……

他患关节炎就离开军队这说得通吗？当然这样决定还有其他因素。

桑巴在远征队中又找到了他的朋友穆萨 (Musa) 军士。两年多来，冯·坎普茨几乎不断地对布鲁人作战；穆萨亲自去“安抚”桑巴的本土阿科克地区，1898年4月25日，在恩科马卡克 (Nkomakak)，耶梅耶马人不得不接受司令官要求修筑公路和提供劳力的令人感到耻辱的条件。德国人10年前自以为是和平占领的整个南部地区持续发生动乱。1897年秋天，齐默尔曼在贝内人地区严重受伤。耶梅耶马人在准备报复——布鲁人全部动员起来屠杀或赶走克里比的白人，布鲁人的这次进攻几乎获得全胜，但造成了1900年的长期血腥镇压。即使德国人在这方面尽量避免让桑巴卷入，但桑巴很难再成为那些向其最亲近的兄弟开火的人的“客观盟友”。

另一个、更多的是个人原因也可能起了作用：桑巴作为军士，是他在军队中可能达到的“最大前程”，而且被认为是达到了顶点。在德国直至今日，短期培训（小学）的人与受过长期教育（中学和大学）的人之间有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寻常的齐默尔曼本人，大家都称赞他的判断力、智慧和经验，他会写书，1918年由于他的英雄主义而成为整个德国军队中在战场上获得最高勋章的士兵，但从来没有晋升为军官。

传说认为桑巴则相反。在居民们看来，当然是他颇有权威地指挥了部队的训练与行动，而军官们则是看着，并按多米尼克的说法，则只是很少介入，因为桑巴是无与伦比的：任何白人都不能使非洲甚至外国士兵敬服，也不能训练他们。此外，桑巴与欧洲人相反，能持续发烧而从不病倒……

1899年，他的“关节炎”使他过上了平淡的百姓生活。他开始在兰达尔 (Randal) 和施泰恩 (Stein) 公司服务，并希望实现小时候对大巴唐加海滨抱有的愿望：成为代理商行的经理。



## 从自主到暴动和神化（1899～1914年）

1901年2月27日，当齐默尔曼及其随从暂住南加·埃博戈（Nanga Ebogo）那里以感动他不屈服的邻居西梅科阿（Simekoa）时，他们看见一位气喘吁吁的、在呼救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面前。齐默尔曼认出是他的老伙伴桑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898年，桑巴军士曾陪同多米尼克去过当时独立的西梅科阿那里。西梅科阿上了保护国条约（表面上平等签署的）的圈套，而且答应在他的领域内保证人员和商品自由流通。因此1899年桑巴就大胆地在那里作为批发商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代理商行，由于种种原因代理商行很快就兴隆起来：那里的人讲的方言与布鲁语差不多，而且马西纳也懂得武泰人买主讲的话；桑巴在那里事实上是独家经营，而且在这个任何白人无人护送不敢冒险的危险地区对其主人来说是独立的。

但是，按照传统，享有财富是酋长的特权，而西梅科阿很快就对新来的人的财富感到不快。何况受过德国式训练并清楚地知道自己价值的桑巴既傲慢又出风头。他同西梅科阿相互蛮横无礼，接着是相互威胁，因此他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并马上想到会看见他的商店被酋长的士兵抢劫。这种局面难以忍受：桑巴的力量只是德国部队的力量，所以他去请求德国部队保护他能搬迁。第二天他就动手干。他让80名运输工人在齐默尔曼的掩护下装运他的财产和商品，然后齐默尔曼烧毁了村庄。接着，桑巴在军队护送下抵达雅温得，3月4日齐默尔曼到达。

1902年，桑巴又定居在奥拉马（Olama）；他在兰达尔和施泰恩公司的配合下，在战略上选择了一个理想的贸易场所，即一个几千名运输工人必须停下来等待尼翁河上渡船的地点，这几千名运输工人通过唯一的联系道路和当时使用的唯一运输方式不断

地往返于雅温得与海边之间。桑巴在那里住了10年。

他搞批发业务坚持不懈。他在奥拉马周围建立了许多分行，并经常去分行光顾。他的勇敢、战功、权力和学识使他当时在贝蒂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并在所有贸易中处于实力地位。他以非洲方式发家致富，这首先是说，除马西纳之外，还有其他妻子：一个马兰巴女人（Malimba），一个埃翁多女人，两个马卡（Maka）姑娘……；然后是桑巴积累了财产。他按照炫耀消费的原则，胡乱地订购了德国目录上和最好商行中的所有商品：银餐具、大妇女时装店的衣服、烈酒等等。对于差点儿离婚的妻子来说，他要求穿上和德国女皇的一样漂亮和一样贵重的连衣裙。有一天，他的一家商店着了火，欧洲人目击者估计他当时的损失大约有2万金马克。

但是他的性格变得尖刻：他抱怨挣钱太少了，抱怨住在丛林中感到不舒服，惋惜过去在欧洲“祖国”的大好时光。他经常去找他在雅温得时叫的“多米尼克爸爸”，向他诉说他的困难，但多米尼克却向亨内曼（Hennemann）神甫说，他觉得亲爱的桑巴由于认为妖术和其他传统信仰很重要，已成为一个纯粹的“布须曼人”，一个真正的森林儿子。实际上，有一天他促使邻居天主教小学教师海因里希·恰拉（Heinrich Tsala）和他一起祭献了一头公山羊。

然而他丝毫没有失去他在很大程度上对依赖欧洲文化的自豪感：他继续唱德国爱国赞歌，指责奥拉马的新教讲授教理者不准确地引用“圣经”故事中的细节，一天，小学教师恰拉用“你”称呼给他写信，桑巴把信退回要求他称呼桑巴“您”。

但是历史在很快地发展，而洞察力很强的人已体会到这一点。摩根1907年在喀麦隆进行私人旅行，桑巴肯定再次见到了他过去的主人。然而正是在这次旅行返回后，并可能在桑巴身上感觉有了变化，摩根在1907年的“德国殖民日志”中关于喀麦隆人写道：“他们学习了欧洲学校、学科和训练中的长处，但也学会

了白人的弱点。他们认为白人不再是半人半神，而是人类中的普通人。”前年，记者赛德尔（Seidel）在他的喀麦隆百科全书中就已经深刻领会并提出，喀麦隆人越是受到德国人的教育，就越是摆脱德国人的控制……

1910年多米尼克的突然死亡对桑巴来说肯定是一种打击，而且是觉醒的原因。客观上他很失望：他离开军队后不久，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取代他给多米尼克当翻译和管家；这位夏尔·阿唐加纳（Charles Atangana）出生于雅温得本地，能够起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并即将成为整个地区的最高酋长。然而，他是否对德国人表现出了类似于桑巴那样的忠诚和英雄气概呢？1896年，向多米尼克介绍阿唐加纳并教给他为白人服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桑巴自己。为什么桑巴不在自己的布鲁地区被选定起类似的或超过其从前部下的作用呢？首先，他如同阿唐加纳一样，想成为传统法庭的庭长，然后……但是，摩根的远离和多米尼克的去世使他失去了保护人。

在这个非洲地区，如果财富不直接发挥力量，它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桑巴很容易地放弃了其唯一好处是获得利润的职业；他结束了同他所属商会的合同，并在1912年初以私人名义和他的家庭定居在埃博洛瓦（Ebolowa）。可惜他的愿望没有得到埃博洛瓦哨所长贡特尔·冯·哈根（Gunther Von Hagen）的反响，他是一位聪明的军官，但以残酷甚至暴虐闻名。例如，他活埋了不服他的人……所以他引起了居民的强烈不满。

桑巴于是懂得，他唯一能有朝一日当上最高酋长的机会，是站在一直在布鲁人当中酝酿的不满的最前面：他们同埃翁多人不一样，25年来他们一直渴望摆脱白人，在埃翁多人那里，1914年初，精明的阿唐加纳从德国回来后就当上了最高酋长。

人们说，桑巴于是与杜阿拉人合作，秘密地进口了武器，并在丛林中训练地下民兵。在他家中，他和恩科马卡克酋长埃丹代·姆比塔（Edandé Mbita）、地方讲授教理者阿萨科·恩纳姆（As-

sako Nnam) 以及靠近埃富兰 (Efoulan) 的美洲长老会教会的小学教师姆巴·埃纳姆 (Mba Enam) 共同密谋。这些人可能还和一向同白人为敌的克里比老国王马多拉取得联系，并可能通过他和杜阿拉·曼加·贝尔 (Duala Manga Bell) 也取得了联系。

冯·哈根非常了解布鲁人并有他的密探；他肯定在监视桑巴。桑巴曾和他谈判，争论了他的一次判决的合法性，为此桑巴曾被关了几天监狱。阴谋很快被发现了。

1914年8月1日，密谋者都被逮捕了。在桑巴家里发现了文人姆巴·埃纳姆激昂的信件。姆巴·埃纳姆答应桑巴，一旦他用武力把白人赶走或屠杀，就在桑巴头上放一顶花冠并给他征服许多居民。1914年8月2日在宣战的冲击下召开的法庭面前，这些信件就是起诉的物证；同法国人和英国人已建立了联系；和敌人串通好……请示柏林是没有用的！

1914年8月8日当天，他们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亲王杜阿拉·曼加·贝尔在杜阿拉处决，国王马多拉、酋长埃丹代和小学教师姆巴·埃纳姆在克里比处决，最后桑巴在埃博洛瓦处决。但是其他人都是被吊死的，而最后一个被看作是叛徒，不过又是德国军队的士官，受优待在城市附近的门多奥 (Mendo'o) 军事打靶场上被枪决。

这就是结局。这就是光荣。因为这次事件起到了电休克的作用，使一位精神失常的空想家猛然恢复对现实的意识。对欧洲人来说，终于这样杀死了一位模范的殖民地的人则完全是反常现象；大多数人都指责冯·哈根和惊恐万状的德国政府。因为制度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德国的子弹打倒了日耳曼化的桑巴时，正是殖民主义本身在自己射击自己。

对喀麦隆人来说，同样被惊呆了。桑巴难道不是第一个“帕胡安”，其种族中第一个读和写德语的人吗？在外国人和为外国人的战争中难道他不是一位英雄？难道他在知识、军事和经济方面

没有威望？他只是缺少受将奖赏。他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奖赏，即权力，但却得到了一个更长久的奖赏：殉难，它使这个难以理解的孩子不再成为一般的知名人士，而是成为一个半人半神。

他肯定死得非常勇敢——他不是有多次面对过死亡吗？人们说他要求穿上他最漂亮的军服、带上白手套、手杖、一块洁白的手帕，并拒绝用布蒙住眼睛。他甚至还可能指挥了开枪。

他刚一死就立刻出现了全是关于他的传说和神话。这种转变，这种改观是值得研究的。这里我们严格地遵循历史。但是在喀麦隆，神化已和桑巴紧紧连在一起，甚至在被称作科学的工作中，人们使他在当时尚不存在的历史—社会方面提高威望；这就是总督把他作为酋长的儿子派往德国，他在德国纪尧姆二世的皇宫里受到接见；皇帝成为他的朋友并任命他为上校和喀麦隆总督；在返回的旅途中他对任命他为总督难以捉摸，但他还是在杜阿拉受到了非常体面的接见。他建筑了恩孔桑巴（Nkongsamba）城。然后有一天，他当着普特卡默的面践踏他的军服并最终去汇合他的兄弟们。他被处决的那天，子弹从他身上离开了，因为他的护符手帕使他防弹。于是他母亲来恳求他让人杀死；如果没有他的牺牲，喀麦隆就会在进步的道路上停下来；因此桑巴让手帕掉了下去……

不管怎样，他不知不觉地取得了胜利：他超过了夏尔·阿唐加纳和他在当地的名望，因为通过他的牺牲他成为全体人民确认的暴动标志。“桑巴，我们哀悼你！”喀麦隆这样著名的赞歌和丰富的民间文学证明，人们正是依照最悠久的非洲传统来重新赞美他先驱教官的命运。桑巴如同他渴望的那样，确实变成了不同于欧洲人、但更超过他们的“白人”，按照他国家的信仰，关于这个超自然的、令人赞叹的白人已成为先辈和神中的一员。

（吴增田 摘译）

## 恩儒瓦亚：一位巴蒙素丹的 改革与反殖斗争

1907年，巴勒（Bâle）出版的一份教会杂志传出一条新闻，喀麦隆巴蒙（Bamoun）人山区小王国的年轻国王恩儒瓦亚发明了一种文字。这个王国位于西邻阿达马瓦（Adamawa）山脊的群山高地，是草原高原上许多王国中的一个，德国人称这些王国为“牧场地区”。若干年中，巴蒙王国在德国人思想中几乎是神话。19世纪末，占领者把第一个高山哨所建在一个小国首府巴里（Bali）。这个小国距巴蒙国只有几十公里。巴蒙人并不是不知道有白人，但他们并不想让白人来。只是在1902年，一位给一家同喀麦隆北部进行贸易的公司工作的名叫拉姆赛的上尉来巴尼奥（Banyo）时到达了巴蒙首府并会见了恩儒瓦亚（Njoya）。

### 传说中的历史

在王国中部因砍伐树木而变得干旱的地区竖立着富姆班（Foumban）城，周围有20公里的护城墙，城墙前面的开阔地里有壕沟和捕马器。恩儒瓦亚很有分寸地接待了那位欧洲客人。在王宫，国王让战士们保持谨慎冷静，他们不容许有人带着武器进入城市。国王曾梦想德国人和巴蒙人能彼此合作。恩儒瓦亚对外国人的力量心中有数，早几年外国人曾在邻国显示过自己。双方建立了友好联系。翌年，一个镶着珍珠的豪华宝座，即在位国王父亲的宝座被一直运到了喀麦隆首府布埃亚（Buea），以送给德国皇帝。客人们相继来到富姆班：有军人、商人、传教士、学者。客人们受到

年轻君主的亲切接待。年轻君主在25~30岁之间，他和客人们谈话，让他们消遣，使他们十分满意并可能让人一直护送他们到边境。这个手工业繁荣、国王会写字、男人以英勇和女人以贤惠而出名的偏僻山城出现了传说：在德国人笔下有“小巴黎”之称。

这只是个大概情况。恩儒瓦亚很快要发展棉花种植，试图引进欧洲谷物大麦和小麦，改革政府，搞身分登记，记录法院的审判，一切都用巴蒙文字书写。要叙述王国的历史，拟订王国的习惯法。国王将在所有方面进行革新。国王的坦率、正直使他赢得了无以伦比的声誉。

1915年德国人离开后，王国建立了许多学校。恩儒瓦亚最后制定了近似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同时，王国的地图已完成，编写历史已定稿。

然而，国王还要接受政治上的考验：先是英国人后是法国人接替了德国人，他很快就和法国人发生冲突。新占领者认为，进步而有才干的君主只不过是骄横的暴君，黑人独裁者。他的事业被诋毁或被蔑视；1925年，他的政权被推翻；1931年，他被流放到雅温得，1933年在那里死去。

今天关于恩儒瓦亚的传说有些模糊不清。他的英雄行为不被人知晓：他的名字主要和发明文字联在一起，他个人的不为人知的死亡标志着历史的不公正。对比德国人和法国人对他的描绘令人困惑不解。不论在哪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出发，而不是从占领者的看法和国王存在的问题出发，才能试图理解他的事业的意义和政治作用并领会其事业的重要性。

### 王国最初几世纪的历史

很可能在17世纪，或许更早一些，从位于姆巴姆河（Mbam）上游河谷的里富姆（Rifum）“蒂卡尔”（tikar）小王国来的一群移民最后在姆巴姆河与其支流努恩河（Noun）之间的高原东部

边缘定居。他们在高原上逐渐征服了所遇到的18个小国；其中被征服的姆贝恩人（Mbèn）酋长居住的村庄变成了新王国的首府。巴蒙人在“姆贝恩人废墟上”安家落户。首府富姆班仍是今天巴蒙州首府的正式称呼。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曾经领导过移民的恩沙莱（Nsha/rě）成为刚建立的王国的国王。他恢复了原先国家的传统，在他周围有两组7个有名望的显贵（王国顾问）。国家制定了根本法，解决国王、王国顾问和其他居民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有关继承王位的习惯做法：由在位国王指定的儿子继承王位。王国建立起来了，面积有300~400平方公里。这个社会的构成有恩沙莱、他的同伴、一些归顺的成员，每个成员都产生一个父系家族，还有被征服的小王国，他们留在当地，但从属于巴蒙国王。

从王国建立到19世纪初，有10个君主先后继承王位。王国社会发展了，被征服的国土住满了居民；每个国王的儿子和重要奴仆成年时，都得到一块土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建立父系家族。但是王国的国土没有任何扩大，9个继位者中的8个君主毫无作为，他们依靠“恩沙莱用双手立下的家业”维持生活。随着19世纪的发展，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第12位国王姆布翁布奥（Mbuombuo）在19世纪20年代统治了王国。

### 巴蒙王国的扩张

库奥图（Kuo/tu）国王之后姆布翁布奥国王继位。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用鲜血和武器奠定王国的边界。战争，这就是我干的事情。

国王的政策符合人们对他的期望。他把王国边界从姆巴姆河移到努恩河，使国家的面积增加了20倍。巴蒙战士征服或赶跑了63种居民。王国的居民人数很可能增加了3倍。

王国征服的土地被划分成农庄，安顿俘虏开垦。然后再把这



些农庄交给国王要奖赏或聘用的公社酋长，或者由国王自己留用。一些被征服的居民留在王宫伺候国王；这种新人员中的一部分加入了重要奴仆的行列，得到一块土地并建立家族。按照传统，这些家族都建在王宫周围。从被征服国家来的手工业者定居在王宅附近。由壕沟限定的地方住满了居民，富姆班开始形成城市。

富姆班的一部分居民从此由农庄供应粮食，而族长们都忙于管理自己的家产，经常往来于王宫和忙于打仗；另一部分居民直接伺候国王并由王宫养活，王宫拥有国王保留的土地。所有这些居民再加上手工业者都按不同方式由农村供应粮食。巴蒙人将锄头抛弃了。

在这种变化的同时出现了缺粮现象。粮食时有时缺并不是新现象，但在城市化运动后可能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反应。移居逐渐使经济恢复平衡；属于城市家族的男系亲属离开城市去没有奴隶的农庄定居。另外，战争在巴蒙社会中成为固定的事情。每年旱季，由各家族成员组成的巴蒙军队出征攻击邻近的居民以捕捉战俘，然后利用战俘来扩充农庄的劳动力。巴蒙政治生活在姆布翁布奥统治下出现的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欧洲人到来。

这些事实使人懂得，从姆布翁布奥起，巴蒙社会开始分化；从此以后这个社会一方面包括大批奴隶，这是打胜仗的产物，奴隶总是可以转让并通过所有权关系附属于他们的主人，另一方面包括王子和重要奴仆的后代，自建立王国以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其中男系亲属根据规定则不能转让。

由缔造国王或以后继位国王分配的土地属家族所有；一些政治上的正式任职在这些家族中世代相传并且由族长担任。族长直接属国王管辖。

简短回顾巴蒙社会的变化可使我们提及姆布翁布奥统治末期和恩儒瓦亚统治初期出现的政治斗争，那么，恩儒瓦亚开始统治时的整个社会政治背景也就明确了。

## 19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变迁

姆布翁布奥的统治在混乱中结束；生病国王的儿子们自相残杀以消灭一些继位的人；王宫的奴仆们介入，将他们杀死，卫队长乘机强占了老国王的所有妻子，把他们分给他的伙伴以激发他们的勇气。一位出众的幸存王子格贝特恩科姆（Gbètnkom）被扶上王位。几年后，奴仆们因害怕王子惩办那些占有其父妻子的人而将他暗杀；他的年轻儿子接替了他，由于同样原因也很快被人杀死。曾经杀死了王子们的王宫卫队长恩古乌奥（Nguwuò）夺取了政权。姆布翁布奥女儿的儿子恩萨恩古（Nsa'ngu）王子，在国王农庄支持者的帮助下恢复了王国的权利。当时是19世纪60年代。恩萨恩古统治了15~20年。后来王国内部发生冲突导致其统治结束。

恩萨恩古冒险成功使他掌握了政权，但他的同母异父兄弟们按其出身同他一样也有权行使权利。在一次冲突事件中，他中弹受伤，险些丧生，当时人们以为他处于昏迷状态，这使恩萨恩古认识到，他的一个兄弟正在采取措施要接替他。这是在公开违犯排除在位君主的兄弟继位的惯例。

恩萨恩古恢复了合法政权，忠于传统，决定最终排除对合法继位的所有威胁。同邻近的班索（Banso）王国的一场战争提供了这种机会。国王指挥了所有巴蒙贵族首领参加远征。国王的一位奴仆在战斗中杀死了国王的兄弟，国王兄弟的一位奴仆看到这种情况后打伤了已被敌人包围的恩萨恩古。最后，国王、他的所有兄弟和巴蒙精兵全部战死。这场悲剧后开始了未成年的恩儒瓦亚的统治，恩萨恩古去打仗前就已准备指定他作为继承人。

## 19世纪末的巴蒙社会

恩儒瓦亚即将统治的巴蒙社会在19世纪最后十年的状况怎样呢？国王拥有什么权利呢？这些问题值得先考虑，然后再研究恩儒瓦亚在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

恩儒瓦亚登基时，巴蒙的国土从努恩河延伸到马佩河（Mape）和姆巴姆河，面积为7000~8000平方公里，这使它成为山区的最大国家，它的6万居民也很可能使其成为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居民的一半集中在国家中部的狭小地区，即大约400平方公里；另外，2/3的中部居民近2万人生活在首府。有几百所建筑物的王宫与国王妻子的住宅和大约400个家族的男系亲属的村庄及其附属的奴隶劳力占据了该城市的土地。该城市是政治首府，同时又是手工业中心和贸易市场。

在首府周围的王国中部其他地区住着大约1万居民，组成了200多个家族，穿过这个地区后就是专门的农庄区，由奴隶和移民经营，移民们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宁愿选择去农村生活，而不愿意过困难的城市生活。

巴蒙社会的构成：国王居第一并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这个社会中心体的近百个家族都出自于国王和国王前任的家世，这些家族按其创始人的出身分成血统贵族或王宫贵族。

国王同所有族长保持特殊关系；他对每个族长来说都是父亲的象征，这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居民和国王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任何权利最终都不会反对国王自己。国王家世代表着髓质，它产生了所有社会细胞。

另外国王家世的权利很广泛。巴蒙国王对全部王国国土行使土地分配权和土地收回权。只有国王同辈、王国顾问的土地才受豁免权保护。国王支配所有战利品；所以他把土地、妇女、奴仆分配给那些他安排职务或奖赏的人。农庄按经营人数的比例每年向国

王交纳捐税，这些捐税可在缺粮时用于养活居民。大量财富进了王宫，然后再从王宫重新分配。另外，国王还是审判官，掌握着生杀大权。最后，他自己行使国王祖先祭司的职权。更概括地说，国王是一切法律的起源。

在国王统治周围有6名王宫高级军官，其中3名出身王室，另外3名是可信赖的重要奴仆。19世纪末，这些军官似乎比以前不懂得保卫王国的王国顾问更加重要。所有族长都直接服从国王，除建立家族组织外，没有本土保卫组织。巴蒙社会象是个国王领导下的庞大家族，国王担当经济、司法和宗教上的多种职务。然而他仍然代表一个家族，在违背习俗的情况下，他可以被高级法院审判，该法院存在本身确保国家超越国王本人。

### 统治初期的危难

恩儒瓦亚成为国王时尚未达到结婚年龄；他可以执政，但必须等有了第一个孩子才能进行统治。在等待的几年中，他母亲恩雅普登克（Njapdumke）和王宫第一位高级军官格贝特恩科姆·恩多姆布奥（Gbètnkom Ndombuo'）一起执政。他们的政策没有脱离传统，经常对邻国进行远征。但格贝特恩科姆·恩多姆布奥进行敲诈勒索给这一时期投下了阴影。他有时也逮捕国王的妻子并将她们杀掉，借口是她们阴谋让自己的儿子作国王。

恩儒瓦亚大约19岁时可以进行统治了，当时是1892年至1896年之间。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疏远王宫第一位高级军官而亲自选择一位军官。结果没有实现；被疏远的格贝特恩科姆从他隐居的农村策动起义反对国王，而支持恩儒瓦亚的兄弟。当时斗争持续了两年。分裂者控制了城市粮食供应的来源；饥饿对国王起到反对作用，城里人到农村参加了对立面的行列。年轻的恩儒瓦亚做出了众人不赞成的决定：他请求距王国北部200公里的巴尼奥（Banyo）的柏尔人（Peul）帮助。为对付一部分奴仆与王子的

背叛，在国王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巴尼奥的柏尔人决定支援国王。不久后，柏尔骑兵队开向巴蒙王国并到达分裂者的地区。穆斯林教徒祈祷真主后发动攻击打败了格贝特恩科姆的人。柏尔人得到年轻国王的礼物酬谢后返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次干预产生了结果；由于这次干预，开始了整个统治时期对外开放的时代。

“骑兵队的胜利”给巴蒙目击者和国王以深刻印象。年轻的巴蒙国王从传统和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其政权是不稳定的，决定给胜利者装备有力武器。他决定组织骑兵队，并请求巴尼奥给他派伊斯兰教隐士教他伊斯兰教。这第一次转变的原因完全在于传统，国王希望掌握宗教仪式，他认为这比巴蒙战士准备战斗的习惯做法更有效。

国王的计划实现了，王宫里的人学习祷告并庆祝了第一个斋月。当时伊斯兰教被严格地限于国家的政治中心王宫。它首先被当作力量的源泉。不过，国王还从北部购买了马匹，让战士们学习使用。巴蒙人在19世纪最后几年取得了一些远征的胜利，而且内部暴乱也减少了。

最后，从19世纪末起出现了第三个创举，恩儒瓦亚看到了《古兰经》，希望拥有本国的一种文字，但这种文字从邻国那里借不来，国王也并不依靠邻国。国王梦见一个人命令他拿一块小木板，在上面画一只手，然后把画洗去并将水喝掉。第二天，国王象梦中指点他的那样拿了一块小木板，在上面画了一只人手，把木板洗了并喝了洗木板的水。国王叫来许多人，向他们说：如果你们画许多不同的东西并给他们起名，我就将做成一本会说话但无声音的书。人们回答说，尽管我们做，但不会成功。国王又说，假如你们动脑筋想一想，是会成功的。

不久后，人们把画的东西交给了国王。国王自己进行试验。国王试了5次，力图获得结果，但都枉然；第六次尝试成功，文字发明了。

这是发明文字的起点，几年后，恩儒瓦亚的发明赢得了特别声誉。这种文字总共要画500多个符号，其中许多符号和一些真正图画文字所代表的字相符；这可以使恩儒瓦亚同他周围熟悉这种新联系方法的几个特权者进行联系。人们可以用木炭和植物汁在小木板上写字。

这种文字发明后有什么用途呢？恩儒瓦亚说，这种文字用于讲话而听不见声音，换句话说，如果信件不被拦截，可用于联系。口头传递消息除可能泄密外，还冒有危险。采用文字将能消除一切曲解的可能性。使用文字和伊斯兰教一样仅限于国王。

革新的潮流并未停止，同时人们也在发生转变，人们放弃了用树皮或棉布简单缠腰的传统服装，改穿穆斯林教徒宽大的缝合服装。这些服装先是向豪萨商人购买，后来恩儒瓦亚从北方弄来织布机生产布匹，把布缝合，或染上色和绣上花。不久王宫就有了缝纫作坊和染坊。在巴蒙手工业中出现了裁缝业。

巴蒙王国从历史初期以来就有铁匠，分布在王国各地，制造农具和武器；铁是从邻国进口的，或是回收的废旧金属。恩儒瓦亚要结束这种依赖，在王宫附近建立了一座烧木炭的高炉，加工提炼当地的铁矿砂。

恩儒瓦亚在进行这一系列创举时很可能不到25岁；他刚刚成熟几年，就面对周围不信任而敌对的军官，决定请求外国援助，挽救了政权，为国家确定了伊斯兰教的方向，并以创造文字的成就载入人类重要成果的光荣史册。同时一些规模不大的仿效的东西也变革了巴蒙的手工业。总起来说，一位年轻人对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政治困难很难不做出反应。他所选择的解决办法不管怎样都表明了他在政治方面的非凡勇敢和卓越智慧。

### **恩儒瓦亚统治的伟大年代**

恩儒瓦亚对技术和对欧洲人的经济计划非常关心，使德国人

很快就对他表示很大信任。当1903年希尔特勒（Hirtler）中尉去富姆班提出德国人想把铁路从杜阿拉一直修到该城时，恩儒瓦亚非常具体地提出在铁路穿越的分散居民中可能有些困难；至于他，他将帮助修建铁路。在巴勒（Bâle）教会代表几次访问之后，他同意在富姆班建立一个停留站和开办一所学校。国王关心的首先是开办学校。德国人在富姆班从未建立行政部门，但一些欧洲商人却住在那里，而且一位德国牧师在1906年建立了一个巴勒教会停留站。国王原希望开办一所容纳300名学生的学校，但建成的学校规模比较小，只接受60名男女生。为了使客人满意，他把巴蒙的星期减少到7天，使地方日历与基督教日历相一致，以避免市场适逢星期日。

有两件事情还有助于改善德国人与巴蒙人之间的关系。1906年，德国人进攻并打败了恩索人（Nso），使恩儒瓦亚可以收回其父恩萨恩古国王的颅骨，国王是在恩索人战胜巴蒙国王后被监禁的；1908年，恩儒瓦亚去德国人首府布埃亚，受到热烈欢迎，并对种植园和开发喀麦隆南方的情景留下深刻印象。国王将其父亲的宝座送给了德国皇帝。

恩儒瓦亚尽管平常绝大部分时间在王宫里忙于国家的行政和司法事务，但决不是一位闭门不出的国王。他非常关心农业；1908年他在离城几公里的马布埃（Maboue）村庄建立了一个农场，1912年在姆巴姆河边的曼图姆（Mantoum）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种植园，其中有他每年定期来住的住宅。他让人在种植园反复试验，除大麦和小麦外，力图引进欧洲蔬菜和谷物。他努力的结果并不理想，而且未能证实失败的原因究竟是采用的农业方法还是气候和土壤条件造成的。

但是，国王却使传统农业大开放，国家引进了白薯和块茎类以及花生等的新品种。国王从南方旅行返回后要求居民们多植树造林，并在富姆班种满了油棕榈树。引起德国人关注的棉花种植得到了改善。德国人在离首府几公里的恩库蒂（Nkuti）建立了

一个农业试验站。恩儒瓦亚所做的一件特殊事情是改变了土地占有制，对经营了10年种植园的经营者的经营者不能收回任何土地。习惯的改变目的在于鼓励开发国家，这给国王根据政治而不是根据经济分配土地权利的经济带来一定的灵活性。

同时，手工业也在发生变化。教会的一位木匠学习使用锯和刨，这就可以锯成木板，而不象以前那样采用修枝去皮的树干。人们开始制造欧洲式的家具和给房子安上门窗。习惯于自己建房的居民学习制造模子并生产砌墙用的土坯。锥体房顶的四方形住房逐渐被两面房顶的长方形住房所代替。

下面例举的两项成就，都是用当时最巧的技术实现的，有一个叫蒙雅普（Monjap）的人，国王让他建造了一座玉米磨坊，显然，它的效率高于妇女用的石磨。同是这个人，应国王的要求，又建造了一个印刷所。国王在开办这个印刷所之前曾于1913年左右请求德国人建造。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所以国王要求一个手工业者考虑他的计划。这个手工业者成功地用巴蒙人懂得使用的青蜡制造出当时字母包括的大约80个活字。1920年，印刷所已经就绪，但恩儒瓦亚当时被法国政府纠缠，狂怒之下熔化了所有活字。

关于贸易，富姆班对欧洲企业开放。国王在城里开设了一家商店，销售王宫手工业者和国王妻子们制造的产品。另外，“国王的商人”进行长途贩运，在西部购买可乐果，在北部出售。国王生意的收入都存在巴勒教会，教会支付利息。当时一份巴蒙文件明确记载存款有时超过3万马克。

恩儒瓦亚发明文字的最初创举在整个德国占领时期产生了结果；国王及其周围的人努力完善字母表。该字母表经历了6次改革，最后一次简化是在德国人离开的1918年左右；从1911年起，字母表变得容易使用，因为字母符号的数目由起初的500多个简化为80个，其中包括计算符号。文字的使用逐渐发展，而且用国王文字写文章的数目也增加了。



国王设立了一个身分登记处，登记出生、婚姻、少量地方人口统计、出卖人口；还记下王室家法庭的判决，司法部门有了真正的诉讼档案保管室。

几年中，国王意识到开始使用文字的可能性；在他当时开办的学校里普及文字教学。1912年，恩儒瓦亚着手测绘国家地图；他进行了持续52天的远征，记录了2/3国土的地形测量，1920年测量结束。

恩儒瓦亚完成了重要的立法工作；对习俗进行了78条变革，例如，准许巴蒙人穿所想穿的衣服，用金属盘子吃饭，用黄铜烟斗吸烟，带头饰进王宫；那些吃了国王的山羊或拿走国王棕榈林的酒的人不再被判处死刑；可以到国外去旅行，等等。改革取消了王室特权，减轻了处罚习俗，废除了许多规定，过去违反规定要受到极刑惩处。人们自由自在，社会区别的标记被取消了，因此社会秩序井然。

这些不同的事情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德国人受到英国部队紧逼于1915年离开富姆班时，恩儒瓦亚的主要事业并未完成。但是，从掌权时(1892~1896年)到1915年的大约20年间，王国的全部生活显示出国王的创举。喀麦隆最后一届德国总督卡尔·埃贝迈尔(Karl Ebermaier)的评价告诉我们恩儒瓦亚给一位热爱进步的占领者留下的印象：“在我所认识的喀麦隆所有酋长中，他是最有能力、最有智慧和最光明正大的酋长；他发展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给国家带来了繁荣，成为所有人的榜样。”

1915年12月，英国人到达富姆班；1916年5月，法国人接替了英国人。只是从1919年开始，法国的占领才打断了恩儒瓦亚的生活，这一年法国政府同恩儒瓦亚之间发生了冲突。恩儒瓦亚统治的伟大年代，即改革的年代也一直持续到这一年。

1916年是王国历史发生转折的一年。恩儒瓦亚在巴勒教会走后编写了一部受伊斯兰教广泛启发的宗教教义的著作，这部著作的内容在全国发行，俾使伊斯兰教作为王国的国教。在市场的广

场上建立了一座做礼拜的清真寺。

然而恩儒瓦亚教义的传播很快就突然停止了。国王在其周围的人的压力下接受了伊斯兰教公认的教义，他最终也接受了正统的伊斯兰教；1918年这件事得到一致确认。国王可能感到单独成立宗教团体的危险，会成为邻国穆斯林首领敌视的目标。不过恩儒瓦亚国王还是变成了恩儒瓦亚素丹，他不隶属于柏尔人首领或豪萨人首领。

国王利用了传教士离开后出现的空闲时间：在全国建立了王室学校，教学生文字和巴蒙历史。法国人在1918年建立了大约20所学校，上学的既有男孩也有女孩。1918年恩儒瓦亚的奴仆测绘了富姆班城的平面图，1920年绘制完国家地图。1921年巴蒙历史与习俗一书进行最后的重新抄写，但编写著作一直继续到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因为著作中涉及恩儒瓦亚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国王在精神上的事业差不多结束了。

下面是恩儒瓦亚与殖民者之间的最后关系。当1915年末英国军队向德国人占领的巴蒙王国进军时，巴蒙国王帮助了德国人。在这场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战争中，恩儒瓦亚国王给了德国人巨大帮助。他们要求国王向他们提供士兵，国王给他们招募了許多人。不管愿不愿意，他们要什么国王给什么。他们叫国王给他们奴仆、马匹和4000马克的士兵给养。国王不管愿不愿意，这些东西都给了。

英国人的消息实际上表明，在国王“不管愿意不愿意”提供帮助的同时，赶紧向英国人派去了密使：“恩儒瓦亚的使者打着谈判的旗号到达，带着主人的问候，请求我们尽快向富姆班进军。使者带的信件也表明，德国人在离开富姆班，他们已经吊死了一些酋长，而国王也害怕自己出现最坏的情况。”后来德国人的对手由巴蒙人带路，没让敌人发现就越过了努恩河，敌人受挫后撤退了。然后，英国士兵在这个国家受到了客人的待遇。

恩儒瓦亚的行为只会使那些忘记了国王首先是一国之君的人

感到惊奇。实际上他从没有叫来离他几十公里的德国人，后来他承认了殖民权力，但并没有被打败，殖民权力从未在富姆班设立行政部门。他确实很重视德国人，德国人也重视他，但国王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政治方向。当恩儒瓦亚面对欧洲人之间的斗争时，尽力从一种统治过渡到另一种统治，而避免居民流血。所以，这是他作为巴蒙君主的政治行动，同与他无关的争夺保持一定距离。

### 苦难的年代

下面简述恩儒瓦亚统治时期最后年代衰落、流亡和死亡的经过。

从1919年起，国王同法国殖民政府开始发生冲突。同年，富姆班哨所的军官逮捕了素丹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死在监牢，他企图让恩儒瓦亚承担责任，指控他毒死了囚犯。通过军队调查洗刷了分区头目对恩儒瓦亚的所有指控。

恩儒瓦亚“占有财产和人员”，拥有“全国的收入”，是“一位傲慢而淫荡的统治者……一位发明了一种宗教的神权政治的暴君……”；这是出自共和国特派员卡尔德（Carde）笔下的评价。事实上，这些评价与事实并无共同之处。恩儒瓦亚一无所有。相反，按照整个地区非常稳定的传统，他赋予了对国家土地的权利；至于捐税，并未用于国王本人，而是供王宫客人食用和暂时应付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

法国殖民政府采取了反对恩儒瓦亚的措施，打发走了他的一部分妻子和奴仆，减少了捐税。1924年，巴蒙分区的国土被分成附属的行政单位，每个单位服从一位行政长官的领导。同年5月发生事变。素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冲突。大约40名巴蒙人被关押。恩儒瓦亚的传统权利被废除。素丹只有殖民政权授予的职权；共和国特派员希望把他变为殖民化的助手。

从这一天开始，恩儒瓦亚在他姆巴姆河边曼图姆住宅中度过一部分时间。他照管种植园和继续编写“历史”书。由于他与行政长官不和，甚至考虑放弃权力。

恩儒瓦亚正在失去一场不平等的战斗。但是，在斗争年代的初期，他最后采取了唯一产生明显而长远影响的真正的政治主动；从1922年到1923年起，甚至可能更早，他就开始进行系统的伊斯兰教化运动。伊斯兰教隐士到富姆班以外的地方去传教。几年后，这种传布信仰的热忱产生了影响；1929年，法国殖民政府预料到了王国将全部实行伊斯兰教化。当时，法国殖民政府也认为素丹的职位只是有名无实。这种改信宗教是在恩儒瓦亚指使下进行的，是对占领者的报复。根据各种可能，素丹预想到了各种目的；一方面他试图使居民不受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也想维护王国的团结。在他看来，这涉及到宗教团结。由于伊斯兰教不同于他取代的信仰，是把宗教变成首先力求拯救教徒的个人的事情，这一目的就更加重要。

下面是恩儒瓦亚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1931年，行政长官向共和国特派员抱怨恩儒瓦亚的活动。国王拒绝去他在曼图姆的种植园居住。1931年8月3日，他被捕了，后来被转到喀麦隆首都雅温得，被软禁在那里。在他流亡时，有一些信徒、兄弟、儿子和奴仆跟随着他。1933年5月30日，他死在雅温得。

不久后他的棺材运回富姆班时，有一位村民向他的儿子、未来素丹赛杜(Seidou)表示恩儒瓦亚并没有死，而且棺材里什么也没有。他说这些朴实而感人的话是不愿意看见国王遭受普通的命运。

恩儒瓦亚的统治可能持续了大约40年，其中实际统治了30年；这位君主是由非洲传统社会培养出来的，他对这种社会非常了解。在非洲历史中，他是少数在20世纪初就大胆地试图使非洲旧制度世界接触现代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知名人士的榜样。

在这种事业中，第一件事就引人注目，国王亲自参加变革。

恩儒瓦亚不仅了解情况并做出决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和周围的人一起完成计划。19世纪末他已成为骑士，他从事伊斯兰教活动，构思文字，监管种植园，访问手工作坊，到校听课，听传教士传教，参加绘制地图和讲授新宗教教训。国王周围都是王宫军官，但他最终做出决定，而且经常很详细地关心并注视其政策的实施。

恩儒瓦亚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人们回过来思考使其王宫成为黑非洲最辉煌和最出众的王宫之一，并使他得到观察家们的赞赏和憎恨的政策的行为准则，思考这种政策的结果。年轻的恩儒瓦亚是以古老的悲剧结束统治的其父的继承者，不久后他依靠外国帮助拯救了王国。他从柏尔人那里获得了他所认为的他们的威力手段，但是他给这些手段打上了他的关心与才能的标记：伊斯兰教专为王宫；关于文字，他发明了文字符号。由于柏尔人的干预而得到巩固的政权后来由于德国人存在而稳定了。革新的时代继续发展。恩儒瓦亚从来不是军人；他甚至有不易察觉的残疾：他有一只眼是瞎的。那么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国家得到技术，显然，技术象征着财富和威力，而且可以解决一些困难。他的政策有选择：即使温带作物最终不适应当地的耕作制度，但也要通过改善农业，消除贫困；手工业得到一定改进：织布工人变成裁缝，铁匠成为技工，剪材工变成木匠，普通农民当上瓦匠。相比之下，一些惊人创造，玉米面粉厂和印刷所尚没有结果：这些创造对欧洲方法不大有前途。在欧洲人强加给目前喀麦隆领土的文字面前，采用巴蒙文字也维持不住。王室学校终被征服者的学校所取代。

另外，国王也从不直接改革社会；社会制度没发生变化，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德国人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一些风俗习惯被取消了，用死刑惩罚一系列被认为敌视或威胁政权的许多规定的权利减少了。既保守又豁达的国王依然是巴蒙王国非常忠实的捍卫者；他离开了德国人，同英国人周旋，最后与法国人不和并

拒绝让步。他不是德国人所认为的忠实可靠的盟友，更不是法国人所希望他成为的殖民化的助手。

王国的制度被摧毁了，但是这个偏僻山区小国的年轻国王的事业给今天留下了什么呢？从前一座不寻常的王宫建筑和几十页记载着历史与该地区传统的手稿，但还有另一件也完全存在而看不见的东西：在了解上述事实的巴蒙人和非洲人当中留下了这样的感情，别人完成的事情他们也能完成，并且能够接受今天称之为当代主人的挑战，这些当代主人在当时曾是现代世界的主人。

**（吴增田 摘译）**

## 中非独立的预言家——卡尔努

卡尔努 (Karnou) 的真名叫巴尔卡·恩加伊努姆贝 (Barka Ngainoumbey)，大约上个世纪最后10年出生在中非共和国加洛 (Galo) 至阿巴 (Abba) 公路上位于布瓦尔 (Bouar) 和巴布瓦 (Baboua) 之间的一座小村庄塞里-普姆巴 (Seri-Poumba)。其父格巴扬加-恩加南·恩加伊旺 (Gbayanga-Nganan Ngaiwen) 是大名人塞里 (Seri) 周围许多小酋长中的一位。其母出身于纳安 (Nahing) 的酋长家庭，大约1930年去世。

巴尔卡的整个青年时代是在纳安度过的。他和几乎所有格巴亚 (gbaya)、塔利 (tali)、卡雷 (karre) 和帕纳 (pana) 族的青少年一样，也被接受参加了拉比 (Labi) 教派，进了一所可以说与古希腊斯巴达人的旧教育机构相类似的青年训练学校。一般地说，他的儿童和青少年时代是在匿名中度过的。然而他善于打猎，尤其是捕鱼，却引人注目。直到在上桑加 (Haute-Sangha)、布瓦尔-巴布瓦、瓦姆-庞代 (Ouham-Pende) 全部地区和在整个喀麦隆留下深刻痕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尔卡对他的同辈人来说仍是个普通人。但是，从1925~1926年起，他由于受到一些启迪，开始传播一系列主要是反对殖民主义的预言，这使他成为1928与1931年间喀麦隆、中非、刚果人民共和国和乍得边界地区的最伟大人物。

1925~1926年，在殖民帝国主义向黑非洲扩张的最后阶段，包括中央刚果、加蓬、乌班吉-沙里和乍得的法属赤道非洲出现危机形势，很有利于产生预言者和革命运动。卡尔努和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在压迫、侮辱和恐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在近30年中，

该地区居民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野蛮流血事件。

事实上，以过度开发地上地下物产和过分剥削赤道非洲人民为主要基础的法国殖民化的控制和初步尝试最终遭到了失败。

1899年，法国政府建立的类似于旧制度中契约公司的特许公司，享有过分的特权，组织了掠夺经济。它们掠夺的主要产品藤橡胶很快就变得稀少了。赤道非洲的这种产品受到种植园橡胶的竞争和被世界价格变化所左右，赢利越来越少。一些特许公司在经营了十来年之后活动陷于困境。1912年，好几家这样的公司呈报破产。

一般在欧洲各国“不受欢迎的人”中招收的、而常常是前惯犯或寻求冒险的前外籍军团士兵的特许公司代理人在这一地区大肆烧杀。这些代理人借助于也是在因粗暴和残忍而被比属刚果公司和政府部门解雇的前卫兵中挑选的非洲助手，对居民们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行：凶杀、暗杀、酷刑、强奸和诱拐少女和妇女，最后抢劫居民的劳动果实。

运输，即因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而成为必要的人背运输，和人头税也同样引起了敲诈勒索。负责招工的人和征收人头税的士兵采用了和特许公司人员同样的方法。从1899年至1920年，几乎法属赤道非洲整个地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尤其是具有无限权力的桑加—乌班吉林业公司统治下的上桑加地区。

巴尔卡出生的布瓦尔—巴布瓦地区和整个上桑加地区一样，因毗邻德属喀麦隆，不得不集中力量参加1914年与1918年间的战争。仅仅为了供应桑加—喀麦隆纵队的军需，政府在1914~1915年就招收了5000多名运输工，其中1/3全部死亡。法—德战争在赤道非洲多次作战期间，布瓦尔—巴布瓦、上桑加、伊本加（Ibenga）、莫塔巴（Motaba）、利库瓦达（Likouada）草原和恩戈科—桑加（Ngoko-Sangha）地区的农民看到他们的产品被征调，他们的孩子被抓走当运输工和士兵，最后田地荒芜，村庄被烧。

总结最初20年的殖民占领经验清楚地表明，殖民化不会实现



19世纪末理论家们所宣扬的文明事业。相反，它却使一些地区倒退并造成了全面危机。

当时法属赤道非洲整个形势的特点是传统社会瓦解和人口暴跌。在居民中造成真正灾难的是特许公司制度、人头税、士兵和招工的人反复进行血腥镇压、黄热病、昏睡病和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

法属赤道非洲全体居民被视为殖民者和政府的简单劳动工具，他们被剥削、遭侮辱并往往受过精神创伤，放弃了传统的生产活动。殖民化强加的新限制阻碍了农村生产的自由发展。社会瓦解逐渐普遍了。

从殖民化的初步尝试起，大的村庄就开始消失。很重要的丛林居住地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闻所未闻地混居的几种临时居住形式，他们避免点火，好不让招工的人和变为税务机关代理人的士兵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居民逃离了被政府和私人公司蹂躏的地区，而从此宁愿过这种吃野果和采摘其他果品的不稳定生活。农业濒于破产，许多村庄都闹饥荒。

殖民控制的最初20年中，也没有试图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变当地居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政府努力建立镇压制度。几乎所有非洲人都受“土著身分法”的约束，它准许区长未经法院的司法程序，借口一些虚假的而常常难以确定的不法行为，就把当地人投入监狱，例如：扰乱秩序的行为、捏造可以妨碍公共安静的谣言、煽动性言论、侮辱当局胜任的代表、庇护“罪犯”或耕作者、共谋逃跑、隐藏政府追查的分子、进行巫术活动和流浪罪……等等。

1903年5月11日与1922年5月4日下令制定的初步“劳动法”和关于服劳役的法令更强调非洲劳工对殖民者和政府尽义务，而不强调他们作为雇主的责任。私人公司和政府的欧洲代理人的抢劫行为、暴虐与罪恶现象往往受到很轻微的处分。根据十分普遍的而由殖民者竭力辩护的意见，不应该判处白人监禁徒刑，

以不使白人在黑人面前失去威信。

布拉柴维尔上诉法院的法庭判决始终能以诉讼的幌子表明，殖民化的欧洲代理人对指责他们的行为并不真正负责。因此许多罪行依然不受制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级政府意识到殖民化的初步尝试失败了。法属赤道非洲新总督维克托·奥加涅尔(Victor Augagneur)在1921年10月的通报中开始确认失败并要求中尉-总督和区长们放弃直到当时采用的强制手段。

1924~1925年，在法国，由“法属非洲”组织的题为“拯救法属赤道非洲”的宣传运动就刚果盆地的悲剧警告宗主国舆论。一些行政官员，如作家乔治·布津埃尔(Georges Bruel)和总督阿尔法萨(Alfassa)参加了这一敏感运动。但是，就在当地，事实也有不同：政府和私人公司继续采用本世纪以来揭露的那些同样的暴力手段。

总督维克托·奥加涅尔的通报没有结果。殖民者及其助手们继续认为非洲人可以听任榨取而他们自己不受任何处罚。

被20年恐怖状态激怒的居民一直不断地动荡。1920年与1928年间，丛林居住地进一步增加了。在村庄里，出现了几位出售躲避殖民者和士兵枪弹的护符的老人。起义的思想在发展。为修筑刚果—大西洋铁路过量征收劳工在1925~1926年使局势恶化并引起了全面起义。

其实，修筑刚果—大西洋铁路是法属赤道非洲的悲剧。铁路线长520公里，委托给巴蒂尼奥勒(Batignolles)公司，在距黑角60公里的地方要进入高700至900米、有陡峭山峰的马荣贝(Mayombé)山地，穿越1800米的隧道。1921年由奥加涅尔开始的工程因贷款不足和征收劳力的困难，而在1924年中断了。

1925年，在新总督——安东奈蒂(Antonetti)将军的任期内恢复工程标志着悲剧开始了。安东奈蒂被他要在赤道非洲完成

的重要任务所缠身，把修筑铁路变为他在法属赤道非洲政策的中心点。

除大部分就业居民为特许公司伐木的加蓬外，从1925年起，整个法属赤道非洲都被动员起来修筑刚果—大西洋铁路。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殖民化手段的强制措施。士兵和其他助手被迫组织真正的“追捕男人”，以为刚果—大西洋铁路工地找到所必需的劳工。

在距工地1000公里甚至1500公里的地方，被征召的男人经过长期苦难才能到达工地。在走完丛林土路和穿过细菌性痢疾或昏睡病菌侵入的地区之后，他们在很悲惨的情况下到达锡布堡(Fort-Sibut)、班吉、蒙贡巴(Mongoumba)和东古(Dongou)装货港口。男人们被象牲畜一样集中成100、200或300人一组，坐商船去布拉柴维尔。在持续15至20天、往往冒雨或冒难以忍受的炎热进行的旅途中，一些人被树枝刮倒掉入水中，另外一些人窒息或饿死。在工地上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被强迫离家的不幸的人忍受着适合奴隶制时期的服苦役地方的制度。

当时法国游客、小说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记者阿尔贝·隆德勒(Albert Londres)和罗贝尔·普莱纳(Robert Poulain)的见证在对刚果—大西洋铁路建筑工地劳动条件的看法上意见一致。

隆德勒说：“我看到了修筑铁路，即工地上的设备。这里只有黑人。黑人代替机械、卡车，而为什么不能代替炸药呢？劳工们筋疲力尽、倍受虐待、消瘦不堪、忍受折磨、大批地死去。”

在隆德勒之前，安德烈·纪德就曾把刚果—大西洋铁路称作“吞噬人的家伙”。当罗贝尔·普莱纳在1928年按作家和他同事的足迹走时，他的意见更加直截了当。他在给殖民部长的私人信件中确实承认：“如果我不担心公开揭露事实真相会损害我的国家，我很想给我第一篇关于赤道非洲的文章写明 *le laciare ogni speranza de Dante*。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会见时，我们曾

谈到纪德的书，并指责他把个别显然令人遗憾的现象推而广之而不利于法国的殖民主义。唉！然而纪德没有任何夸张。”

1929年，政府估计10404人的死亡统计低于实际情况。经过多次调查与说明，当时的法国报刊“时代”、“小巴黎人”、“人道报”和“日报”提出工地上的死亡数字为1.8万、2万甚至2.5万人。法属赤道非洲各国居民虽然不了解全面情况，但差不多都知道发生在刚果一大西洋铁路工地上的悲剧。秘密地村庄传村庄、部落传部落，任何人都知道了铁路强迫工程的情况。

布瓦尔—巴布瓦、整个上桑加和洛巴耶（Lobaye）地区除为刚果一大西洋铁路提供劳工外，还要为修筑班吉—雅温得公路枢纽另外提供劳工，1924年与1928年间进行的这项工程动员了1万多非洲人。从1925年起，一些行政报告就开始提到招收劳工的困难和政府士兵与其他助手所冒的越来越大的危险。

布瓦尔地区的人头税从1925年的3法郎增加到1926~1927年的7.5法郎，尽管上桑加的区长表示不同意。在许多村庄里，对殖民政府及其代理人的不满和敌视的迹象越来越频繁。被派出征召劳力和收回各村庄的纳税金额的士兵常中埋伏。

在这同一时期内，在位于布瓦尔与巴布瓦之间纳纳河（Nana）上的小村庄纳安，卡尔努露面了。一触即发的局势和对殖民制度的全面敌视有助于卡尔努主义运动的胜利，并使这一运动与直到当时众所周知的运动相比具有特殊性。

### 卡尔努与独立运动的产生

卡尔努在他同辈人看来是一位预言家。根据传说和口头证明，他从一颗星星坠入马伊安河（Maïen）中受到启迪，而一些人则肯定说当他收回装满干鱼或熏鱼的鱼篓时，曾两次受到他任务的启示。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据这种说法，卡尔努大约10年以前就死了，而在1925年或1926年他又复活了。

据他的同辈人说，从这些事件起，卡尔努的奇遇就开始了。他思考了约两周，隐居在茅屋里并避免和任何人接触。隐居结束后，他就他的启示、变化发表了许多声明并开始预言殖民占领的末日。他能辨识未来并能创造各种奇迹。他搞了几场腹语术并模拟了一场和“指挥官”的辩论。辩论中后者说他是“肮脏的黑奴”和“蠢猪”。据当时的人说，他的才能是上帝的恩赐。

经过他接受启迪而被采用的化名卡尔努有着深刻含义。这个名字在字面上意味着一位收集土地、能使土地象东西一样转动、能支配并能改造它的人。卡尔努似乎具有一位预言家应有的所有这些能力，但他特殊的地方是他对殖民制度的态度。

起初，他的说教是发表反欧尤其是反殖的但以非暴力为基础的学说。经过启迪，他丢掉了在丛林散步时从不离身的投刀和标枪。从此以后，他行走时手拿一根竹杆和一段锄头把形即孔戈-瓦拉形的木头。这是他的两根指挥棒。他把孔戈-瓦拉形的一段木头交给来纳安看他的拜访者，它会保护他们免遭士兵和政府的敲诈。这种护符会使战士免受伤害，因此卡尔努的同辈人给起义命名为“孔戈-瓦拉战争”。

他反对殖民主义使他不接受所有进口产品，而满足于穿羊皮和树皮。他避免和白人有任何接触，在他看来，白人是自本世纪以来全国灾难的根源。

他刚刚开始传教时，要求信徒们避免流血。有一段木头和两种植物（其中一种是很危险的有毒植物）就足以赶走欧洲人并把他们变成大猩猩。即使行政哨所的“指挥官”来和他打仗，他既不动也不逃，并向他说：“杀死我吧。”然而，卡尔努不断向他的信徒们宣布白人、士兵权力的末日，并劝他们不要纳税，逃避政府的种种强求，如服养路劳役，尤其不要应征去修筑班吉-雅温得公路枢纽和刚果-大西洋铁路。他还向他的同辈人宣布，新时代就要诞生了，白人将要滚蛋或是变为奴隶，并代替黑人清除田地上的丛枝灌木。当时局势的这种辩证的逆转，将伴随着一个

粮满仓、打鱼狩猎都兴旺的富裕时期。最后，自由会使这个地区的所有黑人在他领导下团结起来。

时而以随和时而以严厉攻击语气发表的这种学说很快对居民产生了一定影响。卡尔努的许多信徒坚决要求白人、士兵和特许公司撤走。从此以后，这位预言家就更加明确他的反殖信念。

卡尔努的影响迅速扩大。由于他的许多拜访者以村向村和部落向部落的方式传播，他的思想传到了距纳安250多公里的地方。卡尔努接待了兹洛兰(Zrrolim)、扎奥拉奥-曼(Zaorao-Man)、扎乌勒(Zaoule)、贝朗乔科(Betandjoko)、科马达(Kommada)、迪萨拉(Dissara)、恩加洛-格巴亚(Ngaro-gbaya)大酋长从巴伊博库姆(Baibokoum)、博卡朗加(Bocaranga)、博祖姆(Bozoum)、亚洛凯(Yaloké)和博阿利(Boali)、班比奥(Bambio)、卡诺(Carnot)和喀麦隆的整个格巴亚地区派来的密使。他成了喀麦隆、中非、刚果共和国和乍得边界居民的领袖。各酋长都给他送去了实物贡品，使他能供养来自四面八方人数不断增加的支持者。

人们对预言家的信赖是很大的，没有人敢向政府告发他，甚至完全相信殖民政府的大酋长如阿巴和纳齐博洛(Naziboro)以及离纳安很近的巴布瓦的桑巴(Samba)也都不敢。所有人都了解卡尔努的生活，他的活动，而尤其了解他的反殖感情。他令人敬畏，但受人尊重，因此他的说教传播了近三年而不为殖民当局所知，也没有出现背叛行为。政府对纳安预言家的思想传播方式十分震惊。上桑加区长勒鲁(Leroux)写道：

“我曾说过，卡尔努在三年中创立了学说，非常秘密地进行了传播。这可能难以置信。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怎么一无所知呢？通过格巴亚人紧密的惊人团结……所有居民都知道一种行动，而民兵的妻子、民兵、年轻男仆、翻译、白人的家庭主妇、人贩子、讲授教理者，没有人打破沉默。

1927年12月人们在卡诺市场上谈论卡尔努和他的学说。人们

当着翻译的面交谈，达尔（Darre）先生却一无所知，商人们就更不知道了。豪萨人可能知道，尽管他们否认……他们什么也不说。一个喀麦隆出生的人贩子曾力图告知克律比耶（Crubillé）先生，但人们不愿意翻译他的告发。”

1927年，卡尔努的传教已经取得进展并争取到大量信徒。纳安预言家主张的非暴力理想后来被武装斗争所代替。卡尔努的支持者们相信由于有孔戈-瓦拉，他们不会受伤害，越来越要求对占领者采取暴力行动，以解放祖辈的土地。政府征召劳工和到各村庄征税的困难越来越大。大约1927年底和1928年初，由于政府加重了压力和暴行，卡尔努及其同伙转入了武装起义。

被看作殖民者同盟的士兵、运输工、豪萨和博尔努（Bornouan）商人再也不能不受袭击地穿过各个村庄。从1928年5月至10月，所发生的一系列暴力：袭击欧洲商人、屠杀豪萨人和博尔努人、杀死士兵、拦截公路和切断桥梁，表明起义和独立战争开始了。

1928年6月，当巴布瓦分区长、农活指挥克律比耶因得知一位自称上帝或上帝使者和创造了所谓奇迹的人鼓励当地人起义，命令他们赶走白人，杀死指挥官，而决定去使扬言能制造“混乱和破坏法国权力基础”的预言家“恢复理智”时，殖民政府才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6月25日，他由5名卫兵和1名下士护送去纳安逮捕卡尔努并将其监禁在巴布瓦监狱。

到达预言家的村庄使分区长很不愉快，感到惊讶。纳安不再是按时缴纳人头税和“殷勤尊敬地欢迎指挥官”的沉闷小村庄，而成了政治动荡和反殖起义的中心。克律比耶几乎来不及询问或和人们交谈就急急忙忙地返回了。这次远征纳安后，他向上桑加区长提交的报告摘录阐述了局势的严重性：“大约11时30分，我们到达我起初以为没有人的纳安。刚进村时很冷清。但再往前走，我们来到象是广场的前面，在我们前方、左方和右方，围着200、250或更多的人，所有人都拿着标枪、刀、弓、弩等。他们因得知我们来，尽管已有提防措施，但还是等着我们。他们一看

见我们就喊叫并用武器进行威胁……我命令运输工压后让卫兵撤回。纳安村的人跟在我们后面。一些人走上路在我们后面约30米，另一些人在丛林中和队伍同时走。他们叫喊他们的上帝比白人强大，从孔代（Koundé）到贝贝腊提（Berberati）所有白人就要被赶走或被杀死；他们也会有枪支而且比我们更多，白人不是人，而是猴子……以及其他一些狂热的话。”

克律比耶远征失败对1928年6月25日这天在纳安的卡尔努的信徒们产生了深刻反响。一些人第一次看到指挥官和卫兵们逃跑。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播得特别快。远处和偏僻的村庄都知道了白人及其士兵仅仅看见了上帝的使者就逃跑了。

大约7月15日，由于克律比耶的报告和惊慌呼叫，由三名分别来自巴图里（Batouri）（喀麦隆）、卡诺和巴扬加-迪迪（Bayanga-Didi）的欧洲人指挥的三队民兵汇合巴布瓦向纳安进发。纳纳和曼贝雷（Mambéré）村庄一时间惊慌失措，因为事情趋于严重而且白人和士兵正在准备行动。饲养的家禽和羊群以及大部分粮食都疏散到丛林中。居民们料想会遭到大规模镇压，因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看到布下如此多的兵力这还是第一次。

卡尔努从纳安派密使去各村，告诉人们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从此以后，被他有威力的护符削弱的白人再也不能反击，而且他们很快就要离开黑人国家，回他们自己家了。

7月18日，意外的情况有助于提高卡尔努的道德威望并认为他是正确的。总督安东奈蒂命令驻在巴布瓦等候明确指示以逮捕预言家及其主要副官的三队士兵分散开来。上桑加区长勒鲁不相信卡尔努的政治煽动作用，按照他在报告中表示的意见，这样解决对事件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

用达姆达姆鼓传递的消息和使者们直至最偏僻的村庄到处宣布了“纳安人”的新胜利。大家都认为，卡尔努确实是最强大的。他的“护符”对压迫者产生了魔力。根据一些传闻，它们已



经吓破了白人的胆，而这些白人从此以后在卡尔努面前没有能力反抗了，对非洲人来说，卡尔努已成为国家未来唯一应该依靠的人物。

卡尔努通过密使尤其是通过达乌杜（Daoudou）了解到各殖民当局的企图后改变了策略。其实，预言家是由于感受到严重威胁，于是由非暴力理论转向了武装斗争。他要求信徒们反对政府的任何行动并团结一致抵抗占领者。因此，在1928年的最后三个月中，人们第一次实现了包括不久前还对立的部族的伟大团结运动：所有的格巴亚氏族、杨格雷人（Yanguéré）、庞代人（Pandé）、博米塔巴人（Bomitaba）、卡雷人、塔利人、帕纳人、拉卡人（Laka）和姆布姆人（Mboum）都提出组成共同阵线，以对付殖民政府、士兵、土著步兵和特许公司的代理人。有35万多居民受到非凡的卡尔努的感召。

由卡尔努及其支持者发动的以“孔戈-瓦拉战争”命名的从1928年持续到1931年的著名起义是法属黑非洲的特殊事件。这次起义以它的规模、所动员的各个部族、时间、殖民政府与宗主国的反响和战士的热情，都具有同1925~1926年的里夫战争或1930年的东京（Tonkin）起义和其他一些殖民地事件相似的影响。

起义是起义者和殖民当局双方的所有人的情感得以暴露并强烈表现的一次事件。在卡尔努的号召下，已减弱的仇恨逐渐地被激发起来。居民们处于新时代即自欧洲占领以来丧失自由的时代的初期。他们勇敢忘我地投入了战斗。因此，除卡尔努及其主要支持者外，还有6万多战士开始进行斗争。

过去在巡逻中通常只遇到“胆怯者”或“逃跑者”的镇压部队在卡尔努起义中碰到了新型的人，即决心争取恢复自由的战士。

1928年，从10月至12月是镇压的第一阶段，殖民军向纳安进发障碍重重。这促使殖民当局认真估计起义的规模和卡尔努对居

民的影响。得知白人和士兵向纳安进发企图逮捕预言家或把他杀死后，从博阿利至布瓦尔即350多公里上的所有军事首领都组织起来阻止纵队前进。

对付预言家支持者抵抗的军事行动进展缓慢，使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军队总指挥蒂里（Thiry）将军和负责指挥镇压的乌班吉-沙里中尉总督朗布兰（Lamblin）感到惊讶。有300名土著步兵的布坦（Boutin）中尉的纵队任务是逮捕卡尔努。10月13日纵队从班吉出发，经过20多次战斗，12月初才接近纳安。1928年12月11日，在纳安前线的光荣对抗中，卡尔努突然死去，但起义并没有结束。

与法属赤道非洲政治军事当局预料的相反，首领去世并没有停止继续斗争。另外的人接替了指挥。政府为平息和消灭起义运动而采取的政治行动没有产生任何明显效果。

卡尔努信徒们的士气并没有被预言家的去世所动摇。许多人还认为：卡尔努升天了，而且会更威武和更强大地回来组织继续斗争。重要名人和军事首领，如巴伊博库姆的扎奥洛兰（Zaorrolim）、喀麦隆东部格巴亚地区的恩加格-格巴亚和迪萨拉、博达和亚洛凯的扎乌勒、班比奥的贝朗乔科和科马达、卡诺的贝佩（Bepe）和穆萨（Moussa）、博卡朗加的阿尔多（Ardo）、乌埃索（Ouesso）的姆贝卡（Mbeka）和库卡（Kouka），都以卡尔努同样理想的名义开展了斗争。殖民政治军事当局在三年中不得不开动真正的战争机器镇压1929年3月和4月在南北700至800公里和东西100至350公里范围的起义。

事实上，卡尔努死后，文职政府和军事当局对重新发生暴力都感到意外。当镇压纵队向布瓦尔-巴布瓦进发时，卡尔努的其他信徒在组织防御。

在具有明显的长期抵抗传统的巴伊博库姆地区（乍得），以扎奥洛兰的化名而闻名的扬加（Yenga）酋长在他周围重新聚集了由格巴亚人、姆布姆人和帕纳人组成的一支4000多人的军队。

自1928年9月以来，引起政府注意的起义运动在10~11月和1929年初得到了加强。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殖民当局协调力量以图战胜起义者。虽然在1929年3月有许多人投降，但扎奥洛兰和巴伊博库姆附近、乌伊亚河（Wvia）与姆贝雷河（Mbéré）两岸的其他军事首领直到1930年底前后才向占领军投降。

在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边界地区，从11月起，起义从南至北扩展到贝图瓦（Bertoua）、登-登（Deng-Deng）、贝塔雷（Betaré）、巴库姆博（Bakoumbo）、梅冈加（Meiganga）和恩加翁德雷（Ngaoundéré）与雷伊·布巴（RéiBouba）的拉米达门（Porte des lamidats）。在卡尔努的众多信徒中，最为积极的首先是殖民当局悬赏通缉的、登-登分区的马拉拉巴（Mararaba）乡长迪萨拉，其次是扎奥洛·萨马克（Zaoro Samak）、恩加洛-格巴亚，再其次是比纳库（Binakou）、扎塔奥（Zatao）、扎奥洛-姆巴（Zaoro-Mba）、扎奥洛-孔代（Zaoro-Koundé）、扎奥洛-当卡尔（Zaoro-Dankal）、扎奥洛-戈古纳（Zaoro-Gogouna）和贡切（Gomtsé）酋长。

在曼杜尔（mandoul）地区的中沙里，姆巴耶人（Mbaye）和达伊人（Dai）利用全面动荡的机会，先是在布纳（Bouna）的努恩加尔（Noungar）酋长、然后在库特博尔（Koutbol）和卡迪库（Kadikou）酋长的推动下发动了起义。很快扩展到莫伊萨拉（Moissala）、然后扩展到阿尚博堡（Fort-Archambault）整个地区的起义的暴力，迫使军事当局采取了最为迅速的镇压手段。土著步兵和民兵除利用通常武器外，还放火烧了起义地区的整个草原，因而破坏了村庄、粮仓和耕地。失去躲藏藏身之处的姆巴耶人和达伊人1929年3月5日遭到突然袭击，几乎所有战士都放下了弓、箭、矛。对这些地区起义的激烈程度有深刻印象的殖民政府把姆巴耶人和达伊人押送到库姆拉（Koumra）、莫伊萨拉和阿尚博堡。

一般地说，约在1929年3月底，起义似乎平息下去了。法属

赤道非洲当局可能认为初步的军事行动达到了目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南方的班比奥和托洛（Toro）地区，接着在伊本加河、莫塔巴河上游和利库瓦达草原河上游两岸再一次爆发了起义。在这里，卡尔努的信徒动员了不久前对立的居民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农民、桑加—乌班吉林业公司的橡胶采集工和过去的民兵。伊姆丰多（Imfondo）、东古和班比奥附近的村庄变成了起义者聚集的中心。起义呈现出圣战的气派，不响应起义号召或似乎倾向于政府方面的部族受到冷待、责骂并有时被屠杀。

这片有藤蔓缠绕的森林和沼泽的地势与适应地形、动作敏捷的起义者使得镇压行动十分艰难并造成极大伤亡。1930年2月，政府尚未全部赶走最后的卡尔努崇拜者。

起义的最后阶段，即1930年底和1931年上半年，以博卡朗加、帕瓦和博祖姆地区为战场的洞穴战争，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者的抵抗，严酷的镇压和人员的伤亡，是卡尔努及其支持者发动的战争事件的顶点。

起义戏剧性地揭示了直到当时所实行的政策的失败，尤其是直到当时被认为是被征服的而不能组织抵抗的居民的反应。

这并非简单的一时的事件，而是反对近30年的压迫和侮辱的重大反抗行动。殖民政府尽管声明倾向于低估起义的意义，但仍正确地估计卡尔努行动的影响。

如果卡尔努的行动以某些特点令人联想起当时非洲一些著名的救世主降临的话，如比属刚果的金班吉主义，或利比里亚尤其是象牙海岸的哈里斯主义，那么，它主要是政治性的。卡尔努的行动产生于19世纪末殖民入侵初期尚未超越部落组织阶段的社会，它只能根据祖传的标准：相信巫术、护符或各种吉祥物。虽然殖民部和关心法属赤道非洲的力求减少卡尔努起义影响的重要实业界人士发动了种种宣传活动，但前殖民者和《殖民世界画刊》记者朱利安·梅格莱（Julien Maigret）仍在1930年4月写道：“桑加起义是一个悲惨事件，从白人无论是法国人、英国人、

比利时人还是德国人，企图强迫非洲当地人接受他们的伦理和政治组织方式的那天以来，在折磨黑人灵魂的过程中充满了教训。”

同其他运动相比，卡尔努主义救世主降临学说的独到之处在于主要提出了政治要求和口号：拒绝纳税，拒绝和占领者一起劳动或合作，尤其是号召所有部族团结起来，抵抗敌人，解放祖国。如果只注意强调殖民政府的罪恶与侮辱，那么，卡尔努的行动就不会持续六个多月。许多军事首领之所以和卡尔努联合，是因为他的预言、护符和力量的首要目的是撤走殖民占领的象征——白人与士兵及解放黑人。

卡尔努及其信徒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了法属黑非洲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先驱。

（吴增田 摘译）

## 巴泰勒米·博冈达： 中非的民权保卫者和幻想家

1910年4月4日，巴泰勒米·博冈达(Barthélemy Boganda)出生在洛巴耶河(Lobaye)流域的博班吉(Bobangui)，洛巴耶河是北部赤道森林中乌班吉河(Oubangui)的一条支流。他的父亲苏瓦拉克贝(Soualakpé)是村中在洛巴耶河上最先遇到白人的人之一。

苏瓦拉克贝氏族属于姆巴卡部族(Mbaka)，到达洛巴耶河森林的时间还不长。一部分姆巴卡人被驱赶离开扎伊尔河岸，在乌班吉河森林中安家落户。这部分人在森林中还遇到许多非常不同的苏丹人或班图人。他们曾和提供大量肉食的俾格米猎人相互依存。姆巴卡人的对头崩乔人(Bondjo)曾占领过乌班吉河的大河湾，他们破坏博班吉划独木舟人的古老贸易，加重了这些逃难者与世隔绝。

### 白人进入故乡的茂密森林

直到19世纪末叶，世界其他地区尚不完全知晓这片茂密森林及其居民。1889年6月，两名法国人在乌班吉河急流旁边离开一只小汽船，来到一块无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起名叫班吉。1892年4月，在距西部几百公里的地方，另一只法国汽船逆桑加河(Sangha)而上，直到巴尼亚(Bania)急流。1894年2月4日，由于法、德外交官在柏林达成协议，该地区成为法属区。

1899年，一个庞大的巴黎高级官员委员会无视这块未被人知

晓的土地的主人，将乌班吉河谷划分给26家应时成立的法国特许公司。洛巴耶河流域被划分给几位里尔地区的实业家，组成“洛巴耶河产品公司”。

从1901年起开始了有组织的经常性掠夺。各公司代理人强迫居民们向其提供各种未加工产品。他们常常采用武力威胁而不向产品收集者支付报酬。当必须付钱时，给不值几个钱的商品就算是对以往的劳动付了报酬。村民们迅速做出反应，有15名白人冒险家被杀死和吞食。定期采用暴力开始了。各个公司有的成立了私人卫队，“以确保欧洲人防备好斗的居民”，有的得到阻击队的支持。1904年、1906年和1909年有三支远征军恢复了殖民秩序。于是森林居民又见到来了其他白人。这些白人建立了好几处永久性哨所。许多部族居民遭受奴役的时代开始了，他们曾以为这片赤道森林是避难所。

1906年2月，对布拉柴考察团的沮丧报告感到震惊的法国议会将特许制度永久化了，而饶勒斯（Jaurès）和社会党人则称这种制度是“丢法国的脸，丢民主的脸”。

两年后，一位法官在班吉附近了解到一个特许公司的代理人随随便便犯下了1000多起杀人案，当时这件事引起轰动。司法部长指控说：“……下达命令就总是杀人，如果村庄被抛弃，当地人逃跑，他们不送交规定数量的橡胶，那么还是下令杀人……。”在总督方面，他要求司法部长寻求一种“使司法与殖民化需要相一致的解决办法”。甚至不再经过议会讨论。

1908年，这些“殖民化需要”导致马夏尔·梅兰（Martial Merlin）总督下达命令，一个河谷一个河谷地征服拒绝接受新任长官的整个乌班吉河地区。他命令“减少这些能够长时间地保持其独立的野蛮居民”。他首先指示“不惜任何代价恢复所有欧洲人的威望”；然后“用积极的占领代替和平的殖民化方式”。小博冈达诞生的1910年，是这种轻率镇压的高潮。同时，天花和昏睡病沿运输线路和行船河流蔓延，毁灭了许多村庄。博班吉和洛

巴耶河流域所有地区都处于恐怖之中。博冈达这时才刚刚认得母亲。

1911年，这块被抢劫、蹂躏、榨干的殖民地已经丧失了前途。对此并不十分惋惜的法国，因在摩洛哥行动自由，于11月4日将桑加河和洛巴耶河流域让给了德国。博冈达及其亲属又遭受德国统治。1914年8月，法国士兵取代了德国士兵。法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向德国收回了它的殖民地。

### 受传教士收养和教育

天主教传教士们不敢去特许公司的领域内冒险，而住在乌班吉河的贝图（Betou）、班吉和贝苏（Bessou）。

埃里奥（Herriau）神父来到洛巴耶河后，1921年在哨所长梅耶（Mayer）中尉开办的姆巴伊基（Mbaiki）临时小学校里发现了患天花病的小博冈达，他满身都是伤口，但酷爱学习。神父把他带到贝图。经过三周的照料，博冈达痊愈了，在班上成为第一名。但是崩乔族学生却敌视小姆巴卡。从12月起，神父们把他转到班吉的圣·保罗（Saint paul）教会学校上学。1922年12月24日，他在学校接受洗礼，起名巴泰勒米。

在许多著作中，博冈达曾提及此事：

“从1921年12月至1922年12月，我每天跟让·卡洛克（Jean Calloc'h）阁下上两节课学读法语。其余时间主要安排体力劳动，尤其是干农活。12月24日，我成为基督教徒，当时我12岁。当基督教徒对我来说意味着摆脱祖传习俗的束缚，成为人类的兄弟。从此以后我感到非常失望。12月25日，我来到卡洛克阁下那里，向他说明我希望做所有依靠自己的事情，接受各种训练，以便有朝一日能使我的国家和兄弟摆脱他们当时的处境。能对我打开的、可以实现这种理想的只有一扇门：圣职。由于从未听说过有‘我这种肤色’的神甫，我对此还没有把握。



我壮着胆子说：‘阁下，我希望为我的国家和兄弟而工作。’他已经了解到我的思想和禀性，生硬地回答：‘这是很艰苦的，而且十分漫长。’我胆怯地辩驳：‘我对自己可以冷酷无情，我可以加快速度干。’而我就是这样做的。

那是1922年12月：我在夜里学读法语，我以非凡的努力来掌握法语。1924年10月，我学习了拉丁语。我只有一个理想：掌握法语和拉丁语，成为一个有益于乌班吉的人。”

博冈达在乌班吉以外的地方继续学习了10多年：在布拉柴维尔向法国的斯皮里丹（Spiritains），在雅温得向瑞士的贝内迪克丹（Bénédictins）学习，在基桑图（Kisantu）向比利时的热斯威特（Jésuites）学习。他在这些城市里遇到了其他殖民地的人，他们对他们感到很亲近。

这些学习并不免费。博冈达不能依靠当时处于极度贫困的家庭和村庄的任何帮助。班吉教会的法耶（Fayet）神父每年都向一直不知姓名的法国家庭收集所需要的款项。

1938年3月17日，乌班吉第一位神甫博冈达在班吉圣母大教堂里被授予圣职。

### 洛巴耶河农民的新灾难

博冈达在漫长的学习年代里同亲属们只是偶尔联系。交通困难和旅途费用使他只能很少回故乡暂住。

但是，1925~1935年间，洛巴耶和上桑加地区的形势使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更坚定了让其兄弟摆脱贫困与奴役的决心。

洛巴耶和上桑加这两个森林区重新被大量采伐。1925年底，安德烈·吉德（André Gide）步行穿过洛巴耶森林。他除揭露“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和行政部门的代理人进行敲诈勒索外，还揭露了有许许多多乌班吉劳工被流放到“刚果—大西洋铁路”工地，这是个“可怕的吞噬人命的地方”。

记者阿尔贝·伦敦（Albert Londres）在恐怖的铁路工地见到了这些劳工，他在《埃贝纳（Ebène）的土地》一书中描述了他们受到的折磨。他写道：“他们的悲惨处境我无法形容。他们沿途步履艰难，疲惫不堪，象是怀念家乡的幽灵。他们对吆喝声，头上挨巴掌都麻木不仁。人们认为，他们思念着遥远的乌班吉，在摸索着寻找坟墓的入口。”

博冈达家庭中有好几口人在这个敲诈勒索的新时期中丧生。他叔叔曼多贡（Mindogon）酋长被叫到姆巴伊基分部办公室，由于没有提供足够的橡胶采集工人，在1927年11月被当地卫兵用皮鞭子活活打死。他叔叔留下许多年幼的孩子，其中有后来的中非总统博卡萨，当时年仅6岁。

这种艰苦的劳役促使上桑加和洛巴耶居民再次发动起义，迫使殖民军队从1928年至1931年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殖民战争。

1928年，莫巴耶（Mobaye）两名宗教领袖号召进行反抗白人的战争。上洛巴耶的巴亚人（Baya）宗教领袖卡里努（Karinou）主张“所有黑人团结起来，抗捐抗税，不给白人干活和服劳役，抵制同占领者的所有贸易”。他谴责使用暴力，认为这种消极抵抗会使白人撤离。他说他要去贝贝拉提（Berbérati），请求同白人教士们交谈，让他们把这块土地留给黑人”。但是卡里努无法应付接连不断的暴力。他说他的死将会是报复。后来发现他被卫队士兵杀害。

同时，洛巴耶河谷与伊本加（Ibenga）河谷之间森林中的老宗教领袖贝朗吉科（Berandjko）及其部落，同许多其他部族一起加入了巴亚部落的起义，洛巴耶又重新出现了部队。这位中非抵抗者的老领袖也遭到狙击者的枪击，他预言森林中会很快产生另一位领袖，将使黑人摆脱白人主子的统治。

在一个生者长久铭记死者的国家里，卡里努和贝朗吉科的行动已经预示了博冈达的政治活动。

除耶稣教义原则和法兰西革命原则外，年轻的博冈达还广泛

地接受了人民大众的影响。

后来他在最初的政治报告中写道：“我突然发现晚上和老人交谈是非常有教益的。他们十分悲痛地向孩子们讲述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中以文明的名义所遭受的奴役，并花费极大气力一再教育其子孙后代不信任和仇视占领者。同占领者的和解是长期的而且是艰难的，只有迅速而完全的革命才能扭转这种局面。”

### 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属赤道非洲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努力进行战争的同时，对法属赤道非洲的开发最终开始了：改善交通，加快发展新产品，如棉花、咖啡、钻石、黄金。但这种努力只是由于加强了经济结构和重新采用强制手段才获得了成果。各个棉花公司在广大地区垄断了收购并保证其获得利润。另外，殖民政府还通过强迫所有可征税的男人或女人种植棉田向其保证定期供应棉花。

1941年，费利克斯·埃布埃（Félix Eboué）总督总结他在乌班吉丛林25年的经验，大体上制定出新的土著政策。但是传统社会非常动荡不安，不能恢复通常酋长的权力。社会的发展不可逆转。

殖民政府继续答应私营部门代表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埃布埃的继承人安德烈·贝亚尔代勒（André Bayardelle）从考虑效率出发，在1945年制定了一项计划，将庞大的法属赤道非洲分成三个可行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加蓬-中央刚果，一块沿乌班吉-沙里河（Oubangui-Chari）的高原领地，包括中央刚果北部和非穆斯林的乍得南部，还有一块乍得伊斯兰教化的领地。但一些私营公司，尤其是加蓬“森林公司”和布拉柴维尔运输公司联合起来使这项政策归于失败。这四块过去的领地，尽管还不十分完善，在1946年10月被固定在各自不正规的边界内，后来它们于1960年

组成四个独立国家。

1946年在乌班吉首先采取政治行动的不是博冈达，而是殖民者。他们对于宗主国下令改变政策感到不安，下决心要阻止改革的实施。1946年4月25日，他们的带头人、乌班吉-沙里-乍得第一社团众议员勒内·马勒布朗（René Malbrant）在国民议会讲台上抨击议会议会宪法草案。他大声说：“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在乌班吉当地人中完全不可能找到36名能够以所要求的任何能力保证履行职责的普通参议员。”1946年5月5日，预计很有可能发展海外领地法的宪法草案被否决。

为防备不符合宪法，从1946年4月11日开始执行的一项法律绝对禁止强制劳动。6月7日，班吉商会一致反对这项共和国法律。1946年7月，由马勒布朗发起，所有殖民化国家在巴黎开会，要求“仍有必要维持法国对帝国领地的主权”。

当时乌班吉人在议会的代表是法国军官居伊·博什隆·德·布瓦苏迪（Guy Baucheron de Boissoudy）中校。博冈达教士在格朗丹（Grandin）的煽动和在其朋友的友好影响下，决定自我举荐。1946年11月10日，他被当选进入议会。为这件事情中菲当局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事实上，这标志着乌班吉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开始。第二社团的选民还非常有限，登记的选民才大约两万人，有酋长、“文明人”或老战士，其中有9000多人投票赞成博冈达。

这次选举的第一个结果是博冈达教士发现了他从未去过的法国。他完全没有想到会看见一种与一小撮希望乌班吉保持强制劳动的法国人根本不同的居民。他在奥地利旅行时，注意到法国人对待战败者比对待其本国殖民地的国民要好，然而这些国民在1946年被宣布为“法国公民”。

1947年3月，加入了“人民共和运动党”的博冈达出席了该党代表大会。1947年8月4日，他在议会讲台上讥讽说：“非洲人民可能是有好奇心的人民；他们并不满足于演说，而是首先根

据事实进行判断。”他只要求严格执行所通过的各项法律。12月，他写信给法国海外部长保罗·科斯特-弗洛雷(Paul Coste-Floret)，向其列举了对乌班吉人掩盖了法国真相的种种“事实”：

“征调劳力，采用暴力和随意抓人，城市中的无偿劳动和微薄工资（许多工人每天最多领取45法郎，而其家庭过象样的生活则需150法郎），公共场所的被剥夺（黑人照例被排斥在所有公共机构、咖啡馆、饭馆或电影院之外），滥用教育权利，强制文化，乱派人头税进行明显的剥削……”。

然而，博冈达说话无人听。在班吉，议会中依靠博冈达的17名成员处于少数。但是，博冈达终于让他的两名朋友当选。这两位都是混血人，一位是雅内·维亚尔(Jane Vialle)，当选为共和国参议员；另一位是安托尼·达尔朗(Antoine Darlan)，当选为法兰西联盟参议员和法属赤道非洲大委员会副主席。

博冈达由于完全失去在法国国会和地方议会发表演说的希望，采取了卡里努派和贝朗吉科派的做法，让村民们讨论问题。

他认为，农民摆脱桎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从此殖民政府把他当作煽动者对待，而殖民者也懂得了他的危险举动。博冈达脱离了“人民共和运动党”，在当地努力创建发展其行动所必需的组织。

博冈达几乎把所有的国会津贴都用于创建组织上，但是还不够。他希望大家合作。1948年，他成立了“乌班吉—洛巴耶—莱塞(Lessé)合作公司”。

然而却难以找到能管理这个公司的职员和会计。另外，由于贸易垄断，这个新合作公司被迫把产品交给那些垄断出口的公司，而它们可以拒收产品或对其质量提出异议。没多久，殖民者使“乌洛莱合作公司”走投无路，博冈达支持者经营的另外几家合作公司也破产了。

在政治方面，博冈达和达尔朗成立了“乌班吉联盟”，在殖

民政府职员中散发了几份通报信件。1949年9月28日，在班吉居民区召开的会议上，博冈达用一个他所希望的真正非洲政党“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党”代替了“乌班吉联盟”。

“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党”（以下称：“黑非社发运动党”）不依赖任何宗主国政党，雄心勃勃地要和“世界上所有黑人”对话。其目的是“根据黑非洲固有的精神和面貌促进非洲社会的蓬勃发展”。

“该运动党”的成立在农村中比在职员的小圈子里更引起广泛的反响。博冈达根据这些职员对占领者过分的奴颜婢膝，称其为“白黑人”。博冈达在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团结了所有那些遭受殖民化侮辱的人。

班吉的雇员们拒绝用“你”称呼，不准打年轻男仆耳光，不准鞭打工人。大多数是种族主义者的少数欧洲人，在班吉看到了革命征兆。他们没有搞错。

殖民者以在各县增加“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分部来对“黑非社发运动党”的成立作出反应。博冈达增加了在各村的巡回访问。居民们把他当作救世主。他的神甫身分即使在非基督教徒中也可以赋予他几乎神奇的力量。博冈达以“拉贝”（Labbé）的绰号处处赫赫有名，以其嗓音和演说才能施展迷人般的魅力，他看到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十分愚蠢的活动分子的支持下，支持者越来越少。

在巴黎，博冈达结识了“人民共和运动党”的国会秘书米歇尔·儒尔丹（Michelle Jourdain）。1950年她成为博冈达的妻子。他们的结合生下三个孩子：阿涅斯（Agnès）、贝特朗（Bertrand）、卡特琳（Catherine）。博冈达的反对者在政治上理屈词穷时就大量引用他的私生活。乌班吉的绝大部分欧洲人、商人、种植园主、采矿者、传教士和官员们认为，首先应该反对活跃的博冈达。

在洛巴耶森林中突然发生的一件事颇有助于他的名望达到

高峰。1951年1月10日，博康加（Bokanga）市场上的葡萄牙商人同“乌洛莱合作公司”的代表发生了争吵。应葡萄牙人的要求，市场被延期了。这一决定激起了农民的愤怒，其中一些农民是头顶着沉重的产品从远道而来的。博冈达及其夫人来到市场，为农民们辩护，使混乱更加严重。农民们往道路上扔树干阻止欧洲人的卡车。那时博冈达和姆巴伊基县县长之间的对话十分激烈。该县长以法官身分立即将博冈达及其夫人逮捕。他们被严密看守了48小时，并于3月29日分别被判处两个月和15天的徒刑。

博冈达立即提出上诉，因而未被监禁。然而他被捕和随后被判刑的消息象闪电般地迅速传开。殖民政府向博冈达提出最好参加即将来临的选举运动。尽管施加巨大压力，尽管在绝大多数投票站的票箱里捣鬼，1951年6月17日，博冈达仍在选举中占优势，所得票数几乎等于他的四个竞争者合在一起的票数。由于相邻的乍得领地选举了两名有“法兰西人民联盟”标记的众议员，博冈达的胜利就更加辉煌。该党掩饰不住它的恼怒，其联盟公报发表了题为《前教士好景不长》的文章。1951年10月27日，代理议会中当选的欧洲人提出辞职，拒绝“更长时间地和法国的对手呆在一起”。

博冈达清楚地总结了这种形势，他说：“每当一位当选的非洲人希望政府和国会倾听他所代表的人民的声音时，我们就总听到这样的意见：‘你们是反法分子，你们在谴责法国。’我十分清楚地感到共和国政府总是让各国一小撮唯利是图的殖民主义者占便宜。正因为如此，今天整个法兰西联盟在摇摇欲坠；法国人民不再抱有幻想……”。

### 对话的年代

1951年11月标志着法国的殖民政策尤其在法属赤道非洲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法国海外部政治事务主任保罗·肖韦 (Paul Chauvet) 总督被委任为布拉柴维尔高级专员。法属赤道非洲秘书长埃梅·格里马尔 (Aimé Grimald) 总督被任命为乌班吉-沙立领地的长官。几个月后，法国海外部长路易·雅基诺 (Louis Jacquinot) 到达班吉。

“黑非社发运动党”在1952年3月30日的领地议会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圭亚那的埃克托尔·里维雷 (Hector Rivierez) 律师根据博冈达的介绍当选为参议员，接替在飞机事件中丧生的雅内·维亚尔。

肖韦希望缓和各县政府实行“专制统治”的特点。他要求注意管理那些借口被现政府强迫而处于被征服地位的人，并下令为“当地人出入指挥部提供方便”。

但是对这种变化的阻力私营部门比政府干部要大。当一些县长忽视向各村派领地卫队强迫种植棉花时，棉花公司的领导人就感到气愤。1953年1月5日颁布了海外劳动法。雇主们因当时担心再也得不到政府象从前那样的支持，实行海外劳动法就敷衍了事。博冈达对各棉花公司和政府对关心为种植园主配备技术和警察干部所引起的弊端进行了抨击。

博冈达同法国政府与私营人士展开了广泛的对话，突然贝贝拉提发生了激烈事件，在几小时内就激怒了巴亚人地区这个城市的居民。一位欧洲的公共工程代理人因粗暴对待工人而刚受到处罚不久，1954年4月29日他宣布他的厨师及妻子两人死亡。死者家属要求逮捕这个被他们指控犯有双重罪行的工头，然而当局却接受了丈夫杀死妻子和丈夫自杀的说法。4月30日，该地区办公室前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他们扔石头，打伤了区长，打死了一位过路的运输工人。骚乱爆发了，人群拥入了机场。总督决定派遣伞兵，布瓦尔的DMA装甲车在城里开来开去。战争呼吁遍及整个巴亚人地区。强壮的男人都离开村庄参加了这次反对白人的战争。



总督桑马尔科急忙赶到博班吉的博冈达家中，恳求博冈达陪他去贝贝拉提。博冈达犹豫不决。贝贝拉提城在巴亚人地区，对博冈达并无特别的好感。然而他还是答应了恳求。5月1日16时，在埋葬受害者时，他站在广大群众面前宣布：“白人和黑人的正义都是一样的。”在场群众平静地散去。贝贝拉提的骚乱本来会触发没有武装的居民发动全面起义，居民们也会遭到严厉镇压。这一点博冈达比任何人都非常清楚。

这一事件对于乌班吉国家的命运产生了三点重要结果：

(1) 博冈达作为包括好闹事的巴亚人在内的任何种族中卑贱者的保护人，当时成为官方公断人，是引导国家走向自治的真正领导人；

(2) 巴亚人指出，虽然他们仇恨白人，但他们懂得接受一个其部族曾同他们部族打过仗的人发布的维持秩序的命令；

(3) 总督在5月2日给领地长官的训令中承认，“许多欧洲人对待非洲人的思想和行为是殖民化和殖民政府遭到周期性攻击的原因，使治安经受不住发生最小的事件”。他下令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把它看作是“乌班吉的主要问题之一”。

实际上，贝贝拉提事件彻底揭示了乌班吉欧洲人的行为问题，博冈达揭露这个问题已有七年了。但它却表现出乌班吉人都团结在一个人周围，而殖民政府却阴谋进行部族分裂来反对这个人。1954年5月1日可被看作是乌班吉走向独立的起点。

一次起义避免了，从此以后可以考虑走和平道路。博冈达在法属赤道非洲大委员会上对“高级专员稍迟的理解”和“领地长官的人性”感到满意。“黑非社发运动党”当选的党员在大委员会、领地议会和直到每个行政区设立的各议会里都是一部分积极力量。

1956年，博冈达和“黑非社发运动党”的努力取得成果。1956年1月2日，博冈达获得84.7%的选票。“卡蒂埃主义”使乌班吉的法国人感到不安，他们的企业将随着宗主国放弃援助而被

产。“黑非社发运动党”遭到的批评变得不那么激烈了。许多人认为，1956年6月23日的法律，即给予各领地半自治的“德费尔（Defferre）法律”是不应该失去的一次机会。

1956年11月18日，博冈达当选为班吉市长，几个月后又当选为法属赤道非洲大委员会主席。他当时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其支持者远远超出了乌班吉边界。1957年3月31日，“黑非社发运动党”获得35.6万投票人中的34.7万票，并占有了领地议会的全部席位。该运动党在乍得和中央刚果成立了分部，博冈达还曾几次秘密去比属刚果。

### 根本法制度

中非政府每年都正式庆祝1957年5月17日的纪念日。事实上，领地议会是在这一天被指定挑选参加“政府会议”的成员的。“政府会议”是个刚组建的部，尚由总督、领地长官主持，并包括一些部门负责人，由于修正根本法草案，法国国会同意称他们为部长。博冈达认真确定了这些部长的名单。他本人并不希望进入由法国高级官员领导的班子。他让其校友阿贝尔·古姆巴（Abel Goumba）博士当选担任副主席，他认为此人最恰当、最有能力。

1956年的根本法很难实施。乌班吉实施根本法加剧了殖民集团的分裂。“乌班吉跨党派自由集团”成立时，由罗歇·格里奥（Roger Guerillot）带领归顺博冈达的殖民者希望利用这种新的局面。格里奥自任命为行政和经济事务部长后，进行了反对殖民官员的激烈运动。这位引起哄动的部长很快就和古姆巴副主席闹不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安并给许多良好愿望泼了冷水。根据格里奥的要求，博冈达把达尔朗和东部地区几位被怀疑同情共产党的参议员开除出“黑非社发运动党”。自治时代困难重重，博冈达在困难中看到了殖民制度本身的结果。

博冈达在大委员会中指责殖民政府主要关心生产。他感叹地说：“六年前在议会中我听见谈论木材、棉花、石油、锰；谈论人通过劳动所能生产或开采的一切产品。但我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谈论人，在地球上创造一切是为了人，人在操劳、流汗、开采或者生产。殖民化的罪恶是实行‘人为生产’，而不是‘生产为人’。当12月22日在乌班吉-沙立的预算会议上我大胆地向教育部门要求实行根本法的人员时，我的问题和讲话的声音引起了纷纷议论。有人说，这是造反的声音，是战争的宣言。是的，这是可能的，但造反者叫苦的呼声并不比正在造反的人民更危险，但却更有效。”

事实上，博冈达在1957年体现了非殖民化的整个悲剧，该悲剧尚不敢考虑其正常结局：新国家的诞生。当时乌班吉的苦难和在经济上的完全依赖性引起了讽刺评论，使博冈达勃然大怒。他说：

“有人还在第三者面前对我说，‘你的国家对于法国比给它带来的好处更有价值’！……就按你说的话，如果为了不再成为法国的负担，我明天就决定与圣多明各共和国或与堪察加建立关系，或者更近一些，那么你们就会象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那样派军队来反对我们……”。1958年1月30日和2月3日，《费加罗报》发表了一幅令人恼火的乌班吉图画：“110万人分散在野兽之间力图保证其艰苦生活……一些部落在非洲是最原始的。”

“博冈达主义”政体被称作“事实上的独裁”。

几年来一直在讲话中强烈指责过殖民主义的博冈达对于这样的攻击不能容忍。他决定到内地特别是东部的农村进行长时间的巡回访问。他写道：“我自己开车开了23天，跑遍了整个东部地区，让居民们懂得劳动的必要性，因为我在向他们贡献了我的生命、时间、自由和金钱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带给他们了。居民们是知道的……而且向记者们说：‘博冈达吗？……看在上帝的面，让他工作吧。所以你们那么希望我们仍是一群乞丐，成为欧洲人嘲弄的对象。’“独裁”的指责格外地刺伤了博冈达。

当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的武力打击加速了整个法属非洲发生变化时，乌班吉在实施根本法时期的形势就是这样。1958年7月，他在科托努代表大会的代表古姆巴·达科（Dacko）和阿尔贝·法亚马（Albert Fayama）赞成迅速取得独立。几天后，他在领地议会出其不意地宣布：“根本法已过时，‘黑非社发运动党’今天为乌班吉和黑非洲要求必须是人民自己掌握的权利和在自愿与自由同意的相互依存中取得完全独立，独立的方式我们要进行研究”。

### **按博冈达要求的独立：联合的中部非洲**

1958年7月13日，博冈达表示：“必须从新宪法中肃清一切隶属思想，一切统治的阴影，让海外人民在公民投票中有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有权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和所有外部事务……革命的时钟对黑非洲敲响了。‘黑非社发运动党’希望进行和平的与建设性的革命。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也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革命，否则别人也会进行。那么，革命就会流血，没有我们，革命也会进行，从而也会反对我们。”

不久后，博冈达会见了戴高乐将军。但1953年5月，博冈达曾拒绝在班吉接待戴高乐将军，他把戴高乐当作“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首脑。不过五年后，他们的立场取得了一致。博冈达获准在宪法中清清楚楚地写上独立的权利。博冈达在布拉柴维尔接见了戴高乐将军。

博冈达在班吉莱克斯（Rex）影院集会上解释说：“目前我只要求权利的原则。我仅仅要求必须是人民自己掌握的权利的原则，即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原则。”

1958年9月28日，乌班吉-沙立以487031票对6085票接受了宪法规定的共同体。博冈达认为，乌班吉采取了“独立行动”，

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反对”。

但是宪法第76条只给各领地四个月时间来选择它们的地位。选择的期限太短，使老殖民地不能做出决定。

他认为，老殖民地特别是乌班吉-沙立，人口太少，经济上太弱，不能获得全面独立。他说：“如果乌班吉单独独立，这将是一场灾难。法属赤道非洲的四块领地，历史上苦难深重，周围有尼日利亚、苏丹、比属刚果三个强国，实际上显得非常势单力薄。”

在博冈达看来，法属赤道非洲应该集体独立。他牢记了法国向他提议的为这个新国家起名“中非共和国”。但是，这个中非共和国对他来说只是更广泛集中的第一步，他已在大会委员会中提起过这种更广泛的集中：“因此，利用宪法向我们提供的这唯一机会，我们决心重建以前的法属刚果，并同乍得一起建立中非共和国。这将是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将考虑刚果河右岸。由于刚果而并非乌班吉存在历史的正式边界，从今以后我们把这部分看作属于中非共和国。第三步我们将努力使两个刚果统一。我们的第四步将是建立拉丁非洲合众国，包括中非共和国、比属刚果、卢旺达-乌隆迪、安哥拉和喀麦隆。”这项计划看来雄心勃勃，博冈达视它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既然这可以实现，我们就应该实现它，否则我们会受到子孙后代的审判并被斥责为背叛我们的使命……今天就应该建立中非共和国，明天则太晚矣。”

这项计划很快得到刚果奥庞戈尔 (Opangault) 总统的支持，他宣布：“我要求所有当选者懂得他们的责任所在，并要求他们宣布他们不再代表中央刚果，而是代表中非联合共和国的一个地区。博冈达主席，您代表着法属赤道非洲，请您负起责任来吧，请从地图上抹掉乌班吉，就象我们抹掉中央刚果一样，请邀请加蓬和乍得跟我们走吧。”

博冈达建议同中央立法议会一起组成统一的国家，其政府将向中央立法议会负责。原法属赤道非洲的领地划分成省，各省再分

成城镇和村镇。在过渡时期，一位国务部长将负责在与原领地相应的地区执行政府决议，政府主席则每年由乌班吉人、刚果人、乍得人和加蓬人轮流担任。

但是10月24日，中央刚果奥庞戈尔的一位支持者背叛，使布拉柴维尔的大多数人倒向尤卢（Youlou）教士。博冈达派议会主席里维雷和部长达科去拉密堡、利伯维尔和布拉柴维尔。乍得政府认为联合的计划为时过早。在加蓬，代表团遭到拒绝。11月24日，加蓬、乍得和中央刚果的代表谴责法属赤道非洲的“巴尔干化”，但表示赞成原法属赤道非洲的殖民地联盟立即解散。稍后，他们再次会谈以决定协调方式，不过他们对于确定协调方式都十分谨慎。

1958年12月1日，完全陷于绝望的博冈达宣布了仅限于乌班吉-沙立领地的国家宪法，以及他为渴望建立的辽阔国家所设计的旗帜，国家取名中非共和国。

### 独立前逝世

博冈达从12月2日起开始领导乌班吉新政府。两个月来，殖民部长格里奥同中非共和国的缔造者闹不和，离开了领导班子，离开领导班子的还有两位领导人：前主席古姆巴和内政部长达科。

1958年12月16日和1959年1月12日，博冈达先后主持了法属赤道非洲四块领地政府首脑会议。但在协调行动方面，大家主要关心结算问题。大委员会的权利届满日期定于1959年4月1日，这是真正的垮台程序，而且博冈达在法国电台发表的声明中，为分裂的法属赤道非洲在组成强大集团的世界中的渺茫前途而担忧。

对于博冈达领导的、缩小了规模的中非共和国来说，他在2月使一部十分自由的宪法获得通过。在宪法序言中所有公众的自由都一一列举了。他注意提出了新国家可以同其他国家签署部分或

全部放弃主权的协议。他定于4月5日组织选举，选出立法议会的60名成员，在立法议会中他希望有5名法国人的席位。

就在这次选举前的活动中，中非国家的缔造者悲惨地死去。1959年3月29日复活节，博冈达乘坐的贝贝拉提一班吉间的UAT北部—阿特拉斯（Atlas）航班在洛巴耶河左岸的博达（Boda）县坠落。

全国人民感到无比悲痛。4月2日，在班吉大教堂前的广场上许多群众为他举行葬礼。中非共和国尚未独立，而唯一能在困境中领导它的政治家却离开了它。黑非洲失去了一位最坚定的泛非主义战士。法国高级专员指出，这是一位懂得如此完全代表人民的非凡人物。乌班吉人民得知博冈达在基督教复活节当天惨死，感到很悲痛。

飞机事件的情况仍然是个谜。一份高级专员的公报指出，“飞机是在其航行高度或很接近航行高度飞行中突然炸裂的”。法国《快报》详尽报道了调查委员会一些成员认为飞机在飞行中爆炸的结论，因而被查封。

博冈达逝世时正值相邻的比属刚果即将发生大动乱。他曾几次飞越乌班吉去鼓舞那些他视为兄弟的人进行斗争。博冈达死后几个月，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利伯维尔恢复了中非共和国缔造者的同样语调，面对老殖民者，揭露中部非洲人民在殖民制度统治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当殖民利益在同整个广大刚果河流域新的政局寻求妥协时，曾追述过去的苦难以更好地激发对未来希望的两个声音却过早地沉默了。

（吴增田 摘译）

## 翁戈：一位反抗苛捐杂 税和强制劳动的加蓬酋长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东部加蓬除主要水路外，如奥果韦河，一直明显地拒绝了殖民入侵。阿万吉人 (Awandji) 这个部族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他们生活在奥果韦河附近，但他们占据着拉斯图尔斯维尔 (Lastoursville) 东南最近的地区。拉斯图尔斯维尔是1885年用马迪维尔 (Madiville) 的名字首先建成的一个简陋哨所。

### 阿万吉人

从表面上看，阿万吉人离群索居是由于不易进入茂密的森林和习惯于族内婚姻而形成的，但他们并不总是住在陆地上。第一批沿奥果韦河而上的白人，有第一次考察的布拉柴 (Brazza) 和在他之后的巴莱 (Ballay)，都提到了阿万吉人就近出现在奥巴马巴人 (Obamba) 和阿特齐亚纳人 (Atziana) 地区附近的奥果韦河的岛屿上。

阿万吉人和其邻居阿杜马人 (Aduma) 与班贾比人 (Bandjabi) 一样可能都来自东部，甚至来自东南部高山上被称作恩古阿迪 (Ngouadi) 的地区：所有这些居民都曾经生活在那里，但一场战争把他们驱赶得四处分散。他们划着树皮筏，沿塞贝河 (Sébé)、蓬博河 (Pombo) 和勒巴尼河 (Lebagni) 而下，直至杜梅 (Doumé) 急流，后来由于人数增加了，沿着奥果韦河一路欢声笑语，直至曼吉 (Mandji)，再到奔吉 (Boundji)；他们



到达时，仍在那里生活的只有俾格米人 (Pygmée) (巴邦戈人) (Babongo)，他们踏着大象足迹跟随俾格米人走，这种传统关系实际上清楚地表明他们逐渐进入茂密灌木丛林的方式。

不同氏族渐渐地分散开来，同时各自的语言也不尽相同。但是，尽管阿万吉人承认他们同奥果韦河的阿杜马人——他们有着相同的出身、方言、技术和宗教——甚至同库拉木图 (Koulamoutou) 的班贾比人有很近的亲属关系，但以其名称本身与他们截然不同 (万吉 = 不会游泳的人)，并且很快定居在丛林中。他们向阿杜马人提供丛林中的肉食，以换取奥果韦河中的鱼。实际上，阿万吉人躲进森林看来是为了提防奥果韦河人的贸易组织。划独木舟的阿杜马人和奥坎代人 (Okandé) 在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自己的贸易特权。同样沿海部落都在等待时机同大西洋的黑奴贩子一起进入港口，因为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从上奥果韦河至海边，通过断断续续分站进行的贸易活动来运送奴隶的目标仍主要是大约600公里的直线距离；阿杜马人往往从奥巴姆巴人和阿万吉人中获得奴隶……因此奥巴姆巴人和阿万吉人都撤走了。他们以打猎和以主要种植薯类与香蕉为生，每个村庄都有香蕉田，并种上各种豆科植物。打猎不仅用弓，而且用弩、标枪、陷阱，还用火石枪、活塞式枪和投刀。他们用树皮缠腰，用酒椰叶当上衣，茅屋复盖着捶打过的树皮。妇女制作沙锅、凉水壶和织席；铁匠炼铁，制造标枪、大砍刀等。

阿万吉人的居住与亲属关系一致：各氏族之间分布着耕地、打猎的路线和村庄周围的洼地。任何侵犯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各氏族间常因妇女或杀人而爆发战争；被俘的罪犯经过丛林中知名人物谈判解决后用货物或人员交换。

阿万吉人的村庄是一种妻住夫家但以母系确定血统关系的社会；舅舅是族长 (尽管今天这种习俗转向了父亲方面)；其财产传给他的兄弟或同母异父的外甥。

主要宗教社会是姆维里 (Muiri)，这是所有小伙子一到青

春期就可以参加的成年男人的教派。入教仪式很严格，也很秘密。新入教的人在胳膊和手腕上带有用刀子刻的有凸起花纹的特殊记号。这种社会与追查和惩罚任何罪犯的秘密警察相配合，可以说起到了保护生态和维护公共场所的作用。实际上，过分打猎、捕鱼或在丛林中采果有时会造成产品减少。姆维里很快就进行了干预，建立各种“自然保护区”，几年当中禁止到那里打猎、捕鱼或采果。

姆维里尤其怪罪妇女——它令妇女们非常害怕——以迫使她们保养道路和林中小道，或打扫茅屋周围的卫生；当人们有时听见姆维里黑夜在远处喊叫时，那么第二天的工作肯定做得又快又好……

### 特许带来的不幸

从1897年起，阿万吉地区和整个东部加蓬都变成了“上奥果韦特许公司”的领地（10.4万平方公里）。1920年该公司拥有43个代理商行，其中至少一半在租界地以外的奥果韦河下游和利伯维尔周围，其他的则建在水路沿岸；和阿万吉地区几乎没有关系，但和几支少见的当地生意人商队有关系，因为奔吉、拉斯图尔斯维尔和杜梅是最近的哨所。

一次大战后的状况几乎没有变化：大约1922年，代理人韦尔里（Werly）保证将所有供应向拉斯图尔斯维尔、库拉木图和弗朗斯维尔过境，并监督他的生意人在行走15天内到达。交换的货物主要是步枪和火药，其次是布匹、缝纫用品、小摆设、五金用品、盐、烟草和罐头。这位欧洲人固定借给每个生意人平均价值200法郎的货物。生意人要说明货物的用途。当他回到代理商行时带来例如价值150法郎的橡胶，代理人用同样价值的货物和他交换，以保证他总有同样数量的信贷。

生意人中有1/3是利伯维尔的加蓬人，1/3是加洛阿人（Ga-

loa)，其余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被雇佣半年或一年，每月固定工资为15至20法郎，外加每天15法郎的津贴，所有这些都用钱支付。至少直到一次大战时，强迫使用“海神”（冲制的大钢盘），付钱时值1.5法郎，但回收时只给50生丁的货物，这就使得任何发展都停滞不前。雇佣条件是很严格的。公司对生意人用其工资赔偿他们贸易中的冒险活动；对自卫队士兵实行罚款、坐牢或每浪费一颗子弹收费2法郎；对代理商行中通常雇佣一个月的职工实行扣除工资或津贴、罚款、无理指责货物；对运输工人和船工，晚付工资并只付给实物，凡超过事先确定的完成运输的期限，实行停发工资；对工地雇佣的工人实行很严厉的纪律，扣发津贴；最后，对大家都实行专断措施，如专横地维持过期的雇佣合同和在劳动期间扣除工资等。从那时起，人们就明白了该公司反对殖民干预。它十分坚决地表示不希望在它那里建立政府和建立碍手碍脚的无用监督哨。公司代理人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常常显得很尖刻，而这种分离政策却损害了租界地的经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监察关系就决定了根本不可能试图开发转归公司的广阔领地，尤其是租界地的东部。尽管租界法令期满时（1924年底）又出现了新的贸易公司，但该地区还是被放弃了。从1928年起，该公司决定集中它的商行，以批发和半批发取代零售。它关闭了费用太大的弗朗斯维尔和奥孔贾（Okondja）的代理商行。1930年，从博韦（Booué）到弗朗斯维尔的整个地区处于半荒芜状态。

### **反抗的根源：捐税**

当殖民政府也力图填补特许公司留下的空缺时，阿万吉地区才开始做出反应。翁戈酋长从1923年起就纳税。捐税实际上是想作为殖民制度的必要手段；必须向政府纳税的非洲人同时应该收

获产品以得到必需的款项。殖民主义空论家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好处：殖民地会得到额外收入；至于“当地人”，会因此领略到他们所缺少的“劳动情趣”；他们可以利用估计会得到的收入逐渐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他们将会置身于现代经济社会之中。“这将是使当地人最终养成劳动习惯的非常容易的方法”。

由于殖民政府拒绝为强制劳动正式担保，从捐税中产生出来的强制权在享有特许权的人和官员们看来，是一种灵丹妙药，是任何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最初的文章常常提到捐税的效能，这是唯一强迫“当地人进行生产和利用地面财富”的方法，同时迫使他们“养成经常劳动的习惯，没有这些习惯，不可能对租让的土地进行开发”。

但是，在这个刚刚开始使用货币的地区，起初只得征收实物税；因此常常为了促进“有益的劳动”，政府注意要橡胶而胜于象牙：橡胶需要付出收集的劳动，而象牙则相反，只能来源于村酋长利用送嫁妆或继承遗产的机会到处征收储藏的象牙。所以对于捐税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丝毫也不感到意外：用少量的财政投资，以多少隐蔽的形式开始了强制劳动；其结果只能激起非洲人消极抵抗和促使村庄解体，但也没忘记持续不断地进行零星反抗。

漫不经心的管理，加上自然障碍和居民的反抗使得一切努力都不奏效。征税的资金是不起眼儿的：从1902年的仅6万法郎达到1903年的15万法郎。后来从1907年开始直到战争前夕，整个法属赤道非洲最高达到100万法郎，即几乎不到殖民地收入的 $\frac{1}{5}$ 。这一进展主要是因为每人的税率增加了3至5法郎和扩大了对妇女的征税。但是1915年，尽管由于战争的努力再次提高了税率，但捐税只勉强增加了30万法郎。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捐税继续上升：在加蓬内地个人税率达到了7.5法郎，继而达到10法郎。然而人们发现非洲人被沉重的人头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缴纳

人头税需要付出好几个月的劳动。可是，经常不断的财政拮据仍导致再次提高税率，从1926年至1930年，加蓬的税收不断增加，1926年为260万法郎，1927年330万法郎，1928年370万法郎，1929年480万法郎和1930年510万法郎。

尽管1930年发生了危机和地方行政官员建议削减税金，但各殖民地都接到了命令，“只能非常小心谨慎地走这条（削减税金的）道路”。自梅兰（Merlin）指示后，捐税的原则和征收捐税都没有改变。人头税虽然很少，但却引起了预料中的极大失望。非洲人只是感觉到了被敲诈勒索，而不补偿他们劳动的成果。当然，官员使居民们放心，作为交换，他们将受到保护和控制给酋长的礼物。但看来这只是不兑现的诺言，政府同酋长们达成的协议是虚假的。

财政上的迫切需要迫使殖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施加压力。从那时候起，政府规定每个月必须报告统计工作，在每个区巡视和调查的情况，以便“增加捐税的收益”。“只需告诉当地人：‘如果你们不同意，就将象叛乱分子那样被烧死’。”11月份，有几个村庄遭到了轰炸，以使当地人受到有益的恫吓。

居民们准备以消极抵抗，继而以人口外流，甚至以暴力作出反应。这种情况到处都一样。只要“指挥官”稍微不耐烦或高声恫吓，村庄的人就会消失在森林里而不希望返回。由于行政官员们必然要采取行动，各村的人加快了逃跑速度。

这就是阿万吉人能自以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都受到保护的原因。但是，当他们也感到被侵略时，从拒绝纳税到武装反抗，这中间只迈了一步。

### **起义的直接原因：服养路劳役和建立市场**

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于1928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直到当时非常平静和政权结构非常松散的地区在这次行动中团结一致和旷

日持久的抵抗，在起义进行了两年并经过了好几次战斗才告结束。

翁戈 (Wongo) 是公认的酋长。他生活在贝拉迪 (Beladi) 土地上的贝姆贝卡尼 (Bembekani) 村。但是他通过家庭关系和当地所有酋长都有姻亲关系。因此得到姆维里一致支持的起义大大超出了其区域本身的范围，包括了邻近卢维迪 (Louwedi)、巴代库卢 (Badékoulou)、里孔多 (Licondo)、莱伊布 (Léhibou) 和里孔迪 (Licondi) 各村。换言之，足足有12名酋长联合起来给以人员、武器和粮食的实际援助。大家都接受翁戈的领导。在有限地盘内村庄密度较大，促进了整体的团结。人们估计这次起义涉及的居民有1000多人，最多达1500人。

起义是怎样爆发的呢？最初，因要求服养路劳役的人而引起了一次事件。根据传统，管辖区指挥官在翁戈那里派了一名卫兵，以保证招收服养路劳役的人。这名卫兵带回了翁戈的一个叫布朗代 (Boulandé) 的亲儿子进行虐待：用皮鞭子抽他，并指着茅坑向他叫喊：“我们要把你爸爸塞进茅坑。”布朗代回到村子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被哨所召见的翁戈拒绝去那里。于是指挥官派了卫兵。

服养路劳役——或1915年以来规定的无偿强制劳动——实际上除要求纳税外，是1926年刚刚在这个地区增加的。劳役的目的是配合村酋长保证进行地方工程（养护村庄街道，清除村子周围的丛枝灌木，整治哨所，修建市场茅舍和宿营地）。最初确定每年服劳役7天，1925年增加到15天，而且要求所有成年人都参加，弱、妇、15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除外，但要补交钱50生丁，后来交1法郎，在加蓬甚至交2法郎；不过在事实上尚不存在货币的内地如何准备钱呢？

这项新增加的措施虽然有限期，但非常不得人心。这是因为服养路劳役的人已经没有了报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住的。当然，从1925年以来就规定给离家走一天以上的人送饭。剩下的就只有阿

万吉妇女不得不往返走两天让他们的男人三天中一天有饭吃……

在士兵们看来，被丢弃在丛林中的劳役任凭出现种种滥用行为：象雨点般地用牛皮鞭子抽人，除漫长而艰难的劳役外，还经常有运输的苦差事，最少负担30公斤。饥饿、疲劳、疾病和没宿营地造成很多人死亡。

服养路劳役和强制劳动逐渐混同起来，强制劳动同样不给报酬。“上奥果韦公司”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提供的地区以抓光劳工而著称。后来该公司由殖民政府接替，作为交换，政府可以得到缺少劳动力的森林经营者提供的奖金。

事实上，殖民地总督每年都给每个区确定为森林工地招收劳工的数目。1925年阿杜马区要求的数目达到1500人，1927年为1400人。招收劳工一般是强迫进行：夜里士兵突然闯入村庄，用皮鞭或刺刀把人从家中赶出来。被抓到的男人用绳子拴住脖子，由几名武装卫兵押送到工地。如果是白天闯入村庄，男人们有时还能跑掉。于是妇女和儿童就被当作人质，直到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出现，被卫兵强行招收为止！这些一无所知的男人被要求在模仿拿破仑法典的“劳动合同”上划十字。这些“志愿者们”有时不知道自己被派什么用场和将要干什么活。他们的路途遥远，粮食供应没有保证。当他们到达工地后，有另一种野蛮的工头接替士兵。

因此，居民起来反抗丝毫不惊奇。在上奥果韦河地区反抗的呼声四起，居民们仇恨士兵，士兵是殖民国家最明显的代理人。实际上是派代理人来突袭村庄，扣押人质，焚烧房屋，以便抓走服养路劳役的人或加快收税。当他们在一个村庄暂住时，就由这个村庄养活，征调母山羊、鸡、鱼、肉、香蕉和木薯。

在奥孔贾南部的奥塔拉（Ouala）村响起了该地区的第一次警报。奥贝盖（Obegué）的巴特凯人（Bateké）、奥塔拉和阿卡拉巴（Akaraba）的奥巴姆巴人团结得象一个人，共同反对政府或商人低价收购产品，反对服养路劳役、捐税和卫兵的敲诈，反对

逮捕他们当中的恩杜姆巴鲁拉 (Ndoumbaloula)。1925年3月，他们将该地区的行政官员堵在了村子里。借口“礼仪罪”被关在弗朗斯维尔的恩杜姆巴鲁拉逃出了监狱。奥孔贾分区长假装来统计奥塔拉的人口，再次逮捕了恩杜姆巴鲁拉并想重新把他关进弗朗斯维尔的监狱。帕特凯人和奥巴马巴人在奥贝盖的昂科罗 (Enkoro) 酋长和奥塔拉的加斯东·布米 (Gaston Boumi) 酋长的带领下，拿起武器释放了恩杜姆巴鲁拉，俘虏了行政官员，切断了勒科尼河 (Leconi) 上的桥梁，以阻止敌人得到上级的援助。这一消息迅速传开。一些志愿者从弗朗斯维尔、拉斯图尔斯维尔、奥孔贾出发，去从奥塔拉和本地区“驱赶白人”。“奥塔拉的马蜂窝”只是随着邻村勒基拉 (Lekila) 的奥苏古 (Ossougou) 酋长的背叛才告结束。

奥塔拉的暴动尽管短暂，但通过暴动中形成的团结一致和白人是可以抗击的证明，对整个国家东部的居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预兆着拉斯图尔斯维尔的阿万吉人将发生暴动。两次暴动之间没有中断。

阿万吉人暴动的导火线似乎是再次强迫向行政管理所周围的市场供应粮食。

拉斯图尔斯维尔哨所的粮食供应事实上既不充分也不经常。1927年12月，政府试图通过建立象弗朗斯维尔那样的市场来改变这种状况，每片土地所负担供应的粮食同有关酋长都进行了讨论。从理论上讲，提供粮食的次数和数量是根据居民点的距离与能力。距离最近的土地的男人每15天去一次。其他的男人每21天、28天或42天去一次。运输粮食要动员1/4或1/3的居民——如果组织得好，那么三次中他们只会去一次市场。这种义务本身还不显得过分沉重。但对哨所长来说，市场很快就变成他同居民们建立经常联系的时机；就在这一天他要求派服养路劳役的人，而且让人在提供粮食的同时缴纳定为15法郎的捐税。在15天的劳动中，服养路劳役的人还需要村里妇女送四、五次饭。1月19日，在贝



拉迪和莱伊布，各有30人逃跑。2月6日，30人在马卡迪乌姆 (Macadioum) 逃跑。21日，41人在穆沃迪 (Mouvodi) 逃跑。4月23日，在巴迪亚 (Badia) 和莱伊布，又各有20人逃跑。

定期向市场供应粮食会直接使酋长们忙得喘不过气来。“从来没有听到过服役路劳役或分担公共义务”的阿万吉人，难以忍受这种新的奴役，它可能是命令去刚果一大西洋工地上干活的前兆。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勉强。

### 起义的发展过程

于是谋杀行动在加速进行。翁戈请求所有阿万吉人给予援助。发生第一次事件后15天，有一个班的士兵在米波拉波萨 (Miporapossa) 附近遭到突然袭击。最后，7月初，朝翁戈村庄去的40名卫兵在马苏库 (Massoukou) 附近再次遭到该村居民的攻击，这些居民得到了米库马 (Mikouma) 居民的援助。这些零星的动乱是似乎长期准备的一次行动的初步征兆。几个月来，似乎各个村都储备了火药，这些火药是从代理商行那里买来的。

政府在分区里登记了590枝枪。卫兵们到处搜寻隐藏的武器。他们用火烧人的脚好让人们招供出武器，这样造成了许多人死亡。行政官员采用这种手段终于使人交出了200枝枪。但是其余的仍隐藏在各村庄里。

翁戈可能力图进一步扩大行动。他请求阿杜马人给予援助。阿杜马人似乎完全“腹背受敌”：由于他们拒绝同翁戈联合，翁戈就指责他们引来了白人并让白人发动进攻，而有怀疑的法国人则指责他们向阿万吉人出售了火药。

行政官员于是试图进行和解。他派穆潘多 (Moupindo) 酋长去见翁戈，向其提出放下武器，实现和平。但是翁戈拒绝了。

1928年11月，于是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行动：科尔迪埃 (Gordier) 中尉带领77名士兵，配备30枝步枪和4000发子弹，试图去

蓬吉 (Poungui) 分裂地区中心建立一个临时监视哨。尽管村庄被占领，但是村民们的骚扰迫使他过了五天，丧失 8 名士兵后打了退堂鼓。

阿万吉人成功地利用合适的森林潮湿地带展开了游击战。他们由邻居和潜伏在所有大路上的观察哨递送消息，在敌人周围放警戒哨，全力攻击其劳役队，甚至在夜间攻击敌营房。他们不搞任何猛烈进攻。但是在通常做好准备的地方，通过细心掩饰一系列障碍经常设下埋伏。很显然，在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有效的指挥部；在布置的每一支 10 人最多 40 人的部队中都拥有一个在适当时刻命令发射火力的首领。

严格意义上的战争行动从 5 月中到 8 月 9 日延续了两个半月。重新占领蓬吉村用了三天时间。一直到当时参战的有 80 名卫兵，配备了 3 万发子弹，后来又得到了 88 名士兵的增援，从 7 月 15 日开始最终战胜了 4 组阿万吉人，每一组有 60 来枝步枪。阿万吉人最后失败是因为飞来了一架水上小飞机，它飞过叛乱地区的上空以使居民们感到恐慌。

8 月 9 日翁戈投降了，送香蕉意味着提议和平。但是勒泰斯蒂 (Le Testu) 要求他和所有战士一起投降。他交出了 100 枝枪。在土著步兵方面，暴动并没有造成很大伤亡：从 1928 年 7 月至 1929 年 8 月，总共 9 名被杀，18 名受伤和 2 名病死。阿万吉人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了这些，不过并未进行估计。但是“上奥果韦公司”的一位老代理人回忆了叛乱分子头躺在木砧上被博韦的土著步兵集体处决在当地留下的惨状。被俘虏的至少有 150 人。翁戈和莱西比被判处在班吉 10 年的政治监禁。三个月后他们在转移中死亡。但很快就出现了关于他们的传说，而且该地区的居民会永远纪念他们的。因为这一地区还根本没有屈服。

镇压结束后，行政官员勒泰斯蒂在 1929 年 10 月中制定了重建计划：大部分村庄被烧毁了。这些村庄需要重新安顿，尤其需要紧急改变灾难性的粮食状况：遭受蹂躏的莱伊布土地一无所有了。

一贫如洗的农民为了不被饿死以至砍倒棕榈树充饥。总之，到处是饥饿的威胁。

最后是政治方面走上正规：殖民地步兵的吕莫 (Rumeau) 军士被任命为蓬吉哨所长，负责最后进行逮捕。同时他还接到命令，直到新命令下达前，禁止无论是个人、小组或村庄的任何迁移。

镇压结合管制获得了预期结果：这一地区——很快受到了普遍经济危机的影响——从此以后被认为是“顺从”了。1930年，整个地区都被占领了。但是翁戈的战争不会只限于及时回击在两次战争之间殖民压力越来越高的要求。它反映出更为根深蒂固的不平衡，表现出30年来居民们所经历的深刻变化。这是第一个殖民时期的古老型反抗运动，还不同于现代的解放斗争。阿万吉人的反抗迅速而彻底地遭到了创伤严重的军事失败。这是因为他们反抗的目的在于恢复“白人之前”的时代，他们掌握的初级技术手段敌不上殖民对手的技术手段，而且还没有发展成政治组织，也没有发展成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此，翁戈的反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完全不同于刚果安德烈·马特苏瓦 (André Matsoua) 的反抗运动，这一运动同样在1929年被打垮，但是明显地产生了更具有现代思想的影响：先是更深思熟虑的不满情绪，然后爆发出对“白人”或“指挥官”的愤怒，发生了并不一定表现为暴力的政治事件。但是这次反抗运动在1930年还只是暴力的开端。

(吴增田 摘译)

## 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 先驱者安德烈·马佐阿

法国殖民主义者从1839年开始侵入赤道非洲，到1910年全部占领这块土地，前后一共花了71年的时间。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刚果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大多处于自发的、零星分散的状态。直到出现了由安德烈·马佐阿(André Matsoua)创建的“法属赤道非洲人友谊会”(Association amicale des originaires de L' Afrique Equatoriale Française, 以下简称友谊会)后，刚果才有了一个对法国殖民者进行斗争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组织。

### 马佐阿生平

安德烈·马佐阿于1899年出生在离布拉柴维尔不远的的一个拉利人<sup>①</sup>的村子里。他在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念过书，后被教会派到拉利人聚居的马亚马恩库卡村任传教士。这个工作使他有了解农村广大群众的疾苦和要求。但乡村对他来说毕竟太狭小了。不久，他毅然辞去传教士的工作，离开偏僻的乡村，来到了布拉柴维尔。

他在布拉柴维尔海关找到一个雇员的工作，不久，他又感到布拉柴维尔这个天地对他来说还是太小了，于是他凑足旅费，于1925年动身去法国。在法国，他参加了法国的军队，并参加过镇压摩

---

<sup>①</sup> 拉利人是人们对居住在普尔和布拉柴维尔地区的刚果人的称呼。——译注

洛哥里夫起义<sup>①</sup>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他重返巴黎，并以“老战士”的身分申请加入法国国籍，并取名叫格雷纳尔（Grenard）。马佐阿在巴黎逗留期间，遇到不少中部非洲的同胞，他把这些流亡的黑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于1926年7月创建了“法属赤道非洲人友谊会”。

“友谊会”发展很快，总部设在巴黎，在波尔多和马赛成立了分支机构。法国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支持，并与它建立了联系。马佐阿的行动在法国获得了初步成功之后，在1928年和1929年，他先后派遣代表到法属赤道非洲和比属刚果向当地人民宣传“友谊会”的宗旨和筹募基金。留在巴黎的马佐阿于1928年6月和10月曾两次向法国上书，对法国制定的剥夺殖民地人民政治权利的“土著人法”提出抗议，还揭露殖民当局在非洲实行的强迫劳动和独裁专制的政策。在第二封信中，他还批评了法国各商会和殖民当局对刚果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并指出正是这些弊端妨碍了赤道非洲的经济发展。

“友谊会”在非洲得到迅速发展。在该会的影响下，刚果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不断发生。殖民当局对非洲人民斗争的迅速发展感到惊恐不安，决定采取锁压措施。1929年，除逮捕了从巴黎派回刚果的“友谊会”代表和当地领导人外，马佐阿也在巴黎被捕，并于12月被押送至布拉柴维尔受审。

“友谊会”的领导人以诈骗罪在布拉柴维尔土著人刑事法庭受审，审判是按照“土著人法”进行的，根本无视马佐阿已取得的法国公民资格。1930年4月3日下午，法庭宣判，对马佐阿及其他领导人判处3年监禁，流放乍得5年。

1935年9月，马佐阿越狱成功。他经过千辛万苦到达巴黎，但开展活动已很困难。为了避开警察的视线，他只能秘密地进行

---

<sup>①</sup> 1921年至1926年，当地居民在阿卜杜·克里姆（Abdel-Krim）领导下，抗击法国和西班牙的侵略军。——译注

活动。经过三年艰苦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开办夜校和职业介绍所。

1939年1月，法国政府再次作出决定，解散“法属赤道非洲人友谊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佐阿再次志愿参军，以表示他对法国的忠诚。但是，1940年5月，他却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捕，并被秘密押解到布拉柴维尔。经过秘密审讯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直到1942年1月，因在监狱中倍受虐待而死去。

### 马佐阿的政治主张以及“友谊会”在非洲的发展和影响

马佐阿从小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不论在非洲的农村，还是流亡巴黎期间，他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探索各种问题。他在农村担任传教士期间，就对非洲人的贫困落后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索。到布拉柴维尔后，他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使他对刚果的社会问题、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认识到造成刚果人贫穷和落后的真正根源。他只认为刚果人应该争取与白人平起平坐地商讨黑人的利益和前途。这个认识反映了当时黑人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很快博得黑人的信任，并把他视为黑人一切利益的捍卫者。

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是他政治思想逐步成熟的时期。他除了广泛接触流亡在法国的黑人外，还结识了不少法国自由党的开明人士，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他逐渐明确必须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去解放自己的同胞。

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去解放黑人呢？他认为，首先应争取黑人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而争取平等权利的首要条件是先从教育着手，就是要培养一批赤道非洲的知识分子，然后在与宗主国保持友谊的情况下与殖民者平起平坐地讨论黑人问题。法国共产党曾想从思想方面去影响“友谊会”，却被马佐阿拒绝了，他坚持

自己不过问政治、先从事教育的想法。

马佐阿对宗主国的态度很明确，在宗主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抨击殖民统治的弊端，幻想以和平的手段，解决黑人的问题。他给法国政府上书，抨击殖民统治弊端，不过是以法国公民的身分提出的。

因此，创建初期的友谊会，主要是一个互助共济的团体，其宗旨在会章第四条第5款中已明确规定：“尽一切可能提高法属赤道非洲人的道德和知识水平，然而，这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和宗教的考虑。”会章第十五条还特别说明，该会得到殖民部长和法属赤道非洲总督的赞助。

所以，马佐阿派回非洲的代表们受到当地官方隆重的接待。他们顺利地 在利伯维尔、利奥波德维尔、黑角港和布拉柴维尔陆续建立了“友谊会”分会。殖民当局也表示赞同“友谊会”从事教育的宗旨，甚至还决定每年给予1000法郎的津贴。1929年底，在统一和谐的气氛下，在刚果—拉利族的居民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争取了更多的群众，使“友谊会”会员发展到1.3万多人。

虽然派回非洲去的“友谊会”代表们在非洲活动的地区有一定的局限性，马佐阿本人也以不过问政治自居，但“友谊会”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就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远远超出创始人所能预先估计的形势。“友谊会”的代表们要想得到刚果人的支持，就得启发刚果人的民族意识。他们赞扬刚果民族的光荣历史，讨论未来的前景，这无疑给刚果人民心中点燃起民族希望之火。原来，生活在扎伊尔河两岸的刚果人，总是以兄弟相称，他们以迪亚·恩托莱拉 (Dia Ntoléla) 刚果王国的后裔而自豪。他们一直希望摆脱殖民统治，恢复到那个闻名遐迩的王国时代。“友谊会”的出现，不啻是在希望之火上增添了一把干柴。他们渴望重新获得白人到来后就丧失掉的政治独立。因而一张“友谊会”会员卡似乎就成了希望的象征。代表们在群众中受到了特殊的欢迎。许多人

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倾听代表们的演讲。听众们对他们的期望甚高。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他们演讲的内容慢慢地从社会问题发展到具有政治意义的主题上来。

同时，募款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几个月之内，募到的捐款竟达11万多法郎。捐款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因为当地居民的捐款，不仅是为了帮助在宗主国劳动的同胞，而且在群众思想上还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即通过这笔钱来赎买土地，以恢复他们失去的自由和独立。因为按照当地的习惯，战败者可以用钱赎买被战胜者所占领的土地。另一种想法是，为了获取公民权而缴付捐款。殖民地人民向殖民者纳贡，是为了争取平等的地位。这些想法，实际上反映了刚果人民自治和独立的要求。

“友谊会”在非洲的迅速发展远远超过了建立初期所宣布的宗旨。在“友谊会”的影响下，不断出现刚果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28年爆发了以工人为主的、反抗殖民当局强迫劳动的起义，也是反殖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斗争，是由于监工侮辱修筑布拉柴维尔—黑角铁路的工人而引起的。后来，这个斗争发展成为反对一切建筑工程和种植园的强迫劳动制度的群众性起义。起义群众要求取消强制劳动和沉重的赋税。这次起义扩大到几个省，坚持数月之久。

1929年12月，当马佐阿被监禁和押送刚果的消息传开后，在刚果，特别是在拉利人居住地区引起轩然大波。那里的村长、地主和酋长一起开会，商讨对策，一致强烈谴责殖民当局阻碍黑人的解放，以及他们所采用的专横手段。马佐阿的被捕迅速提高了刚果人民、特别是拉利人的民族觉悟。他们在布拉柴维尔和普尔地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发起一个反对“土著人法”和社会不公正待遇的运动。除了在农村和布拉柴维尔举行公开的示威活动外，还成立了一些半地下组织，采取消极抵抗的手段，拒绝向城市市场供应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以致造成布拉柴维尔等城市一时粮食严重匮乏的现象。



1930年4月2日晨，就在法庭审判“友谊会”领导人的当天，布拉柴维尔市政广场上，数以千计的群众举行集会，以表示他们对被指控者的支持。几百年来，这还是刚果第一次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示威活动。

4月3日在法院判决马佐阿等人之后，大批黑人涌进市政府，捣毁了市政府办公室；行政官兼市长和几个副市长都挨了打。经过军队几小时的武装镇压，才把占领市政府和广场的拉利族群众赶走。以后，接连好几天，在布拉柴维尔非洲人居住的地区，拉利人和警察之间，不断发生流血冲突；同时，各行各业的拉利人为了表示抗议，进行了几天的罢工。

马佐阿等人被殖民者判了刑，刚果人民对殖民者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从期望转为怨恨，从此对殖民当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非洲人拒绝参加法国国庆节的庆典，酋长拒绝接受殖民者赠送的礼品，农民拒绝把农产品送往各市场，造成城市和各驻军哨所农产品供应奇缺。

尽管刚果地区的黑人仅仅采取了消极反抗的态度，法国殖民者却如临大敌，继续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把敢于反抗的黑人送往正在修筑的刚果—大西洋铁路工地上，充当苦役；还把“友谊会”成员或同情“友谊会”的黑人官员撤离工作岗位。

1934年到1935年约半年光景，“友谊会”与殖民当局的关系曾一度缓和下来，原因是新任总督执行了怀柔政策，允许“友谊会”恢复活动，并鼓励其发展。但是，随着这位总督的意外死亡，黑人与欧洲白人之间的关系再度恶化。直到1938年，面对着居民愈演愈烈的骚乱，殖民者变本加厉地派警察监视群众，派飞机在农村上空巡逻警戒。随着运动的发展。刚果人民在政治上的要求成为斗争的主要内容。拉利族的酋长决定向殖民者提出“自治”和“划出一个地区，使拉利人能完全独立地生活”的要求。

## 马佐阿斗争的局限性以及马佐阿主义的诞生

马佐阿富于正义感，对本民族黑人兄弟充满了同情和友爱之情，但是，他却幻想通过文化教育，去提高黑人兄弟的地位，以解决殖民地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触动殖民制度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相反地，他对宗主国一直抱有幻想。两次志愿参军以表明他对法国的忠心，直至被法国当局逮捕，也未能清醒过来。1929年11月，在他写给辩护律师的信中，还幻想自己和其他刚果人已是100%的法国人。他说：“我们早就参加了保卫祖国和扩张殖民地的行动，现在不能怀疑我们的忠诚。虽然我们是有色人种，但政府对待我们，应该象保护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畔的居民那样保护我们。期待着政府给我们以公正的待遇，给我们最低限度的权利。政府不应当阻挠我们的努力，而是把我们提高到同一切其他公民一样的生活水平。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国家。”他是一个热爱本民族和黑人兄弟的民族主义者，但与现代的民族主义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企图用和平手段，争取黑人与白人平等权利的思想里还混杂着与宗主国合二而一的想法。马佐阿一生都在寻求实现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平等对话，但这一梦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作为早期争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历史人物，在刚果（布）各政党诞生之前，他的艰苦奋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确曾大大启发过刚果人民要求独立和自由的觉悟。至今，他仍以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而受到刚果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在马佐阿等人第一次被捕，“友谊会”遭到殖民当局残酷镇压之后，该组织仍然存在了下来，但已变成了一个半地下组织，还换了一些以传教士为主的新干部。这个时期的“友谊会”，虽然没有改变其最初的宗旨：即从知识上求解放，以期达到政治上的解放。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政治理想已经蒙上了一

层宗教色彩，但刚果群众仍痴心地等待着马佐阿象神一般的归来。

马佐阿从乍得逃跑的消息传出后，刚果人幻想马佐阿正在巴黎与宗主国友好谈判，以解决他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1942年，马佐阿死于狱中，但拉利人因为没有看见他的尸体，而断然否认他已死亡，并固执地认为他又逃走了，日后会象救世主一样回来解放他们。从此以后，“友谊会”成为一个纯宗教性的神秘主义的组织。它有自己的教义、仪式、戒律、象征物和传教士，并按“友谊会”各个不同的前领袖分成许多派别。但是，他们全都相信马佐阿要返回刚果。可以说，刚果人在“友谊会”的影响下，对殖民者的反抗行动一直在继续，殖民当局对刚果人的残酷镇压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利族的许多优秀人物认识到马佐阿斗争的不彻底性，并摆脱了神秘的宗教束缚，走向新的政治征途。一支新兴的民族主义力量取代了以部族为基础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马佐阿主义。

但是，直至1960年刚果独立的前夕，仍有一小部分马佐阿主义的虔诚信徒，还坚持自己的立场。从1945年到1960年之间，在刚果曾举行过多次选举，而总是拉利人首先站出来反对，或是顽固地投写马佐阿名字的选票。

在“友谊会”的启发下，刚果-拉利人曾写过许多反殖民主义的爱国诗歌，现援引其中的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刚果，和平的土地；  
为什么你被外国士兵的脚步  
践踏得动荡不安？  
刚果，哭泣吧，诉说吧；  
告诉我们，你究竟属于谁？  
刚果！

（康 昭 编写）

## 芒杜姆和奥万博族反抗安哥拉的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芒杜姆 (Mandume) 是奥万博族<sup>①</sup> 主要分支库安阿马 (Cuanhama) 人的最后一个国王。他是该族反抗葡萄牙最后征服的主要领导人, 这种反抗行动经历了两代人的时光。从他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抗行动的规模看, 可与几内亚的萨摩里·杜尔相比, 但却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甚至许多当代人也不知道他的事迹。1915年, 他曾控制南安哥拉局势达10天之久, 间接地掌握了全安哥拉的命运。

罗安达的一些民族主义者提出芒杜姆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因为他曾在安哥拉南部边界英勇地反抗葡萄牙人统治。然而, 他主要是奥万博族的领袖, 为了保持库安阿马人的独立, 确切地说是不会被葡萄牙人所吞并, 而该族人所在的地方正是殖民者切割的国境边界地区。这个边界地区的斗争也可划入纳米比亚的反抗行动之列, 因为这块地区究竟归属于哪个国家的争论从那时就已开始。事实是: 更多的边缘地区是属于安哥拉的。芒杜姆是一个维护奥万博族独立、要求保持昔日旧秩序的典型人物,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他还拥有3.5~4万名武装战士, 而且战士们所持有的枪支都很精良。就兵力而言, 超过了1974年前安哥拉所有民族主义者。

芒杜姆成为殖民者心腹之患。只要这个坚强的核心存在, 殖民者就不能夸耀自己完成了“平定”的任务。由于芒杜姆及奥万

<sup>①</sup> 奥万博族是安哥拉南部的最大种族。——译注

博人武装力量的存在，葡萄牙企图向库内内河（Cunene）、鲁皮孔（Rubicon）的东南方向扩张的野心遇到了很大阻力。

### 持久的战争

显然在1975年殖民统治垮台之前，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宣称已占领安哥拉达“500年”之久。实际上，1845年集中在罗安达居住的葡萄牙人，占他们总人数的87%，总共才1832人；葡萄牙人实际占领的面积不过占安哥拉全国总面积的1/20。直至本世纪初叶，安哥拉2/3的地区还是完全独立的，因此葡萄牙对安哥拉的实际控制地区是很狭小的。此外，从最近揭露出来的材料看，安哥拉各部族于1849年到1878年间，相互残杀的时间持续80个月之久；以后从1879年到1926年是殖民征服的最后阶段，在这47年当中，葡军人数共3.08万名，其中一半时间用于打仗，进行大、小战斗约150次。从1902~1919年间，军事行动的次数之多令人咋舌。前后228个月中，竟有192个月在打仗，其中与马克希姆人（Maxim）和克鲁博人（Krupp）的斗争占了绝大部分时间。

由于奥万博人的反抗，葡萄牙人向南安哥拉派遣了至少1.35万名士兵（实际约2万名），并始终对奥万博人保持军事戒备状态，直到芒杜姆去世为止。对于本世纪初居住在安哥拉的葡萄牙人来说，奥万博人居住的边境地区比任何其他边界更危险。因为奥万博人不仅拒绝葡萄牙人建筑碉堡，还定期向臣属于葡萄牙人的非洲人发起进攻。北方奥万博人的反抗活动，是以库安阿马人的国王和将帅为核心的，其中又以芒杜姆最为强大，最不妥协。

### 奥万博人的社会

与库安阿马人接触的第一个白人，是名叫布鲁查多的商人。他于1850年在库安阿马的第一个国王统治的社会里生活了一段时

期。当时的布鲁查多估计库安阿马人口约12万，仅次于中安哥拉的乌姆本社人（Ovimbundu）。大部分奥万博人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库安阿马人实行绝对的专制统治，历届国王都是残酷地剥削人民的暴君，因此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十分紧张；对外的侵犯活动也连续不断，朝着东、西、北三个方面，向以下各部族发动进攻：

（1）库阿马多人（奥万博族分支，库安阿马人的西部邻居）。

（2）洪贝人（Humbe，库内内河左岸的前主人，葡萄牙人在该地区建立了前哨堡垒）。

（3）北方其他洪贝人建立的雏型国家。

（4）埃瓦勒人（Evale）和卡菲马人（Cafima）（奥万博的两个北方分支，在北部有几万居民）。

（5）在上库内内河与上库巴戈河之间，一些不同的甘格拉人（Ganguela）集团。

（6）本世纪初，居住在卡孔达（Caconda）小堡垒的乌姆本社人和受乌姆本社同化的人。

库安阿马人征服行动的辐射面达450公里，不仅威胁葡萄牙的南部统治，还包括中安哥拉地区。

这种侵袭行为延长了封建贵族统治的时间。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奥万博人的统治者成为真正的军事集团。他们在频繁的征服活动中，吸收各种不同种族的武士，形成一支庞大的武装。掠夺来的战利品使国王和国王的部下富有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侵袭活动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实际上，库安阿马人并不是一个闭关自守、拒绝技术革新的民族，情况正好相反，1850年时，武士们还只有弓箭和标枪，仅经几次贸易就改变了他们与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最初进入奥万博族社会的商人和猎手有英国人、瑞典人和挪威人，继后还有芬兰和德国的传教士，最后才是南部的布尔人。葡萄牙人垄断了进入这个腹地的捷径，但是他们不会使

用四轮拖车，他们的产品质量低劣，所以他们与当地人的贸易数额不大。

奥万博人特别是库安阿马人把奴隶贩卖给葡萄牙人，后者再将奴隶发送到葡属巴西的庄园里劳动；用以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酒精和武器弹药。进口的衣服和马匹归各部落酋长所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助长了疯狂的掠夺行为，侵扰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需要。

虽然有些专家对库安阿马人的军事力量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库阿马多人和埃瓦勒人的力量比库安阿马人强大。然而，后者的人数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众多的仓库（专为储藏和贩卖掠夺品以及存放战俘赎金之用）足以使该族人在50年内建立一支常规部队，监视葡萄牙人在库内内河右岸的活动。

葡萄牙人从莫萨梅迪斯 (Moçamedes) 登岸，采用残酷的手段缓慢地向库内内河靠近。1859年，葡萄牙人曾在洪贝地区建造了一座粘土构成的碉堡，后来因为罗安达政府财政拮据，1867年又放弃了该堡。葡萄牙的军事力量一直龟缩在边境地区。1879年之后，形势才稍有变化。白人传教士杜巴尔盖 (Duparquet) 于1882年拜访了库安阿马的齐邦德卡国王 (Chipandeka)，据该教士估计，库安阿马人在1879年约有6万人。齐邦德卡国王并不熟悉葡萄牙人，却畏惧梯尔兰人 (Thirstland) 和特雷凯尔人 (Trekkers)。后者属布尔人分支，他们沿着奥万博人居住的土地到达南非，从库邦戈河到达考科韦尔德 (Kaokoveld)。葡萄牙人最后在威拉 (Huila) 接受了这批信奉基督教的移民，移民为征服南安哥拉带来两个有利因素：

- a) 数百名优秀的射手；
- b) 可以运输超重物资的牛拖四轮车。

葡萄牙人于1880年重新占领了洪贝。1883年，葡萄牙人向洪贝地区的南巴迪 (Nambadi) 国王送去一面旗子，当时他已拥有20匹马和3000名用步枪武装的战士。杜帕尔盖神父于1884年在南巴迪国王领土上创建了教会。因为葡萄牙人没能在库内内河之外

找到一个听任摆布的傀儡，也未能通过葡萄牙的高级传教士潜入刚果的圣萨尔瓦多。葡萄牙人唯一可靠的“代理人”是法国的传教士，虽然他们之间的利益有矛盾，但仍相互利用，原因是奥万博地区是属于基督教和德国影响的边缘地区。

由于南巴迪国王难以驾驭，1885年底，他被“消灭”了。新国王韦伊鲁（Weyulu，1885~1904年）要应付来自两方的敌对力量——葡萄牙人和德国人。后者于1886年用分割库安阿马人领土的办法来划定他们殖民地的边界。库内内河的出海口（鲁亚加纳瀑布至今还由南非人管理）一直不能确认归属。1927~1928年以前，边界线一直未划定，换句话说，是在结束了库安阿马人的独立之后才解决的。这种没有确定边界线的局势被各届库安阿马国王巧妙地利用，在他们统治的土地上，有1/3（或1/2）的部落臣服于柏林政权，而为了保存权力，他们周旋于里斯本和柏林政府之间。

1885~1886年，葡萄牙人镇压洪贝地区发生的第一次暴动。该地区的国王查翁戈（Chaungo）接受库阿马多人的军援。洪贝地区的第二次暴动发生在1891年，葡萄牙派来镇压的军队与韦伊鲁国王联盟，该国王是臣服于葡萄牙人的。库安阿马地区被正式宣布沦为葡萄牙统治，韦伊鲁国王派遣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队伍协助葡萄牙殖民军追逐洪贝叛军，这支叛军退到库阿马多地区。当时库阿马多分裂为两个王国：小贝格诺王国和大贝格诺王国。在这里，我们不能准确地解释韦伊鲁国王与葡萄牙人合作和攻打兄弟民族——库阿马多人的原因。

### 主要的敌人

葡萄牙殖民军指挥官彼德尔率领4600名士兵和两门大炮，穿过库内内河到达班贝（Pembe）这个可以涉水过河的地方，向大库阿马多王国挺进。库阿马多与库安阿马一样，是一块被水洼地



隔开的平原，树林和白蚁巢是射击手的掩护体。葡军第一次侵入奥万博地区时，地形有利于库安阿马人。1891年7月12~13日，葡萄牙人营地被库安阿马人包围，进攻的战术是奥万博人经常采用的死胡同战术，包围圈的一面是库内内河。彼德尔估计当时进攻的人数约1万人。集中这么多的武装人员，在安哥拉近代史中还是第一次，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葡萄牙人畏缩了，他们看到炮兵部队没能挫败奥万博人的士气，奥万博人对这种“神奇”的武器居然无动于衷。

此外，这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他们擅长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作战。葡萄牙殖民军的士兵主要是在降服了的殖民地地区内招募的，指挥官又不善于对付象这样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因此在库内内河之外的战争，总是遭到惨败。如果不能及时从葡萄牙本土输送援军和武器装备是难以取胜的。

自1891年起，奥万博人成为葡萄牙人在荒漠的南安哥拉的主要劲敌。1891和1892年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属于葡萄牙管辖的并由库安阿马人居住的地方，创建了教友会。韦伊鲁国王对其他宗教信仰漠不关心，却重视双重国籍给他带来的好处。洪贝地区第三次叛变（1897~1898年）的起因是一场牛瘟。韦伊鲁国王只是间接地站在葡萄牙人一边。葡萄牙人经过一场十分残酷的战斗，才把这次叛变镇压下去。

韦伊鲁国王并不了解非洲历史，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可以与罗得西亚马特贝莱人(Matébélés)的洛炳古拉国王(Lobengula)的实力相提并论。在韦伊鲁国王统治时期，库安阿马人的社会已经发展起来：德国的基督教会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在那里活动起来；许多国家的使臣从萨达班代拉(Sadabandeira)和温得和克(Windhock)纷至沓来；还有许多不同民族的商贾也蜂拥而至，他们以原始的掠夺手段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

本世纪初叶，大家对库阿马多地区的情况知道并不多。在整个奥万博地区，只有库阿马多人胆小而多疑，因此，商人几乎都

不去那里，甚至洪贝地区的权贵都不敢贸然涉足库阿马多人居住的地区。

### 奥万博人的伟大胜利

宗主国终于在1904年下决心发起攻势，首先攻打库阿马多地区，然后占领库安阿马地区。葡萄牙驻威拉（Huila）的总督若阿·马利亚·戴阿吉阿尔上尉率领40名军官、467名欧洲籍士兵和613名非洲籍士兵，包围了奥万博地区。除1860年征服安哥拉西北部的那次战役之外，以后如果没有布尔人的帮助，葡萄牙人是不可能安哥拉集中一支正规军的。此外，葡军指挥方面存在明显的弱点，他们所采用的作战方法仍是巴德尔13年前使用的，且军官们犹自沉醉在征服莫桑比克的喜悦之中，不愿再拼命。韦伊鲁国王于1904年夏去世，接班人是他的兄弟南德（1904~1911年）。南德登基时，虽有一批人表示要与白人继续战斗下去，而南德却想与白人建立联盟关系，一直接兵不动。

阿吉阿尔上尉犯的错误是，他没有首先攻打这位举棋不定的王国，而是去打奥万博地区的硬骨头——库阿马多人。9月13日，葡军再次渡过库内内河到达班贝水洼地。约2万到3万的库阿马多的战士，排列在几公里长的战线上严阵以待。葡军中许多人患病，指挥官又无能，而库阿马多人的子弹象雨点似的射向葡军，使葡军动弹不得。阿吉阿尔为了摆脱在南部被困的处境，于1904年9月25日，派遣了一支由500名士兵和两门大炮组成的侦察分队，进攻中安哥拉的几个王国，并取得了成功。

库阿马多人利用时机悄悄地设置陷阱，诱使侵略者陷入4公里宽的水洼地之中，隐蔽在树林中的武士，突然发起攻势。他们利用20年前从翁东加人（Ondonga，住在南部“边界”）那里购买到的武器，组成一个强大的火力网，向陷入圈套的分队进攻。葡军抵挡不住，除倒下的军官外，都纷纷夺路而逃，阿吉阿尔上

尉束手无策。得到大炮掩护的葡方援军遭到库阿马多人的袭击，抓到的白人统统被库阿马多人杀死。这一次有名的战役被称为“班贝水洼地失败”，是一次最惨重的失败，是葡萄牙人在安哥拉近代史上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挫折，约损失306人。

阿吉阿尔上尉甚至不敢去收回250具尸体（其中有110名欧洲人）、丢弃的两门大炮和两车军需品以及几百枝步枪。葡萄牙人为了挽回这次惨痛的失败，又花了三年的准备时间。

### 葡萄牙的报复（1907年）

从此，葡萄牙人不敢再轻视奥万博人的力量了。1905年和1906年，葡军又在库内内河边进行了一番紧张的军事活动，集中2400名士兵，包括上千名欧洲人，于1906年9月，向库阿马多地区进发。在陡峭的河岸边，葡军建造了一座以罗萨塔指挥官命名的碉堡。当时，南德国王与前任韦伊鲁国王一样，协助葡萄牙人攻打库阿马多人，并同意殖民参谋长率军经过自己的领地。库安阿马人在1906年就已拥有1.5万枝枪，其中8000枝枪质量精良。

1907年葡萄牙人与库阿马多人之间的战争，是葡萄牙人发起的一场复仇战。葡军中有87名军官，1306名白人士兵，906名非洲人和200名助手，还配备了10门大炮和4挺重机枪，指挥官是罗萨塔。葡萄牙最害怕的“奥万博联盟”只形成了一部分。南德国王失去了一部分酋长的支持，没有参加联盟。库安阿马人向库阿马多地区派遣由12名酋长率领的4000名武装人员，洪贝人和南部边境的奥万博人都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据罗萨塔估计，当地部队总人数约2.5万名，其中武士约1.5万或2万人，7000人持有各种步枪。这是当时安哥拉人为反抗葡殖民军而组成的最大一次联盟。然而，出现了一个叫加里巴鲁拉（Caripalula）的叛徒，一个没能登上大库阿马多王位的可怜虫。他出面引导葡军走到当地部队必经的沼泽地。

另一位西赫特凯拉 (Sihetekela) 国王从一开始就错误地让葡军进入他所管辖的库阿马多·贝格诺地区。1907年8月27日，在距库内内河10公里的地方，葡军进入姆菲罗 (Mufilo) 的入口处，成功地牵制了先头射手，在密集的机枪火力面前，库安阿马武士被迫后退了。当罗萨塔部队往前推进时，库安阿马人却错误地去攻打奥刚果 (Aucongo) 碉堡，葡军以护墙和壕沟作掩蔽体，三次打退了库安阿马人的进攻。9月10日，罗萨塔部队继续前进，13日到达第二个战略要地达墨格罗 (Damequero)。此刻只剩下库安阿马人孤军奋战，由于缺粮和南方盟友纷纷撤退，在敌人强大的炮火前，库安阿马人纷纷倒下。最后活着的爱国者围绕在西赫特凯拉国王周围，决心拼一死战。葡军采用焦土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挺进，最后占领了西赫特凯拉国王和舒拉国王分别居住的村子，并以两村为基地去攻打奥万博地区的主要据点 (今日的库阿马多)，并用巡逻部队把库阿马多分割成两块。

初期，两个被追逐的国王领导着武士进行游击战。舒拉国王于1908年被击毙；而西赫特凯拉国王于1907~1909年进行了两年毫无希望的复仇战；南德国王看见大势已去，先后承认了葡萄牙和德国的宗主权，从而保留了一条通往南方的自由道路。

在葡萄牙新总督阿尔梅达 (1908~1910年在位) 离任时，南德国王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库安阿马是葡萄牙人对南安哥拉始终未能驾驭的最后一个大王国。奥万博地区成了殖民政权的心腹之患。南德国王于1911年初去世，他的继承人芒杜姆 (1911~1917年在位) 却完全不是殖民者所喜爱的那种庸碌之辈。

### 独立的捍卫者

1911年，芒杜姆年方20岁，就被誉为新型的传统君主。他曾在德国教会学校念过书，精通德语，也会葡语，穿着象一个欧洲

猎手，但首先是一个独裁的君主。他竭力采用现代化手段以巩固政权，不择手段地打击那些对专制制度提出异议的人。在他的四年统治之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他抗衡，他清除敌视他政策的首长，启用非库安阿马族人，甚至用奴隶来取代他们。他仇恨欧洲人，迫害所有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信徒。在政治上，芒杜姆坚决捍卫全面独立。这个主张深得人心。

从1911年到1916年，安哥拉中南部发生了灾荒，约25万人死亡，占当地人口半数以上，因而大大削弱了军事活动。为了生存下去，库安阿马人向葡属领地的部族发起了抢夺行动。据葡军估计，1912年，库安阿马武士人数约有3.5万到4万人。葡军从北、西两面封锁芒杜姆部队所在地，以图解决奥万博问题。

### 葡、德冲突

当时突然发生一件大事，打乱了里斯本当局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入南安哥拉的计划。1914年10月19日，当葡军封锁南部边界时，在诺里拉碉堡附近杀死了几名德国军官。两个月后，于1907年打败库阿马多人的罗萨塔部队遭到德军的袭击。芒杜姆并没有利用这次机会去攻打葡军，而在1907年战争中失败的西赫特凯拉国王却投身德国人的怀抱，鼓动库阿马多人行动。由于罗萨塔上校的失利，葡军放弃了在奥万博地区修建的所有碉堡，丢盔解甲的葡军把葡萄牙人10年内在库内内河东岸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而后撤的葡军不断地受到袭击，一部分人被库阿马多人和埃瓦勒人所消灭。到1914年12月18~19日，库阿马多地区完全摆脱了葡萄牙人的控制；到12月23日，埃瓦勒地区也已摆脱了葡军的控制；罗萨塔部队还被迫放弃了洪贝地区。

葡军总共损失1000枝步枪，200万发弹药、几百枚手榴弹、4挺重机枪、两挺轻型炮和19门大炮，换句话说，一个武器库完整地被芒杜姆所缴获，从而改变了南部力量与葡军的对比关系。

库内内河东岸的战争发生在饥荒肆虐的时期，1915年的第一季度，洪贝和奥万博地区重新获得了自由，但这是一个尸骨成堆的自由时期。

葡萄牙人的这次失败在整个安哥拉引起连锁反应。反葡活动在刚果、隆达和宽扎南部此起彼伏，葡萄牙人没有援军，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葡萄牙人得不到信任的危机席卷整个安哥拉。葡萄牙的一些部队逃到威拉东部高原，等待假想的德国人进攻。

1915年3月，里斯本政权任命前作战部长佩雷拉·戴埃萨将军为总督；并向安哥拉派遣265名军官，7489名士兵和60门炮与机枪。这是1964年以前，葡军在安哥拉投入的最大的一次兵力。加上罗萨塔远征军剩下的兵力，佩雷拉于1915年7月向安哥拉南部派去317名军官、6166名欧洲籍士兵和763名非洲士兵，配备的武器有：26门炮、28挺重机枪、几百辆战车和28辆卡车。从兵力和配备的武器上看，葡军最高指挥部是很重视这场战争的。

芒杜姆曾在葡军哨所里安插间谍，但没能制止住敌方发动进攻。住在西南非洲的德国人不愿支持这个难以控制的奥万博“盟友”；虽然还有一些国籍不明、思想倾向不清的商人还敢冒险走到库安阿马地区去，却未能对芒杜姆的武器库提供什么帮助，就是说，芒杜姆得不到任何列强的援助。奥万博人与其他非洲民族主义的不同点是，总是孤军作战，对国际舆论一无所知。国际舆论对这些“不适合时代的人”是不会有利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居留的地方既无宝藏，也无出海口。

### 最后的战斗（1915年）

由于灾荒，洪贝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高达80%。佩雷拉率军于1915年7月7日顺利地占领了洪贝，并实行大屠杀的恐怖政策。幸存下来的洪贝人都逃至库安阿马地区参加战斗，据佩雷拉夸大了的估计，约有8万到10万人进行抵抗。葡军派出三个支队，不

费力地重新占领了诺里拉、库阿马多和埃瓦勒等三个地方，司令官佩雷拉本人亲自率领一支由103名军官和242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向库安阿马进军。

芒杜姆先让葡军进入蒙古阿（Mongua）沼泽地，自己的部队则集中在最珍贵的财富——水源的四周。葡军自从远离库内内河以后，一切用水全靠卡车运送，缺水现象十分严重，牲畜纷纷渴毙。芒杜姆的亲信卡洛拉（Calola）任指挥官，率领边境11个部落的兵力，于8月18日向葡军发起进攻。当时葡军实力雄厚，拥有16挺重机枪和8门大炮，是不容易被打垮的，可是由于行军途中损失了大批有运载能力的牲畜，部队失去应有的灵活性。然而，芒杜姆也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让葡军运载军需品的卡车安然通过，给洪贝后方基地造成很大的威胁。为了支援卡洛拉部队，芒杜姆所率部队向蒙古阿移动，8月19日，葡军挖掘了壕沟并夺取了有水源的地方。

在生死存亡的危险面前，芒杜姆懂得须拼死夺回失去的要地。8月19日晚，他率领全部人马（包括33名酋长）抵达前线。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挂帅的国王是从不亲临前线的，可是，这一次他一反常规，亲自指挥，准备决一死战。芒杜姆集中了4.7万人和1.2万枝精良步枪，大部分是商贩运进来的，另外还有5辆满载军需物品的布尔人的车子，他们所拥有的兵力，比1895年库库阿纳国王在莫桑比克的兵力还大4倍。非洲除埃塞俄比亚外，在殖民军对热带非洲的征服战争中，还从未出现过人数这么多的非洲抵抗力量。

在蒙古阿，实际是全民参战，也是安哥拉最大的一次战役，各个种族的人民团结一致，为的是驱赶一支共同的外国侵略部队。经过库阿马多、埃瓦勒和洪贝等地战争而幸免一死的人，甚至一些昔日仇恨芒杜姆的人，都纷纷前来参战；只有南部的奥万博人却原地不动，因为他们认为，葡萄牙人不会侵犯“边界”后面的人。8月20日，经过10个小时的浴血战斗以后，葡军被死死围困

在驻地不得动弹。饥渴交迫的2700名葡军不得不四处寻找后退的出路。8月22日，来自库阿马多的葡萄牙援军到达之后，形势才发生变化，芒杜姆只得撤退至西南非洲的翁东加人（Ondonga）居住的地区。当时正值一位南非的参谋军官在那里访问，他访问的目的是宣布奥万博兰（Ovamboland）从此归于比勒陀利亚当局管辖。翁东加人的国王向南非特派员控告自己受到无端的攻击，要求仲裁。8月31日，葡殖民当局宣布芒杜姆的行动属“叛乱”性质，芒杜姆不得已又转到南部介于两块殖民地之间的12公里宽的中立地区。此时，他的主要将领卡洛拉已无力制止葡军进占恩吉瓦了。

整个奥万博地区已成一片废墟。1914~1915年，葡萄牙为了争夺纬线一度的地方，一年之内牺牲了819名士兵，大部分白人死于疾病，非洲人则死于饥渴。

芒杜姆坚持留在中立地区，誓死不肯投降。此时，他还有2000名武士以及500枝步枪和5万发子弹。然而他部队军心已散，内部发生了哗变。

芒杜姆所犯的第二个主要错误是，他既仇恨葡萄牙殖民军，又不肯向温得和克政权靠拢。1916年10月13日，他在中立地区遭到伏击后，就把屠杀的矛头转向他下属的首长，他不懂得武士的时代已结束了，仍然以1914年最强大的国王自居。

温得和克政权两次限期要他前去解释自己的行动，当时他虽然囿于一个十分狭窄的地方，但对南非的限期指令十分不满，并傲慢地回答说：“我是一个男子汉，不是妇女，我要战斗到最后了一颗子弹，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温得和克政权最后调遣了693名南非骑兵和114名非洲步兵向芒杜姆部队逼近；而葡军则在南部边境屯兵以待。

芒杜姆失去了所有的“盟友”和战争的拥护者。1917年2月6日，芒杜姆本人还坚守在中立地区（后属英国领地），进攻者经过30分钟的机枪扫射后，发现了芒杜姆的尸体。



从此以后，大批的难民开始往南迁徙，自由的奥万博被消灭了，但只是暂时的！

(康 昭 摘译)

## 根根亚纳和莫桑比克十分艰难的谈判

加扎 (Gaza) 的尚加人 (Shangana) 最高首领根根亚纳 (Gungunyane)，从1884年至1895年统治了罗得西亚东部和莫桑比克南部的好儿部分地区。在莫桑比克现代史的非洲传统君主中，他是最有影响、最著名的一位。

### 对话的年代

尽管根据亚纳合法地直接继承了其父姆齐拉 (Mzila) 酋长的王位，但这并非没有问题。其兄弟马弗马内 (Mafemane) 是他的主要对手。在1884年8月其父死后的数月中，根根亚纳清除或流放了所有对手。他一直担心逃亡在斯威士兰的王位继承者阿纳纳 (Anhana) 和马法巴泽 (Mafabaze) 再次出现，他们的支持者也使他焦虑不安，以致在谈判中，他常常要求葡萄牙人把他们交出来由他照料。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内，继位问题一直是动乱的因素，也是葡萄牙人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从而使这位非洲酋长越来越神经过敏，性情暴躁。

根根亚纳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在加扎北部的马尼卡兰 (Manicaland) 进行，目的是想抓获马尼卡兰的穆塔萨 (Mtassa) 酋长。鉴于19世纪80年代在马尼卡兰山进行的几次远征均以失败告终，因此他热衷于取得欧洲的武器和技术，他的外交活动反映了这种追求。1886年6月，根根亚纳在同葡萄牙使者阿尔梅达 (Almeida) 商谈时，得知了火箭的威力，于是他要求葡方提供大量火箭，以便把绍纳人 (Shona) 从山里赶走。这位酋长尽管没有得到这种火箭，但他对马尼卡和马绍纳的土地和居民却早已垂涎三尺。

根根亚纳懂得，葡萄牙人的力量将会不断加强。葡萄牙人拥有火器，正在扩大其在海边的地盘，并开始对马尼卡地区发生兴趣。1881年，葡萄牙军官派瓦·德安拉达(Paiva de Andrada)曾经去过那里，但未能从姆齐拉老酋长那里夺得租界。1884年，葡萄牙政府计划建立“马尼卡区”，并以军事首领戈韦亚(Gouveia)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苏萨 Manuel António de Souza) 的名字为首府命名。戈韦亚的私人军队开往赞比西河以南，为葡萄牙征服新的领地。

1885年，葡萄牙人急忙派何塞·卡萨莱罗·达莱格里亚·罗德里格斯(José Casaleiro d'Alegria Rodrigues)，去说服根根亚纳派两名军事首领到里斯本，以承认葡萄牙的宗主权，双方于1885年10月12日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根根亚纳答应服从葡总督的法令和命令；不让任何其他国家控制其领土；允许一名葡萄牙代理人在其政府中充当顾问；在各村升葡萄牙国旗；准许葡萄牙人在加扎领土上自由来往；只准持有葡萄牙特许权的人采矿；同意建立教会和学校。利用这项条约，根根亚纳宣称对加扎领土拥有完全的司法权、管理权和征税权。按条约的第2款规定，没有根根亚纳的允许，葡萄牙不能诉诸武力。

1886年，葡萄牙代表阿尔梅达再三向根根亚纳要求得到在马尼卡兰采矿的特许权，但没有成功。因为根根亚纳认为：许多沿赞比西河和索法拉(Sofala)居住的葡萄牙“巴拉佐”<sup>①</sup>都是向穆塔萨纳贡的，因此根根亚纳拒绝给葡萄牙人以特许权。他的顾问告诉阿尔梅达，尚加人注意到葡萄牙人打算利用条约和诺言在伊尼扬巴内(Inhambane)地区扩张势力，如果他们在马尼卡也得到特许权，就会把葡萄牙人的统治扩展到加扎内地。当阿尔梅达援引1885年由根根亚纳的“密使”签订的条约时，这位酋长反驳说：协议空洞无物，那不过是为得到加扎土地所设置的骗局。他公开

---

① “巴拉佐”是指享有皇室特许权的人。

提请人们注意：“该条约只有助于获得土地”。

从1887年起，根根亚纳开始将注意力由北方转向南方。因为南部地区原来臣服于他的通加人(Tonga)和乔佩人(Chope)起来造反了。1869年至1877年间，一个原籍法国的商人洛福特(Loforte)武装了作为葡萄牙盟友的乔佩部族。洛福特策动伊尼亚里梅河(Inharrime)西部的乔佩族居民反抗尚加人。大约在1884年，约有20名乔佩酋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葡萄牙人纳贡，以换取葡萄牙人的支援，来防御尚加人。这样，乔佩人的领土就成为根根亚纳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根根亚纳面对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来自加扎领土上主张进行收复战争的人；另一种压力来自葡方代表，他们极力制止根根亚纳对臣属于葡萄牙的部族进行征讨。

1888年，根根亚纳终于作出了对加扎前途生死攸关的抉择：将村庄从罗得西亚高原边缘迁到林波波河(Limpopo)河谷。据统计，有4万至10万人开始迁徙。有几部分人于1889年4月出发，而酋长则在6月15日离开塞林达山(Selinda, 罗得西亚)。虽然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苏萨在马尼卡影响的不断扩大推动了这次迁徙，但导致根根亚纳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本原因，是他想同林波波河与伊尼亚里梅河之间的乔佩人算旧帐：他想收复其父在被称作比莱内(Bilene)地区的土地，尤其想惩罚某一位乔佩酋长。据口头传说，这位酋长曾写信侮辱了他，信上说这头“狮子”(指根根亚纳)有一个“大肚皮”。1889年，根根亚纳大举入侵乔佩人领土，在今天称作曼雅卡泽(Manjacaze)村附近建立了一座村庄。这场反对乔佩人的战争一直进行到他统治的末年。

尚加人被长途跋涉所削弱，途中缺衣少吃，很快就遭到乔佩人的奋力抵抗。对方战士都躲藏在堡垒后面。1890年1月在包勒(Baul)岛战斗中，乔佩人曾打败了尚加人。

1889年，数千名尚加人的迁移，使南莫桑比克的部族解体，根根亚纳大大接近了海边的葡萄牙机构。虽然尚加人经常战胜乔佩人，但他们的冲突牵动着葡萄牙人的利益。战争提出了加扎兰

南部主权的归属问题：谁对非尚加部族行使权力，是根根亚纳呢，还是葡萄牙人呢？

当根根亚纳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身不由己。他周围的欧洲和非洲顾问以及他众多的亲属对他不断施加影响。根根亚纳最有名望的将军、战争总指挥马吉加纳（Magniguana）拥有重要权力。从外表上看，马吉加纳既不是尚加人，也不是恩古尼人（nguni）；他可能是恩达尼人（ndani），甚至是乔佩人或沃伦格人（volenge）。他是主战派，而且还代理酋长的秘书甚至充当主事。正如阿尔梅达所提到的那样，根根亚纳听从“秘书马吉加纳和许多军事首领的意见，他怕和他们闹翻，尽管他也担心和我们争吵”。在根根亚纳统治末期，马吉加纳和其他军事首领对他施加压力，促使他停止谈判，并向葡萄牙人宣战。

1889年和1890年，关于加扎兰的国际争端进入了新阶段。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南部的主权受到英国南非公司的威胁。于是根根亚纳不仅要对付这些不择手段的特许权谋求者，同时也必需对付其他人。姆齐拉曾于1874年在加扎兰给予第一批特许权，其中一个名叫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的人获准开采黄金。自1888年1月起，根根亚纳接待了类似的特许权谋求者，他在1888年至1891年间同意给欧洲人以特许权。这些欧洲人通常以英国金币向根根亚纳支付。

早在罗得斯（Rhodes）的代理人到达这里之前很久，葡萄牙人就承认根根亚纳是位能干的谈判代表。根根亚纳得到的声誉是一位不停地推行“扩张”政策的“贪得无厌的野心家”和“粗暴的阴谋家”。他在内外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受到葡萄牙顾问阿尔梅达的钦佩。曾见过他的欧洲人起初几乎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纯粹的酒鬼，但居住长久的欧洲人后来悄悄改变了这种印象。一些葡萄牙人送给他大量的酒，以助长他爱酒的嗜好，指望借酒“淹没他的野心”。但阿尔梅达看到，这位酋长通常规定自己早晨不过量饮酒，因为早晨他需要处理问题或审理案件。阿尔梅达明确说过：

“这个伟大国家君主（指根根亚纳）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表现了所有臣民所公认的伟大”。

1890年，根根亚纳禁止在加扎卖酒，并限制巴尼亚(Banya)商人贩卖葡萄酒和朗姆酒。现在根根亚纳同意考虑从一个宣称自己不仅代表一家公司而且代表英国政府的人那里得到枪支、弹药和金钱，这个人名叫舒尔茨(Schulz)。根根亚纳怀疑他是江湖骗子，于是就同部族人商量：“舒尔茨真代表女王吗？”与此同时，根根亚纳写信给英国驻洛伦索—马贵斯(Lourenço Marques)的副领事史密斯(Smith)，向他打听舒尔茨的情况。

虽然史密斯在1891年以后正式成为英国领事，但他仍暗中支持罗得斯的扩张计划，他希望英国在加扎扩大影响。英国南非公司给史密斯的回电中说：“舒尔茨全权代表罗得斯和英国南非公司，望加强他对国王（指根根亚纳）的影响。”不知根根亚纳是否相信这些保证，因为他一直是谨慎行事的。舒尔茨曾描绘根根亚纳这一特点：“国王十分多疑和高傲，他不接受白人的任何保证，他要先得到商品后再签字”。

罗得斯最初指示舒尔茨的目的是让他取得“英国作为保护国的地位和升起英国国旗”的权利。他的另一位代理人、曾于1891年拜访过根根亚纳的丹尼斯·多伊尔(Dennis Doyle)设想得到根根亚纳的批准，建立“白人共和国”。

1890年10月4日，根根亚纳口头同意舒尔茨所要求的签署特许权条约。尽管英国政府没有授权，但特许权却被看成是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结盟的条约。条件是在每年的补助金外，再提供1000枝枪和2万发子弹。这些条件几乎等于通过拉德(Rudd)特许权<sup>①</sup>向根根亚纳的邻国洛本古拉<sup>②</sup>(Lobengula)提供的礼

---

① 拉德特许权是1888年10月罗得斯的代表拉德从恩德贝莱酋长洛本古拉那儿获得的特许权。

② 洛本古拉是现今津巴布韦土地上的恩德贝莱酋长。

物，只不过多了“两头公牛、一匹马和一只英国看门狗”。答应给根根亚纳的货物于1891年2月运到。

尽管舒尔茨为获得特许权费尽了心机，但由于1891年6月11日英葡签署瓜分加扎王国的条约，舒尔茨特许权被宣布无效。加扎兰北部成为英国领地，而根根亚纳的王国南部绝大部分领土被正式确认为葡萄牙领地。无论如何，1891年中根根亚纳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罗得斯和根根亚纳分别作出的最后努力也无济于事。1891年初，英国南非公司曾试图收买拥有加扎股份的葡属莫桑比克公司，但枉费心机。1891年4月，根根亚纳派代表团前往英国，企图同女王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亦于事无补。

在特许权谈判中，根根亚纳在利用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内部矛盾方面上不乏言语上的技巧。他要求恢复对伊尼扬巴内区的管辖权，并指责葡萄牙人唆使自己去南方打乔佩人；他也摸了罗得斯代理人的底，出人意外地要求将每年的补助金额由300磅增加到500磅。

同时，根根亚纳与阿尔梅达商议，决定在1891年不派首领去伦敦，他一直不承认派首领是去请求英国的“保护”。在他和葡萄牙人私下交谈时——不同于有罗得斯代理人在场的公开交谈——他愿意根据传统对葡表示“友好”和“结盟”。

1891年危机过后，葡萄牙当局不再担心英国南非公司进行直接干预，他们就建议对根根亚纳采取“等着瞧”的和平政策。后来成为皇家驻莫桑比克特派员的安东尼奥·埃内斯（António Enes）提出了一份重要报告，主张容许根根亚纳“半独立”，同时伺机予以打击。他写道：现在根根亚纳由于国内政策的失当而失掉了本部族的支持。他在被征服部族中选择宠臣的做法引起周围恩古尼族顾问的强烈不满，目前尚加军队中恩古尼人战士较少，而从较弱部族中招来的新战士却较多。在报告中，埃内斯还预言：根根亚纳因喝酒过量而不久人世，然后他众多的儿子会争夺继位。由于他在远征中强占牲畜和妇女而激起了贵族的愤怒，所以他失

去了巨大影响。这个报告在夸大根根亚纳弱点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要求真正而确实的独立”。

尽管根根亚纳一直自主而慎重，但他受到了阿尔梅达的影响。当阿尔梅达不常驻加扎时（1892年和1893年），根根亚纳就让儿子曼加给他写信。一封注明为1892年5月11日的短信说，他拒绝了英国人恳求他“变成英国人”的建议并回复说：“过去我父亲是葡萄牙人，而我则永远是葡萄牙人”。

由于尚加人对萨比(Sabi)河以北公司的领地进行远征，葡萄牙当局争取同根根亚纳达成协议。作为莫桑比克公司的代理人，阿尔梅达从1893年10月30日至12月13日同根根亚纳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11月19日根根亚纳保证同意协议。

在一次公开会见中，根根亚纳承认萨比河以北为葡萄牙莫桑比克公司的特许领地，表示不进行任何干预。交换条件是：根根亚纳将得到一半的税收。这项包括14项条款的协议被根根亚纳欣然接受，其中包括：莫桑比克公司征服加扎北部部族时根根亚纳将提供兵源；此外，准许首领们招募通加人从事公共事业。阿尔梅达指出，莫桑比区公司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它和葡萄牙政府一样没有军队，而尚加人自1820年以来就在当地保持着军事霸权，而且根据1891年莫桑比克公司章程和1885年附件，都承认根根亚纳对整个加扎领土的最高权力，在加扎使用军队进行干涉是非法的。

尽管根根亚纳公开保证同意协议，但如同1890年对舒尔茨特特许权那样，他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阿尔梅达指明了其原因：

“根根亚纳从未签署、现在也不签署任何文件，因为他不能阅读，也不相信别人给他宣读，即便宣读的人是他的亲儿子曼加”。

这项临时协定被接受后一周，由罗得斯代理人向根根亚纳提供的1000枝枪中的大约800枝，在曼雅卡泽附近茅屋着火中被烧毁。是谁干的呢？是象阿尔梅达后来肯定的那样发生了意外事故吗？其实，阿尔梅达有理由毁掉枪支，而且以后不让其他武器再落



入酋长手中。为此事，根根亚纳大发雷霆，坚持要求葡萄牙政府向他提供1000枝新枪，并向他交出一直流亡在斯威士兰的姆齐拉继承人。自1893年12月后，尚加人开始加深对葡萄牙人的敌视，并一概敌视特许权谋求者。同乔佩人长期拖延的战争更增加了这种敌意。在战争中，尚加人又损失了大约200枝枪。

1894年6月，根根亚纳在瑞士传教士的帮助下向英国南非公司正式提出书面抗议。在抗议书中，根根亚纳肯定舒尔茨是南非公司的正式代理人。公司借口这份抗议书没有马吉加纳的签字而予以拒绝，但仍继续向根根亚纳支付每年800英镑的特许权费用，至1894年9月为止，均由郎登（Longden）向根根亚纳本人直接付款，此后则通过葡萄牙政府进行结算，“以避免同根根亚纳直接接触”。

当尚加军队和葡萄牙军队接近最后对抗时，局势牵动了邻近的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和斯威士兰。根根亚纳与洛本古拉关系密切。1887年前，根根亚纳的姐姐嫁给了洛本古拉，他们之间还有其他血缘和姻亲关系。1893年马塔贝莱战争<sup>①</sup>在加扎兰引起了混乱，罗得西亚的非洲人到处避难。许多恩德贝莱人（Ndebele）征得根根亚纳同意后定居在比莱内下游。1895年6月，美国驻莫桑比克领事叙述说，罗得西亚战争以来，赞比西河以南的非洲人处于“动荡状态”。葡萄牙人利用洛本古拉的失败对根根亚纳施加压力。1894年3月，一位葡萄牙高级官员让人转告根根亚纳，“漂亮的言辞”再也不够了，必须遵守诺言。

整10年来，洛伦索—马贵斯地区成为混乱的场所：一些龙加人（ronga）小酋长为争夺霸权而相互交战。1894年爆发了一场战争，根根亚纳本人可能卷入了。在科西内（Cossine）和马加亚（Magaia）地区的洛伦索—马贵斯周围足有30公里范围内，“几乎所有酋长”都宣布他们依附于加扎。

---

<sup>①</sup> 1893年以罗得斯为首的英国南非公司入侵马塔贝莱兰。——译注

1894年8月22日前后爆发了非洲人反对葡萄牙军队的战争。数周中，定居在洛伦索—马贵斯北部的非洲人在齐萨萨(zixaxa)的马拉祖勒(Mahazul)和马蒂贝雅纳(Matibejana)酋长带领下进攻了该城。1894年10月至1895年1月间，曾几次发起进攻，但都被葡萄牙驻军打退了。

### 武器“发言”和“狮子”被捕

尽管爆发战争的迹象以及葡萄牙人的侵略性越来越明显，根根亚纳与葡萄牙人的谈判继续进行。此时，控制莫桑比克对葡萄牙人来说已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葡人放弃了1891年至1894年间和平谨慎的政策。1895年1月，当野心勃勃的安东尼奥·埃内斯作为葡萄牙特派员到达洛伦索—马贵斯时，他正式拒绝根根亚纳作为谈判代表，同时积极地试图组建一支2000多名欧洲士兵的部队。1895年2月2日，装备着机关枪和卡宾枪的这支部队在马拉居内(Marracuene)战胜了反抗的龙加人。

谈判在曼雅卡泽继续进行。根根亚纳仍要求阿尔梅达1894年12月返回。根根亚纳向葡军朱迪斯·比克(Judice Bicker)中尉许诺，他不会进攻伊尼扬巴内并将派使团去洛伦索—马贵斯求和。阿尔梅达作为葡萄牙使者于3月返回，任务是让根根亚纳同意成为葡萄牙王国的附庸；在未承认时，他要阻止尚加人参与洛伦索—马贵斯周围的激烈反抗。

阿尔梅达察觉根根亚纳惶惶不安和犹豫不决。莫桑比克南部几位小酋长的被捕、监禁然后被流放到安哥拉，使这头“狮子”心绪不宁，他邀请这些小酋长的家庭到他的驻地避难。当1895年初其他酋长到他的领地避难时，他也给予保护。

当埃内斯制定分三路纵队进攻加扎兰的计划时，阿尔梅达却竭力使根根亚纳相信，眼下没有任何可靠的战争计划。但这是枉费心机，根根亚纳的密探网，其中包括印度商人和外国顾问，很

快就告诉了他，他将从海边受到葡萄牙的攻击。一些传教士也告诉根根亚纳，“大量的白人部队”正在集结。阿尔梅达说，那只是针对反抗的酋长而不是针对根根亚纳的。

4月16日，根根亚纳的二儿子曼加突然死去，使危机加深。表面上看，他是被毒死的。阿尔梅达怀疑这是曼加的兄弟和对手戈迪德（Godide）干的；不过，怀疑根根亚纳在好战的部下的压力下，让人杀死他受过葡萄牙教育和亲葡萄牙的儿子并非没有根据。1895年5月，根根亚纳匆忙派遣许多使者去边远地区寻求支援；同时，他还派了尚加征税员，在每个区域按每间茅屋征收1英镑多的税。对乔佩人的战争仍在继续。

在一次达11小时的谈判中，阿尔梅达力求使根根亚纳同意和平地服从葡萄牙更严格的控制。葡皇家特派员埃内斯不喜欢阿尔梅达、也不信任他作为代表的作用。埃内斯讥讽地称之为“加扎狮子认可的驯养者”，并指责他和根根亚纳一起等待时机。在6月的第一周，阿尔梅达将好几名尚加人首领带到洛伦索—马贵斯想与埃内斯谈判。首领们表明他们希望和平，但埃内斯拒绝接见他们。因而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根根亚纳得到一些欧洲人的同情和帮助。一对叫费尔斯（Fells）的传教士在1895年给他当代理人，一些邻近的瑞士传教士也给他出主意。他们可能鼓励根根亚纳要求维持和平，必要时寻求英国保护。不幸的首领离开洛伦索—马贵斯后几周，两名瑞士传教士朱诺德（Junod）和利恩格姆（Liengme）会见了埃内斯。利恩格姆说，所有尚加人酋长——除几人外，如马努内（Manhune），可能还有马吉加纳——都希望和平。他认为强求根根亚纳交出在他保护下的难民是不道德的，也不符合基督教的做法；但埃内斯不肯让步。这次会见也和另一次会见一样白费劲。

于是，埃内斯更加强硬地坚持自己的立场。7月14日，他公布了要求根根亚纳服从的条件。其中包括：向他交出龙加人酋长马拉祖勒和马蒂贝雅纳。在其他14项条件中，葡萄牙当局要求根

根亚纳每年缴纳1万英镑的贡品；承认葡萄牙有权在加扎驻军并建立军事哨所；结束根根亚纳与附庸酋长间的战争状态；把非洲军队交给葡萄牙支配；倘若根根亚纳不执行上述某一条件，“他将失去统治加扎土地的权利，加扎兰的酋长就要推选新的统治者”。

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对根根亚纳来说意味着失去“真正而确实的独立”。8月8日，根根亚纳接到正式文件。他拒绝交出龙加酋长；不过他仍一再表示希望和平。一周后，根根亚纳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葡萄牙人将接受他的人民的Le Saguete，作为交换，酋长将向埃内斯交出几名重要的首领——但不是马拉祖勒和马蒂贝雅纳。此外，他准备支付1000英镑的贡品。

根根亚纳同当时英国驻洛伦斯—马贵斯的副领事罗杰·凯斯门特 (Roger Casement) 恢复了联系，要求准许再向纳塔尔 (Natal) 和开普敦派出使团。虽然未获同意，为了寻求保护和结盟，根根亚纳还是匆忙派了密使，带着象牙作为礼物，途经比勒陀利亚去纳塔尔和开普敦。经过两个月的旅行，他的使者没有带回丝毫许诺，就于1895年9月返回了加扎。

直到那时，根根亚纳一直指望着英国的帮助，至少支持他防御从边界兵营发动的军事远征。他的下属预感到战争不可避免，他们都支持战争。

虽然埃内斯认为8月15日以后谈判该结束。但不连贯的谈判在9月和以后的日子仍在继续进行。根根亚纳向阿尔梅达抱怨说，葡萄牙人违约侵入了被看作是加扎兰组成部分的科西内领土。根根亚纳的几支部队在马古勒 (Magul) 被葡萄牙人打败之后，他于9月中离开了驻地。

战争的支持者们在营地里敦促根根亚纳向邻近的葡萄牙部队发起总攻。然而根根亚纳一直坚持谈判达成协议，他在9月20日急派密使向埃内斯要求和平。但没有得到任何最终答复。11月初，主战派占了上风。11月7日，装备有轻武器的葡萄牙人在离曼雅卡泽不远的科勒拉 (Coolela) 湖打败了尚加人的八支军队。

科勒拉是根根亚纳的“滑铁卢”。以后，他携带了他的所有财富（约2000多英镑），登上一辆牛车逃出了驻地。近一个月中，人们不知道他在何处。一些葡萄牙官员认为他逃到德兰士瓦(Transvaal)，其实他却逃到了距林波波河以北三天路程的村庄谢米特(Chaimite)。对尚加人来说，这是一座神圣的村庄：因为那里安葬着根根亚纳已故的祖父马尼科西(Manikosi)。12月28日，根根亚纳在村里被任命为加扎军事总督的阿尔武凯克(Albuquerque)逮捕。

在此之前，“加扎狮子”矢志不移，直到最后仍力图谈判。12月13日，他向阿尔武凯克派了密使，带去了礼品和葡萄牙人索要的首领马蒂贝雅纳，以阻止葡人进军，被阿尔武凯克拒绝。

根根亚纳在亚速尔群岛度过了最后几年。这位加扎“谈判战士”大势已去。“1906年，他在亚速尔群岛正常死去，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葡萄牙人的囚徒”。

在根根亚纳统治下，尚加王国改变了活动的中心。同姆齐拉统治的末年相比，尚加人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直到1889年，当根根亚纳迁到林波波河谷前，葡萄牙人力量太弱，不能与尚加人对抗。

根根亚纳不能同时使他周围好战的人以及越来越富于侵略性的葡萄牙人两方面都感到满意。事实上，自1893年开始，他是作为缓和者而不是过激者在起作用的。他的谈判政策建立在个人权力与传统基础上。在其思想中，远征制度是沿袭下来的。他自己的军队因受劳动力迁移、疾病、酒中毒和内战的影响而衰弱，根根亚纳于是失掉了在尚加人中享有的尊重和威望，因而也失掉了同欧洲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在他的末年，其谈判实力比1894年前一落千丈。

虽然他那样希望得到英国帮助，为什么他最后不向北方去罗得西亚高原呢？人们怀疑根根亚纳是否真正愿意接受英国“保护”；传统的影响和象马吉加纳那样的顾问们的政治实力可能阻

止了最后的迁移，阿尔梅达记录了以下感想：“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应该期望根根亚纳会完全放弃这个国家，带走所有居民，因为这种行动完全违背他的习惯，也不符合这个国家引以为荣的勇猛作战的传统”。

把根根亚纳描绘成一个阴谋家表明不了解他的立场，也没有正确评价他的才能。他完全明白，中断谈判意味着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就要到来，并且将失去独立。对于葡萄牙特派员埃内斯，他再也不会给予特许权。由于担心要么违反葡萄牙人的、要么违反激进的将领的意愿，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用阿尔梅达的话说：“他在犹豫不决中奄奄一息”。虽然他终于使用了计谋，但看一看1895年的战争就会明了，从根本上说，葡萄牙人比尚加人酋长巧于策划阴谋和玩弄拖延手腕。对于根根亚纳，埃内斯有一种温和的看法：“确具实力的尚加王国之所以这样快和这样容易垮台，唯一的原因是尽管根根亚纳很有能力建设，却没有能力保卫。”犹柔寡断的战士根根亚纳首先是一位谈判者，一位较好的战术家，而不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他不能战胜集欧洲技术与不和解政策于一体的葡萄牙对手。根根亚纳的力量使观察过莫桑比克南部混战的欧洲人赞叹不已。一位葡萄牙人写道，这是“黑种人在东非建立的最强大的王国”。英国南非公司的一些人在1891年初把根根亚纳看作是“比洛本古拉强大得多的酋长”。虽然他最终失败了，但“加扎狮子”应该得到他在莫桑比克现代史上最伟大君主的地位。

（吴增田 摘译）

## 马拉维民族主义的 先驱者约翰·奇伦布韦

1915年初，受过美国教育的牧师奇伦布韦 (Chilembwe) 领导了一次反对尼亚萨兰白人政权的起义。他的支持者杀死了3名白人，打伤了另外2名白人。许多年以后，当非洲民族主义获胜和尼亚萨兰成为独立的马拉维共和国时，奇伦布韦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位英雄。他的战绩作为保证土著人自由的第一次重要尝试而受到赞扬。

奇伦布韦生在戴维·利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时代～1860年代或1870年代初。父亲是尧族人 (Yao)，母亲是塞瓦族人 (Cewa) (可能是曼雅族人 [Mang'ja])。他出生后几年，奇伦布韦及其家庭离开了奇腊德祖卢 (Chiradzulu) 地区的桑格诺 (Sanganu) 村，定居在尼亚萨兰的商业都会布兰太尔 (Blantyre) 郊外。这次偶然搬迁使奇伦布韦成为布兰太尔的苏格兰传教会的小学生并开始学习教理。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890年。它可能表明奇伦布韦或他的父母希望更好地懂得不久前在他们当中定居的白人的教养。

### 平均主义的福音

布兰太尔教会按西方方式进行一般教育。该教会的神权政治虽然比过去少，但教会必定给非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非洲人来说依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教会作为传播现代主义<sup>①</sup>的工具，通

<sup>①</sup> 现代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主教内的一种神学思潮。主张以现代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对传统教义和《圣经》进行新的阐释。——译注

过教诲的办法在精神和世俗方面实行深刻的变革。

1892年，出现了一位非正统信仰的传教士。他由此使布兰太尔教会的最高权位成为问题：一位英国人约瑟夫·布思（Joseph Booth）接受了传播福音的神圣使命，来到尼亚萨兰，决定在那里建立自立的浸礼会教会。就这样他在布兰太尔附近建立了赞比西实业教会并开始宣传平均主义的福音。他的到来及其传播的教义引起苏格兰传教士和殖民地行政人员的反对。他批评白人传教士在贫困的非洲过着舒适的生活。由于他付给非洲人的工资比其他教会高，他很快就吸引了少数虔诚的信徒，其中就有奇伦布韦。

奇伦布韦成了布思的仆人并因此照管这位传教士的孩子们。随着他口头英语知识越来越丰富，他可以为布思当翻译，而后接受洗礼，最后在赞比西教会学校中任教。由于他已成为布思一家人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因为布思刚刚丧妻），他成了新教会的支柱。布思的女儿深情地记得奇伦布韦：“如果没有他的忠诚和我们对他的信任，我不可能会活下来，我父亲也不可能会最后买土地建立传教站……我父亲可以把我交给他照料。他非常善良而极有耐心”。

奇伦布韦通过布思表露出对殖民政权和关于土著人自由的不同寻常的态度。布思是最先明确发表“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这一意见的白人之一。奇伦布韦追随他是为了在1898年提议成立尼亚萨兰非洲基督教同盟，目的是主张“非洲人和欧洲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权利平等……达成公平的土地协议，鼓励亲非洲的报刊和文字，发展非洲独立的基督教”。这时，奇伦布韦已经属于少数越来越多的开始按西方方式而不是按传统方式生活和工作的非洲人。

### 在欧洲和美国

奇伦布韦越来越西方化。1897年，布思和他一起从伦敦旅行



到利物浦，再从那里到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从1898年初起，奇伦布韦在纽约黑人浸礼教会的支持下，作为大学生开始进入弗吉尼亚神学与修道院。这所位于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学院是由黑人开办的。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奇伦布韦是否在这所学院学习过，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度过的两年中是否参加了任何一个定期预备班。但是很明显，他可能注意到了这一时期西弗吉尼亚州和美国南部其他地方的黑人所遭受的歧视。黑人被税收和扫盲条例剥夺了选举权。私刑处死的现象屡见不鲜。暴力和种族隔离同时存在。当布思和奇伦布韦在公众场合坐在一起时，他们常常受到口头的或人身的侵犯。尽管布思和奇伦布韦都没有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但据认为奇伦布韦已意识到美国黑人过去对白人统治有过激烈的反应这一事实。奇伦布韦可能没有系统了解黑人的激进主义，但人们可以猜想他经历了愤恨的、对抗的和进行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反击的气氛。

尽管奇伦布韦在1901年前没有获得文学士和神学士学位（后来缺席授予他的称号），但他在美国黑人浸礼教会全国会议——浸礼会教会以此名在美国驰名——被祝圣后还是在1900年回到了尼亚萨兰。最初几年中，他在美国黑人的帮助下竭尽全力建立后来的天命实业教会，该教会建在布兰太尔北部奇腊德祖卢地区姆帮布韦（Mbombwe）的一块37公顷的土地上。距离这个教会大约6公里是他的直接对手：蒙特福特天主教主母会神甫的恩古卢迪（Nguludi）教会。奇伦布韦的教会四周都是白人的大地产，那里居住着恩戈尼族（Ngoni）、塞瓦族（Cewa）、隆韦族（Lomwe）、尧族和其他非洲移民。

### 天命实业教会

奇伦布韦是一位对自己的人民兢兢业业的传教士。他在英国殖民地得到了美国黑人的支持，为黑人教会服务，信奉布思的绝

对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他不属于当时任何殖民者一类的人。他渐渐地将所有土屋改造成真正的传教站。然后他开办了一批学校（1914年他说共有7所），建立了一座使天主教徒眼红的坚固的砖结构的教堂，种植了棉花、茶叶和咖啡，并终于在尼亚萨兰南部和附近的莫桑比克拥有大量信徒。

他的天命实业教会是按西方模式设计的。他坚持要求信徒们穿端正清洁的高领子爱德华式服装，带护腿套、帽子等。奇伦布韦自传的一位非洲作者赞扬他的朴实和工作热情。“他希望看到同胞们勤奋工作并在事业中获得成功，但也希望看到他们模仿美国黑人穿戴漂亮。”奇伦布韦至少在表面上接受黑人资产阶级宣扬的进步技术。在他的教义中没有千年至福说<sup>①</sup>。从1900年至1914年，大部分白人都十分尊重奇伦布韦。尼亚萨兰南部的主要苏格兰传教士说他“大大超过了当地一般的传教士”。

起初，奇伦布韦可能认为，如果尼亚萨兰人表现出商业才能和责任感，非洲人也会获得某种权利和得到社会与政治的提升。为此他在1909年参与了当地实业同盟的建立，该同盟的目的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基督教黑人的事业，这项活动是为专心从事商业和农业等团体的事务而收集商业情报，建立仲裁法庭，以及同当局进行联系”。就我们所知，奇伦布韦参加了1909年的几次会议。他可能按布恩几年前考虑的模式在组织同盟中发挥了作用。

在1909年4月9日发出的第一批要求非洲人加入同盟的请帖上没有奇伦布韦的名字。非洲实业家约瑟夫·比斯马克(Bismark)担任同盟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布兰太尔教会学校的校长塞德里克·马桑加诺(Cedric Maasangano)、托马斯·M·马西亚(Thomas M Massea)、后成为布兰太尔教会使者可能是尧族酋长亲属的哈里·K·马泰切塔(Harry K Matecheta)、阿舍·M·马蒂

---

<sup>①</sup> 千年至福说：基督教神学末世论学说之一。认为在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将直接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这期间，首批复活的圣徒与之共享福乐。——译注

普怀尔 (Asher M Matipwile)、摩西·马塔什 (Moses Matache) 和尼尔森·卡布韦扎 (Nelson Kabweza) 等出席了会议。5月15日的第二次会议时，奇伦布韦成为主席；约翰·格雷·库法·姆潘撒 (John Gray Kufa Mpantha) 同另外几名新成员出席了会议。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参加了1915年的起义，而且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后来成为密谋的核心。

奇伦布韦在非洲教师与实业家彼得斯 (Peters) 的帮助下，于1908年开办了一家乡村小店。买卖可能收益不好，因为直到起义前夕，奇伦布韦连续欠彼得斯的债，而且他该缴纳的利率越来越高。除财政负担外，还有健康方面的烦恼。1909年后奇伦布韦的胸痛加重了，视力开始下降。他在给彼得斯和其他人的信中抱怨经常生病。

在保护国制度下人民的命运同样令人担心。英国政权悲惨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剥夺了部分土地和被鼓励以不同方式给白人干活的尼亚萨兰人，为了欧洲人的利益不得不失去大部分资源、财产和精巧的手艺。他们也明白，大部分白人把黑人看作下等人：尼亚萨兰的非洲人首次发现了种族主义。随着越来越多的殖民者定居国内，居民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在本世纪头10年中，居民们到处看到他们的自由减少了，他们的生活受到他们陌生的法律和原则的控制。

在奇伦布韦建立了教会的尼亚萨兰南部高地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从1890年代起，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定居在希雷高地。他们希望靠耕种肥沃而较好灌溉的土地来发财。他们向几乎没有“买卖”概念的酋长们购买了田产。当白人控制了国家时，酋长们还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种方式 and 通过其他手段，希雷高地大约一半最好的土地落入了外国人手中。非洲人虽然原则上受保护，但他们丧失了农民必不可少的东西：自由进出可耕种的土地和按传统方式使用土地的权利。

殖民者需要廉价劳动力，但又拒绝采取任何措施来逐渐提高

非洲人的最低生活待遇，对此殖民者自己已感到很满意了。因此，生活在希雷高地上属于白人地产的居民，或者选择给白人干活，向白人缴纳租金，或者被排挤走，而去寻找新的土地，以便种植糊口的作物。如果他们留下来租地，欧洲人就指定他们应该种什么作物，何时和怎样播种。收获以随意确定的价格买走来代替租金。地主一般禁止农民种玉米或其他供自己食用的食物。他们阻止非洲人砍树建造传统茅屋。在居住地实行母权制的地区，禁止年轻人住到可能成为他们岳父母的家中。尽管白人认为这些限制和其他一些限制对保护私有财产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对非洲人来说，这些限制是残酷的。非洲人最担心的是成为白人种植园的农民。

1890年代初期以来，尼亚萨兰政府对希雷高地的非洲人征税，以迫使他们给白人干活并分担他们自己“受保护”的费用。从1892年起，地方官员确定每个成年人征税3先令，每个男人有多少间茅屋（通常每个妻子分居的茅屋）这一钱数就增加多少倍。同时，全保护国的工资定为每月相当于每人一年的征税额。如果一个非洲人有3个妻子，就得被白人征用三个月额外劳动，以便他偿清欠收税官的税。

起初，这种办法可以使官员、传教士和殖民者们得到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但是随着殖民地居民的增加和咖啡种植业的发展，运输工、用人、道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除捐税负担外，政府还更加强迫增加义务劳动的负担。劳动力的充足来源这时取决于官员们能够对非洲人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迫使非洲人放弃不论多么重要的事情去给白人干活。

### 大战临近

从1913年起，非洲人就大量地分担尼亚萨兰政府花样翻新的费用。这一年，100多万黑人提供了国家年收入的70%。他们还

给大约100个种植园主带来了收成，使事实上已成为其主人的大约200名传教士和100名官员过上富裕的生活。

一个以征税和镇压软弱无力的纳税人为其主要活动的政府不可能得到非洲人的支持。1914年，当局开始消除传统的权力根源。当局和殖民者共同确认了种族歧视，它虽然非法，但是在一直强迫非洲人证明他们地位低下的侮辱与抱有蔑视偏见的普遍气氛中继续在实行。传统社会的瓦解，越来越重的捐税负担与越来越严格控制非洲人的活动，对希雷高地少量尚空闲的土地不断的需求，以及许多白人种植园主极端残酷地使用劳动力的趋势，这一切造成了适宜发生反抗的气氛。另外，1913年缺少雨水，遍地饥荒。结果莫桑比克移民进入希雷高地。对非洲人来说，任何地方的状况都不比与奇伦布韦教会相毗邻的种植园更艰苦。

这个大约300平方英里的种植园有一个叫威廉·杰维斯·利文斯敦(William Jervis Livingstone)的经理，他因对农夫和农业工人苛刻而出名。他强迫他们长时间干活，付给他们的工资比答应标准低。他反对奇伦布韦，经常破坏奇伦布韦的信徒在他土地上建造的教堂。

奇伦布韦忧虑重重，对殖民地的不公正行为十分气愤，他终于认为，只有进行革命才能阻止他的人民生活状况恶化。1914年8月宣布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促使他采取行动的的决定性因素。

1914年，当德国人经湖泊和陆地进攻尼亚萨兰北部时，非洲人被招进英国皇家非洲步枪队。许多运输工也被动员去用头顶运送弹药和其他供给品。1914年9月8日和9日，在尼亚萨兰北部的卡隆加战斗中一些新兵被杀。当这一消息传到已经非常痛苦的奇伦布韦那里时，他感到十分惊愕。

1914年10月或11月，奇伦布韦召集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共同讨论战争的发展趋势。他们似乎要求他写一封抗议信。代表他们内心呼声的这封抗议信的一部分交给了白人主办的地方报纸发表。

大部分尼亚萨兰人从未看到这封信。因战争而任命的政府检查官把这封信从11月26日“尼亚萨兰时报”的第一版中删掉了。清晨，奇伦布韦收到了报纸编辑的信，嘱咐他把信藏好以免被捕。他本人和鼓励他写信的人对此都非常苦恼。11月26日以后，他们设法寻找别的方式让人们了解他们的抗议。直到这时，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起义。在政府方面，10月和11月的反复检查也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密谋。

### 宁死……

从1914年12月3日起，奇伦布韦及其支持者们重新会合，以便找到一种办法，克服政府拒绝考虑他们的抗议所形成的障碍。

整个12月他们都在密谋，大家一致认为：“他们拒绝答复我们的请求，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死亡”。他们宣布：“对我们大家来说，宁愿死，也不活受罪。”战争使奇伦布韦及其支持者们成了积极的战士。最后，1915年1月3日，在奇伦布韦主持下，决定“采取行动，或者最终放弃行动计划”。

这天讨论后，奇伦布韦通知了严守安息日者<sup>①</sup>的传教士奇尼亚马（Chinyama），他答应在恩切乌（Ncheu）领导起义，其他人在委员会按预定计划决定进攻的松巴（Zomba）、布兰太尔和姆万杰（Mwanje）地区起义。如果执行任务不遇到过多的对抗，奇伦布韦可以有一定的希望在希雷高地临时建立独立政府。但是他很可能只想到要增强他抗议的力量，他在1915年1月23日夜间向马戈梅罗（Magomero）、姆万杰和布兰太尔派了“部队”，以获得枪支弹药并带回利文斯敦的头。有了枪支弹药就可以在姆邦布韦或在邻近的奇利曼万杰（Chilimangwanje）山地开战。

---

<sup>①</sup> 严守安息日者：是指一世纪时皈依基督教后仍守安息日的犹太人。——译注

1915年1月第三周，奇伦布韦可能决定23日星期六适合他的行动计划。这一天，许多白人将参加布兰太尔体育俱乐部每年组织的庆祝活动，他们将不可能对抗起义。他决定转入进攻的原因也归根到底在于奇伦布韦对总督宣布尼亚萨兰北部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解释。他也可能得知了要将他流放到塞舌尔群岛的决定。据他部队的首领之一证明，他可能听说白人打算杀死所有的非洲人。据参加密谋的另一位成员说，当这件事还没有出现任何预兆时，星期五奇伦布韦就已派人去天命实业教会的各个教堂，通知他的信徒们“欧洲人企图在星期一杀害所有当地人，他们应该起义了”。同时，他向奇尼亚马急遣密使，通知奇尼亚马，应该按约定好的于星期六19时采取行动。几天后，他派约塔姆·邦戈（Yotam Bango）带着求援信件去见德属东非总督。

星期六早晨，奇伦布韦在姆邦布韦教堂最后一次召集他的信徒们。他缓慢而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要为祖国而死得勇敢。他们不能指望获胜，但要为尼亚萨兰同胞更美好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奇伦布韦禁止支持者们进行任何偷盗，并要求他们不要触动白人妇女，“你们是爱国者，而不是放荡堕落的人”；后来这些命令都得到了最严格的遵守。他还明确指出，如果在进攻中白人被杀，只有他们的头可以带回姆邦布韦。最后他决定在奇利曼万杰山地度过星期六黑夜和以后的夜晚，等待白人的反击，也可能等待他自己的结局。

这天夜里，奇伦布韦密谋者们的小小军队的“队伍”开出了天命实业教会所在地姆邦布韦教堂。一些部队开往白人统治的保护国商业中心布兰太尔和林贝（Limbe）。另一些部队开向恩索尼（Nsoni）和米迪马（Midima）地区。另外两支巡逻队或小分队沿着曲折的路朝北开向邻近的利文斯敦大庄园。

反抗者们想要利文斯敦的头并经过一些小规模战斗想要拿下他那座庄园。当时，利文斯敦及夫人正在庄园里接待一位海关官员

的妻子拉纳尔德·麦克唐纳 (Ranald Mac-Donald) 夫人。在地区射击俱乐部弹药储备保管员占用的隔壁房间里，有斯坦顿 (Stanton) 夫人和罗奇 (Roach) 夫人。她们跟前有五个孩子。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怀疑会发生进攻，尽管一些用人知道部队为什么而来。

经过小规模战斗后，一位进攻者强行进入了卧室，卧室里利文斯敦夫人试图使受伤的丈夫苏醒。这时，得到用人通知的麦考密克 (Mac-Cormick) 来援助利文斯敦一家；反抗者们以剑迎击，他死在威廉·利文斯敦旁边。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马戈梅罗的妇女和儿童都没有受伤或挨揍，麦克唐纳夫人企图用武力阻止反抗者们进攻也完全未被理睬。除武器库遭劫外，未丢失任何东西。反抗者们只带着几枝枪、少量弹药和利文斯敦的头回到了姆邦布韦。利文斯敦的头被挂在姆邦布韦教堂的杆子上。

同时，第二支部队在姆万杰的另一部分布鲁斯 (Bruce) 庄园采取了流血行动。一些战士将长矛刺进了正在睡觉的储备仓库监督员罗伯特·弗格森 (Robert Ferguson) 的身体。在地方经理的房间里，约翰和夏洛特·罗伯逊正准备去睡觉。一阵交火使他们睡不成了：他们最终逃到了棉田里。部队可能以为找到了藏武器的地方，或者为自己确保了向马戈梅罗撤退的路。不论怎样，部队空手回到了姆万杰。

对恩索尼和米迪马孤立的庄园主没有进行攻击，但代代 (Tete)、松巴、布兰太尔和米卡隆圭 (Mikalongwe) 之间的电话线被切断了。被指定进攻布兰太尔的博马和林贝附近的商业机构的部队没有采取行动。同样，奉命进入邻近地区曼达拉 (Mandala) 武器库的70名反抗者，也只是完成了部分任务，夺得了几枝枪和700发子弹。

反抗者们避免指责生活在姆邦布韦和马戈梅罗30公里范围内的富饶庄园里许多未受保护的白人，而只是当他们严重伤害了天主教教士威廉·斯威尔森 (Swelsen) 神父并烧毁了他的恩古卢



迪教会时，姆邦布韦的白人才在1月26日再次动用武器。奇尼亚马领导的反抗者在进攻恩切乌的博马之前，一位行政官员就通过几名忠实的酋长风闻他们的行动计划：他没遇到任何抵抗就逮捕了奇尼亚马及其一伙人。人们不能说奇伦布韦和奇尼亚马是否希望他们带头行动的结果是发动全体南部居民起义。这是起义成功的唯一办法，但是奇伦布韦在姆邦布韦附近的山地上思考了几天。此外，他似乎没有准备任何防护线，甚至没有对他的传教站加强保卫。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考虑到了失败的可能，但没有制定任何撤退计划。

因此起义是短暂的。从1月26日起，很快聚集起来的白人志愿者就开始进攻姆邦布韦，那里的抵抗只持续了一、两天，许多反抗者都逃跑了，或者力图混入非参战的村民中，但未成功。奇伦布韦本人最终被说服放弃他占领的山地，并在附近的莫桑比克寻求避难。白人用了大量炸药终于炸毁了姆邦布韦教堂。几天中，欧洲人巡逻队在“当地支持者”的帮助下追捕密谋者们，并将他们不客气地吊死。欧洲人用赏金引诱，最终进行了大搜捕。

奇伦布韦本人直到2月2日才终于摆脱了追捕。这天，苏格兰教堂的教师加尼特·卡杜亚（Garnet Kaduya）“在丛林中发现了踪迹并进行跟踪……直到晚上，但我害怕继续跟下去，于是派了一个男孩儿去叫姆兰杰（Mlanje）的警察”。早晨来了五名警察，他们一起在班卡拉（Bankala）山地周围并渡过米戈威河（Migowi）跟踪奇伦布韦，一直跟到距离莫桑比克边境约11公里的地方。1915年2月3日大约中午，他们发现了约翰和莫里斯·奇伦布韦及两个孩子。莫里斯·奇伦布韦开了两枪，但他本人被警察打死。约翰·奇伦布韦没有武器，穿着一件海军蓝大衣，条纹睡衣，外面是一件彩色衫衬，下穿一条灰法兰绒长裤，跑了一公里多：“然后警察纳卢索（Naluso）开了枪，我们看到他打伤了那个人，那人转了一圈后停下了。中士开枪再次打伤了他。他总是站着，于是我用莫里斯的枪开了一枪，击中了他的头，他倒下

死了。”

起义的积极结果在当时并没有显示出来。1915年3月底，死了40名反抗者（吊死或枪杀），大约300名被监禁。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和与他们会合的其他人都被迫流放度过余生。政府严格规定了边缘教堂及其头领的活动，甚至在一些年中支持天主教而损害耶稣教。当官方调查委员会主张采取措施以改善强加于希雷高地的居民和工人的艰苦生活条件时，政府拒绝执行和实施必要的改革。然而起义的结果却打破了中非甚至东非白人那种自满的心理。

奇伦布韦及其伙伴们彻底驳斥了在英国统治下的“当地人幸福”的所谓说法。尽管如此，1915年的起义丝毫没有改变中部非洲殖民政权的发展。只是很久以后在更有利的时期，约翰·奇伦布韦失败的例子才作为真正独立运动的教训。

（吴增田 摘译）

## 莫索索一世与莱索托王国 的诞生和发展

今日的莱索托是一个象比利时一样大小的国家，嵌插在南非共和国境内，独立前（1966年）是英国殖民地，名叫巴苏托兰。人口有100多万、受立宪君主莫索索二世管辖。

东部德雷肯斯堡(Drakensberg)山脉把它与纳塔尔(Natal)省分开；西部卡利登河(Caledon)是它与奥兰治(Orange)自由州的分界线。

莱索托2/3的国土被两条并行的大山脉占据，它们是马卢迪(Maluti)和德雷肯斯堡山脉。后者高达3480米，为牛群提供了天然牧场；西部沿卡利登河低于海平线的地方不超过1500米，是种植稻谷的良田。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人口集中，属温带型气候。

莫索索二世是莫索索一世(Moshoeshoe I)的继承人。后者于19世纪初统一和创建了苏托国(Sotho)，是当时南部非洲最显赫的人物。苏托人爱戴他，自称是“莫索索的孩子”。1966年庆祝独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庄严地揭开莫索索一世塑像的幕布。

莫索索一世统一了分散的人民，是一个创业者。上个世纪的几乎全部时间，他都为摆脱欧洲人的统治而奋斗。当其他国家在殖民者进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国家却懂得用新的办法去抵抗各种进攻。无论是西北边界的布尔人，还是南部边界的英国人都没能把它压垮。苏托人以国内高地为屏障抗击来犯者，有一个时期，他们被迫放弃独立，却仍坚持领土的统一。

## 莫索索的青少年时代

莫索索本人所属的苏托族是大苏托族的一个分支。他们与其他班图人一样，从北方经过漫长的迁徙后，在当地定居已有几代人了。苏托人共分成三个语言十分近似的大集团：西部的茨瓦纳人（Tswana）（贝专纳，Bechuana）靠近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北部的苏托人居住在林波波（Limpopo）河边；而南部的苏托人则朝奥兰治河方向推移。莫索索及其臣民属于后者。

南部的苏托人在17世纪以前叫弗肯人（Fokeng），分成几个家族生活。以后由一些小的自治王国组成了一个十分松散的联邦，分别管辖介于瓦尔河（Vaal）和马卢迪山脉之间的土地。第一个联邦主要是唐（Taung）家族；第二个是卡特拉（Khatla）家族，其中包括夫亨（Phuting）、特罗果阿（Tlokoa）和西阿（Sia）三个王国，第三个是科艾纳（Koena）家族，分裂出去许多王国，其中有科艾纳王国、赫拉科阿纳（Hlokoana）王国和科阿科阿（Khoakhoa）王国等。莫索索的祖先莫纳汗（Mona-heng）就是科艾纳王国的人。弗肯人在他们自己首领的统治下保持了他们的独立性。

从17至18世纪，也许更晚一些时候，在这块土地上有了另外的移民，他们来自东面马罗迪和德雷肯斯堡山脉以外的地方。他们是恩古尼人（Nguni），定居之后叫菲特拉人（Phetla）、波拉恩人（Polane）和弗蒂人（Phuthi），他们走遍了该地区班图人居住的土地。

来自北方（苏托人）和东方（恩古尼人）的班图族移民与当地土著、从事打猎的桑人（San）（欧洲人过去称他们为布须曼人）一起和平共居。

莫索索于1786年诞生在门果阿南（Menkhoaneng）的一个座落在现在莱索托北部的村子。该村首领就是他的父亲莫卡夏

恩 (Mokhachane) 。

他出生后取名叫“里波科”(Lipogo)，意思是争吵，因为当时的村子为了一件巫术的事情而分裂。他是他父亲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子。他与同龄的祖鲁国王恰卡相反，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成年后，还怀念地提及这段时光。

莫索索这个名字并不是原名，而是为了纪念一次诱捕野兽的活动而取的。这个字来源于“剃”这个动词，使人想起十分锋利、可以割断人们头发的刀片。

1810年，他从父亲那里接受到一份“波哈里”(bohali)，就是牛群的赏赐，意味着他可以娶第一个老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以“妈莫哈托”(Mamohato)的名字出名，意思是莫哈托之母，她的第一个儿子就是莫哈托(未来的莱齐，Letsie)。他结婚时不过是一个小村长的长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正如他的家谱中所表明的，他属于科艾纳家族中年幼的分支，这个分支被称为莫科特里(Mokoteli)；而恩查勒(Ntsane)和莫特罗赫罗阿(Motlohelea)族人的权势均大于莫科特里。此外，他的父亲莫卡夏是里贝(Libé)家年幼的儿子且以笨拙出名。

对年轻的莫索索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他的亲戚莫赫罗米(Moh-lomi)。莫赫罗米的父亲是莫纳汉的儿子。这是一位智慧、沉着、思想开明的人，他对各种生活方式和其他部族的文化都很感兴趣。他喜好旅行，对所遇见的部落都进行访问。他已婚，当他离家出走时，留在家里的妻子完全可以自由。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有很大影响，甚至超出科艾纳家族。

莫索索继承了他的远大目光，对巫术持怀疑态度，憎恶死刑，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

约在1816年，莫赫罗米临终时曾预言一场暴风雨即将震撼苏托人的世界：“我死后，红色尘埃的云将从东方来临，将摧毁我们的部族。父亲要吃自己的孩子”。

## 利发加勒时代 (Lifaqane)

暴风雨于1821年来临了。当时莫索索按照苏托国家村长儿子的习俗，在布塔布特 (Butha Buthe) 山坡上建立了自己的村子，并建成了一座真正的堡垒。祖鲁国王恰卡率领军队获得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各部族纷纷投降。几乎所有的部族都无力抵抗，损失惨重。这就是苏托人称之为利发加勒的时代。

特洛夸人 (Tlokwa) 被恰卡的祖鲁军队赶出自己家园之后，依仗自己强大力量，转而攻打自己的邻居，一直打到布塔布特。由于总攻不利，转而向西，他们的转移，给莫索索一点喘息的机会。

约1824年，特洛夸人再次攻打布塔布特，他们采用正式包围圈。布塔布特城堡本可以防守，但因山顶面积狭小，不能饲养许多牲畜，被围困的人们缺乏粮食，只能啃噬自己的皮鞋和皮披风。莫索索与恩古尼族的一个部落，也许就是与恩戈瓦勒部落达成谅解，该部落对特洛夸人反戈一击，帮助莫索索解了围。虽然特洛夸人解除了包围，却在不远的地方住了下来，这对莫索索来讲，终究是一个隐患。

### “夜晚的山”

这次的围困使莫索索懂得，要在布塔布特坚持一场长期战争是有困难的。他了解到，在西南约100公里的地方，有座易于防守的大山，山顶相当宽阔，在敌人进犯时，可以饲养更多的牲畜，他决定全体迁移到那里，环绕大山的四周是肥沃的平原，和平时期人民生活有了保障。

这次迁移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南部苏托人的处境困难，许多王国都被瓦解，牲畜被掠夺，田地荒芜。那些活下来的饥民攻击

他们所能攻击的人。其中一些人变成食人肉者，就在这次成群结队的迁徙过程之中，莫索索的祖父皮特（Peete）和另外一些人落入食人肉者手中。最后莫索索终于在某天晚上抵达目的地，该山取名叫“塔巴波修”（Thaba Bosiu）意思是“夜晚的山”。这次选择居留地的行动是明智的，以后的斗争证实了这一点。

莫索索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统治，他把所有的部落都团结在他周围，阻止那些过去受过虐待的人进行报复；另外，他成功地与弗蒂人达成谅解；恩古尼人被长期安顿在山上，他们的首领莫罗西（Morosi）与莫索索经过一番短暂的较量后，接受了莫索索的安抚。

就这样，支离破碎的几个部族组成的苏托国诞生了。莫索索的保护政策深得人心，他保护和安置所有的难民。从军事角度上看，他的地位还不稳固，恩戈瓦勒人和赫卢比人一直在未来的奥兰治国的平原上打仗。恩戈瓦勒人取得了最后胜利，莫索索要长期进贡。他为了摆脱这种臣属地位，却向恰卡国王求援，并表示愿意效忠，每年进贡。他利用不断向恰卡国王上贡的机会，鼓动这位国王攻打恩戈瓦勒人。然而，不是恰卡国王，而是他的对手、曾背叛过他的姆济利卡济（Mzilikazi）将军控制了德兰士瓦，迫使恩戈瓦勒人离开了这个地方。

1831年，恩德贝莱人（Ndebele）攻打“塔巴波修”失败了。莫索索考虑他们参加战斗的只是经过训练的部队中的一部分，应该运用外交手段对付外来者。于是，他送牛给恩德贝莱人首领，以示友善。恩德贝莱人接受了这些牛，从此两个部族开始和平共处。

在不断发生冲突的年代里，人们对莫索索灵活的外交手腕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分化不同的敌人，促使一方去攻打另一方；利用自己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向战败敌人提出和平建议。

莫索索虽然摆脱班图人的骚扰，却又遇到另外的麻烦。1833年，从奥兰治河下游来了科伊人（Khoi）、科拉纳人（Koranna）

以及混血种格里夸人 (Griqua)。面对这些骑着马、手持着枪、梭标和火棒的新来者，苏托人束手无策。新来者的榜样促使莫索索设法获取了马和枪。但是仍挡不住新来者对“塔巴波修”的袭击。

这时，莫索索从格里夸人的猎手那里听说有一个传教士白人。传说这种白人很强大，他们拥有兵器和某种具有诱惑力的魔法。于是他派遣一个猎人，带去100头牲畜，到开普去邀请传教士。这个讯息被巴黎的福音教会知道了，他们派遣了托马斯·阿尔布塞特 (Thomas Arbousset)、欧也尼·加萨里 (Eugène Casalis) 和一位手艺人康斯坦·果塞兰 (Constan Gosselin) 前往。莫索索于1833年在驻地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 莱索托的居民及其起源

1848年，莫索索年约62岁，统治着8万个臣民。1836年到1848年的12年和平时期，人口从2.5万上升到8万，并仍在直线上升，到1870年，莱索托人口已达16万。

经过迁徙和“利发加勒”时代所形成的各种族杂居，莱索托居民中包括了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当然，多数是苏托人。在苏托人中，莫索索所属的这支部落人口增长最快；其次是恩古尼人，他们是在“利发加勒”时代以前，或者是在这个混乱时期投奔苏托人的。还有桑人（长期被欧洲人叫成布须曼人或波希曼人），他们是那块土地上最老的居民，其中大部分已与苏托人和弗迪人通婚。（莫索索就娶了许多桑人为妻）。最后出现了许多混血儿，叫克里夸人和科拉纳人，人口约1000人左右。

非苏托人被同化的程度在各个地区不一样。在苏托型的村子里，恩古尼人和桑人的后裔通常依附于苏托人首领和显贵，通婚已使他们与苏托人完全融合了。相反的情况是，在王国的边缘地区，主要是恩古尼人居住的村子，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和习俗。



北部的情况也一样，赫拉波人（Hlapo）至今还保留着他们自己部族的特殊习俗。

### 通过立法决议

在鼎盛时代，莫索索的统治仍坚持按传统规矩办事：“莫纳雷”（首领）的决定必须得到他臣民的同意。王国的决定要先与叫“马托纳”（Matona）的顾问协商；其次与叫“洛科特拉”（lokhotla）的一般顾问商量。地方首领被称为“亲王的洛科特拉”。这种传统的体制一直保存了下来。如1862年2月，开会讨论莱索托与大不列颠帝国之间的关系，参加该会的人有“亲王的洛科特拉”、祖鲁国王以及姆蓬杜人（Mpondo）的首领。

最后是召开全国性“比佐”大会（Pitso），与会的有来自王国各方面的数以千计的武装人员。“比佐”是以节日形式开始，唱赞颂首领和武士的歌曲，跳武士舞蹈，传饮国王侍从送上的小米啤酒。欢庆后，大家一起讨论公众事务，可以自由发言。“大家不会与一个在‘比佐’会上误解的人吵架”。这是苏托人的一句谚语。莫索索本人发言，批驳某些论据，表明他个人立场，并对要通过的决定进行解释。只有与会者一致欢呼通过，决议才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比佐”大会是一个交换情况和进行政治教育的场合。“比佐”大会所起的作用比中央政府更大，而中央政府对各首领极少使用强制手段。

### 莫索索的顾问

谁能担任莫索索的顾问？他们能起什么作用？

从1850年起，莫索索很少启用老一代保守派，例如莫索索的舅舅拉修（Ratsiu）就是一个有名的“保守派”，他仇视变革。以

后，莫索索开始在同龄人当中挑选助手，如启蒙时代伙伴马科阿尼阿勒（Makoanyane），是恩古尼人。他是武士、战略家，还擅长军事。另一位拉马兹阿查纳（Ra Matseatsana），是科艾纳人的另一个家族人，从1824年起就归顺莫索索。他皈依了基督教，如何与教会维持关系，经常由他向莫索索进言。还有一个亲信叫洛何（Lehau），是恩古尼人，掌管土地的耕种和王家的牛羊群。

外交方面，他求助于法籍传教士欧仁·加萨里，后者成为他的秘书、翻译和顾问。他对莫索索的影响较大，一直维持到1848年。在莫索索与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后，对白人的幻想才破灭。

莫索索愿意起用自己的儿子们。他不仅让他们受教育，还送他们到教会学校和开普大学学习。如泽克罗（Tsekelo），特拉里（Tlali）和马索法（Masopha）等；有时还派遣儿子去完成外交使命。

### 统治体制

莫索索安插的地方首领都是他自己家族中有亲缘关系的人。各首领所管辖的地区，都有明确的界线。行政管理方式根据地方不同而有所不同，约可分三个地区：

1. 围绕首都塔巴一波修的地区，国王直接统治，由第一个妻子的第三个儿子马索法协助，是莫索索晚年的右臂。据说马索法在勇敢、智慧和宽宏大量方面酷似他父亲。

2. 王国的中间地区是首都的边缘，西南方面住着第一个妻子的长子勒齐（Letsie），是推定的继承人；东北面住着勒齐的弟弟莫拉波（Molapo），他们对莫索索的权力从未提出异议。

3. 王国的边缘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疏远，不协调，政权形式也不相同。塞科尼艾拉（Sekonyela）地方的特罗夸人的情

况很特殊。1853年战争结束时，塞科尼艾拉被征服，一部分臣民逃走，归并到莫拉波（Molapo）王国。对莫索索只是口头表示效忠的政权有：南面的波索里政权（Posholi），北面的洛萨奥阿纳政权（Lesaoane），还有与莫索索同一家族的苏托科艾纳政权（Sotho Koena）。他们不时地抢劫牲畜的行动，恶化了与国王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些部族政权对王国边界的安全起了保障作用。如西北面唐人的首领莫莱查勒（Moletsane），和东南面弗蒂人首领莫罗西（Morosi）。

为了防止出现威胁国家安全的离心倾向，莫索索采用了各种不同手段：他分牲口给那些愿意归顺他的人；还培养那些与自己结盟的首领的儿子；莫索索为自己的牛羊群设立了许多放牧点，由自己年轻的儿子负责，以便直接了解情况。

1830年以前，莫索索已经注意到一定数量的马和火器能吓唬混血种匪盗格里夸人和科拉纳人。他鼓励自己的臣民去夺取它们。1850年以后，马匹和枪支是年轻的苏托国家主要关心的事情。马种来自开普殖民地，在莱索托无污染的环境中繁殖起来，成长为一种适应高山环境的粗壮马种。关于枪支，他们从白人殖民地的雇佣军那里得到，或是通过边境的冲突中抢到，或是用钱买到一些过时的劣质枪。

参加过1852年贝雷亚（Berea）战役的一些英国军官估计，敌对的苏托人“至少有6000名装备精良的骑兵和几千名步兵”。他们还说，“国王在塔巴一波修拥有几座大的火药库”。莫索索的军事体制与祖鲁人不一样，他也不创建常规部队。战时，是一批拥有马匹和武器的武士，平时则放牧、种地。在战役中所采取的战术很适合于高山地形，避免进行正规战，而是把大部队分成灵活的小分队，坚守阵地。最出名的要塞就是“塔巴一波修大山”，不管用什么形式进攻，都攻不破。

经过“利发加勒”混乱时代的贫困和饥饿之后，莱索托繁荣

地发展起来了。传教士带来的稻谷在西部平原、卡利登两岸，与传统的小米一起茁壮地生长；绵羊、山羊，特别是牛群繁殖很快。从1838年起，莫索索在塔巴一波修建立起来的小米仓库可供7~8年食用，其他地方的首领也一样拥有足够的存粮。莱索托成为邻国的粮仓。主要依靠放牧的布尔人，到莱索托去以牛交换粮食。

莫索索鼓励多种经营，不仅引进小麦，还种土豆、果树和蔬菜；还采用新技术，用犁耕地，牛车运输等。

对于莱索托，当时最危险的是外国商人定居，不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他们都在慢慢地攫取土地。因此，国王制定了两条有效法律，“禁止贩卖烈性酒和外国人占有土地”。结果没有一分土地让给外国人，莫索索是土地唯一的主人。

### 宗教政策

基督教的侵入，改变了莫索索的态度，是他在1833年同意基督教在莱索托扎根的。

从1833年到1848年，大家都热衷于倾听“莫索索的白人”传授的哲理。1843年，福音教会出版的报纸上有一段消息：“巴苏托人的国家似乎愿意选择耶稣教义。”这种提法主要是指教徒的社会地位，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有604人。当时的教徒有：国王的兄弟莫伯里（Mopeli）、国王第一个妻子的兄弟马特特（Matete）、国王的主要顾问，其中有马科亚里亚勒（Makoanyane）和他的两个妻子和三个儿子等等。莫索索本人似乎完全被宗教所征服：星期日，他去塔巴一波修的教堂作礼拜，与教友们一起讨论加萨里讲的教义，他还规定星期日休息；允许自己的两个皈依基督教的妻子离婚；给死去的基督徒提供埋葬双亲的墓地，甚至还取消了传统的祭祀营，等等。

可是，1848年以后，莫索索完全改变了态度。原因是苏托人

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被迫参加了接二连三的战斗，而西方传教士却禁止教徒参军，鼓吹和平。传教士不允许苏托人参加反对殖民者的征服战争，完全暴露他们站在白人的殖民立场，这使莫索索极大地失望。

随着基督教影响的衰退，传统宗教在领导层中惊人地活跃起来，莫索索也改变了自己以前引进宗教的作法，重新恢复了祭礼营。在战斗危险的时刻，他又去请教大祭司、占卜者“夏比”（Chapi）。他曾表示没有任何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但是，有一段时期，他本人确是热衷于基督教，熟读圣经。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刻，西方传教士都没有放弃给他洗礼的愿望。从1869年底开始，年迈和疾病使他变得很虚弱了，教会还为拉他入教施加种种影响。1870年1月18日，在“比佐”大会上，他公开宣布要皈依基督教。他于同年3月11日去世，受洗礼的日子却是他被埋葬的日子——3月13日。

### 莫索索其人

曾见过莫索索本人的人，对他的描述如下：

加萨里于1833年对莫索索描述道：“他看起来只有45岁，是一个具有一副漂亮、聪慧而高雅风度的男人，他以纯朴可亲的外表打动和吸引着接近他的人们”。阿尔布塞特写道：“莫索索在国内享有政治家的声誉。他有准确判断事物的锐利眼光。谈判中很有分寸。富有人情味，随和。虽然他很看重自己的权力，但并不高傲”。

莫索索生活简单，通常住在传统式的房子里；与其他苏托人一样穿同样的皮袍子；吃的是小米饭，然而饮茶和吃糖的习惯，却和欧洲人一样。

他在自己的宫廷里用很多时间与各种人物谈话，仲裁大量的诉讼案；还要接待拜访者。

从相片上看，他穿着欧化。他总是按欧洲方式接待白人客人。

从1833年起，他就在人民之中享有威信。大家认为由于有了他，人民才在“利发加勒”时代幸存下来；还认为他是杰出的领袖，懂得与欧洲人建立关系。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在他统治的后期，与布尔人和英国人的关系。

布尔人向奥兰治河、瓦尔河以及后来的大批移民，对莱索托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向莫索索提出要求，允许他们于有限时间内在莱索托土地上放牧。

莫索索考虑如何才能使莱索托人民免遭由于白人占有土地所带来的饥荒。他懂得自己的军队虽然具有现代化装备，却不能靠武力解决问题，唯一的希望是利用一部分人去攻打另一部分人。

开普的英国政府并不象布尔人那样贪婪地覬覦莱索托的土地，为此，莫索索尽力取得英国人的保护，以反击布尔人蚕食土地。自1842年5月起，他通过加萨里给开普殖民地总督写信，要求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他，并愿与他们进行贸易。1843年，他与英国人签订了《纳皮尔条约》，1845年又一次修订。

1848年，开普的新总督亨利·史密斯爵士 (Harry Smith) 决心结束布尔人和苏托人之间的混乱局面。因为从长远来看，布尔人对开普殖民的安全也不利。史密斯并吞了介于奥兰治河和瓦尔河之间的土地，换句话说，吞并了属于莫索索、布尔人和克里夸人的土地，以建成奥兰治河流域的君主国。这个决定虽然对莱索托不利，莫索索仍接受了这个解决办法，他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布尔人的蚕食。实际上，英国人并不尊重苏托人的权利，在划定双方界限的委员会中，却没有一个苏托代表。1849年划定的“温尔顿线”完全有利于殖民者，而使布尔人蚕食的土地成为合法，卡利登西面苏托人的村子都划给了布尔人。苏托人对此十分不满，莫索索提了抗议。最后出于无奈，还是签了字。

英国驻扎当地的官员温尔顿 (Warden) 鼓励特罗克瓦人

(Tlokwa) 和罗龙人(Rolong)去掠夺苏托人的牛群；他认为莫索索政权是他支配土地的主要障碍，因此他要抓紧时机摧毁这个政权。1851年，温尔顿率领一支小分队和一支罗龙人组成的分队一起侵入莱索托。然而，他低估了苏托人的武装力量，最后在维埃沃特(Viervoet)遭到失败，部队被迫撤至布隆方丹(Bloemfontain)。当时莫索索已经可以控制奥兰治的一部分地方，但是他放弃了发展自己的优势，不再继续向布隆方丹进军。

英国人遭到这次军事失败后，又发生科索萨人(Xhosa)的叛乱，迫使英国政府修改政策，不再派兵干预布尔人和班图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听任双方厮杀。因而就使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利用《桑河协议》(Sand River Convention 1854年)，宣布独立。不久之后，奥兰治的布尔人也宣布独立。

英国殖民地的新总督卡特卡尔特(Cathcart)想再动用武装力量，以图挽回英国人在维埃沃特的军事失败。他率领一支强大的纵队到达莱索托边界，向莫索索提出最后通牒：要他接受“温尔顿线”和在三天之后交出1万头牲口，作为前次战役损失的赔偿。卡特卡尔特把兵力分成三股进攻塔巴一波修。中路在穿过贝雷亚大山(Berea)时，遭到苏托人的围攻，英国军队被迫撤回营地。莫索索继1852年12月21日在贝雷亚取得军事胜利后，立即采用外交手腕，遣人给卡特卡尔特送去几千头牲口，建议停战。英国人接受了这项和平建议，率部队远离而去。

莫索索利用第二次战胜英国人的异常优势，开始攻打特罗克瓦人。因为该部族人总是不断地骚扰苏托人，这次“全民”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收复北莱索托，科埃纳人(Koena)就是从那里被特罗克瓦人赶出家园的。1853年的战役，莫索索取得了全面胜利，特罗克瓦人四处逃散。拒绝在莫索索统治下生活的一部分人和国王索科尼埃拉(Sekonyela)一起逃往开普殖民地；留在故乡的人从此成为莱索托国王的臣民。

德兰士瓦政府成立两年后，根据1854年签定的《布隆方丹协

议》，在瓦尔河和奥兰治河之间，建立“奥兰治自由邦”。1858年，莫索索接到“自由邦”送来的最后通牒，要他接受温尔顿线并要支付一大笔所谓偷盗牲口的赔偿费。布尔人的突击队向塔巴一波修发起进攻，苏托人一方面在自己山上筑垒固守，另一方面派兵到“自由邦”的中心进行袭击。布尔人夺取“黑夜的山”没有成功，而后方却遭到袭击，不得不撤回军队去保卫自己家园和财产。

“自由邦”的总统要求开普总督格雷（Grey）保护。格雷划出一条新的边界线，比温尔顿线对苏托人的损害只稍少一点。边界冲突又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一直到1865年再次爆发战争。

布尔人于1865年6月9日发表的战争宣言，列举了他们对苏托人的不满事例。双方都为了保卫土地要决一死战。

然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莫索索年老了，再不能挑起战争的担子，他的儿子们为争权夺利而分裂，对保卫国家十分不利。布尔人在武器和军需方面得到充足的补给，他们兵器的威力大大优于苏托人。经过几次较量之后，布尔人暂时放弃进攻固若金汤的塔巴·波修城堡，而把部队分成若干机动支队，转而进攻其他据点，苏托人被迫处于守势，不能再向“自由邦”腹地发起攻势了。其他据点先后被攻破，牲畜被掠夺，莱索托内部裂痕加深，莫索索的一个叫莫拉波的儿子投降了布尔人。

局势令人沮丧，国王为了赢得时间，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付敌人。终于在1866年，苏托人与布尔人签订了《塔巴一波修条约》，把最好的土地割让给布尔人。这些土地被布尔人分割成许多小块出售或出租。这次战争使莫索索丧失了3/4的国土，被称为“高粱的和平”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仍允许臣民播种和收获，一直到1867年，再次爆发战争为止。

莱索托度过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莫索索向英国人求援。当时的英国总督伍德豪斯（Wode House）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英国人担心的是，如按布尔人的意愿，执行《塔巴一波





修条约》，苏托人可能会因自己家园被破坏，由失望发展到挑动殖民地东面部落起来进行骚乱。1868年3月12日，莱索托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初期，属纳塔尔省管理，由于莫索索对纳塔尔省殖民者不信任，应莫索索的坚决要求，莱索托成为英国国王直属领地。莱索托终于幸存下来。莫索索对自己国家前途的担忧，直到1870年3月13日他去世时才得以解除。

### 介于两个世界的国王

与国王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他向其他非洲领袖征询统治方法、外交政策以及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还十分乐意接受能为他国家和人民所利用的改革创新政策。阿尔布塞特传教士说，这位目不识丁的君主很开明，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白人学校里去受教育。但是，当他的儿子特拉里（Tlali）返国时，已成为基督教徒，并改名为“乔治”。特拉里自以为比别人优越。莫索索在一次“比佐”大会上尖刻地批评特拉里说，“乔治是一个人，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乔治所学的不过是一些乱涂乱写的东西，他既不会盖房子，又不会种植果树”。特拉里这个“乱涂乱写”的人最后不再盲目地追求欧洲文明，而成为他父亲的翻译。

莫索索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苏托人的传统世界，“利发加勒”时代给这个世界以沉重打击；而欧洲人带来的新世界，在技术和军事方面都比传统世界高出一筹。面对两个不同世界，莫索索从实际出发，保留了旧世界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接受新世界中值得采纳的一切。

（康 昭 摘译）

